

总 序 一

基督教传入中国，可分四个时期：即唐代的景教为第一时期；元代的也里可温教为第二时期；明代的罗马天主教为第三时期；及至清代的基督教为第四时期。基督教教育在中国的发展始自 19 世纪，英人马礼逊牧师（Robert Morrison, 1782—1834）于 1807 年来华传教之时。由于中国当时采取闭关政策，严禁传教士进入境内传教，马礼逊牧师只得在马六甲开办一所教会学校，时为 1818 年，该校名为“英华书院”。办学之初，马礼逊的理想有二：一是为促进欧洲与中国语言文学上的相互沟通，让欧洲人士可以学习中国的语言及文学，也让华人可以学习英语，接受西欧文学与科学成就；二是透过学校教育，促进基督教思想在东亚和平的传播。

鸦片战争后，传教士开始积极在中国大陆兴办学校。一方面是由于他们传教的热诚，要促使“中国基督教化”；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借助在政治上取得的优势，可以在各通商口岸兴办学校，教会学校的数目因而剧增。根据晏文士（Charles Keyser Edmunds）《中国现代教育》一书的记载，1918 年中国基督教教会学校已达 6000 所，学生超过 15 万人，分布如下：

学校类型	数 目	学生人数
幼稚园	15	3, 196
初级小学	5, 276	133, 826
高级小学	575	19, 605
中学	233	12, 533
专上学校	28	1, 499
师范学校	56	不详
神道学校	31	985
职业学校	40	1, 409
孤儿院	49	1, 544

基督教教育事业因此构成了中国教育系统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传教士在中国兴办的幼稚园、中小学、师范学校、以至大学及研究院校，先后有一百多年的岁月，在中国教育、文化、医疗、科技、政治、经济等领域，影响至深且巨。今日研究中国近现代教育史、文化交流史，甚至是近代中国政治史、近代科学发展史、法律史或建筑史等，都可以在不同层面或多或少地接触到与基督教有关的课题。至于基督教教育的资料也逐渐地成为近代学者所留意和重视的目标，并作为他们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80年代开始，中国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国内学者对中国基督教史的研究兴趣愈来愈浓厚，尤其在基督教教育史方面的研究，更有显著的成就。1989年6月，在武汉举办中国40年来首次“中国教会大学史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章开沅教授对国内基督教教育史研究有如下评价：“无庸讳言，教会与教会大学曾与西方殖民主

义及所谓基督教征服中国的宗教狂热有过不同程度的联系，也正因为如此，教会大学曾引起中国知识分子的强烈反感和抨击。”他接着补充说：“但是，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种尖锐的批判虽不无事实依据，但却失之笼统与有所偏颇，因为它没有将教会大学作为主体的教育功能与日益疏离的宗教功能及至政治功能区别开来。……今天，我们已有可能并且应该排除民族情绪与历史成见中某些偏颇因素，更为客观地、全面地、科学地从事中国教会大学史的研究，从各个侧面与不同层次探索其发展流变与社会效应。”

近年来，国内学者先后多次举办国际性研讨会，即如 1991 年 6 月在南京师范大学举办“教会大学与中国教育现代化研讨会”；1993 年 10 月在武汉华中师范大学举办“韦卓民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1994 年 3 月在四川大学举办“教会大学与中国现代化学术研讨会”等。这些学术研讨会正是反映出中国学者正视过去的基督教教育事业，重新肯定基督教教育事业在中国社会发展历程上所产生的积极影响及成果。福建师范大学高时良教授在他的近著《中国教会学校史》一书中，明确指出教会大学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产品”。至于现代学者应如何看待基督教教育问题，高教授认为“应当全面地看问题，对它进行科学分析与总结。……既否定教会教育中的消极因素，又肯定其值得参考的经验，做到实事求是，对其办学成绩和具体问题作具体分析”。换言之，国内学者已积极采取客观和科学的研究方法，全面地、实事求是地从事中国近代基督教教育史的研究。

为了肯定国内学者近年研究的成果，以及进一步推广有关基督教教育的研究，华人基督教宗教教育促进会决定出版一套《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社会丛书》。促进会成立宗旨有三：一、联系香港及世界各地华人基督教宗教教育工作者，并藉资讯促进彼此之交

流；二、推动教会关注宗教教育，加强联络网；三、普及基督教教育研究的成果。该会自 1989 年在香港成立以来，曾积极接触从事教会工作或教育研究的信徒和学者，建立沟通的桥梁，达至相互的交流、促进基督教教育事业的发展。除分别举办学术讲座、座谈会、训练课程、研讨会外，还有出版《通讯》和编撰《迈向九十年代的基督教宗教教育》专书等工作，备受香港教育界尊崇。

至于国内联系方面，近年经常主动与国内学者接触，参与国内举办有关基督教教育各种学术研讨会，由是加强两地学者交流往来的机会。本丛书的出版计划缘起于 1994 年 3 月在成都四川联合大学举行的“教会大学与中国现代化研讨会”，其中一些来自大陆不同地区和香港的学者，相聚间谈起国内有关基督教教育研究的专论著述不多，尤以丛书形式出版的专书更少。鉴于现代中国社会极需有较客观、更科学化及实事求是的研究著作，应在有关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社会的课题方面作出深入研究。有见及此，学者建议彼此携手，共同撰写一套《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社会丛书》，以补这方面学术著作的不足。于是各位学者推举本人为丛书的主编，负责联系大陆、香港两地具有学术水平、专门研究基督教教育的学者，并策划有关出版事宜。本人适任华人基督教宗教教育促进会主席，蒙学者们错爱，遂答应肩负出版丛书的重任。返回香港后，本人先后联系大陆、香港学者共八位，分别是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史静寰博士、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研究所周洪宇博士、山东大学历史系陶飞亚副教授、南开大学历史系王立新副教授、福建师范大学教育系高时良教授、福建师范大学谢必震副教授、福建省教育科学研究所黄新宪先生、及香港信义宗神学院李志刚博士。他们均同意参加此项计划，并约定分工撰写下列七册专著：

(一)陶飞亚、吴梓明：《基督教大学与国学研究》

- (二) 史静寰、王立新：《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知识分子》
- (三) 黄新宪：《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社会变迁》
- (四) 高时良：《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科学文化事业》
- (五) 周洪宇：《基督教教育与中国教育的发展》
- (六) 李志刚《基督教教育与中国出版事业》
- (七) 谢必震：《基督教教育与近代中国妇女》

这项丛书出版计划,标志着大陆、香港两地学者首次携手合作,共同撰写有关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社会课题的专论。丛书的特色除了由两地学者共同撰写外,更是十分注重客观的研究及事实的陈述,尤其是从正面、系统地探讨西方传教士过往在 19 世纪至 20 世纪中叶(1807-1952)在中国社会所提供的基督教教育(包括教会或差会所办之中、小及大学机构),以及对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影响。各位作者尝试从不同的角度、多层次去探讨,目的是要将基督教教育过往在中国社会的发展及影响作出客观的论述和阐释,冀能引发更多学术思想的交流。本丛书为能符合一般学术著作的要求,各书均附有详细的注释和参考书目,以便读者进一步深入研究。

本丛书得以顺利完成,实赖各位作者的衷诚合作,不负所望,完成艰苦的撰写工作。1995 年初,适逢武汉华中师范大学章开沅教授在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从事学术访问研究,藉此难得机会,我们恭请章开沅教授执笔,为丛书作序,获赠鸿文,使丛书增添无限光彩,谨此衷心铭谢。

本丛书能如期出版,我们更须感谢香港圣公会诸圣堂等慷慨捐助教育专款作为丛书出版经费,并蒙福建教育出版社支持出版,乃底以成,谨此志谢。

吴 梓 明

于香港中文大学宗教系

1997 年 5 月 21 日

总 序 二

基督教与佛教、伊斯兰教一样，是源远流长且具有普世性的重要宗教之一。基督教在中国的流传也有一千多年的漫长历程，其间虽然多经严重挫折与长期停顿，但自 19 世纪中期以来，特别是在 20 世纪的 20 至 30 年代间，又复得到比较明显的发展。基督教的信徒虽然在数量上远远少于佛、回、道等业已完成本土化的各大宗教，但由于其兴办的各项事业渗透于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而且在不同程度上成为传播西方近代文明的媒体，因此所产生的影响之深远亦未可低估。

教育是基督教在华事业的重要部分，除了神学教育外还包括各个种类与各个层面、各种形式的世俗教育，而对中国社会影响更大的正是世俗教育。这不仅是就学校和师生总数而言，更重要的是世俗教育与社会生活关系密切，直接服务于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

无可讳言，早期的较低层次的基督教教育，多半是为传教或培养宣教人材而兴办。其中有些草创阶段的学校还具有救济与慈善性质，当然救济与慈善也被视为传递福音的信息，归根到底还是为了基督教的传播。由于 19 世纪中叶以后基督教在华传布受到不平等条约的支持与庇护，许多西方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知之甚少，

而且持有西方中心主义的傲慢态度，有些人甚至直接为殖民主义的侵略活动服务，所以“中华归主”之类的口号自然会受到中国民众的厌恶与抗拒，被解读为西方侵略者“征服中国”的同义词，乃至激起 20 世纪 20 年代风起云涌的非基督教运动，而基督教各类教育事业亦曾受到严重的冲击。

但是，与任何异质文化之间的交流都存在着冲突与融合、排拒与接纳两种趋向一样，上述情况只是基督教在华事业遭遇的一个方面。在另一方面，基督教内部也存在着逐渐加强理解、吸收中国文化的顺应趋向，与此相应的则是很早就出现了中国基督教“自传、自治、自养”的主张，以及其后“本色神学”探讨热潮的兴起。历经多次反复的激烈碰撞乃至对抗，从 20 世纪 20 年代后期开始，以各级基督教学校向中国政府教育部门注册为标志，基督教教育迅速走上本土化、世俗化和知识化的道路。对于这条道路的选择，其利弊功过在基督教内诚然有激烈的争议，因为世俗化的结果必然是教育功能的迅速彰显与宗教功能的日益淡化。但从基督教教育事业，特别是高等教育事业的自身发展而言，唯有世俗化才能赢得政府与民间更多的认同和支持，否则便很难承受公立学校与其他私立学校的强力竞争，甚至连继续存在都会受到严重威胁。前些年我在美国教书时，有的天主教大学知道我正在研究中国教会大学史，便邀请我参加座谈会。我曾谈到中国教会大学之所以一度得到迅速发展，是由于它们的决策注意到：（1）努力满足社会需要；（2）利用有限资源，着力办好两三个领先于全国的有特色的专业，决不追求“大而全”。这些天主教大学的同事对此备加赞赏，因为他们的学校也正面临类似的困难抉择，而从学校自身来说，存在与发展毕竟是性命相关的首要问题。后来我到台湾东海大学访问，知道夜间部的创办对该校的发展厥功甚伟，但却受到有些教会人士的指责，称之为“不务正业”、“偏离了办

学宗旨”。这或许也可以看作为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世俗化问题的争议在台湾的延续。

但无论如何，世俗化毕竟为基督教教育事业增添了活力，开辟了通向社会并为社会所认同的道路，同时也为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发挥了自已应有的作用。虔诚而多少流于偏执的基要派必然不会同意这种说法，因为他们认为福音的传播主要得靠个人与上帝的直接对话，颇为近似传统儒学所一贯提倡的“内省”。但现代神学的诠释早已多元化，把基督教精神外化为世俗精神，把“Serve God”与“Serve the Society”统一起来，把“与上帝对话”，溶于“与人民对话”之中，也未尝不能促使基督教得到复兴，至少是可以发扬基督教文化的优良部分。或许可以说，也正因为如此，基督教教育才能对中国社会的走向现代化发挥更大的作用。

由吴梓明博士主编的《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社会丛书》，经由福建教育出版社鼎力协助出版，正好为我们研究上述这些问题提供一套重要的参考书。这套丛书的作者都是多年从事基督教教育研究的学者，他们分别从中国知识分子、科学文化事业、教育的发展、社会的变迁、出版事业、近代妇女、社会服务等不同层面和不同角度，深入探讨基督教教育在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角色和作用。这些选题虽然未能包括基督教教育的全部内容，特别是没有专门论述基督教的神学教育，但是大体上涵盖了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社会关系最为密切的主要方面。因此，通过这套丛书，读者对于基督教在华教育事业将可获致比较客观而又深刻的认识。

我对基督教教育的研究侧重于高等层次，深感基督教教会在中国创办的十余所大学很有成绩，在专业人材培养与新型学科的开拓两方面都有重要的贡献。如果仅就教会大学的教育功能着眼，它们与亚洲其他地区的教会大学相比较，自有其优胜与成功之处。正如一些中外学者所曾指出，教会大学已经发挥其应有的历史作

用，不仅培养了大批新型人材，开创了许多新兴学科，而且它们的校园、建筑、设备、图书乃至留校服务的师生，仍然为新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继续作出贡献。同时，教会大学还留下许多成功的或失败的办学经验，这也是一笔丰富的历史遗产，只要加以正确总结，便可成为当前深化高校教育改革的重要借鉴。

1979年以来，由于出国机会较多和任职学校的历史渊源，使我得以结识许多以前曾经在中国教会大学长期服务的教职员及其子女。根据我的了解，他们虽然在1950年前后离开中国，但绝大多数对中国和中国人民怀有深厚的感情，并且衷心希望中美两国恢复正常邦交与加强经济文化交流。以燕京大学夏仁德教授（Dr. R. Sailer）为例，他不仅敢于在朝鲜战争期间，公开同出席联合国安理会的新中国代表握手祝贺，而且还不顾横行一时的麦卡锡主义的威胁，在《纽约时报》发表公开信，强烈谴责美国飞机轰炸上海的野蛮行径。1982年秋天，我有幸在华盛顿郊区他的儿子家里小住数日，这位在中国出生的“传教士第二代”，当时正担任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副主席，在繁忙的律师业务之余，尽心尽力地推动美中两国人民的友好交流。我们曾一起满怀激情地大唱当年流行于教会大学校园的各种歌曲，包括迎接解放的革命歌曲。歌声使我们回到风华正茂的青春岁月，歌声也唤醒了我们之间沉睡已久的固有情谊。类似的事例我还可以举出好多好多，无论是我个人的生活体验，还是通过中外历史研究的心得，我永远相信世界上的好人占绝大多数。对于那些无怨无悔地把自己的青春，自己一生中美好的岁月，都奉献给中国教育事业的外籍教会人士，我们没有理由不给予以应有的尊敬。

我之所以要说这些似乎“题外”的话，是因为我们过去对基督教在华教育事业的评价常失于偏颇，而其实对它们的切实研究非常不够，甚至缺乏起码的了解。现在，我们应该也有可能力求

客观地、也更为超越地研究这个历史课题，使人们获致比较符合当年实际的全面理解。基督教并非专属于西方，它也属于世界，是人类文化总体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不能老是把基督教视为外来宗教，其实它与佛教、伊斯兰教一样，已经逐步融入中国社会，充其量只是有时间长短、程度深浅、范围大小的差别而已。基督教教育，经过几代中外人士一百多年的努力，早已不是外来事物，而是中国文化遗产的一部分，我们不可以不加珍惜而随便唾弃。即便是基督教神学教育，除狭义的教育功能外，更具有满足一部分人民灵性生活需要的宗教功能，我们也不可以简单粗暴的态度随意加以否定。我认为，基督教教义的正常宣传，特别是多年以来基督教内有识之士对于汉语神学的艰苦探索，也属于中西文化的交流与相互融合，在不同层次和程度上丰富与促进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在大力提倡研究传统文化与世界文化的今天，我们完全有理由加强对基督教文化，特别是中国基督教文化的研究，剔除其糟粕，吸收其精华，必将有益于当前的人文精神重建。

是为序。

章 开 沅

于香港马料水客舍

1995年夏

导 言

近代史上，中国基督教大学在传播西方文化方面的重要地位现在逐渐被学术界所认识了。^①不过，人们对这些大学的学术功能的认识，还是不完整的。因为它们不仅仅是介绍和教授西学的机构，它们在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和哲学等方面的教学和研究中也曾起过重要作用，而这一点常常被它们在输入西方的宗教、科学知识和教授西方语言方面的突出功能遮没了。

因此，这方面的探讨即使在对中国基督教大学早有研究的英语著作中也不多见。20世纪50年代初期，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组织撰写的一批关于基督教大学的著作中，可能由于作者更重视记录学校的全面情况，特别是西方人在学校中的活动，对教会大学的国学教研谈得不多，即使论及也是相当简略的。在后来的关于教会大学的学术著作中，鲁珍晞（Jessie G. Lutz）的《中国教会大学史 1850—1950》和魏思特（Philip West）的《燕京大学与中西文化》都比较早地涉及了这个问题。^②1995年由北京大

① 本书在广义的层面上使用基督教大学或教会大学这两个名词，即本书所指的这类大学不仅包括了基督新教也包括了天主教在中国办的大学。

② Jessie G. Lutz: *China and the Christian Colleges, 1850-1950*.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1. Philip West: *Yenching University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 1916-1952*,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学出版的陈毓贤的《洪业传》则记载了一个在教会大学中国历史文化学科的建设方面做过大量工作的燕京大学教授的生平，展示了当年燕京在开展国学教研方面的努力。^①但是总起来看，在西方学者的论著中，对这个方面的活动始终没有展开探讨。

近年来关于教会大学历史的中文出版物中，张寄谦、陈时伟、王运来、何建明、陶飞亚和刘家峰等先后论述了燕京大学、金陵大学、辅仁大学和齐鲁大学的国学研究活动，表明了随着教会大学研究的发展，中国学者接触了大量的原始资料，特别是教会大学档案资料之后，对这一个领域的探讨在不断深入。但是，如果把教会大学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对它们在这方面的活动，还应该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考察。

因为，从历史上来看，这方面的活动不仅牵涉到基督教大学的教学水平、学术水平，而且还有一个如何看待和对待中国文化的问题，简言之就是外国传教士创办的基督教大学的学术性和民族性的问题。后者在国立大学和其它私立大学都不会引起激烈的争议，而在外国人办的基督教大学中则完全不同了。早在清末，强调神学、重西学、轻中学一直是教会学校和教会大学为人诟病的缺点。在 20 年代的非基督教运动中，教会大学轻视中国文化的批评更是一时人言汹汹，认为这就是“文化侵略”的一种突出表现。20 年代末 30 年代初，教会大学向国民政府立案时，加强中国文化的教育也就成为一项特别的要求。一直到 50 年代，在因抗美援朝而激发起来的批判美国对中国文化侵略的运动中，仍然隐含着这方面的内容。因此，是否重视中国文化的教学和研究，是与教会大学“文化侵略”的恶谥联系在一起。

^① *A Latter Day Confucian: Reminiscences of William Hung 1893-1980*. 此书也有中译本。

那么，认为这些大学轻视中国文化的教育与研究的看法是否符合实际呢？作为办在中国的大学，它们究竟如何对待中国文化呢？这就是我们今天探索的出发点。美国学者柯文（Paul Cohen）在《在中国发现历史》中曾经提出西方学者要从中国社会的内部因素来考察和解释近代中国历史运动的过程。如果注重近代历史发展中的中国“内因”这一点也能为我们所接受的话，那么，我们在考察教会大学历史的时候，为什么不能既看到教会大学发动者们的动机和要求，更注意到教会大学与中国社会的互动关系及其实际结果呢？过而言之，即使是教会大学创办者们的动机也不可能完全从自己的要求出发，因为文化教育的对象是人，高等教育面对的是具有相当认知水平和选择能力的青年人，他们与学校是一种双向选择的关系，学校教育必须满足他们求知与走向社会的要求。因此，教会大学的办学目标中必须包括这些青年人的目标。事实上，教会大学受到两种力量的牵引，一是西方的教会，一是中国社会。就前者而言，教会大学的资金大部分来自西方教会，在政策上当然要受到他们的影响。就后者而言，教会大学的学生绝大多数要走向中国社会，因此它们的教育方针不可能不受到中国社会的影响。中国教会大学的特殊性可以说是背靠西方而面对中国。近代中国的学术变迁，就业市场的需求，各类大学之间的竞争，中国的政治运动等等都会影响学校的发展进程。其中，反对“文化侵略”的运动就是一个显著的例子。

其实，反对“文化侵略”的口号，正如中国近代史上许许多多的流行语，如“中体西用”、“全盘西化”等一样，它是中国的文化教育领域受到西方冲击后在知识界激起的一种强烈反响。多年以来，学术界在分析和评价西方在华文化活动时，一直在使用或者在部分地试图否定这个政治断语，但却忽视了这个口号本身应该是历史研究的对象，只注意到了它的政治含义，却忽视了它

的历史内容和历史意义。反对“文化侵略”到底反对什么？反对西方的文学艺术、科学技术吗？显然不是。按当时的资料来看，它的内容是：第一，反对外国教会控制中国教育，并且形成独立于中国教育体制之外的教会教育体系；第二，反对教会学校宗教与教育的不分离；第三，反对教会学校宣扬西洋文化轻视中国文化，造成学生仰慕西方的心理。借用今人的话来说，就是教会大学到底为谁培养接班人，是为中国还是为西方？是为教会还是为社会？这种提法在今天看来可能有点绝对，也可能有点“社会主义研究还幼稚的结果”，^①但对教会大学的培养方法和方向上的问题是一针见血地提了出来。中国文化的教学和研究则是这个问题的关键内容之一。不过，学术界过去往往注意到了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却不太关注运动之后静悄悄的改革和变迁。

因此，本书的任务就是在近代中国教育与学术的演进过程中，讨论那些不太为人重视的、但却在其自身历史和中国学术史上占有一定地位的教会大学在中国文化方面的活动。希望本书的研究能为全面认识教会大学的学术功能，认识教会大学中中外学者的努力提供一些新的内容。其中当然也包括了对其学术发展的时代局限性的讨论。

本书的研究对象主要包括 13 所新教大学和天主教會的辅仁大学，讨论的内容限定于教会大学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教学和研究，也就是 20 世纪以后人们习称的“国学”。本书将按历史顺序展开论述：第一，将考察早期传教士、教会学校到教会大学究竟是如何对待中国文化的；第二，分析它们的教学和研究政策前后所发

^① 田汉：“日本学者对‘非宗教运动’的批评”，《少年中国》三卷九、十期，1922，4—5，转自辽宁大学哲学系编《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1981年版，第一集第十一册，第486页。

生的变化及其原因；第三，将具体地探讨各个教会大学在国学研究方面所开展的活动，它们的成绩和它们的局限，以及一些著名学者的活动；第四，将讨论以国学教研为重点的，教会大学适应中国社会的努力及外在政治因素对学术发展的影响；最后将回顾对教会大学学术遗产的评价。在研究资料方面，本书尽可能利用这些大学的原始材料，其中包括了档案、档案资料选辑、各校的出版物、曾在教会大学工作过的学者的论著以及当时报刊关于教会大学的报道。近年大量出版的当年师生的回忆资料也在参考之列，尽管这些回忆文章与本世纪 50 年代初的批判相比，似乎走向了两个极端，但综合起来看还是有相当的价值。本书也参阅了其他中外学者的研究成果，引用资料均在注中说明。

本书的计划始于两年多前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两位作者分别在香港和济南从事中国教会大学史的研究，对教会大学的国学教育与研究都有特别的兴趣，决定利用两地资料开展一项合作计划。1995 年初夏吴梓明博士专程访问山东大学，得到山大热烈支持，与陶飞亚确定了这项合作计划的内容与分工，分别在两地着手工作。

本书的写作曾得到多方面的支持。华中师范大学中国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心主任章开沅教授与美国研究中国基督教史的著名学者裴士丹教授(Daniel H. Bays) 对此项研究给予了热情支持和鼓励。梁元生教授、狄德满教授(Gary Tiedemann)、何伟业教授(James Hevia)、山东大学教授路遥、郑佩欣、孟祥才、李德征、宋家珩、王学典、副教授刘天路和张书学等曾对这一研究提出许多宝贵的意见。美国耶鲁大学档案馆馆长史玛莉(Martha Stalley)、南京大学任利剑、西南民族学院秦和平、苏州大学许周鹤、南京师范大学孙海英、山东大学王伟、李磊等先生曾为作者提供了重要的资料。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承蒙美国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

合董事会(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资助, 山东大学及历史文化学院慨准赴外学术研究, 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的妥善安排, 使作者之一陶飞亚能亲来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访问半年, 与吴梓明博士共同完成了此书的数据整理及撰写工作。最后, 本书能够获得香港华人基督教宗教教育促进会接纳, 作为《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社会丛书》之一, 并得到福建教育出版社副总编黄旭先生、编辑陈天正先生及《教育评论》杂志社黄新宪先生的大力协助, 得以顺利出版。在此, 谨向所有帮助过作者的学者和学术单位表示我们最衷心的感谢。

陶飞亚、吴梓明
于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
1997年6月1日

第一章

源头:早期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研究

考察 20 世纪教会大学对中国文化教育和研究的起点，必须要谈到 19 世纪传教士在这方面的活动。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多种多样的，有些有直接的联系，有些只有间接的联系，但只有从这些源头看起，才能观察出这个潮流的发展和变化。

一、近代以前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研究

十六、十七世纪，西方国家通过海路向中国和东南亚进行贸易和扩张它们的势力。西方传教士也就在这个时候飘洋过海来到东方。他们看到了一个全然不同的社会，一种全然不同的文化，看到了许多中国人自己习而不察的东西。为了在这个社会中传播宗教，他们必须研究传教对象的社会风俗、历史文化。这样，传教士的中国文化研究，西方汉学的源头之水就开始缓缓地流淌起来。

最早是西班牙奥斯定派的传教士门多萨（Juan Gonzalez de Mendoza, 1540 -1620）于 1585 年出版《中华大帝国史》，作者本人没有到过中国，他是根据奥斯定派和方济各派传教士在菲律宾、

广州的经历和见闻写成此书。他在书后附有当时传到欧洲的最早的汉语资料。

但真正为西方的汉学开辟了道路的，应该是意大利的来华传教士。利玛窦被公认为西方中国学的鼻祖。他把中国的《四书》译成了拉丁文，他写了《耶稣和基督教传入中国史》。利玛窦之后，耶稣会士金尼阁神父（Nicolas Trigault, 1577—1628）1610年到北京，他把利玛窦的罗马字拼音方案加以修改扩充，出版了一部精辟的语言辞汇集，其中的汉字按音调和音素用欧洲字母转写，这就是最早的汉语拉丁字母的拼音方案《西儒耳目资》，于1626年在杭州刊印。这部著作在中国学者中轰动一时，激发了中国学者对音韵学研究的兴趣。^① 龙华民神父（Nicholas Longobardi, 1559—1654）的意大利文著作是《论中国人宗教的某些问题》，该文在欧洲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奥地利人卫匡国（Marti Martini, 1614—1661）于1654年出版《鞑靼战争记》，1658年出版《中国上古史》，并发表了《中国新舆全图》。

从17世纪下半叶起，法国传教士开始在欧洲的中国学中充当主角。这里可以列出许多著名的人物和他们的著作。张诚（Jean Francois Gerbillon, 1654—1707）本人并没有出版专书，但他关于中国情况的日记为杜赫德（J. B. Du Halde）所编的《中华帝国全志》提供了材料。李明（Louis Le Comte, 1655—1728）1692年返回法国后出版了《中国现势新志》。白晋（Joachim Bouvet, 1665—1730）著有《康熙皇帝传记》、《中国现状》等书。法国传

^① 金尼阁：《西儒耳目资》，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年版，见“内容说明”；该书是迄今为止仅有的由西方人写作而被视为中国学术名著的一例，见《中国学术名著提要·语言文字卷》，《中国学术名著提要》编委会编，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48页。

教士冯秉正(Joseph Anne Marie De Mailla, 1667—1748)从传播宗教的观点出发,根据《通鉴纲目》,《续通鉴纲目》和其它有关资料编译成《中国历史》十二卷,于 1777 年至 1783 年在巴黎出版。冯秉正的《中国历史》迄今仍然是西方国家历史著作中卷帙最大的一部。后来的西方学者如高第(Henri Cordier, 1849—1925)等人所写的中国历史中关于清代以前的部分多取材于此书。

被称为 18 世纪法国最大的中国学家的宋君荣(Auoine Gaubil, 1689—1759)曾在北京度过 37 年,熟练地掌握了汉语和满语。他的研究著作中包括了《从成吉思汗到满清帝国全史》、《中国纪年》和《大唐帝国史》等许多著作。他是巴黎科学院和金石与美文学院的通讯院士,也是圣彼得堡皇家科学院的普通院士、伦敦皇家科学院的特聘院士。

18 世纪最后一位来华传教士中国学家是钱德明(Jean Joseph Marie Amiot, 1718—1793),他在北京居住 42 年,特别以《中国古今音乐篇》、《满文—法文辞典》和一部多种语言的辞典而著名。他的许多介绍中国情况的文章已经刊布于《中国杂纂》中了。

明清之际的传教士向西方介绍中国文化,在西方,特别是法国革命前所产生的影响,在中国和西方的著作中已经有了充分的研究。^①值得考察的是传教士研究东方文化的推动力,也就是说,为什么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使命会落在传教士们的肩头。从整体上来说,这是和西方特定的社会结构和联系的。中世纪以来的教会一直是欧洲学术文化的中心。教会建立和控制各种学校,一直到近代都是欧洲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教育和宗教、科学和宗教

^① 参见宋谦之:《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3 年版;〔法〕安田朴、谢和耐等著,耿升译:《明清间入华耶稣会上和中西文化交流》,成都,巴蜀书社 1993 年版。

经常在同一个机构中成长和发展、冲突和斗争。这种情况甚至在欧洲资产阶级革命以后仍然部分地保留下来。在文化交流中作出巨大贡献的耶稣会是一个非常重视文化传教的修会。耶稣会传教士历来以较高的文化水准和科学能力而享有盛誉。利玛窦从小在耶稣会办的日耳曼公学、著名的罗马公学等学校学习包括神学在内的各门学科。后来曾在印度果阿进修神学的同时学习钟表、机械和印刷手艺。他本人在数学和哲学方面有特别的兴趣。^① 当时在北京的法国耶稣会士几乎都是天文、物理、自然史学、地理学、数学等方面的专家。同时他们也是一些卓越的语言学家，几乎很快就掌握了汉语，许多人还学会了满语。1685年6名非常博学的耶稣会上曾荣获“国王数学奖”的尊号，都被接受进了科学院。他们每个人都得到了一道国王敕令，命令他们“改进科学和艺术”。^② 和传教士过从甚密的晚明两朝内阁首辅叶向高曾说过，西来之传教士皆“绝世聪明之人”，“其技艺制作之精，中国人不能及也”。^③ 因此，这些人多方面的才华和学术素养使他们在观察介绍中华文化时具备了相当有利的背景条件。

不过，传教士介绍中国文化正如他们向中国介绍西方科学一样，在学术目的之外，国家的政治动机也许具有更强大的推动力。17世纪中期当法国政府注意到远东地区时，要求耶稣会神父在北京创建一个法国传教区，并要求“该传教区按照由利玛窦及其继任者采纳的布教策略，力求与中国掌权的绅士阶层保持联系并研

^① 裴化行著、管震翻译：《利玛窦神父传》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年版，第20、32页。

^② （法）安田朴、谢和耐等著，耿升译：《明清间入华耶稣会士和中西文化交流》，第169页。

^③ 叶向高：《西学十诫初解序》，转自孙尚扬：《基督教与明末儒学》，北京，东方出版社1994年版，第153页。

究中国文明。”法国学者戴密微（Paul Demieville）评论说“这种研究的目的在于彻底地了解中国以便更好地使它归化，而同时还有一种完全是科学方面的目的，这就是推动更透彻地认识中国，这并不是为了有益于中国，而是使欧洲受益。”^①欧洲彻底地认识中国是否也对中国有益，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但至少在这里可以看到的是传教士充当了汉学研究的先驱，而在当时的条件下也只有亲身来到中国的传教士可以担当起这个历史的任务。

但是，耶稣会士 1764 年在法国遭到禁止，1773 年被罗马取缔。另一方面清朝廷从康熙开始，经雍正和乾隆逐渐加强力度的禁教政策，也使得整个天主教传教活动在中国走上了下坡路。钱德明之后，耶稣会在中国的教务一蹶不振了。天主教传教士开端的汉学研究也就此衰微下来，但是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研究所表现出来的热情和勤奋，以及他们的不朽成果已经在历史上留下了永久的痕迹。

二、晚清传教士对中国的考察

19 世纪开始，随着欧洲和北美工商业的发展，通商贸易、殖民扩张成为当时世界的历史潮流。更多的传教士梯山航海下东洋。中国再度成为传教士写作的主题。如果说明清之际传教士关于中国的研究还能数得过来的话，那么晚清传教士有关中国的著述已

^①（法）安田朴、谢和耐等著，耿升译《明清间入华耶稣会士和中西文化交流》，成都，巴蜀书社 1993 年版，第 168 页。

经多得不可计数了。费正清曾经提到，伟烈亚力（Alexander Wylie, 1815-1887）统计了 1867 年在华的 338 名传教士所印行的出版物，其中仅以中文发表的就有 787 种。^① 传教士成为多产的写作者，担当了向西方社会介绍中国文化的角色。就他们自身的条件来看，这种情况也并非偶然。毫无疑问，早期传教士对中国社会文化的研究，有许多不利的条件。首先，他们大多数人对中国的语言文字所知不多，其中有一些例外，如马礼逊父子被称为当时欧洲最通晓中文的人才，理雅各（James Legge, 1814-1897）“谙习中文”“深通中国文字”，郭士立（Charles Gutzlaff, 1803-1851）擅长中文且能讲官话和几种方言，但是学好中文毕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当时人就说过他们用中文写的东西“词义不可甚晓”^② 马礼逊（Robert Morrison, 1782-1834）自己承认中文知识有限。在这种条件下要完全理解中文资料显然是有困难的。其次，他们是外国人，是在基督教文化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作为外来者，要洞察有几千年历史，包含了儒佛道多种因子的中国文化与社会是不容易的。再次，他们是在资本主义文化蒸蒸日上的时代来到中国的，西方民族社会发展方面的优势，必然在他们的心理上造成强烈的优越感，在观察东方时自觉或不自觉地产生产某种程度的偏见，把一孔之见夸张为普遍结论。但是，作为冷眼旁观的外来人，他们的研究也有显然的优势。

第一，一般来说传教士都受过比较好的教育，大部分男传教士毕业于各种学院。据福赛斯（S. A. Forsythe）的研究，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美国公理会在华北的 101 名传教士中，除两人之外

① Suzanne Wilson Barnett and John King Fairbank edited: *Christianity in China: Early Protestant Missionary Writings*, Cambridge, Mass, 1985p

② 萧令裕：《英吉利记》，见《小方壶斋舆地丛书》。

都进过大学，他们得过 35 个学位，其中有 9 个是硕士学位，大部分人有大学学历。女传教士中 7 人有大学学历，3 人有硕士学位。相当数量的传教士女眷在各种各样的“神学院”和社区学院学习过。有 12 名妇女看来仅完成了高中教育。^①，他们所受到的关于一般问题的观察、思考和研究方法的训练，使他们在收集材料和理论的抽象分析方面已经具备了一定的基础。虽然他们在自称以理性精神审视东方文化时，终究难免自身的偏见和局限，他们毕竟要比科举体制下的多数中国知识分子有更广阔的知识面和理解力。

第二，传教士长期生活在西方文化的环境中，他们对中国的一切都感到新鲜。一个初到中国的传教士曾经不无夸张地说过除了风声雨声和婴儿的哭声，中国和西方相比是太不相同了。他们会对中国人熟视无睹的现象去思考和研究。用现在的话来说，他们有条件进行比较研究，经常是在东西方情况的比较中，发现了中国人习以为常而自身感受不到的东西。

第三，比起中国知识分子来说，传教士享有前者从未有过的学术研究的自由。他们可以对历史的和现实的各种问题进行批判性的研究，而不用担心各种各样的“文字狱”或“文网”。当然，这里的批判除了政治和文化意义上先进和落后的评判外，还包括了后来者对前人的文化进行学术上的审视。对中国人来说，传教士的许多论述是离经叛道之论，但也是发人深思的新论。

第四，在鸦片战争前后，基督教传教士的文化活动中，一些中国人曾参与其间，许多译作和著作如果没有中国人的努力是不可能搞成的。在传教士初至中华语言不通的情况下，一些中国人

^① S. A. Forsythe: *An American Missionary Community in China, 1895—1905*.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1971, P12.。

冒着被清政府处死的危险为他们教授中文。^①如任光明、李先生（其名不详）及其子女曾担任马礼逊的官话和粤语教师。^②后来的如王韬、沈毓桂、李善兰等，实际上是得风气之先的有识之士。这些译作是一些中国人和西方传教士共同劳动和创造的结晶。

因此，19世纪以来传教士对中国的研究，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非儒家文化圈的知识分子对中国文化的探究。借用“旁观者清”这个说法，他们的研究中有中国人“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而看不到的新鲜东西。在此不可能全面介绍传教士的研究，只能着重看一些著名的传教士中国学家。他们的成就是传教士研究中国的里程碑。其中一些最突出的人物，成为西方国家近代汉学的开创者。他们的研究如果按内容来划分的话，大致可分为这样几类。

第一类传教士在中国的语言文字方面完成了许多开创性的工作。

语言是传教士布道的基础，传教士需要能对中国人说中国话，早期来华传教士不得不攀越这道万里长城。1807年来中国的英国传教士马礼逊首先致力于这项工作。从1808年起，他在把《圣经》译成中文的同时，开始编纂《华英字典》。1815年出版了第一卷，1823年出齐，总共6大本，合计4,595页。^③1815年马礼逊出版了英文版的《汉语语法》，1828年出版了英文版的《广东土话字汇》一书。1835年到上海的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Walter H. Medhurst, 1796—1857）在鸦片战争后出版了《汉英字典》和

^①许地山：《达衷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版，第138—146页，转自李志刚：《基督教与近代文化论文集》，台北，宇宙光出版社1992年版，第16页。

^②马礼逊夫人编：《马礼逊生平 and 事业回忆录》，第1卷，第163页、168页；第2卷，第13页；清江理：《马礼逊小传》，第15页。

^③夏燮：《中西纪事》第8卷，第10页；第16卷第5页。

《英汉字典》。麦都思著作丰富,涉猎广泛,仅中文著作就有 59 种,英文有 27 种。他还在上海建立了中国第一个新式印刷所。他被看成是 19 世纪英国中国学的奠基人之一。

英国人之后,美国人也在编辑字典方面出力不少,他们对于各地的方言,如广东话、福州话、宁波话、北京话等都有著作。1833 年来华的美国公理会传教士、后来成了美国驻华公使的卫三畏 (Samuel Wells Williams, 1812—1884) 自学汉语,成了汉语方面的专家。他编著的汉语语法书籍有《简易汉语教程》(1842 年)、《汉语拼音字典》(1874 年)等。这本字典和他的《汉语拼音字典》是过去外国人研究中国的必备之书。其它研究中文语法的还有晏马太 (Matthew Tyson Yates, 1819—1888), 1871 年他出过一本《汉语基础》。富善 (Goodrich Chauncey, 1836—1925) 是卫三畏之后研究中文语法的美国传教士。他 1865 年来通州传教,后来主要从事教书和翻译。曾任华北协和大学教授和神学科长达 25 年。他用了 29 年的时间把《圣经》译成蒙文,并编写《富善字典》。后来随着传教士来华日久,逐渐出现了专门研究民俗语言的《汉语谚语俗语集》、《拉丁化宁波口语旧约》等。1890 年出了两本学北京话的工具书。其中狄考文 (C. W. Mateer, 1836—1908) 编写的《官话读本》篇幅达 700 多页,体例完备。狄考文在前言中预言说:“总有一天,丰富、准确、高雅的官话会成为中国流行的口语和书面语言。”^①该书因其实用性强,曾经再版了好几次。一直到民国期间还被燕京华文学校当作对西方人进行中文教育的重

^① Charles H. Corbett, *Shantung Christian University (Cheeloo)*, 1955, New York, p. 129.

要教材。^①

第二类传教士的贡献在于把中国经典介绍到西方。

鸦片战争前，四书五经已经被介绍到西方，但是除了拉丁文之外，还没有其它欧洲语言的译本。1840年以后，一批传教士致力于翻译介绍中国的经籍。其中特别著名的有英国传教士理雅各 (Legge James, 1814—1897) 和艾约瑟 (Joseph Edkins, 1823—1905) 德国传教士花之安 (Ernst Faber, 1839—1899) 和尉礼贤 (Richard Wilhelm, 1873—1930)

理雅各 1840年到中国，不久出任香港基督教英华书院的院长，开始从事中国典籍的英译，曾立志“深究中国学术”。^② 他的译本名为《中国经典》(The Chinese Classics)。从 1861年到 1886年的 25年间，他在王韬等中国助手的协助下把中国的“四书”、“五经”全部译成英文。译完儒家经典后，理雅各继续翻译中国的其它名著，先后译出道家的著作，如老子的《道德经》、庄子的《秋水篇》和《太上感应篇》，以及其它一些文学作品，如屈原的《离骚》等。晚年他还在致力于《楚辞》的翻译。^③

艾约瑟 1848年来华。他所翻译的中国典籍包括《借靴》(琵琶记)、《素问》、《道德经》、《旧唐郭子仪传》，内容有戏剧、医药而至哲学、史学，可见其兴趣之广泛。^④

花之安是德国传教士，1865年受德国礼贤会派遣来华传教，后加入德国同善会，1898年在青岛传教。因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爱

^① 美国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档案缩微胶卷，第 315 盒 4821 份，第 599 页。以下简称“联董档案缩微卷”，并略去“盒”“份”字样。

^② 罗香林：《香港与中西文化交流》，中国学社 1961 年版，第 25 页。

^③ Helen E. Legge: *James Legge, Missionary and Scholar*, London: Religious Tract Society, 1905

^④ 王尔敏：《中国文献西译书目》，台湾商务印书馆，1975 年出版。

好，他极力推崇明清耶稣会士所主张的“孔子加耶稣”的口号。传教期间，他热衷于对中国古代宗教与哲学的研究。他把《论语》、《孟子》、《列子》、《墨子》等书译为德文。

尉礼贤属于德国同善会。1899年来山东青岛传教，1920年回国。在华期间，他通过对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考察，对“中国生活全体之和谐精神”叹为观止，决心要“研究此种精神之起源”。^①由于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兴趣，他先后创办礼贤书院和尊孔文社，并在中国学者的帮助下开始翻译中国古代经典。他翻译成德文的中国经典有《论语》、《孟子》、《大学》、《中庸》、《礼记》、《道德经》、《列子》、《庄子》、《墨子》、《易经》、《吕氏春秋》等。他的译著有些和花之安的重复，但译文质量较高，成为中国经典德译本的权威版本，迄今仍在不断再版发行。除了译出中国经典外，他还翻译出版了《西游记》、《三国演义》、《三言两拍》、《聊斋》、《搜神记》、《封神演义》和《列国志》的部分章节，分别载入其所编的《中国民间童话》和《中国学》杂志。

这里还必须指出的是上面两类传教士，不仅是字典的编撰者，中国经典的翻译者，而且还是重要的中国问题研究者。马礼逊于1819年在马六甲出版了一部《中国大观》^②记述了中国的社会情况。1848年卫三畏出版《中国总论》一书，对中国的地理、人民、政治、历史、社会生活和文学艺术都有明确的叙述，并附有他绘制的中国地图。他在序言中说，他要消除一般肤浅作者对中国的轻蔑讥笑态度。^③该书后来被美国各大学采用为中国史课本几乎

^①《尉礼贤行述》，转自《中德关系史文丛》，第51页。

^②马礼逊：《中国大观》，1817年澳门版：绪言，第1页。马礼逊写道“这部小册子中的材料，最初是计划作为中文词典附录的。”

^③谭维理：《1830年至1920年美国人之汉学研究》，《清华学报》，新二卷第二期，台北，1961年6月，第287，289页。

达一个世纪之久，是美国人研究中国的必备书，前后几次再版，影响了几代美国人的中国历史观。理雅各写作了《中国人关于神鬼的概念》（1852）、《西安府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考》、《法显行传》（1856）、《中国编年史》、《孔子的生平和学说》（1867）、《孟子的生平和学说》（1875）、《中国的宗教：儒教和道教评述及其同基督教的比较》（1880）等著作。前面提到的花之安对中国学术的研究，尤以史前史方面最富有创造性，曾以英文撰写《史前中国》（*Prehistoric China*）一书。花之安还是《白西徂东》的作者。该书由上海的“广学会”出版，单是在 1897 年至 1911 年之间，即发行 54,000 多册，列为“广学会”出版书籍之冠。他曾用英、德文著有《儒学汇纂》、《中国宗教学导论》、《中国著名男子名录》、《从历史角度看中国》、《中国古代社会主义的重要思想——哲学家孟子的学说》、《孟子的思想——基于道德哲学的政治经济学说》及《中国史编年手册》等，因而被加拿大来华传教士季理斐（*Mac Gillivray, Donald, 1862—1931*）在其《基督教新教在华传教百年史（1807—1907）》一书中赞誉为“19 世纪最高深的汉学家”，就连一向看不起外国汉学家的辜鸿铭对花氏也另眼相看。同样，尉礼贤还撰写了《实用中国常识》、《中国精神》、《中国文明简史》、《中国经济心理》、《中国哲学史纲》、《老子和道教》、《中国文化史》等多部著作。1922 年尉礼贤为研究中国文化再次来到中国，任德国驻华使馆顾问并兼任北京大学教授，得以结识蔡元培、梁启超、胡适、罗振玉、王国维等中国学者。胡适在日记中称尉礼贤“对于中国学术，有一种心悦诚服的热诚，故能十分奋勇，译出十几部古书，风行德国。”^① 1924 年尉礼贤返回德国任法兰克福大学中国文学及文化讲座教授，并且创办了中国学院。尉礼贤为中德

① 《胡适的日记》，中华书局，1985 年，上，第 441 页。

思想文化交流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德国乃至在欧洲享有盛名，被看作德国汉学界的泰斗。

第三类传教士是中国社会的观察者。

这部分传教士可以分为两种情况。一种人是为使西方人和西方社会了解中国而写作，其中明恩溥可以作为代表。明恩溥 (Arthur H. Smith, 1845—1932) 是美国公理会传教士，1872 年来华以后在山东等地传教 30 多年，其间，在各类杂志上发表许多有关中国的文章，并用英文出版了《中国文明》、《中国人的性格》、《中国乡村生活: 社会学的研究》、《中国在动乱中》、《王者基督: 中国研究大纲》和《中国的进步》等书，被看成是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中国问题专家。他的几部著作在美国多次重印，有的被翻译成其他文字，在西方世界影响很大。研究传教士对西方舆论和外交影响的学者瓦格说：“传教士的一些讲话和许多缺少第一手资料的个人著作中都宣传着明恩溥对中国的看法。他的几本著作流传很广，不仅是传教士社会的读物，而且成为远东许多学院的教科书。”他还指出，使明恩溥的中国著作在西方得到广泛流传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他生动的写作风格”。^① 的确，和其他传教士尤其是德国传教士的中国著作相比，明恩溥的著作缺少理论基础，缺少立足于某种理论之上的系统分析，这大大降低了它们的学术价值。但他的著作，特别是他最著名的《中国人的性格》和《中国的乡村生活》，却有其他传教士著作所不及的一个特点，这就是生动、细致的描写。他的《中国人的性格》每提出一个性格，都列举出许多实例，而且对每一个实例的叙述都栩栩如生，非常具体。而《中国的乡村生活》对当时中国农村生活的各个方面，从

^① A. Vary: *Missionaries, Chinese and Diplomats, the American Protestant Missionary Movement in China, 1890—1952*,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8, p. 114.

村庄的坐落环境到它的内部结构，从乡塾教育到科举考试，从村社生活中在宗教、政治和经济上的合作，到婚丧嫁娶年节喜庆等民风民俗，从村庄的光棍无赖到村头庄首，从妇女由少女熬成婆婆的一生，到男人在家庭中的地位，都进行了详细的描写。大量具体事例和生动的叙述，一方面增强了明恩溥著作对一般读者的吸引力，扩大了它们在西方的影响；另一方面又使他们成为瓦格所说的“信息量极大”的著作，为后来的学者研究近代中国社会提供了许多重要的材料，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它们本身学术价值的不足。鲁迅曾多次对中国人没有把明恩溥的《中国人的性格》翻译过来表示遗憾，认为此书“似尚值得译给中国人一看（虽然错误亦多）。”^①

另一类传教士比较热衷考察当代中国社会的一些问题，如丁甦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 1827—1916)、傅兰雅(John Fryer, 1839—1928)。他们以传教士的身份来中国，由于种种机缘直接参与了中国的社会生活。傅兰雅和丁甦良长期在清政府文教机构中工作，在将西方科技移植到中国来的过程中作出了贡献。同时，他们也对中国社会特别是对清末的改革，多有指划评议^②

不过，论及中国社会文化最多的是林乐知(Young J. Allen, 1836—1907)和李提摩太(Richard Timothy, 1845—1919)等以广学会为核心的传教士。林乐知 1860 年到中国，先为江南制造局翻译西书。后来于 1868 年创办中文刊物《教会新报》，1874 年改刊名为《万国公报》。林在主持这份刊物期间，发表了大量关于中国社会的政史评论。梁启超主编的《时务报》上发表的政论，许

① 《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2 卷，第 246 页。

② *Chinese Recorder*, Январь, 1896, pp. 36—37.

多是《万国公报》宣传过的内容。林乐知关于甲午战争的《中东战纪本末》对维新运动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李提摩太 1870 年来华，1877 年参加华北大灾荒的救济活动，因而关注中国的社会问题，在《万国公报》上发表救灾的建议。19 世纪 80 年代初发表大量的政论，鼓吹改良变法。1890 年李提摩太应李鸿章邀请到天津担任《时报》主笔。一年之间就写了二百多篇社论。1891 年出任广学会总干事，以后任此职达 25 年之久，主持出版关于中外历史书籍，并在《万国公报》宣传自己的变法主张。类似例子很多。有些传教士甚至在多年研究基础上对自己所在地区的社会经济问题提出了非常具体和系统的看法。^①

衡量传教士涉猎中国文化的另一个标志是他们所创办的刊物。传教士创办的最早的中文刊物是 1815 年马礼逊在米怜 (William Milne, 1785—1822) 协助下在马六甲出版的期刊《察世俗每月统纪传》。最早的英文刊物是 1817 年 5 月米怜在马六甲出版的季刊《印华杂拾》(the Indo—Chinese Gleaner) 这是由传教士创办的第一份以西方读者为对象、以介绍中国为主的近代外文报刊。^② 19 世纪 30 年代，卫三畏和裨治文共同编辑的《中国丛报》(Chinese Repository) 是“发表西方人论中国的严谨学术著作的主要园地。”它对这一时期的中外关系有比较详细的介绍，还用大量的篇幅，介绍中国文明史、农业发展、科学技术、历代轶事、语言文学和风俗人情方面的情况。该报 1851 年停刊。鸦片战争以后，外国教会和传教士在中国创办的主要中文报刊有十余种，其中《教会新报》、《万国公报》、《益闻录》(后改为《格致益闻录》、

^① R. C. Forsythe (法思远) *Shantung, the Sacred Province of China*, Shanghai, 1912, pp. 391—402, 240.

^② 《中国丛报》，第 2 卷，通告。

《圣教杂志》)等历时较久,在中国社会有比较大的影响。^①

西文报刊中最著名的是月刊《教务杂志》(Chinese Recorder),该刊自 1867 年在福州创刊,除在 19 世纪 70 年代初停刊 3 年,一直维持到 1941 年太平洋战争爆发才终止。每一期《教务杂志》都有传教士讨论中国社会的文章。其范围包括了中国的历史、宗教、哲学、文学、天文学、医学、艺术及民间风俗和社会问题。^② 清王朝的政策、中国人生活方式都在他们观察描述之列,这很能反映出传教士们在宏观和微观层次上对中国社会的关注。《教务杂志》严格地说是面向传教士、面向西方社会的刊物。传教士在中国实地观察的文章是很受其国内读者的重视的。即使到今天,西方学术界仍很看重《教务杂志》,美国学术机构近年来花费巨资编制该书目录和制作缩微胶卷,以供学者研究。事实上这对中国学术界来说,也同样是极有价值的历史资料。上述刊物,在宣传基督教之外,都对中国的历史文化和当时的社会状况发表了大量的报道和评论。

以上只是传教士著作中比较著名的一小部分,但已能大致上看出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涉及之广。在谭维理列举的从 1830 年到 1920 年之间最著名的 11 名美国中国学家中,有 8 名是早期传教士。^③ 比较起明清之际的传教士,清末传教士不仅注意到了中国的古典文化,而且也留心那个时代的社会状况;他们不仅看到了帝王将相,而且把目光投向了平民的生活。他们人数众多,来自不

^① 方汉奇:《中国近代报刊史》上册,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8—28 页。

^② 参见刘大路译:《“教务杂志”目录》,见《义和团研究会通讯》,济南,总第 21、22、23 期。

^③ Laurence G. Thompson: *American Sinology, 1830—1929, A Bibliographical Survey*, 见《清华学报》,新一卷第二期,台北,1961 年 6 月,第 275。

同的国家，用不同的眼光看中国。英美传教士在汉语语言文字方面富有成绩，同时较多从历史和社会学的角度分析中国社会。德国传教士则明显对中国哲学和古典文化有兴趣。与采用上层路线传教的利玛窦等人不同，他们散处在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有机会接触各色人等，直接观察和研究中国社会。虽然他们的著述也是精芜具存，有些还包含着种族主义的谬误，但从历史的脉络看，他们探讨中国文化的广度和深度已经超过了明清之际的传教士。他们把有关中国的大量信息，用近代的手段迅速传到了西方，使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在马可波罗和利玛窦的基础上大大的丰富和提高了一步，成为后来的汉学家们认识中国的出发点。

三、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看法

传教士对中国文化如何评价，这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文化是有民族性的，对一种文化的褒贬，摆脱不了自身文化价值观的影响。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看法也是如此。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对中国文化的分析并不是简单的好和坏，也不是“全盘”如何，而是对中国文化的基本要素进行了具体分析。

儒学是当时的官学和显学。传教士说：“儒学包含了所有中国的教义和实践，它已经成为中国人宗教、社会和政治生活的特色。因此，儒学是理解中国和中国人的钥匙。”^①他们看出儒学在中国社会的地位，对儒学进行了较多的探讨。首先他们认为儒学不是

^① Ernst Faber: *A Systematical Digest of the Doctrines of Confucius*, 1875, p. 100.

宗教。明恩溥指出：“由于儒学没有限定人与某一个神的关系，而仅仅是提出了一种道德伦理体系，其学说显然不能被称为宗教”，他认为儒学只是一种道德哲学。^①英国传教士库寿龄（Samuel Couling, 1859—1922）花费 10 余年时间编著的《中国百科全书》也曾概括说，儒教不鼓励对于一个人格神的信仰，不进行祈祷，不考虑人的永生，因此它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宗教。^②其次，他们也看出儒学有某种宗教色彩。明恩溥认为：“儒教部分地可以看做政治和社会的伦理，部分地可以看做一种国家宗教，包括对自然、已故圣贤的灵魂和祖先的崇拜。因此从一种观点说，它是宗教；从另一种说，它又不是。”^③库寿龄也说，儒家学说尽管不是宗教，但其中包含着可以发展为宗教的教义，而且它对于千百万人来说，已经成为宗教的替代品了。^④再次，大多数传教士趋向于肯定儒学的价值。花之安对儒学的评价在传教士中很有影响。他说：“儒学和基督教这两种体系有许多相似和相同之处，说明和了解这些有利于二者的信徒相互理解。”他指出了基督教和儒学的十多处相似点。^⑤传教士对儒学的伦理思想特别赞赏，因为他们从中发现了与基督教更多的相似之处。他们认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儒学格言是基督教箴言“你们愿意人怎样对待你们，你们就要怎样对待别人”的“反面金律”。明恩溥说：“它可以被看作儒学道德的最高点，也是基督教之外所有道德训戒的顶峰。”^⑥

① A. H. Smith: *The Uplift of China*, New York, 1907, p. 98.

② Samuel Couling: *The Encyclopaedia Sinica*, p. 125.

③ A. H. Smith: *The Uplift of China*, New York, 1907, p. 88.

④ Samuel Couling: *The Encyclopaedia Sinica*, . 125

⑤ Ernst Faber: *A Systematical Digest of the Doctrines of Confucius*, 1875, p. 89.

⑥ A. H. Smith: *Rex Christus, An Outline Study of China*, New York: Macmillan Company, 1903, p. 50.

事实上，传教士对儒学的态度，隐藏着一种矛盾的文化心理，他们怎么也不能忘记儒家传统的非基督教性质，即使那些学习中国经典、欣赏儒家教义的传教士也是如此。他们一方面学会了尊重中国古典的伦理学说，同时，他们又认为儒家学说阻碍基督教的传播。于是就出现了把基督教说成更好地完善了儒家教义的宗教以摆脱困境。进而言之，传教士对儒学的肯定仅此而已，他们认为儒学作为一种政治哲学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明恩溥认为儒学一千多年来没有发展，他对儒学在中国的未来不抱希望，并以儒学在近代日本的命运为例子指出，“日本许多世纪一直受儒教的束缚，但西方文明几乎使它完全摆脱了这一束缚。迟早，尽管要比日本慢些，相同的原因会在中国产生相同的结果。”^①

传教士们对佛教和道教的研究就远没有像儒学那样重视。他们认为由于儒学缺少关于来世和再生的理论，从而为佛教和道教的传播留下了余地。明恩溥说：“佛教基本教义是万物皆空、慈悲为怀以及通过灵魂转世来惩恶扬善。它提供了儒学冷漠无情的道德和道教粗糙的物质主义所不能提供的东西，从而适合了中国人的需要。”^② 传教士们在进一步分析儒、佛、道三者关系时，普遍接受了英国传教士艾约瑟的概括：即儒学是伦理的、道教是物质的、佛教是形而上学的观点。他们指出近代儒学仍然是道德体系、而佛教已经成为宗教盲从，道教更是堕落为迷信。^③

传教士研究中国文化的另一个倾向是赞美中国古代的文化，但批评中国近代文化的停滞不前。早在 1836 年马礼逊就说过：

① A. H. Smith; *Rex Christus, An Outline Study of China*, New York; Macmillan Company, 1903, pp. 58—59.

② A. H. Smith; *Rex Christus, An, Outline Study of China*, New York; Macmillan Company, 1903, P. 67.

③ John Nevius, *China and Chinese*, New York, 1869, p. 151.

“如果把 1500 年前的中国地图和欧洲地图放在我们面前,然后根据各自知识与文明的进步程度,用明暗色作标记的话,那么,我们以为,至少在许多方面,优势在中国。但从那个时期以来,欧洲和中国发生了哪些变化呢?欧洲稳步前进了数百年,知识飞速发展,其速度可谓史无前例。艺术、科学、文学和神学,按事物自身要求已经联系起来,随着政治、宗教的多次改革,现在正以前所未有速度向前推进。同样,与过去相比,人的权力、责任得到更深刻的理解,人对精神、物质的需求,得到更多的关注,并正享用着日益增多的精神、物质成果。但在中国,在同样的历史时期,人们只是留恋和叹息古老文明的逝去,许多方面不但没有丝毫的进展,反而步步衰退,知识水平大大下降。与 1000 年前占领历史舞台的先辈相比,当代中国人望尘莫及。”^①

担任圣约翰大学校长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卜舛济评论说:

“中国人过去曾有许多有用的发明,诸如活字印刷,火药和指南针。他们懂得怎样养蚕,并把养蚕业发展到令人赞叹的地步。他们也懂得建筑的艺术。开挖了了不起的运河,修筑了长城,并建造起奇妙的拱桥、寺庙、宝塔和宫殿。

虽然中国在早期历史上通过反复实验和失败曾取得巨大的进步,但在后来许多世纪中他的发明创造的能力

^① 1836 年 10 月 28 日,“马礼逊教育公第一次大会报告摘要”,《中国丛报》(*The Chinese Repository*) 第 5 卷第 8 号,第 378-381 页。1836 年广州出版(徐祖昌等译)转引自朱有~~王~~等编:《中国近代学制史资料汇编——教育行政机构及教育团体》,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 年版第 602 页。

却处于休眠状态。这也许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一千多年前采取的教育制度的片面性所造成的，这种教育制度完全忽视数学和科学的研究。”^①

应该说传教士的看法是有道理的，当时也只有他们能这么透彻地看到先进的中国人在半个世纪以后才大声疾呼的问题。

大致说来，传教士对中国文化的感情是复杂的。费正清说过：“传教士作者们逐渐地变得欣赏起中国文化传统并被其所影响。他们试图在这种文化中扮演学者的角色，进而影响和改造这种文化。他们发现自己在双向通道上忙碌。他们把中国的形象传递给西方，同时又在帮助形成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观点。”^② 尽管比起 20 世纪的专业学者来说，传教士的研究多少显得粗陋和肤浅。他们对中国的文化无论是肯定还是批判都显得缺乏深度，有许多作品类似于新闻报道。这和他们自身的素养和研究目的是相联系的。但是，如果反过来和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认识相比，那差距就不可以道里计了。就如人们在认识新事物时通常所做的那样，用自己已经熟悉的概念来诠释异质的文化，看到自己想要看到的東西，相信自己想要相信的东西。这样的认识往往会偏离事实。传教士对儒学的评价中就包含了这种曲解和失真。但是这毕竟是中国国门初开后，第一次由外国人从不同的视角看中国，它毕竟为西方人了解中国提供了第一手的资料。这些活动推动了西方中国学的兴起。

差不多在同一时期，西欧国家许多研究中国和亚洲的学会都

^① 徐以骅译：《卜衡济自述》，丁日初编：《近代中国》，第六卷，上海，1996年，第252页。

^② Suzanne Wilson Barnett and John King Fairbank (edited): *Christianity in China: Early Protestant missionary Writings*, p. 4.

成立起来。法国于 1818 年成立亚洲学会，从 1823 年起刊行《亚细亚学报》，英国于 1823 年成立皇家亚细亚学会（Royal Asiatic Society），从 1834 年刊行《皇家亚细亚文汇报》。美国在 1842 年正式成立了美国东方学会（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并先后出版了《美国东方学会杂志》、《美国东方学丛刊》和《美国东方学翻译从刊》等。这些学报都刊载有关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报导和论文。他们把中国当做历史的或人类学的对象进行研究。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入侵的深入，这些国家扩大了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范围。许多高等学府，例如英国的牛津大学于 1876 年，伦敦大学于 1877 年，剑桥大学于 1888 年，法国巴黎的法兰西学院于 1875 年，东方现代语学校于 1881 年，美国的耶鲁大学于 1884 年，加利福尼亚大学于 1896 年相继设立中国历史和文化讲座，开展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教学与研究。一些传教士学者成为这些讲座的主讲人。卫三畏于 1876 年因病回国，次年在耶鲁大学担任中国语言和文学教授，出版了他的著作《中国总论》（The Middle Kingdom），开始在美国的高等学府开设中国问题的课程和培养中国的中国学家。1896 年傅兰雅担任美国加州大学东方语言文学教授。理雅各则在 1876 年成为牛津大学第一任汉学教授。1924 年蔚礼贤返回德国任法兰克福大学中国文学及文化讲座教授，并且创办了中国学院。上述各人都为中西思想文化交流作出了重大贡献。

四、传教士研究与在华教会教育的关系

传教士研究中国文化本来是为了适应传教的需要，传教士了

解中国传统使他们得以与中国各阶层人士沟通。理雅各对来华传教士说：“只有透彻地掌握中国人的经书，亲自考察中国圣贤所建立的道德、社会和政治生活基础的整个思想领域，才能被认为与自己所处的地位和承担的职责相称。”理雅各明白“如果想引起一个民族的注意，而不试图去了解那个民族，那将是一个悲剧。”因此他开始研究中国的古典文学。^①李佳白认为，在中国活动应当“采用中国方法，讲中国经书，这样能使华人反教仇外之趋向渐次消灭，且可得到中国许多有势力之朋友。”^②他特别认为：“既能通达中国之学，中国之礼，则能与中国儒士官绅接见，情谊交孚。”^③传教士们在这方面付出的努力是收到了一定的效果的。在维新运动中曾经产生影响的人物，如花之安、林乐知等往往也是对中国文化有所研究的传教士。值得强调的是，作为外国人能对中国的问题发表看法，而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人所接受，离开对中国社会文化的观察和分析是做不到这一点的。教会史学家王治心说传教士“一方面介绍西洋学说，开中国报纸的先河，一方面又用中国经籍陈言，发挥基督要道，其贡献于中国思想界，有不可磨灭之价值。”^④反过来，这也正是中国思想界在一个时期接受传教士影响的原因。

但是我们更关注的是传教士研究中国文化对教会在华教育事业的影响。毫无疑问在世界范围的传教运动中，基督教会在中国的庞大教育事业是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这实际上是传教士了解

^① James Legge: *The Chinese Classics*, Vol. 1, p. 95.

^② 《国际公报》，第 45—46 期合刊，1923 年。

^③ 李佳白：《筹华刍议》，第 34 页，《民教相安议》。

^④ 王治心：《文字事业与基督教育》，《真光杂志》24 卷 4 号，1925 年 4 月，转引李楚才编著《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料——教会教育》，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 年 7 月版，第 385—386 页。

中国国情后，在传教策略上的一个重大的调整。应该指出的是除了裨治文、郭士立、卫三畏等少数几个人或者因为去世较早、或者因为改行而没有亲自从事过教育外，几乎大部分热衷于研究中国文化的传教士都同时是教会学校的创办人或者是教师。我们在这里可以列出一系列名字。马礼逊 1818 年在米怜的协助下创办英华书院。理雅各在 1840 年前后担任英华书院的校长。倪维思夫妇是宁波和山东登州最早的教会学校的创办者。丁韪良 1864 年在北京办学，1869 年担任同文馆总教习。傅兰雅先在香港任圣保罗书院校长，后在上海任英华学堂校长，1876 年他发起成立著名的格致书院，自任监督，直到 1896 年。林乐知除了主持《教会新报》、《万国公报》外，还于 1881 年创办了中西书院和中西女塾。花之安起初也在教会学校教书，因有喉疾专门从事著述，但一直关心教会教育。李提摩太是最早建议创办大学的传教士之一，对大学的作用深信不疑，在义和团运动后出任山西大学西学专斋总理。明恩溥是山东德州庞庄教会学校创办人，并在 1906 年建议美国利用庚款在华办学。富善担任华北协和大学教授和神学科长达 25 年。创办上海圣约翰大学的施约瑟（Samuel Isaac Joseph Schereschewsky 1831—1906）和卜舛济（Francis Lister Hawks Pott, 1864—1947）也是对中国文化很感兴趣的传教士。岭南大学早期校长香便文（Benjamin C. Henry, 1850—1901）“精通中国礼仪风俗”，曾在 1884 年出版了《十字架和龙：或东方之光》。^①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John L. Stuart, 1876—1962）也是一个例

^①李瑞明编：《岭南大学》，香港：岭南（大学）筹募发展委员会 1997 年版，第 4 页。

子，他最初把自己看成一个学者。^① 这样的人物太多了。

究竟是因为教学激发了他们研究中国文化的热情，还是研究中国文化推动了他们创办学校呢？毫无疑问，从根本上看，推动在中国的传教事业是他们研究和教学事业的原动力，但对中国人文化心理的认识，是促使他们纷纷在华办学的契机之一。山东的传教士在追溯办学起源时说：“许多世纪以来，中国信奉教育，尊重学者。”^② 可能是出于这一认识，传教士在中国大力兴办学校，形成了传教史上的一个突出现象。施约瑟在 1904 年回忆起创建圣约翰大学的动机时说：“我 1859 年跟随文惠廉（William J. Boone, 1811-1864）主教到中国，当我在这个国家生活了几年以后，创办一所传教士大学的强烈愿望缠绕在我心头，我决定回国休假时就要致力于为这个目标募集资金。我深信接近中国人民最好的途径是通过教育。有两个原因：第一，中国人是一个有智慧的民族；第二，也许比起其他民族来，中国人更看重教育。”^③

无论如何，上述研究至少表明了，在传教事业开端的岁月里，出于各方面的原因，传教士并没有忽视中国文化，反倒是投入了很大精力探讨中国文化，那么进一步的问题是在他们的学校课程中是如何处理中国文化的呢？

① Philip West: *Yenching University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 1916-1952*,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 188.

② R. C. Forsythe, *Shantung, the Sacred Province of China*, Shanghai, 1912.

③ Mary Lambertson: *St. John's University, Shanghai 1879-1947*, Hong Kong, 1988, p. 57.

第二章

晚清教会大学的教育方针： 西学为体？

传教士在中国办学是一种跨文化的教育事业，是一种创举。当时现代意义上的学校体系在中国还不存在，没有可以参照的样板。一张白纸，如何作画，颇费斟酌。传教士们办学的目的也各不相同。大致说来可以分三种类型。第一种是着眼于直接传教，即在课程中以神学教育为主，直接培养传教人员，这类学校逐渐发展成为神学院。第二种是传教士创办的普通学校，毕业生并不一定从事教会工作。这种学校实际上类似于英美社会中的教会学校，教学的内容中包括了神学和科学文化知识。这类学校占了教会学校的绝大多数。第三类是专门学校，即专门教授一些实用的科目，像山东烟台美国长老会培养商务人才的益文商专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这类学校数量也很少。本书讨论的主要是第二类学校，因为这些学校是教会创办普通高等学校的基础，有些著名的高校，就是从这些学校发展而来。

一、教会中小学的中国经书教育

19 世纪五六十年代，是教会小学大量涌现的时期。传教士们在直接布道和游行布道收效甚少的情況下，许多人都开办了小学，希望通过教育学生的途径，来扩大基督教的影响。这些小学的师资和设备一般都相当简陋，课程也因人而异。尽管这样，有一点是明确的，学校办在中国，不论传教士如何看待中国文化，他们的学校必须适应中国的需要，才能生存和发展。因此，这类学校一开始就把中国文化列入课程。特别在教会学校刚起步时，这种现象无一例外。传教士讲解一些圣经知识、西方史地和基础的数学知识。一些被聘用的中国文人则讲解经书，实际上这是包括了思想教育在内的语文课。

七八十年代，是教会学校从小学向中学发展的时期。经过十几年的创榛辟莽，教会学校逐渐规范化，课程的设置也逐渐稳定下来。在多数教会中等学校中，经书或者说中国哲学、伦理和语文知识，都占有一定的地位。^①在有些教会中学，中国经书的教育还被放到一个重要的地位。我们可以分析一下几所有代表性的中学。

齐鲁大学的前身山东登州文会馆起源于 1864 年创办的登州蒙养学堂，算得上是最早的教会学校之一了，1872 年该校扩大到

^① 姬红研究了北京地区的 8 所美国基督教会中学，指出这些中学一开始都设有国学课程，但不占重要地位。姬红：《北京地区美国基督教教会中学研究》，见章开沅、林震编《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1 年版，第 416 页。

中学程度。这所学校把课程分为三类，即道学、经学和一般科学文化知识。其中道学即基督教神学知识。经学课程就是儒学经典。在为期 9 年的初中、小学课程中，学生要学习的儒家经典包括了《诗经》、《书经》、《论语》、《礼记》、《孟子》、《大学》、《中庸》、《左传》、《易经》、《系辞》等。此外，学生还在学习《唐诗》等诗词辞赋。当然，学校的课程中还必须教学生如何做策论等应试文章。^①由于学校主持人狄考文的反对，文会馆的科目中一直没有英语课程。相反，文会馆的课程中，经书教育的内容是相当全面的，学校比较重视学生这方面的训练。1873 年文会馆的学生邹立文参加县考，榜上有名，这在当地引起了很大的轰动。^②

文会馆的课程安排在教会中等学校中是有一定的典型性的。中国文化的课程在各类学校的课表中都占有一定的地位，以中国经书为核心的中国文化课程、基督教神学和西方科学各占三分天下。文会馆办得比较早，中国的有识之士虽然已经提出改革传统教育的形式与内容，但是以科举为导向的封建教育还将在中国维持近半个世纪，教会学校也不得不迎合这种社会风气。尤其山东是孔孟故乡，文会馆所在地登州依然是农业社会包围中的传统城市，教会学校学生的出路还不十分宽广，除了做神职人员或者在学校教书外还找不到更多的就业机会。七八十年代文会馆一直鼓励学生参加科举考试。

但教会学校的中国经书教育仍然感觉到了时代的冲击，特别是工商业发达的沿海城市。上海中西书院就是一个例子。这所学校的创办，差不多比文会馆晚了 9 年，1881 年才开始招生上课。创

① 王元德、刘玉峰：《文会馆志》，山东潍县广文学堂 1913 年版。

② Charles H. Corbett: *The Shantung Christian University*, New York, 1955, p.

办人林乐知在办学宗旨中说要“中西并重”，“其教虽以西法为主，而西学中学，究当相辅而行。”^①在教会学校中算是明确强调了中学的地位。但是究竟如何辅助而行呢？西学好办，可以借鉴美国的经验，引进美国的教材，1881年订定的《中西书院课程规条》中对西学课程按年度列出了循序渐进的课程表。但对中学课程就不那么容易了。“因诸生年岁大小不同，难以预拟”，只能“因材施教，各分班次”。^②但大致内容包括讲文、五经、赋诗、尺牍、对联、书法等，这实际上和中国传统的书院没有多大的差别。只是在教学时间上，中西书院保证了中学西学，“无畸轻畸重之弊”，各占半天时间。而且每星期三有中文教习出题作文，每月考校一次。中文课程在中西书院中可以说是名符其实了。

传教士们对经书教育的认识，当然和他们自身对中国文化的理解是有关系的。像林乐知在中国有多年的经历，对中国文化已经有了一定的认识，他在说明为什么要中西并重时说：“西学固为今日当务之急，而非明乎中国之书理，熟乎中国之文法，则西学要不过得其糟粕，终无由挾其菁英，将挟之翻译西书，而莫通义理，与之讲求格致，而莫测渊微，此其人即或见用于世，第足供奔走之役，无当于远到之程，而本书院所定之章程，中西并教，实为握以要图也。”^③此段文字发表在1882年，正是洋务运动方兴未艾之际。林乐知把中学抬到很高的位置，很有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气味了。

① 林乐知：《中西书院肄业诸生当自期远大说》，《申报》1882年12月17日，转自朱有璠、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四辑（以下简称《学制史料》），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1993年6月版，第282页。

② 林乐知：《中西书院课程规条》，《万国公报》，1881年11月26日，转自《近代学制史料》，第四辑，第287页。

③ 林乐知：《中西书院肄业诸生当自期远大说》，《申报》1882年12月17日。

但正像“中体西用”最终没有能为中国现代化成功地导航一样，传教士们的教学计划也没有成功。正是在同一篇文章中，林乐知认为学生对于西学“只欲略识西国文字，略通西人语言，籍图旦夕糊口”，浅尝辄止，并没有远大的目标。而且学生重西学，轻中学，不满意中学教育占去一半时间，往往上西学课，学生到课，上中学课，缺课者有之。西学勤奋，中学敷衍。因此，“虽中师沥诚启迪，不少偷安，终难入暴弃之中藏而生其智慧”。^①林乐知和狄考文一样，与其说是希望学生了解中国文化，不如说他们希望自己的学生能够学贯中西，左右逢源，成为中国社会的领袖。但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就业市场的导向力太大了。林乐知以后也不得不变通章程。1891年，林乐知和海德女士共创上海中西女塾时，虽然仍在“中西女塾章程”中说明教学上“中西并重”，但是，学校表示，如果学生只学西文的话，可以在入学前由其父母声明。^②在这一点上表现出了灵活性，也就是从坚持中学的地位上后退了。

19世纪下半叶，教会学校的经书教育正如一位传教士所说的那样，“整个课题是令人困惑的，我们不能和中国经书相处，而我们不能不和它相处。”具体的课程安排，各地的学校因人而异。“有些地方，全部‘四书’‘五经’列为中文课程，要求学生熟记，并练习写文章，准备参加政府考试，而另一些地方只教‘四书’。有些学校给学生一半的时间或更多的时间学习经书，而一些学校只给学生很少的一部分时间。”^③但总起来说，是用“次要的时间

^①林乐知：《中西书院肄业诸生当自期远大说》，《申报》1882年12月17日。

^②“上海中西女塾章程”，《全地五大洲女俗通考》，1904年第十卷第十九章，第43—49页。

^③潘慎文：《论中国经书在教会学校和大学中的地位》，《学衡史料》，第四辑，第132页。

学习经书”，并且经书教育可以说是从相对重视，向相对不重视滑坡。为什么会这样呢？

第一，传教士本人对中国文化缺乏真正的了解。在众多的传教士中，真正能够通汉语，读懂中国书籍的太少了。如果不说他们对本身文化的偏爱，缺乏了解本身就成为他们的学校疏远中国文化的一个具体原因。《岭南大学校史》的作者郭查理曾指出了岭南传教士在这方面的局限，其实这是当时教会学校的普遍问题。^①

第二，中学教育本身的陈腐性。这些学校不仅在中国文化的课程方面与传统学校相差无几，就是教师也不得不依赖那些有功名的文人。因为经书词章这类功课，传教士本人所知很少，基督教徒中也难有胜任的人才。书是旧书，人是旧人，教学方法也没有什么新招，记忆和背诵就是三家村塾师们的不二法门。狄考文曾经对学生大声的死记硬背中文经典表示了无可奈何。1874年到1875年一位《中国通讯》杂志的编者曾经描绘天主教办在上海的徐汇公学的经书教育情况：

“学生们用震耳的声音朗诵经典作品，每个学生反复大声读唱从未有人给他讲解过的课文；这里是学生在老师面前背书，背书时学生的头会摇来摇去，甚至全身都左右摇摆起来；书法课也是比较重要的一课，因为学生识字的多少和写字笔法的挺秀，也经常是衡量一个人才学高低的标准；上讲解课时，老师讲解学生们已经背诵得滚瓜烂熟而几乎一句也不懂的渊博的古文。最后是作文课，学龄最高的学生在学作奇特的八股文章。有一位进士与两位举人替他们修改作业，学生们很关心老师

^①李瑞明编：《岭南大学》，第4页。

的评语。神父们认为,这种中国的老式教学太不理想,太限制约束学生的智力,欲试加改进,但一时也想不出适当的方法。”^①

教会学校对这种教学方法虽然不满意,但当时也只能如此,未来的中国文史方面的教师人才还正在这些学校中接受教育。但对学生而言,西方资产阶级的新教育、新课程使学生们大开眼界,使多少代来埋首在故纸堆中的年青人看到了四书五经之外的广阔天地,激发起他们探求新知的强烈愿望。因此,他们厌恶八股文章是自然的。

第三,中学和西学知识的社会需求差异。传统教育的重要目的是通过科举这一道路做官发财。但通过重重科考,真正能金榜题名,高官厚禄的毕竟太少了。有清一代,科举考试到举人这一级,中举者在一省应试人数中只占千分之一,像孔乙己这样的悲剧人物在历代读书人中,实在是太多了。所以从学生的角度来看,如果想通过学习传统的经典来谋求一官半职,竞争太激烈了,希望是很渺茫的。学习西学情况就不一样了。19世纪60年代以后,列强在中国的经济扩张不断深入,对商务人才的需求越来越大。随着洋务运动的兴起,中国民族工商业也缓缓启动,需要越来越多的懂得西方语言文化和科学技术的新知识分子。任何学校都不是孤立地存在的,社会提供的就业可能性当然会影响到学生学习的积极性。^② 这是不以传教士意志、也是不以官方意志为转移的规律。但如何处理中学和西学在教会学校中的比重和地位问题,始

^① (法)史式微《江南传教史》,第98—100页。

^② 以茅盾为例,1904年茅盾8岁时,其父病不起,要茅盾和弟弟一定要在学校读书。他说“不久中国要大乱,那时,唯有学会了西洋工业技术的人,能够谋生。”见《茅盾自传》,《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以下称《社家》)第四辑,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85年版,第35页。

终困扰着传教士教育家。

二、传教士对经书教育的讨论

经书教学逐渐成为教会学校关心的一个问题，究竟如何确定经书教育的地位在一些传教士中引起了讨论。一些著名的传教士陆续发表了如何进行经书教育的看法。讨论集中在两个基本问题上：一是教会学校应该用中文教学还是用双语教学？二是中国经典在教会学校中的地位。

围绕第一个问题有两种意见。一种是坚决主张用中文教学。文会馆的创办人狄考文是这种看法的代表。在 1890 年的上海传教士大会上，他作了题为“怎样使教育工作更有效地促进中国基督教事业”的演讲。就教会学校的经书教育而言，他强调了两个观点：第一，教会学校要实施完整的教育。他认为所谓完整的教育是要对“中国语言文学、数学、现代科学以及基督教的真理有个良好的理解。”第二，要用中国语言施教。

狄考文在传教士中突出地重视用中文教学。在他看来，在中国进行教育使用中国语言，这是顺理成章的事。他进一步认为，只有全面地应用中国语言，全面地掌握知识，才会得到人们的尊重。他说：“一个中国人缺少本国语言的知识训练，将损害他所有的外语和科学方面的学术成就。不管外国人怎样看待这种人，而中国人自己却不认为他是个学者。他们会容忍外国人对他们自己的语文知识不够完整，却不会容忍中国人自己对本国语文的无知。谁在这方面有了缺陷，他马上就会失去自己的社会地位和影响。”他批评那些主张同时用中文和英文教学的人说：“还必须注意到，英

语的学习往往打掉了年轻人学习本国文学和写作的兴趣。那些英语基础好的学生，再教以中国经典和中文作文，简直难如登山，在一般情况下是不容易成功的。要达到预期的目标，唯一办法是在学好中文以后再学英语。”狄考文还分析了中文教育能使学生更好地运用自己的知识，能够引导学生与群众打成一片。狄考文强调用中文教学，虽然出于他担心学生学会英语会另谋高就，使教会培养人才的目标流于落空。但是他看重中国知识的教育，从基督教会中国化和教会教育的中国化角度来看，不失为有远见的看法。^①

狄考文的看法在会议上引起了激烈的讨论。美以美会的力为廉(W. H. Lacy 1858—1925)，武林吉(F. Ohlinger 1839—1919)和监理会的冯昌黎(W. B. Bonnell)都反对他的意见。福州福音书院的院长李承恩(Nathan J. Plumb, 1843—1899)承认狄考文的看法是有道理的，即只用汉语教学能够达到教育的高级阶段，这是已经被清楚地证明了的。但是他认为如果“英、汉两语并用，效果或许更佳。”他以前曾经认为用汉语是最好的方法，但现在赞成英、汉两语并用。他的理由是，第一，汉语缺乏科学术语，不利于精通其他学科；第二，懂英语带来的主要好处是扩大学生的知识范围，学生从中可以汲取任何学科的丰富信息，随心所欲地搞科研。他根据自己的教学经验说：“只懂中文的学生虽然能够完成全部学业，实际上只是死读书。在他面前就没有如此巨大的知识宝藏吸引他去探索，以满足他深入学习文学、科学、历史、神学等知识的渴望，因为这些都是用英文写的。”针对狄考文担心学会英语的学生会跳槽，李承恩说在福州会议上，精通英语

^① 狄考文：《怎样使教育工作更有效地促进中国基督教事业》1890年，见《学制史料》第四辑，第94—103页。

的中国传教士是最有才干的。^①

这个问题的争论一直继续下去，直到 1905 年中国教育会的三年会议。美国监理会传教士潘慎文（Alvin P. Parker, 1850—1923）曾先后任苏州博习书院和上海中西书院的监院（校长），他在这次会上作了“对中国人使用汉语和英语教授科学”的报告。他根据自己的经验说：“首先，我相信汉、英两种语言作为把西学灌输给中国的教学媒体都是必需的；第二，我更强调使用汉语教学，当只能使用一种语言作为教学媒体时，无论如何必须是汉语；第三，在所有科学、数学、常识的初级教学中我使用汉语；第四，在更高级的学科中我使用英语教学。”^②

教会学校在教学语言方面，实际上有两种做法，一是狄考文的文会馆，坚持以汉语作为唯一的教学语言，即使自然科学也采用中文教材。另一种是其它大部分学校，用汉语教中国文化，用英语教西方自然科学。相比狄考文坚持不设英语课程的做法，潘慎文的主张可能更容易为教会学校所接受。但在后来的发展中，英语逐渐成为一些学校中主要的教学语言，这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在整个清末，汉语著作中所包含的各种学科的信息量比起英语来说，内容要狭窄的多。但是作为民族的语言，在一个国家的学校中的主导地位是不可否认的。教会学校的英语教学喧宾夺主，可能受到一部分人的拥护，但将受到更多的本民族的人的反对。

围绕第二个问题也有不同的看法。

^① 李承恩：《教会学校的历史、现状与展望》，《学制史料》第四辑，第 124—125 页。

^② A. P. Parker, “The Use of the Chinese and English Languages in Teaching Western Learning to Chinese”, *Records of the Triennial Meeting of the E. A. C.* pp. 248—251. 转自胡玉清《传教士教育家潘慎文的思想与活动》，《近代史研究》，北京，1996 年第 2 期，第 245—246 页。

在河北省通州办学的美国公理会传教士谢卫楼 (Devello Z. Sheffield, 1841—1913) 在 1890 年上海传教士大会上发表了“基督教教育对中国现状及其需求的关系”。他解释儒教文化与基督教文化的关系。在他的分析中, 儒教实际上是泛指中国文化。他承认儒教中包含着正确的东西, 但是“渗透中国新教育的基督教将仔细地保留这些教训中一切正确的东西, 使之豁然开朗, 脱离狭隘与歪曲了的应用, 赋予它们更深刻、更普遍的意义。”他并没有具体讲教会学校中应该如何对待中国的文化, 显然, 谢卫楼是要在教会学校中用基督教文化来改造中国文化。^①

如果说谢卫楼的观点可能是大多数传教士的看法的话, 那么潘慎文在这次大会上, 则旗帜鲜明地肯定了中国经书在教会学校和大学中的地位。他认为教会学校的教学计划中应该包括三个方面, “即学习基督教书籍、中国经书和西方的自然科学。”他说: “这三个方面的学习在中国教会教育的宏观方面缺一不可, 所以在我们教会普通学校和大学中, 经书学习不仅要占有位置, 而且要有重要的位置。”潘慎文从两个方面论证了学习经书的必要性。

第一, 经书是中国语言 and 精神的源泉。他认为, 一个中国人为了受教育, 他必须懂得本国的语言和文学, 迄今发现的唯一学习语言和文学的途径是通过认真学习经书。中国语言的经纬出自经书。字的读音和定义, 作家常用的大量引语, 历史典故和举例, 他们的诗, 一言以蔽之, 语言的要素和精神是从经书中产生和形成的。所有大量的中国文学、历史和哲学作品都被经书的文风和道德原则所笼罩。任何人没有经书的知识, 就不能写商业和外交书信。不言而喻, 学习经书被认为是语言的知识来源, 乃是不可

^①谢卫楼:《基督教教育对中国现状及其需求的关系》,《学制史料》第四辑,第 107 页。

缺少的。

第二，经书是学生在国内取得地位和影响的敲门砖。他指出，中国政府的教育制度只要像现在这样继续下去，任何人想要得到文学学位并能在民众中造成影响，没有受到具有如此高度价值的教育，那是不可能的。

值得一提的是，潘慎文还提出了如何进行经书教育的十条具体办法。概而言之，教会学校的课表中一定要有经书课程，学生要用三分之一，不超过二分之一的时间来学习经书，用基督教和自然科学来消除经书中的异端思想。潘慎文特别重视教会学校学生学习与科举考试有关的知识。他说：

“在学校中，每个学生要熟记‘四书’、《诗经》和《史记》。那些期望参加政府考试的学生还要熟记整本的《礼记》、《春秋》、《左传》和《易经》。为了有目的地学习这些书，除了中国自己的学习方法外，别无更好的方法。这种学习方法经历了若干世纪的检验，学生要是不能从记忆中引用“四书”“五经”中的任何一段，要想在政府考试中竞争胜利是无望的。

“在学生进行学习时，要给他们讲解有标准注释的全部‘四书’、‘五经’。要求学生能背诵，用他自己语言讲解。……那些期望参加政府考试的学生必须成为写文章的能手。”^①

持这种态度的传教士不乏其人。1893年，福开森（John C. Ferguson, 1866—1945）在教育会成立会议上的报告中仍然强调

^① 郑心澂译自潘慎文（A. P. Parker, “The Place of the Chinese Classics in Christian School and College”）见《在华传教士 1890 年大会纪录》第 490—496 页，《学制史料》第四辑，第 126—133 页。

“在考虑中国经史教育的时候，我们最好能为我们的学生提供一种培训，以使他们在参加科举考试，谋取科举功名和官职方面更具竞争力，这就要求教授‘文章’”。但福开森看得更远一些了。他认为：“这种课程被最有学问的懂经书者认为是愚蠢和无用的，它的唯一作用是使学习者有一丝提升官位的可能。……我认为，我们决不应去和那些把学生培养成只会写呆板文章的当地学校竞争。我们希望把学生培养成既能找到对社会发展最有价值和用处的题目，又能写出清楚、有说服力的论文的人。……如果我们放弃学写学究式文章，转而学习那种实际上更古老的文体，我们的教育就会朝着更完善、更全面的方向发展。”^①

很显然，两种意见虽然相左，实际上都有实用主义的倾向，强调汉语和经书，是为在现存体制下，帮助学生取得社会地位和影响；另一种则认为英语和新学科代表了前进的方向。不过，可以指出的是，主张前者的往往是来华较早的传教士，主张后者的则是来华较晚的传教士。这里已经显示出了教会学校在自觉和不自觉地向中国社会对教育的客观要求为依归，虽然学校是传教士办的，但是学生还是要走向社会的，社会的需求对教会学校有着无形的制约作用。正如福开森在 1893 年所呼吁的：“我们必须向学生传授最适合于他们种族生存、能让他们尽最大努力建设和发展自己祖国的课程。”“我们学校的赞助人都是讲究实际的，他们将小孩交给我们，并不是为了使自己的孩子只懂书本知识。中国古代文化非常丰富和独特，在自我陶醉式的死读书方面，西方简直

^① 《中华教育会年会报告，1893 年》（*Records of the Triennial Meeting of the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 May 2-4, 1893*）第 17—26 页。美华书馆 1893 年印行（施祖尉译）见朱有璘等编《中国近代学制史资料汇编——教育行政机构及教育团体》，第 623—625 页。

长期无法和中国竞争。我们期望给予学生个人乃至整个国家一种非常实用的教育。”^①

在教会学校的课表中如何安排有关中国文化的课程，确实是个难题，因为晚清是中国教育发生巨大变革的时代，而面临如何对待传统文化和现代科学的问题，中国教育界也发生了一次又一次的激烈争论，除了洋务派办的几所学校外，直到戊戌变法前，总体上是纸上谈兵谈了几十年。对传教士来说，这一问题的最终解决办法仍然是自行其是，各类学校完全按照自己对形势的理解来安排教学计划。20世纪以前，中国政府关于近代教育法规的观念还正在孕育之中，对教会学校完全任其自生自长。因此，教会学校的总体倾向是中国文化的教学越来越受到轻视，各级教会学校与其说是“中体西用”，不如说“西体中用”，在西方的神学和科学的拥挤下，中学只成了一个微不足道的陪衬而已。

三 西学冲击中学：教会大学中的中国文史教育

从19世纪下半叶到清朝末年，是中国教会大学纷纷成立的萌芽时期。新教系统的教会大学中，有12所在这一阶段初具规模。这些大学主要集中在长江以南，又以长江中下游地区为多。上海有圣约翰大学、沪江大学（起先称上海浸会大学）；苏州有东吴大

^①《中华教育会年会报告，1893年》（*Records of the Triennial Meeting of the Educ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 May 2—4, 1893*）第17—26页。美华书馆1893年印行（施祖尉译）见朱有瓚等编《中国近代学制史资料汇编——教育行政机构及教育团体》，第623—625页。

学；南京有金陵大学；杭州有之江大学；武汉有华中大学。长江上游有一所成都华西协合大学。华南地区有位于福州的华南女子文理学院（起先称华南女子大学）、福建协和大学和广州的岭南大学。华北两所，山东的齐鲁大学（1904年称广文大学，1909年称山东基督教大学）和北京的燕京大学（由华北协和大学和汇文大学合并而成）。天主教会于1903年在上海建立震旦大学。

对这一时期的教会大学来说，除了如山东、金陵等建立较早的学校，其它学校一切都在初创阶段。之江大学的前身育英书院1897年开设正科和预科。正科相当于大学，预科相当于中学程度，学制6年。1902年进行了学制改革，正科5年，预科为中学。1911年学校改名为之江学堂，1914年为之江大学。华中大学的前身文华书院大学部于1903年正式建立。文华大学阶段除神学院外，又增设文学院。沪江大学1905年筹备建立，学校刚创立时，只有神学院略具专科性质，大学未分科系。华南女子大学1907年5月正式成立，1914年才开设了大学一、二年级课程。华西协合大学正式成立于1910年3月，设置了文科和理科，文科有哲学、教育、英文、西洋史学和综合文科5系。

初期各个大学的学生人数很少，1910年时，8所教会大学的学生总数才有262人。^①鲁珍晞的研究表明：“当时大学里的教师和学生人数都是很少的。杭州的学校在1880年只有4位教师和3位中国教员。圣约翰在1888年有8位教员。登州在1891年时教师人数虽然比较多（7位外国人和5位中国人），但其中大部分是兼职教师或是教师的妻子。……卜舛济于1902年写道：学校能用

^① 8所大学是华北女子协和大学、金陵大学、东吴大学、沪江大学、圣约翰大学、之江大学、华中大学、华西协合大学。

专家的时候还没有到来，他需要能开所有课的人。”^①

相应地，教学计划也不稳定。传教士教育的先驱们对学校目标和课程的讨论，当然有利于各种不同看法的交流，但无论哪种看法对各所大学都不具有政策性的约束力。主持教会大学的传教士们，仍然按照自己对教会教育的理解，来安排各自学校的课程和培养方向。一般说来，教会大学的课程依然是神学、中学和科学三大块，无论南北各地，中国经书课程都是必不可少的。

登州文会馆 1891 年出版的一本学校便览中说：“日前教授的课程是中国经典、西方科学和宗教教育的结合，这最符合创建这所学校的目的。”由于中国经典是最重要的课程之一，因此要求所有学生每天背诵。背诵的内容相当多。在预科时学生就要背诵 4 卷《诗经》和 2 卷《书经》。在学院里则要求学生复述 2 卷多的《书经》、4 卷《礼记》、6 卷《左传》和全部《易经》。课程中还包括了以前要求学生背诵的孔子的《论语》、孟子的《大学》和《中庸》以及有关经典的注疏。此外，学生必须写作文，头五年每周一篇，最后一年每两周一篇。学生还要写诗，也要会写散文。学校便览中对文学课作下述评论：“学校强调写作这样的诗文，因为这对在政府举行的科举考试中取得功名是必要的，同时在公众心目中只有精于此道才能成为受人尊敬的学者。”^②

后来组成燕京大学的 4 所学校中的两所是潞河书院和汇文大学，潞河书院也是以中文教学为主，“学校的主要目标是训练传教士的助手，其标准是掌握汉语口语能力，能用中国古典文体写作，

^① 鲁珍瑜（卢茨）著、曾钊生译：《中国教会大学史（1850—1950 年）》，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56 页。

^② Charles H. Corbett, *Shantung Christian University (Cheeloo)*, 1955, New York, pp. 28—29.

并在为中国创作基督教文献的工作中能与传教士合作”。

历史比较悠久的东吴大学是从原来的中西书院、博习书院和宫巷书院合并升格而来。1901年在田纳西州立案。1905年起正式招收大学生，开设了一批大学课程。潘慎文曾主持博习书院，对中学一向比较重视。孙乐文主持宫巷书院，也主张中西文并重，强调中国人要以本国文字为主。^①

金陵大学也属于源流较久的大学之一。包文（A. J. Bowen）1912年在《金陵大学堂章程绪言》中说：“大学特别建置分授专门各科学，……更注重中国文学，延聘硕博之儒，分科教授经史国文，蕲学有根底，不徒芸人而讥舍己。”^②

圣约翰大学以英语教学著称，但它的课表中中学课程并不少，该校1904年的章程中，把课程分为中西两斋。西学斋从预科到本科只有一门用英文教授的中学课程，即卜舫济自己编著的《中国史略》。但下表所列出中学斋课程的内容一点不比文会馆逊色。^③

中学斋 备馆	
第一年	蒙学课本三编，国史启蒙问答，读书乐《经畬类》，造句，联字，习字，默书，圣教课，基督本记
第二年	《孟子》，蒙学中国历史教科书，高等小学国史教科书，书札，文俗互译，作浅论，选读浅显传记文论，圣教课，基督譬喻略解
第三年	《礼记》节读，支那通史，选读近世名人传记文论，书札，作论，圣教课，《天国振兴记》

① 见《中华监理公会年议会五十周年纪念刊》，1935年，上海，第56页。

② 包文：《金陵大学堂章程绪言》，1912年，见《学制史料》，第583页。

③ 《圣约翰书院章程汇录》，见《学制史料》，第438—439页。

第四年	《尚书》，近世史，选读近世名人传记文论，札记，作策论，圣教课，《备立天国记》
中学斋 正馆	
第一年	《论语》，《周礼政要》，《公法会通》，札记，作策论
第二年	《御批通鉴辑览》（上半），《近思录》，《管子》，札记，作策论
第三年	《御批通鉴辑览》（下半），《三传》，《荀子》，札记，作策论

按圣约翰大学的规定，如果学生“西优中劣，则中学入各馆，西学入正馆，中优西劣，则中学入正馆，西学入各馆。”所以学生即使选择以西学为业，中学课程也是必不可少的。

如果仅从上述各校的章程来看，教会大学的中学教育是受到了相当的重视。但实际上的结果并非如此。齐鲁大学在广文大学时期一向用中文授课，强调经书课程，坚持不教英语。但这种政策遭到学生的反对。1906年学生罢课请愿，1907年校方不得不批准教授英语，并且改变教授中国经典的方法。^①

圣约翰大学早在1881年10月，便应上海一些商人的要求，设立了英文部，学校当局极力鼓吹华人学习英文可以增进智慧，便于东西方的交流，有利于国际贸易的扩大及基督教义的普及。圣约翰不久就成为英语学习的中心。1890年以后，学校的多数课程用英语进行教学，吸引了各大商埠的不少富商子弟前来就学。这样中学教育受到很大的冲击。陈鹤琴清末进圣约翰大学学习，他说：

“（圣约翰）在我的脑筋深深地刻着一种不良印象。那时，一般学生总不注意中文，学校更对不起中文先生。外国教员的待遇比教西文的中国教员好，教西文的中国

^① Corbett, Charles H., *Shantung Christian University (Cheeloo)*, 1955, p. 81.

教员的待遇比教国文的中国教员来得好。所住的房子，所领的薪金都有三种等级。国文教员住的房子是又旧又小的中国房子，外国教员住的是又新又大的洋楼。相形见绌，触景生感。最痛心者，一般洋行买办的纨绔子弟，出入包车汽车，对国文一点不注意，对于国文教员一点没有礼貌。上国文课的时候，大部分学生不是预备西文功课，就是看小说。国文教员靠着桌，低着头，看着书，独自摇头摆尾的讲解而不敢抬起头来，看一看教室内的情景的。^①

这很真实地反映了所谓经书在教会大学中的处境，但这个问题有很复杂的社会背景。是什么原因造成学校中经书教师的地位低下呢？除了学校政策上的明显偏颇外，也有一些如学历、教学成绩等具体因素。1906—1907 年度圣约翰的西文部有 7 名中西教员，全部受过西方大学本科以上的教育。中文部有 3 名教员，分别是光绪十三、十六、二十年的秀才、监生和贡生。^② 教会学校对中国教员的受薪标准，一般是按中国社会的经济水平来制定的。教会大学并没有像对待西方教员那样，来对待没有受过西方教育的中国教员。但这还不是造成经书地位下降的唯一原因。中国经典的教学也存在着问题。许多中国教师自身只受过传统教育，他们不习惯像西方人那样按照一套教学大纲上课和考试。如同在教会中等学校中一样，大部分中国教师按照传统的方法教授中文，即熟记课文、练习书法、解释字义、读经书集注、作文写诗，甚至

^① 陈鹤琴：《我的半生》，第五章，大学时代，第 108 页，见《学制史料》第 451—452 页。

^② Mary Lamberton; *St. John's University, Shanghai 1879—1947*, Hong Kong, 1988, p. 68.

用传统方法管教学生。引起广文大学学潮的原因之一，就是一位教授经典的中国教师，要求学生跪在面前背诵课文，如果学生不能背诵，就要挨板了。“学生认为他们不能这样毫无尊严。”^①直到清末，教会大学还无法对这种经书教学的方法进行任何重大的改革。

另外，教会大学虽然包含着宗教和教育的双重目标，但其本质上是属于近代的新教育，它的学生是为社会培养的专门人才。学生本身也必须按社会的需要，来选择学习的方向。当时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社会对新的人才的需要远远超过对旧学，或者说中学人才的需要。急功近利是普遍的社会心理。这自然会导致学生轻视经书、重视西学了。这种情况在上海这类通商口岸的教会大学中表现得特别明显，而时风所及，内地的学校也莫不如此。经书的滑坡，代表了教育从传统向现代化转型时期的曲折，代表了近代社会对学术和知识的新选择。中国文化教育形势的逆转还有待来日。

至于教会大学中国文化的学术研究，当时还提不上日程。但是，一些大学中零星的研究开始出现。教会大学中东吴大学是最早开展社会科学研究的学校之一。东吴早在 1906 年就创办学术性刊物《东吴学报》，创刊号名《学桴》，封面画一帆船行驶在波涛中，桅杆旗上标有《东吴月报》四个红色大字。学报长期由学生会主办，组成东吴学报社，负责编辑。编辑人员以学生为主，教师任顾问，校学生会负责出版发行。东吴学报是我国高等学校最

^① Charles Corbett: *Shantung Christian University (Cheeloo)*, New York, 1955, p. 75.

早的学报，在国内外有一定的影响。^①

传教士教师中有一些人开展过一些研究工作。比较著名的有山东齐鲁大学校长卜道成，山东青州广德书院教师库寿龄，金陵大学校长福开森等，但这都是教师个人的兴趣，对学校的教育并不能起多少作用。教会大学真正研究学术的时代还没有到来。经书的地位正在受到更激烈的挑战。

四、晚清的教育改革及其对教会学校的影响

鸦片战争以后的一个时期，中国的教育仍然在传统的磨道中打转。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生产力的发展极其缓慢，小农经济既不能刺激教育的发展，也没有对教育提出新的要求。国家办教育的重心就是做官教育，为封建统治机器培养接班人。因此学生所学科目是单一的人文学科，教材是经、史、子、集，学习的方法就是死记硬背。乾嘉以后，所谓学问就是考据、性理、词章。这种僵化陈旧的教育在鸦片战争前后开始受到攻击，经学在中国教育中独占性的地位开始动摇。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朝再度受到重创。为挽救危局，洋务运动兴起，推动了近代史上第一轮教育改革。1862年清政府设立京师同文馆，开始教授英、法、俄等国文字。1866年设算学馆。1872年设德文馆，1898年设东文馆。京师同文馆之后，1863年上海设立广方言馆。1864年广州也设同文馆。此后一些技术学校和

^① 张圻福、陈少英、杨恒源编：《苏州大学校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4页。

军事学校先后创办。这些洋务学堂，打破了“四书”、“五经”儒学教育的一统天下，在教学内容和目标上，开始和传统教育体系分道扬镳。虽然早期改良派对此并不满意，批评洋务派只学西方之皮毛。但是，这对削弱儒学教育的垄断地位是一叶落而知天下秋。

随着中国工商业的发展，1895年在津海关道盛宣怀的主持下，创办了中国第一所近代分科大学——天津头等、二等学堂，也称天津中西学堂。1898年盛宣怀又在上海开办南洋公学。在这些学校里，除了要有一定的“中学”基础外，主要的课程基本上都是西学了。这些学校的创办，标志着中国高等教育现代化的开端。

上述变革也带来了书院体制的改革。1879年上海官绅商人创办“格致书院”，学习西国语言文字。傅兰雅等人曾为上海格致书院制定了有六门西学的课程表：矿务、电务、测绘、工程、汽机、制造。此后，直到19世纪末，江苏、浙江、陕西、湖北等地均设立了新式的书院。这些学校课程不一，程度也参差不齐，但注重实学、西学是共同的特点。这些书院在清末学制改革后，大多成为中等学堂，少数演进为近代大学。

1898年的维新运动，对封建教育又是一次冲击。维新派教育改良的内容就是师法西方，建立新的学校体制，改革和扩大教育的内容，培养社会所需要的人才。

1903年，清政府终于公布新的学制——癸卯学制。这个学制结束了传统的儒学教育，确立了为近代工业生产服务的小学、中学、大学预科和高等学堂，分科大学的三级学制。在教学内容上保留了传统的儒学，但扩大了自然科学和实用知识，并引进外国的教科书和教学方法，在中国教育史上是一个巨大的进步。1905年清廷废科举兴学校，从此教育从官本位逐步走向社会。

但与传教士学校一样的是，教学内容在中国教育界也成为一

个难题。难点就在于如何处理经书与西学的安排。在整个清末，对教育内容的讨论是众说纷纭，但对当时教育产生了直接影响的基本上是“中体西用”。张之洞在两广和湖广总督任上，创办过不少新学校。他在 1898 年出版的《劝学篇》中，认为所谓中学就是“四书”、“五经”、中国史事、政书、地图。所谓西学就是学校地理、度支赋税、劝工通商西政；算绘、矿医、声光、化电西艺。在如何对待中学和西学上，张之洞认为“今欲强中国，存中学，则不得不讲西学。然不先以中学固其根底，端其识趣，则强者为乱者，弱者为人奴，其祸更烈于不通西学也”。张之洞作为封疆大吏，当然强调用“中学”来培养学生基本的价值观，在政治方向上引导学生。但他也承认学习西学的必要性，承认了西方教育的优越性。他说：“出洋一年，胜读西书五年，……入外经书堂一年，胜于中经书堂三年。”^①至于中学和西学到底如何把握，实践中并不容易。再来看严复，他也曾主持过好几所学校，对中国教育多有评论。他说：“中国自古至今，所谓教者，一语尽之曰：学古入官而已！”“故中国教育，不过识字读书；识字读书不过为修饰文词之用；而其修饰文词，又不过一朝为禽犊之兽，以猎取富贵功名。”^②1902 年严复在《与〈外交报〉主人书》中为当时的教育提出了非常具体的建议：

“一、学生未进中学之先，旧学功课，十当处九，即都不事，亦无不可。第须略变从前教育之法，减其记诵之功，益以讲解之业，期使年十六七以后，能撮管为条达妥适之文，而于经义史事亦粗通晓。议者或谓宜编经

^①《劝学篇·外篇》第 5 页。

^②《论今日教育应以物理科学为当务之急》，见王拭主编《严复集》，北京，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一册，第 281 页。

史旧文，颁行天下，顾此功非易，此时不若听天下能者各出己意为之，俟十年以往，阅历稍深，定论渐出，厘而定之，当未为晚。

二、取进中学堂，年格当以十六至二十为率。务取文理既通，中学有根底者，方为有造，而西文之能否，可以不论。之后便当课以西学。且一切皆用洋文授课。课中洋文功课，居十之七，中文功课，居十之三。

三、如此四五年，便可升入高等学堂，为预备科；三四年后，即可分治专门之业。凡高等学堂中，中文有考校，无功课；有书籍，无教席，听学者以余力自治之。”^①

按照严复的看法，中学的课程被放在极其次要的地位，在大学里已经不必设立中学的课程。在这里，严复强调西学西文的倾向已经到了矫枉过正的地步，但这确实反映出了当时的社会风气。

这对求学的青年学子，自然不能不产生影响。也是在 1902 年，《中西教会报》上发表了黄龙报的文章，题曰“告中国有志之少年”，文章声称：

“今日朝廷诏停制艺，讲求实学，乃各省聪慧之少年，辄弃儒书，竞诵西学，略识涂径，便号通才，视儒书为糟粕，华文若土苴，既逃于中，无获于西，若是者谓其无志。……以今日中国，人亿万之少年，而使将来国家有乏才之叹，少年其愧耻欤！因略举中国少年当知者于其后，而籍以抒创报者之苦心。一，少年当知讲求学问之新理，必精通欧洲之文字，而欧洲之文字之通辟全球者，当以英文为最。二，少年当知文界学界之别，今

^① 《与〈外交报〉主人书》，同上，第三册，第 654 页。

之粗学英文者，志在温饱，仅得皮毛，其余文界，尚未精造，何有于学？三，当知精习英文者，终无大用，反致进退失据，为中西学人所交耻。四，当知华人不精华文，虽娴熟英语，而仍无裨于中国，且诤笑于他人。五，当知全球各国教科之法，必先习本国文字，而后再及外国，故小学堂科目，无例外国文字者。故凡有志之少年，决不可轻弃华文，不然，数典忘祖，不特无国家之思，而且不知为何种族类。六，当知华英文字会通之联系，旅华英儒，尚皆精求华文，而华人于华文，反不注意，无乃相形见绌。”^①

这位作者对青年学子轻视中学的担心不为没有理由。1906年《汇报》也发表文章说自西学东渐以来，中国的教育发生了无数变动。

“即以近事言之，始谓帖括词章，非实学也，而重策论；继谓风科乡会无真才也，而始兴学堂。近为科举学堂不能并立也，而废科举。迹其种种变端，种种现象，一若不达此目的不止者，谓非沾习久而变革速，变革速而推倒力之理欤？”他担心“变革既速，推倒既力，则有矫枉过正之弊”，因此他建议学部要采取措施。重要的就是保国粹。至于什么是国粹，文章说：“国粹者，即新学派所唾弃之六经也，四书也，及一切汉牛充栋之子集也。其理皆至理，其言皆名言，观所记载，凡大而治国，小而治身，皆与吾有密切之关系。故尝入西国藏书之府，其牖列满架者，动以数万卷，即希腊古文，半就剥蚀，而犹郑重收藏，以国粹之不可不保存耳。今无论大学、中学、小学，及一切乡间之蒙学，于各项科学之中，宜

^① 《中西教会报》1902年9月，第8卷第85期，见李楚才编著《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料——教会教育》，第113—114页。

别立国粹一门，使之讲习。^①

事实上，清政府在奏定章程学务纲要中，提出“设立中国旧学专门，为保存古学，古书之地”，并强调“重国文以重国粹”。张之洞于 1905 年将湖北经心书院改为存古学堂。1907 年 7 月 9 日张之洞撰“创立存古学堂折”，提出按照湖北存古学堂的宗旨和教学内容，在全国设立类似的学校。^②张之洞来头大，学部也不便反驳。其后，全国各地均有仿行。江苏、陕西、贵州、山西、广东、四川都设立存古学堂。但在清朝最后一年，宣统三年五月（1911 年 6 月）庄俞发表“论各省可不设存古学堂”的文章。^③江苏巡抚程德全“奏存古学堂暂行停办折”^④从财政等方面论述了停办的必要性。存古学堂停止办理后，新学的地位更为突出。

清政府的教育改革，最先给教会学校带来的是有利的影响。新学校需要新教师，教会学校的毕业生成了热门的人才。山东教会大学的学生不仅受聘于官办的山东大学堂，还远赴北京、上海、云南和辽宁各地，一时盛况空前。^⑤这也进一步加强教会大学重西学轻中学的倾向。

但是物极则反，教会大学在中国教育体系中的突出地位，已经引起了国人的警觉。1906 年清政府开始制定有关教育行政的一些新政策，其中规定所有教会学校毕业生都不得享受应得权利，用

① 见李楚才编著《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料——教会教育》，第 424—425 页。

② 《张文襄公全集》第 68 卷，奏议 68，第 26—32 页。转引自潘懋元等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高等教育》，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 年版，第 233—235 页。

③ 《教育杂志》第三年（1911 年）第五期，言论第 47—52 页。

④ 《内閣官报》，宣统三年九月十九日，第七十八号，奏折（学务类），转引自潘懋元等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高等教育》，第 262 页。

⑤ 据 1901 年的统计，文会馆的学生中近 60% 的人从事教育工作，其中 27.7% 的人在国立学堂中任教，见王元德、刘玉峰：《文会馆志》，第 35 页；史静寰：《狄考文和司徒雷登在华的教育活动》，台北，文津出版社 1991 年，第 62 页。

意显然在限制教会学校。1907年《外交报》最早发表了《论外人谋我教育权之可危》，朦胧地提出了教育主权的概念。^①但是，中国自身的高等教育机构当时还极不完善，学校的管理，教师的资格，课程的设置都没有像样的章程和计划，按严复的说法清政府在支付赔款之余，也无财力来兴办学校。^②因此，无论要限制还是规范教会大学都还提不上日程。在这种形势下，教会学校自然没有任何改革的压力。但是风起青萍之末，这样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了。

^① 《外交报》1907年第185期。见李楚才编著《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料——教会教育》，第567—568页。

^② 中国科学院哲学所哲学史组编：《中国哲学史资料选辑》近代之部下，北京，中华书局，第408页。

第三章

冲击与反应：民初教会大学 国学教育的改革

北洋政府时期，军阀混战，政局动荡，教育根本得不到重视。北洋政府的教育部实质上是各派军阀政治分赃中的一个官僚机构，教育部的主持者走马灯似的跟着军阀上台下野。自 1912 年到 1926 年的 14 年内，先后更换了 38 个（次）总长，24 个（次）次长。教育事业自然不能在这样的环境中得到发展。20 年代以前中国国立大学只有北京大学一所，省立大学只有山西和北洋两所。但是，也正是在这一段时期内，北洋政府不懂学术，也顾不上管制学术。国立大学开始了学术现代化的过程，特别是北京大学迅速崛起，成为新思潮和新学术的中心，并且迅速影响到包括教会大学在内的其它大学，促成了一系列的改革。

一、民初中国学术近代化的新趋势

辛亥以后，南京临时政府发布了一系列改革教育制度的规定，其核心是取消了清朝“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教育方针，具体到高等教育而言，1912 年 10 月教育部公布的《大学令》中首次提

出了“大学以教授高深学术、养成硕学宏才，应国家需要为宗旨。”^①并且废除原来分设十一门的经学科，改革了大学的教学科目和内容。这些举措为新的资产阶级的高等教育奠定了基础。袁世凯复辟帝制，一度恢复“尊孔读经”，但终究随着帝制失败而成泡影。《大学令》等制度名义上是针对全国的大学，但当时全国只有北大一所国立大学，所以，“大学令”实际上就成了当时北京大学的基本章程，成为北大的教育方针和组织原则。

这些教育方针显然不可能在北洋政府时期得到全面贯彻执行，但是，北大在培养目标上的新界定，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开端，逐步带来了学风的变化。严复 1912 年任北大校长，在全校倡导外语会话。1914 年胡仁源任北大校长，提出整顿大学计划书，认为大学最重要的是培养专门学者。他说：“我国创立大学垂十余年，前后教员无虑百数，而其能以专门学业表见于天下者，殆无人矣。”^②他认为这是由于“社会心理大都趋重于官吏一途，为所教员者，多仅以此为进身之阶，故鲜能久于其任”。他提出了三个办法：一要慎选有能力的教员，国家对教员要“格外优待”，以养成社会崇尚学术的风气；二是“各科功课由教员按照所学分别担任，至多不过三四科目”；三是“于各科教员中每年轮流派遣数人，分赴欧美各国，对于所担任科目为专门之研究。多则年余，少则数月”。这是北大有史以来第一次强调教师的专业化，明确了教师的社会角色，希望使北大脱离“教书做官”的旧轨道。

当时的北大，中国文化科目仍然是重点。不过，经过严复等对“中体西用”的批评，“中学”或“旧学”的称谓已经不太流行

^① 《教育部公布大学令》，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人民教育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647-649 页。

^② 《北京大学计划书》，北京大学档案室藏，见《学制史料》第三辑下，第 59 页。

了，代之而起是用“国学”来概括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①这多少反映了中国知识界重新认识和评估传统文化的一种新趋向。北京大学则在高等学校中最先用国学来命名有关系科。当时，北大国学门中都是著名学者。姚永概最初任北大文科学长，引用教师大抵为桐城一派。桐城派崇尚宋儒理学，以继承“道统”自任，和汉学派（乾嘉考据派）对立。1914年夏锡祺出任文科学长后，引进了章太炎一派的名流学者，如黄侃（季刚）、马裕藻（幼渔）、沈谦士、钱玄同等先后到北大教书。冯友兰后来回忆当年在北大的盛况时说：

“我在1915年入北大的时候，有文、理、法、工四个学院，当时称为‘科’。文科中有国文、英文、中国哲学、历史四个系，当时称为门。按当时的计划，应该有三个哲学门：中国哲学门、西洋哲学门和印度哲学门。实际上只有中国哲学门。1915年我进去的时候，在这个哲学门里，从观点、方法到教材，基本上都还是封建的一套。虽然如此，这一套还是代表中国封建社会的正规学术，跟专为应付科举考试所谓‘举业’还是完全不同。在当时说，这也是可贵的了。”

在我进入北大以前，关于中国旧学的知识，重要的是从家庭教育得来的，基本上是上面所谓‘举业’一类的东西。到了北大，觉得眼界大开。经过初步的学习，这才知道于《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外还有《文选》、《文心雕龙》；于《纲鉴易知录》外，还有《史记》、《汉书》、

^①“国学”的名称最早出现于《国粹学报》的发刊词，章太炎后来明确地把“国学”界定为“中国之学”。见陆振岳：《国学刍议》，《文史哲》，济南，1995年第5期，第77页。

《资治通鉴》；于《四书备旨》之外，还有《十三经注疏》；以及所谓汉学、宋学之争，桐城派和文选派之辩。当时，觉得五花八门，三家村里的学究的知识，真是陋及。”^①

这就是说，民初的北大与西方人创办的教会大学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代表了封建时代的正统学术，有国学的历史渊源，在全国也享有很高的学术地位。1916年蔡元培（1868—1940）出任北大校长，正是在此基础上大刀阔斧实行改革，使中国旧学术开始了现代化的进程。蔡元培本人有深厚的国学根底，中年时代留学欧洲，对德国的大学制度和教育理论有很深的了解。^② 蔡元培改革的核心就是要把以前为猎官之所的大学，改造成为追求真理、发展科学的学术机构。他的目光是很远大的，他说：“大学是包容各种学问的机关。我们固然要研究各种科学，但不能就此满足，所以又研究根据科学而又超绝科学的玄学。”^③

为了把大学办成纯粹学术机构，提高北大的学术水平，蔡元培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蔡元培到校后，聘请有名学者当教授。他认为大学的教员不但要求有学问，而且要求有浓厚的研究兴趣。在蔡的网罗下，北大文科中大都为知名学者。如在史学方面有陈汉章、钱玄同、胡适、沈伊默，甲骨考古有王国维。文学有黄侃、陈介石、刘师培、林损、朱希祖、陈独秀、鲁迅、周作人、刘半农等。

蔡元培在北大大力提倡开展学术研究。1920年，顾颉刚作北大图书馆编目员时，学校图书馆藏书已达十七、八万册。1918年

^① 冯友兰：《‘五四’前的北大和‘五四’后的清华》，《文史资料精选》第二期，中国文史出版社，第371—372页。

^② 蔡是光绪进士，1892年（光绪十八年）授翰林院庶吉士，1894年补编修。

^③ 蔡元培：《国立北京大学校旗图说》，见《蔡子民先生言行录》，第335页。

设立了哲学、心理学和经济学等 9 个研究所。规定各科各专门学术都要设立研究所，以各门各科的教员组成，由校长推一人担任主任，本校毕业生可自由参加。研究所的任务是研究学术和中国旧学钩沉等基础工作。1921 年将各科研究所改组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外国文学和国学四个研究所。实际上只有国学所先办起来了。蔡元培的改革还涉及到充实教学内容，鼓励师生办各种学会，创办学术刊物，通过种种努力营造出一种学术空气，并提倡“为学术而学术”。

蔡元培的改革给中国学术界带来了资产阶级的学术观点和研究方法，有力地冲击了传统的学术风气。这可以举胡适为例。陈独秀在北大做文科学长时，从美国请来了胡适。胡适在北大先讲中国哲学史。他从 1919 年提倡“整理国故”，要把“中国的一切过去的文化历史”用资产阶级实证主义的方法加以整理。^①1923 年 1 月，胡适在北大《国学季刊》第一期的发刊词中提出，要“用历史的眼光来扩大国学研究的范围”，“用系统的整理来部勒国学研究的资料”“用比较的研究来帮助国学的材料的整理与解释”。胡适介绍的新方法、新观念在学生中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当时在北大当学生的顾颉刚说：胡适“这一改把我们一班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打击”。^②从此，这一代的学者开始了对古老国学的探索。

但是清末以来，国学的地位一落千丈。深入人心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基本上是对旧文化、旧思想的批判，对新思想、新文化的引进。它产生的负面影响就是在青年人中滋长了对祖国历史文

① 曹伯言、季维龙编：《胡适年谱》，安徽教育出版社，1986 年版，第 161 页。

② 顾颉刚《古史辨》第一册序，第四册序，见顾颉刚《顾颉刚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年第 43、44 页。

化的虚无主义思想，轻视中国历史文化的倾向相当流行。就以清华而言，国学的教学落到很惨的地步。潘光旦是 1913 年进清华的，他说在他接触的教师中“教英文的青年教师，他们对于祖国的历史文化，几千年来丰富多彩的积蓄，一般很少理解，乃至瞧不起。对汉文的修养一般也是单薄得可怜，个别的根本不会写汉字，有的写来别字连篇。”“由于同样的一个理由，当年最吃瘪的是不懂英语而担任非用汉语教学不可的国文、中国历史、中国地理等极少数课程的教师。他们几乎全都是老先生，多半来自长江以南，人都是科举出身，少数几个是举人，进士。进士中还有一个是榜眼。上课一般很认真，修改作业也勤快，但教学方法很陈旧，加以方言的隔阂，……因此不但教学效果很低，并且成为同学们奚落的对象。”“老先生们无论感情上愿意不愿意，思想上赞成不赞成，当然不可能不觉察到这一转变，认识到除了本国的文学和一些历史地理的基础知识，不能不姑备一格似的加以传授外，他们纵有满腹经纶，也是不合时宜的了。因此他们不约而同地采取了敷衍塞职与息事宁人的态度。同学们，一般地说，当然更自然地随着风气走，……。简单地说，在对待中国固有文化的态度上，老师们成了失败主义者，而学生们则成为取消主义者。两种人合作，就形成了当年清华汉语课堂上怪异场面。”^①潘光旦说这种变化的所由发生，远之可以追溯到鸦片战争以及一系列反帝战争的失败，近之可以追溯到辛亥革命前后半殖民地化的日益加深，七十年间，量变达成了质变。

不仅在清华是如此，各地的学校大都如此。“即使政府设立的，也改变了过去的组织，废除经书的传授，转而重视科学和数学，并

^① 潘光旦：《清华初期的学生生活》，见钟叔河等编：《过去的学校——回忆录》，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2 年版，第 77 页。

特别重视英语课程的设置。一般人都喜欢学习英语，认为只要懂得英语，就可以就职于第一流的石油公司或英美烟草公司，否则可以用庚子赔款设置的奖学金，赴美国留学。因此，乡村里喜欢读书的青少年们，犹如在帝制时代他们的祖辈梦想通过科举当上官吏一样，如今他们梦想的是去美国留学。”^①

在中国传教几十年的美国人李佳白 (Reid Gilbert, 1857—1927) 向来以融会中西文化自诩，他也看出了这种趋势。1916年时，他提醒说“一国之精神，必有一国之学术以维系之。故学不可以忘古”。他也看出中国几经改革以来，学风丕变，旧学地位几成江河日下之势。^②但这种情况，愈演愈烈。一直到了1925年，因为当时青年人中流行着“我们应当研究科学，不应当研究国学，因为国学是腐败的，它是葬送青年生命的陷阱”。顾颉刚还必须为研究国学的合理性作辩解：“研究国学，就是研究历史科学中的中国的一部分，也就是用了科学方法去研究中国历史的材料。所以国学是科学中的一部分(如其是用了科学方法而作研究)，而不是可与科学对立的東西。……如果青年们在研究科学，那么，他在故纸堆中找材料和在自然界中找材料是没有什么高下的分别的。……至于老学究们所说的国学，他们要把过去的文化作为现代人生活的规律，要把古圣贤遗言看作是‘国粹’而强迫青年们去服从，他们的眼光全注在应用上，他们原是梦想不到什么叫做研究的，当然说不到科学，我们也当然不能把国学一名轻易送给他

^① 平冢益德：《近代中国教育文化史》，日本出版配给株式会社昭和十七年版，林松庆译，见《学制史料》第四册，第179页。

^② 李佳白：《论新旧教育之兼济》，《尚贤堂纪事》第7册，转白李楚才编著《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料——教会教育》，第533—534页。

们。^①

尽管国学面临着种种挑战，蔡元培的改革把一所封建余毒很深的旧大学转变成成为现代的大学，开辟了高等学校作为学术机构的新时代，为新的国学研究奠定了基础。此后北大不仅是新文化运动的中心，也是国学研究的中心，造成了国学教育与研究的新局面。

二、在学术变革的潮流边徘徊

在北大等国立大学迅速变革的岁月，教会大学也在变化。辛亥革命以后的十多年内，基督教的一切事业在中国都面临着新的形势。宗教自由的条款被载入民国政府的约法，新政府在最初时期对基督教采取完全宽容的态度。在当时的中国社会，基督教和西方经济文化制度同样受到欢迎。同时教会学校也在不断地使自己适应中国的社会环境，它们虽然仍然强调学校的宗教目标，但也越来越致力于传播一般的文化，在神学和西学的教育资源分配方面，越来越达成某种妥协或者说逐步协调起来。如果说在清末，教会大学是在毫无竞争的局面下得到发展，那么这一时期国立学校数量和质量都开始得到一定的发展和提高，加上那时归国留学生就教于国立大学者居多，也增强了某些国立大学的优势。学校之间的竞争，既带来了压力也推动了教会大学的发展。

在华北地区，山东基督教大学最终结束了文理学院、医学院

^① 顾颉刚：1925年12月下旬为《国学门周刊》作《一九二六年始刊词》，见顾颉刚编著：《顾颉刚年谱》，第119页。

和神学院分别在潍坊、青州和济南三地上课的局面，于 1917 年迁到济南的新校园，并正式以齐鲁大学为校名。北京地区的三所教会大学终于在 1919—1920 年间合并成为燕京大学，1926 年迁入以未名湖为中心的新校舍。华东地区，圣约翰大学、东吴大学、沪江大学、之江大学和金陵大学也在扩展规模，增设新的科系，扩大招生。沪江大学 1917 年时仅有学生 14 名，20 年代初学生规模达 344 人。新创办的金陵女子大学 1915 年 9 月正式开学。华南地区历史较久的岭南大学 1904 年仅有学生 60 人，到 1918 年时，全校大、中、小学生达 600 人。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在 1914 年开出了大学一、二年级课程，1917 年开出大学四年的全部课程，成为名符其实的大学。新创办的福建协和大学于 1915 年开始上课。华中大学初创时期（1910—1925）的文科设有哲学、教育、英文、西洋史学和综合文科五个学系。1918 年在教育系独立成科后，将原来的英文、哲学、西洋史学、综合文科四个系，进行调整：成为三组七系：第一，语言文学组，设国文系、法文系、英文系；第二，社会经济历史组，分历史系、社会学系、经济学系；第三，哲学心理学宗教学伦理学组，其中主要是哲学系。虽然学校不免有点小而全、资源过于分散的弱点，但文科教育的架子是搭起来了。华西协合大学 1913 年复课，此后进入一个持续发展的阶段。这些学校的规模仍然比较小。一个学校的一届毕业生仅有几十人。像华西大学 1919 年起每年才有五、六名毕业生，1924 年才有 13 人一齐毕业。^①

即便如此，在当时的中国高等教育体系中，教会大学仍然居于重要的地位。据周予同说，民国元年后废除了全国的高等学堂，北京、南京、武昌、广州等四处制订了设置官立大学的计划，但

^①华西校史编委会：《华西医科大学》，四川教育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15—16 页。

因财政上的原因,除了继承京师大学堂而诞生的北京大学之外,在1921年前还没有别的官立大学。直至1921年才开始在上海设立商科大学,在南京设立东南大学。私立大学有武昌中华大学(1912)、北京中国大学、朝阳大学(1913)、天津南开学校大学部(1919)和厦门大学(1921)等。比较起来,教会学校的实力可以说是比较雄厚的。1919年教会大学组织成立了中国基督教教会大学协会(The Association of Christia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参加的有燕京、齐鲁、圣约翰、东吴、福建协和、华西协合、岭南、金陵、沪江、文华、金陵女子大学、之江、雅礼以及武昌博文学校等14校,表现出相互联系和充实加强的态势。1914年,中国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余日章在《基督教会之高等教育之特色》中列举了教会高等教育在设备、课程、管理和精神方面的四大优点。他认为在课程上教会大学不仅英文程度高,而且“他如格致、历史、数学、哲学、理化、经济等科,虽不能一一完备,而分科教授,已足使国民耳目一新,甚或程度高超,竟与欧美各高等学校或大学媲美。”^① 韦卓民后来也回顾“当时的社会拥挤地送子弟到基督教大学”。原因是:第一,军阀时代国内公私大学的教学和校风都很差,而基督教大学管理教学都比较好,得到社会的信任。第二,在帝国主义侵略势力下,精通英文是谋生的一种工具,基督教大学在英文方面是有办法的。第三,1910年代到1920年代,留学外国,最为时髦。潮流已经从德、法、日转向美国。基督教大学英文教得好,又与美国接近,所以不少人趋之若鹜了。^②

^① 余日章:《基督教会之高等教育之特色》《中华基督教会年鉴》,1914年第一期,第75-76页。

^② 韦卓民:《四十年来我国基督教的高等教育》,《金陵神学志》第二十六卷第一、二期合刊,第52页。

但是，优点的一面，反过来就成了缺点。韦卓民认为，“1926年以前，各基督教大学所教育的学生，除了少数的例外，大都不中不西，不今不古，和中国的社会格格不相入，更谈不上结合中国的实际，供应中国的需要。”^①就当时学校的特点来说，从《中国基督教教育事业》一书的叙述中可以看出。首先一点是各校明显的外国化，“教会大学的课程和教育活动的范围，完全自然而然地采取传统的西洋式，自然不合中国的标准。”教会大学有西学和基督教的渊源，因此民初以后，教会大学在英语、医学及其它自然科学的教学方面都有进展。但是它没有中国文化学术的渊源，早期的国学课程的开设，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功利的目的，它们的主持人很少真正懂得中国文化，不肯尽量地罗致和信任中国学者，也不关心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学术文化的变迁。在很大程度上，基督教大学中很少有著名的学者教授，基督教大学界在新文化运动中几乎没有一点声响，这说明他们不仅远离中国的政治生活，而且也远离中国学术文化的潮流。同样，以北大为源头的中国传统学术开始现代化的进程时，教会大学仍然是睡意阑珊。

不过，各个学校也不能一概而论。燕京大学在20年代初步入发展期。1919年1月司徒雷登到燕大（当时称北京大学）时，学校的情况还很窘迫：经费支拙，校舍简陋，人员短缺，学生不足一百人，图书仅有数万册。“教职员连‘打字姑娘’都算在内只有三十三人。”^②1919年燕大的中外教员之比是4比25。到1923年洪业到燕京任教时，教师已经增多，80名教员中有52位西方人和

① 韦卓民，同上。

② 刘廷芳：《司徒雷登——一个同事所得的印象》，见《真理与生命》第10卷第8期。

28 位中国人。招生人数也扩大了，其中有 336 名男生和 94 名女生。^①但当时的课程同样是偏重宗教和西学而忽略国学。该时期燕大用于有关国学和宗教学院的经费，分别占预算的 3% 和 16%。^②历史系只有一名教授，是来自瑞士洛桑大学的博士王克私 (Philippe de Vargas 1888-1956)。

也许是地处北京，燕大最先感受到北大学术进步的风气。司徒雷登在回忆录中说他在出任校长时，已经注意到了北京的变化。他说：“在传教士们正在为他们创办的大学名称（指燕京大学的命名）争吵不休的时候，一所中、英文都叫做‘北京大学’的国立大学已经创办起来，并且正迅速地在国内外获得名气。这一情况当即引起了我的注意。北大校长蔡元培是一位曾获得旧科举制的最高学位，同时也受过一些西方教育的学者，那时他正把一批受过西方教育的卓越的年轻学者吸收到他的大学里，其中有当时就很著名的胡适博士。这些学者正在出版有关革新的书籍和期刊，深受青年学生的喜爱。正如一份最著名的刊物名称所表明的，那时是一个‘复兴’的时代，还在南京的时候，我就怀着极大的兴趣注视着这一复兴的过程。”^③正因为如此，司徒雷登在 1921 年就想聘请胡适来“改良国文部”，后来胡适推荐了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周作人担任燕大国学门主任。胡适曾写信给周说：“这个学校的国文门若改良好了，一定可以影响全国的教会学校及非教会

① Susan Chan Egan, *A Latterday Confucian, Reminiscences of William Hung (1893-1980)*, published by the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Cambridge, 1987, p. 89.

② Philip West, *Yenching University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 1916-1952*, p. 122.

③ 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程宗家译，刘雪芬校，北京出版社，1982 年版，第 46 页。

的学校。”^①显然，胡适把燕大看成教会学校中的榜样。后来，郭绍虞、钱玄同、俞平伯等著名学者都曾先后任教于燕大国文系。

燕大必须提高国学教育的水平成为该校许多教授的共识。1924年，洪业任燕京文学院院长，在刘廷芳的支持下采取激烈的措施来提高燕京的学术水平。他“充分认识到要使燕京获得中国社会的尊重，一个优秀的中文系和历史系是至关重要的。”他几乎解雇了所有国学系的教员，规定学生的平均成绩如不能达到“B”就必须离开燕京。^②这种言出法随的做法，自然得罪了不少人，但事实上燕大的进步也不负众望。冰心1923年在燕大上学时，中国文学课程已经同其他教会大学很不一样了。^③冰心当年的毕业论文是《元代的戏曲》，分为“元曲的分类”“元曲的渊源”“元曲的作家”“元曲的结构”“元曲的脚色”“元曲的思想”“元曲的艺术”“元曲与新文学”等章节，指导教师是周作人、顾名和许地山。1927年此文被发表于新创刊的《燕京学报》。可见当时的毕业论文已经有相当的程度。^④而冰心本人1926年从美国回国后，也在燕京教授国文，成为非常受学生欢迎的国文教师。^⑤

山东从清末以来，在中国政治地理上一直属于比较保守的地区。齐鲁比起燕京来，变化要小得多。1917年秋季，齐鲁大学在济南开学时，三院的学生总数达303人。教学和行政人员总共50人。1917年起成立了历史系和国文系，国学教师是4名有功名的

① 《胡适的日记》，上，第275页；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83年版，第124页。

② Susan Chan Egan, p101

③ 冰心：《我的大学生涯》，《燕大文史资料》第一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9页。

④ 范伯群编：《冰心研究资料》，北京出版社1984年，第14、15页。

⑤ 冰心《当教师的快乐》，《燕京大学文史资料》第三辑，第16页。

旧文人。^① 当时的学生说：“历届国文系的主任和教员，都是擅长八股文的举人、拔贡之类的老夫子。尽管 1919 年波澜壮阔的‘五四’文化运动遍及全国，可是并没有能影响到齐鲁大学的国文系。”^② 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 20 年代后期。

民国初年是金陵大学不断发展的阶段，农科已经初有名气，但文科止步不前。金大开办时，数理方面的若干科目附设在文科内。1914 年金大改组文科，成立了语言学系和社会学系。语言学系包括了国文和英文等科目；社会学系包括了历史、哲学、心理、教育、政治、经济、宗教等科目。1915 年由美国人夏伟师（G. W. Sarvis）继包文任文科学长。国学教育在金大质量不高。国学教师也有同样的“老”和“旧”的问题。^③ 1921 年时中国文学、历史等科只有中国教员两人，仅教授浅近文学。当年教育部派员视察金大时，曾当场出题“试言对于南京之感想”，结果在参加考试的 170 名学生中“文理通顺者固不乏人，而误字劣文占其大半。”教育部报告中称金陵文科“殊无成绩可言”；“其平日之教授未尽得宜，与其程度之未臻深造，已可概见”。^④

远在四川的华西协合大学，在国学教育上也是起步迟缓。初创时期（1910--1925）的文科设有哲学、教育、英文、西洋史学和综合文科五个学系，直到 1926 年还没有一个国文系。^⑤ 福建协

① Corbett, Charles Hodge, *Shantung Christian University (Cheeloo)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 1955, p35.

② 许慕贤：《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简介》，《济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1984 年版，第 150 页。

③ 王德滋主编：《南京大学史》，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477 页。

④ 金大历史档案：“教育部视察金陵大学报告”，见南京大学高教研究所校史编写组编：《金陵大学史料集》，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1—22 页。

⑤ 《华西医科大学校史 1910--1985》，第 45 页。

和大学在 1921 年创办中文系，但师资难觅，英华书院的教务长特地到北京，向北大要人。结果胡适和顾颉刚保荐郭绍虞到协大教国文。郭当时只有 28 岁，便当了协大教授。当时协大国学教育才开始，郭说“我既在大学教书，也就更加努力，于是我只能利用寒暑假的机会，一方面准备教材，一方面努力读书，这样认真，差幸不致辜负这个教授的职责。”^① 这就是福建协和国文教育的艰难开端。

东吴、华西、华中和金女大等都在调整自己的课程。但是它们对开展国学的教学与研究都是没有人员和金钱的投入，多数如齐鲁那样应付局面而已。

在上海的两所教会大学对国学教育历来不太重视。在社会舆论的批评下，沪江在国学教育方面也有所动作。一些学生开始把注重国文作为一种民族主义的表现，为此发动了扩充中文图书的募捐运动。而校方也开始注意国文教学，1924 年一度聘请著名的新派学者朱经农任国文部主任，对国文教学进行了一些推陈出新。^② 国学教育最不景气的是圣约翰大学了。民国初年，圣约翰聘请了有低级科举功名的文人来教古文经学。1922 时全校 51 名教员中 10 人是教中国学的教师。其中 3 人没有功名，5 人是秀才，2 人是举人。^③ 所用的办法仍然是强调背诵和记忆。圣约翰的中文课程被削弱到无足轻重的地位。学生每周只要求花 2 小时把中文译成英文，或者把英文译成中文。所有中文课程都被列为选修课，

① 郭绍虞：《我是怎样学习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怎样学好大学文科：专家学者治学经验谈》，郭绍虞、周谷城等著，复旦大学出版社，1982 年，第 3 页。

② 王立诚：《美国教会高等教育在中国：沪江大学个案研究》，博士论文摘要 1995 年，第 14 页。

③ Mary Lamberton: *St. John's University, Shanghai 1879-1947*, Hong Kong, 1988, P. 88.

1917年国文系被取消。^①

总之，国学教育的老问题依然存在，学术研究更是为时尚远。这里当然牵涉到许多方面的原因。按照最初的设想，教会大学办学的目标是传播宗教和西学，差会显然没有想到要用资金和人员来帮助发展中国文化的教育与研究。在西学教育和中学教育的资源分配方面，中学几乎没有或者只有很少经费的预算，要提高中国文化课的教学质量几乎是不可能的。由于中国教师的新水和地位等原因，教会大学对留学生没有多少吸引力。另外一个问题是当时的大学教师，无论是中国人还是西方人，真正具备资格的不多。^②所以在民初的十余年中，教会大学还是按照大学的创办人自己心中的模式——英美大学，特别是美国小型大学的样板在发展着，仍然在中国学术主流的周边徘徊着，它们向中国学术界的靠拢，还有待着新的冲击和新的机遇。

三、非基督教运动对教会学校的批评 和教会学校的回应

直到民国以后的许多年，教会学校沿袭清末以来自成一体的老作风，与中国教育界的关系是很疏远的。彼此之间存在着事实上的激烈竞争，但彼此之间不相沟通交流，甚至还隐含着某种程度的对立情绪。问题的焦点之一就在于如何对待中国文化教育。

^① Wen-Hsin Yeh: *The Alienated Academy,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Republican China, 1919-1937*, published by 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90, p79.

^② 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第49页。

1917年，曾经担任过教会学校视学的蒋昂就提出了中西教育的融会问题。他指出了教会学校不了解中国教育界的情况，延聘的中文教员多取举贡生员，有些是“滥竽充数”。特别是教会学校“歧视吾国文字”，课时太少，教师待遇太低，以致在学生看来中文变得可有可无。蒋认为这是教会学校“昧乎吾国国情”，应当实行改革。^① 这些问题如果发生在国人自办的学校，大概都可以说是属于教学行政和教育质量的范畴，但是涉及教会学校，涉及到教育主权和民族主义，问题的性质就发生了变化。中国教育界在1922年已经很尖锐地感觉到外国人在中国的土地上开办学校，教育的是中国的青年人，但却丝毫不受所在地政府的管理，是完全不合理的。教会学校的迅速发展，又加重了人们对此的担忧。^② 因此，反对的声浪逐步地高涨起来。

事实上，教会教育界有远见的人也看到了类似的问题。早在1910年，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北美外国传教大会顾问委员会主席巴顿博士（Dr. Ernst D. Burton）在对中国教育进行实际调查后，对教会教育提出了一些看法。他认为教会教育要服务于中国的特殊需要，外国教育家们要积极参与中国的教育活动。教会学校应该成为政府学校的伙伴，与其携手并进。^③ 余日章在1914年就指出教会大学在国学教育、行政权力以及与非教会教育机构的

^① 蒋昂：“中西教育之融会”《教育杂志》1917年9月20日，第9卷，第9期，转自李楚才编著《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料——教会教育》，第469页。

^② 如20年代初共青团济南地委的报告中说：“此地基督教会的势力，较任何地方都大……，计山东全省省立中等学校，不过十五处，而基督教会所设立的中等学校，也有十余处之多，只就济南一隅，中学已有三处，而齐鲁大学，有（原文如此）居然在社会上博得山东最高学府的盛名。”《济南革命历史档案资料》，第一辑，第126页。

^③ 参见巴顿1910年1月12日在“北美外国传教大会”上的演讲，转自史静寰：《狄考文和司徒雷登在华教育活动》，天津出版社1991年版，第115页。

联络方面存在着严重的问题。他认为中国少年醉心欧风，教会学校的学生更志在学习西学，对国学早存轻视之心，但是“一国有一国之国粹，……未有本国国文不精而能发挥惊天地动鬼神之事业。”^①

1915年，中华基督教教会首先提出，由中外教育家合作对中国的教育情况进行考察。后来中华续行委办会也参与进来，并于1918年4月决定“尽快推动在中国安排一次基督教教育调查”，最终促成了巴顿调查团来中国进行了4个多月的考察。1922年出版的巴顿调查团报告认识到时代已经发生了变化。^②在这种新的形势下，报告指出了教会学校必须要注意质量，并且要去掉它的洋气。报告为教会学校提出的新政策就是“更有效率、更基督教化、更中国化”。至于如何更加中国化，报告提出教会学校要增加中国教师和行政人员的比重；西籍教师要认真学习中国文化；学校课程要适合中国国情；要保存中国文化的优点，学校要培养学生的爱国精神。由于这次调查涉及中国30多个主要城镇500多所教会学校，所以这些意见也反映了它们的看法。^③巴顿调查团的报告对

① 余日章：《基督教会之高等教育》，《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一册，第76-79页。

② 巴顿报告称：“有一大批有高度事业心的中国人不顾这种道德的情况，决心在中国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教育系统。他们勇敢、爱国、热忱、聪明，有自我牺牲精神。……一个新的中国教育制度正在兴起，不管它有多少缺陷，未来一定会出现巨大的成就。”*Christian Education in China, the Report of the China Commission of 1921-1922*, New York 1922, p. 15. 见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第349页。

③ *Christian Education in China the Report of the China Commission of 1921-1922*, Shanghai, 1922, 见陈学恂等编：《中国教育史研究现代分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01页。

中国教会教育界显然发生了影响，^①但对教会大学的具体政策带来了什么样的变化，并没有表现得很清楚。巴顿作为一个旁观者，对教会大学的问题要比大学圈子里的人看得更清楚，但是即使不考虑巴顿这种代表新一代教会自由主义教育家的看法是否会被认同，贯彻这些建议牵涉到许多具体的人事和经费问题，没有大的推动力，这一步是很难迈出去的。不过，20年代以后，燕京、东吴、齐鲁都有一些留学回国的中国人担任了教授职务，增添了师资的中国色彩，但是所谓“中国化”的进程只能算刚刚起步。

就在巴顿一行进行调查的同时，中国知识界、教育界政治批判的锋芒，从非宗教到非基督教，到最后发起收回教育权的运动。教会大学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民族主义者的批判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教会教育是文化侵略，中国必须收回教育主权；二是教会教育的宗教性；三是教会教育的非中国化。实际上，正如1923年一篇署名TSO的文章所宣称的，教会教育“破坏中国教育的统一，蔑视中国的国语国文教育，养成国民媚外的习性，培植帝国主义侵略的先驱，实在是教会教育已成的罪案，也就是中国改造的最大障碍物之一。”^②文化侵略和非中国化，都指责教会教育使学生忘其祖国，而这一点在相当程度上是通过削弱中国历史文化的学习来实现的。批评教会教育的言论都要求教会学校的学生快快觉醒，发扬其爱国主义精神，接受具有中华民族特色和优秀传

^① 这一时期的教会刊物广泛讨论了这些问题，见《新教育》，第5卷第1、2期合刊号。

^② TSO，《教会教育流行的原因》《前锋》第2期，1923年12月。转引李楚才编著《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料——教会教育》，第578页。

统的文化教育。^①

教会教育界认为这些指责有些是言过其实的偏激之论，有些则从宣传的角度做文章，并没有考虑到历史事实。个别人认为中国政治分裂，军阀混战，还没有到收回教育权的时候。^②但是，教会教育界的反应比较慎重。后来任沪江大学校长的刘洪恩说“我们应该视反对者为良友，虚心自审，积极改良。”^③他们承认教会教育存在一些缺点。^④1925年起，许多教会教育中的领袖人物检讨教会学校的问题。燕京教授、中国基督教教育会主席刘廷芳认为教会大学“当研究发挥中国的文化，为他宣扬国外。同时又当实际的输入各国文化，提倡纯正的、人道的、平等的国际主义。”^⑤1925年1月，中国基督教大学中国行政人员会议时，对高等学校过去不重视国文教育和中西教员待遇不平等现象提出了些改进的办法，如决议今后“基督教大学应多注意教授国学”，课程“必须

① 1923年6月《学灯》杂志发表一篇未署名的文章《文化侵略中的教会教育》，也强调“教育之目的在发展一国之文化”，而教会学校教育却“使将来化中国为基督教国民之士女”，“把中国的国学完全抛掉”。见《学灯》第6卷第6册第12号；1923年12月少年中国学会苏州大会宣言，提出了“提倡民族性的教育，以培养爱国家保种族的精神，反对丧失民族性的教会教育，及近于侵略的文化政策”，作为该会的行动纲领之一。见《少年中国》月刊第4卷第8册。

② 江炳廷：《中国收回教育权的日期到了吗？》该文对教会学校作了客观的评述，实际上是反对收回教育权的。《真光》1924年7月，第23卷第7号。见李楚才编著《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料——教会教育》，第591页。

③ 刘洪恩：《反对基督教教育之一般评论》，《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8册，1925年，第122—125页。

④ 李天禄：《基督教教育之我见》，《教育季刊》第二卷第三期，1926年10月。

⑤ 刘廷芳《我对于基督教在中国教育事业的信条》，《教育季刊》第一卷第一期1925年1月，转自李楚才编著《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料——教会教育》，第452页。发表过同样观点的还有齐鲁大学第一任中国人校长李天禄，见李的《基督教教育之我见》。

设置本国语言、文学、历史、地理及哲学”，要“有精深研究之中国学者教授”。在“薪俸、住宅、子女教养补助金、保险、旅费、医药等问题上都应该有公平的制度，此项制度以资格地位为准则，绝不应有国籍的区别。”^①这就是要在外国人开办的教会学校中取消对待不同国籍员工待遇的双重标准，学校的一切事务要在一个统一的标准下运作。

上述教会教育行政人员是从制度上考虑问题，一些学生和教师则从养成爱国观念来看国学教育的重要性。1925年10月，刘淦芝在《现在中国教会学校应有的觉悟》一文中说：“外国人在中国借学校传教必须注意中国人的习惯同心性，必须尊重中国故有的文化，西方文化只能以潜移默化的方法，灌输给学生，使学生自己比较中西文化的优劣，不可以本国文化自高自大。”^②1926年杨程在《基督教教育之将来》中谈得更加具体。他指出教会学校要鼓励学生爱国，并提出要“注重国学”。他说：“教会学校虽然款自外来，也多系外人办理，但其受教育的学生，总是中国的青年，所以应当注重国学。注重国学，原非排斥西学之说法，不过主张国学比较西学特别注重一些而已。要注重国学，必须从注重国文开始，因为国文是研究国学的工具。现在教会高级中学多用英语课本教授，大学各科之语言，纯用英文，似乎都是外国来的学生一样。我们常遇到英语烂熟的教会学生，却于一封中文的白话信弄不清楚。”另一方面，他分析教会大学“因用英语讲解各学科之故，大多数学生对于必须研究的学科，只是专心学习英语，则无

① 高时良，前引书，第278页。

② 刘淦芝：《现在中国教会学校应有的觉悟》，《生金》六卷一期，1925，10，转自辽宁大学哲学系编《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1981年版，第一集第十一册，第469页。

暇以求该项科学之真解了。可见，用英语教授各学科的弊病，除阻止学生国文进步外，而且妨碍学生必须研究的学问。我觉得今后高级中学的课程，除英文科外，最好均以华文教授为妥。大学也宜采用中英参半的教授法，而不宜纯用英语也。”杨程最后还谈到了要聘请了解中国学术思想线索、在哲学、伦理学和文学方面学有专长的国文教授，并且要创办刊物“鼓吹国学”，这样教会学校的国学教育四、五年内一定会有进步。^①

在民国政府教育部任职的朱经农从官方角度看也认为：“教会大学过于忽视中国的文化，这也是相当的事实。文化是立国的根本，应该保存，应该宣传。”“教会学校要注重中国固有的文化，不可出主入奴，养成一种纯粹外国化的中国国民。”^②但朱对教会大学的前景并不乐观，在反基督教运动很激烈时，他在致胡适的信中说：“教会学校方面虽有愿努力整顿者，然而求其中国化，亦大不易。除燕京外，恐不能有大希望。”^③

不仅是和教会学校有关的中国人感到了改革的必要，西方人也看到了这股汹涌的潮流。中华基督教协进会名誉干事罗炳生(Edwin Carlyle Lobenstine 1872—1958)也提出关于加强国学教育的设想。他认为：“我们即须毅然决然，使基督教高等教育，接近中国情形，切合中国的需要。外人攻击教会学校，总是说洋气太重。惟在过去的数年中，全国大学已经将国文系，分别扩充改良。要使得所有教会学校毕业生，于中国文化方面，有深切之了解；对于中国文字方面，有纯熟之技能；如此有影响中国人民生

① 杨程：《基督教教育之将来》，《青年进步》1926年第93期，见李楚才编著《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料——教会教育》，第478页。

② 朱经农：《中国教会学校改良谈》，《中华基督教教育季刊》第一卷第一期，1925年6月，见《学制史料》，第4辑，第715—716页。

③ 朱经农致胡适，1915年4月15日，见《胡适来往书信选》，第325页。

活与思想的力量。”罗炳生还提出一个新的设想：“除各大学一律发展其国文系外，更宜择一人才设备比较完善之大学，设立中国文字、中国哲学、中国史学、中国社会学之专科，以为学生深造之所。按教育调查团的提议，此种专科应设于燕京大学。该校年来，对于此事已经有相当进步。”^①参加过巴顿调查团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孟禄（Paul Monroe，1869—1947）也在 1926 年提出国家应该有统一的教育制度，同时他强调了“（一）无论国立或私立一切学校应当注重国语，并用国语为教学语言（二）本国历史、地理、文学及其它相关的科目应当一律依照课程标准教授。（三）教师须具备一定的资格，并有相当的专门训练（四）学校的行政方面与教务方面都应当有相当数量的本国人士负责办理。”^②

在社会压力和有识者的推动下，教会大学加快推进国学教育。燕京首先成为中国教会大学国学教育和研究的首倡者。金陵大学也着手发展国学教育。1925 年前后金陵大学的国文系主任程湘帆教授向校董会财政委员会提出扩大国文系的建议。他认为教会大学的培养目标中忽视了培养文人、翻译人员和报人，这不利于在民众中传播基督教。他说：“作为这个大学的毕业生，我的经历使我不得不承认，由于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知之较少，对中国文学的欣赏能力低，缺少语言表达能力方面的训练。我们科的毕业生的工作在许多方面受到影响，他们对社会、对民族、对教会的贡献在许多方面受到限制。站在毕业生的角度来说，学校没有给毕业生提供一个中国绅士所必要的文化修养，一种作为中国领导人物

^① 罗炳生：《基督教高等教育当前的问题》，《教育季刊》第二卷第一期，1926 年 9 月，见李楚才编著《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料——教会教育》，第 150、152、153 页。

^② 孟禄：《基督教在国家教育制度中的位置》，《教育季刊》，第二卷，第一期，1926 年 3 月，见李楚才编著《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料——教会教育》，第 438 页。

的必要工具。”他举出几个由于国文水平差而失去工作的毕业生的例子，坚决地说“切身体验告诉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师资力量雄厚的国文系。”^①到 1925 年底，金陵大学由著名训诂学家胡小石和文学家陈钟凡出任主任。国学系预算增加一倍达 3 万元左右。“国学教授之待遇地位一律与其他各科教授之资格最老者同等，一洗从前畸轻畸重之弊。中文参考书籍骤加至四万余册。课程教法大加革新。新旧学生对于国学兴味极为浓厚。全校空气为之一变。”^②沪江大学在 1925 年 8 月聘请吕思勉任国学教授。时间虽仅一年，但在该校开设中国文字学、宋明理学诸课程，并为学报写论文，深受学生欢迎。^③

圣约翰大学的国学教育也有些变动。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圣约翰大学的学生虽然能操一口流利的英语，熟知西方的风俗习惯和名人轶事，但却不甚了解本国的历史和语言文字，从而受到社会的诟病。曾在圣约翰大学任教的颜惠庆认为，只尚英文的做法实不可取，即便 4 亿中国人都掌握英语，中国也不会因此而得救。为了使圣约翰大学摆脱洋味太重而招致的孤立状态，学校当局开始采取中英文并重的方针，将国文水准同英文水准一样视为学生日后从事外交、内政活动的必备条件，认为学生如果不重视国文，不重视本国的文化传统，宣教的效果也会大受影响。为此学校逐步增加了国文教学的比例。经卜舛济亲自擘划，国文教学进行多次改进，并大力延揽名家到校任教。二十年代时，圣约翰大学国文部一度由著名学者孟宪承、钱基博等人主持，国文教学的质量

^① C. C. Chen（陈湘帆）《扩建本校文理科国文系之建议》，金陵历史档案（英文），罗庆春译，见《金陵大学史料集》，第 23—24 页。

^② 包文：《金陵大学之情况》《教育季刊》第一卷第四期，1925 年 12 月，转自李楚才编著《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料——教会教育》，第 169 页。

^③ 李永圻：《吕思勉先生编年事辑》，上海书店，1992 年，第 130 页。

因而不断提高。学校还曾打算邀请国学大师梁启超到校任教，此举虽未实现，但也表明当时圣约翰大学已将国学放到一个重要的位置上了。后来，圣约翰大学一直以中英文并重相标榜，显示其与别的教会大学相异之处。但在一种“非民族化”的文化氛围中，中西教育并没有平衡地发展，作为维持学校声望和教会控制手段的英文教学始终占主导地位，一直对国学教学造成不利影响。^①

由非基督教运动开端的民族主义运动的冲击，在教会大学内部引起了几个变化。第一，学校开始重视国学的教育。第二，为实现这个目标，开始提高中国教员的薪水，以吸引和聘请著名的学者，或者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师资。第三，最重要的是，教会大学的国学系开始由中国人来主持和管理，结束了外行当家的局面。这些变化为发展国学教育和研究准备了前提条件。不过，随着国民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仅此改革已经不够了。

四、立案前后的变化

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中国的政治变迁加快了教会大学参与中国学术文化主流的进程。1927年以后，教会大学在“行政方面的进步，确可以突破从来的纪录。”^②切身感受到这股新风的燕京大学学生说：“自从五卅运动以后，燕京大学总算换了一

^① 郑朝强：《我所知道的上海圣约翰大学》，全国政协文史委编：《文史资料选辑》，第91辑；汗统：《著名的教会大学圣约翰》，《上海文史资料选辑》，第59辑。

^② 赵运文：《民国十六年之基督教教育》，载《中华基督教会年鉴》，1928年，第四部分第2页。

种空气，直到革命军到了武汉，燕京大学更是急转直下的大事改革，恨不得一时三刻，把一个教会式的燕京，变成了一个崭新的中国式的燕京。”^①这真切地描绘了大革命时代的急风骤雨对教会大学的深刻影响。

在更实际的层面上，教会大学进一步改革的推动力来自国民政府对教会大学的注册规定。如果说教会大学在北洋政府时期，对在中国政府注册立案还是得过且过的话，^②那么在南京政府刚刚建立后的那种气势下，大部分学校不得不尽快申请立案。但是，在北伐激荡起来的民族主义高潮中，南京政府颁布的私立学校立案条例比北洋政府的条例更加严厉：校长必须是中国人；校董的三分之二以上须是中国籍。各省政府对此都执行得比较认真，于是立案在 1926 至 1930 年，成为基督教大学所面临的一个大问题。有些大学的申请一再被政府驳回，比如齐鲁大学的注册一直拖了三年之久。不过，到 30 年代初，除了圣约翰大学外，其它教会大学都已经注册。

注册对国民政府来说是要建立一个统一的在政府控制下的教育体系。对教会大学来说，则是要在制度上从教会教育机构转变为国家教育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无论如何，它们从此结束了清末以来的独立地位，至少在理论上必须接受国民政府制定的教育计划。尽管实际上许多方面双方做得怎样大可商榷，但对教会大学的教育，特别是以前一直薄弱的中国历史文化的教育是一次巨

^①君度：《敬告学校当局及同学们》，《燕大月刊副刊》，第四卷第三号，1928 年 2 月 18 日。

^② 1921 年司徒雷登在为《中华基督教会年鉴》写的《基督教各大学的实绩》一文中说：“已有数校打算立案，然而未能实际上办到。”据说燕京在 1921 年提出立案申请，但北洋政府没有反应。相反各校都争取在西方立案，大部获得成功。见《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 6 册，第 93 页。

人的推动。

立案使得中国人在教会大学的教育管理方面有了一定的发言权。1930年任中华基督教教育会代理总干事的缪秋生在当时总结说“教会大学之统治权由西人转入华人”，是两年来的最大变迁之一。^①一批有名望的中国学者走上了大学的领导岗位。这些人中多数是留美学生，这和当时国立大学对留学生委以重任是同样的时尚。校长中也有未出国门一步的知识分子陈垣、吴雷川等人。值得一提的是对教会大学持批评态度的学者如吴雷川出任了燕京校长，可见教会学校当局对这些批评并非不能容忍。^②显而易见的是，在中国社会不能承担起学校的经济负担时，中国人担任校长后的实际权力肯定大打折扣。立案后担任华中大学校长的韦卓民说：“有几个立了案的基督教大学，对政府讲，校长是中国人，而学校的行政权和财权，照旧操在外国人手里，一直到抗战胜利，各

^① 缪秋生：《基督教高等教育概况，1928—1929年》，见《中华基督教会年鉴》第11册上，第四部分第39页。

^② 以吴雷川为例，在就任校长之前，曾对教会大学过去轻视中国文化，表示过比较全面的批评态度。吴雷川概括教会学校过去的缺点：“教会学校以往的状况，若照非教者的评论，至少有下列五点：（一）虽说办学是为造就中国人才，但因为经费出自教会，总不免看学校为播道的园地。甚至以新教的学生多寡，为学校应否存在，或评量其成绩优劣的标准，因此教育在方针上就渐至偏倚。（二）倚仗不平等的传教条约，蔑视中国法令，不受中国官厅的考核。甚至夸耀已经外国政府注册，可以自由授予学位，为学生开出洋留学的捷径，却因此予学生轻看本国的印象。（三）管理学校的是外国人，不明了中国历史的背景和当时的需要，妄以为中国的文化俱无足观，对于中文的学科毫不注重，以最低的薪俸聘用中文教员，养成学生厌弃中文的习惯。（四）学校自成系统，自为风气，教职员少与普通教育界中人往来，知识不免封闭，学校内的一切的设施，就不能因观摩竞争而进步。（五）因为经济来源的关系，外国人居于主体，其他中国的教职员，不是热心媚外，就是冷眼旁观，不负责任，以致全校缺乏联贯的精神，学校在社会上的信用也不能圆满。”见《教会学校的已往及其将来》，《教育季刊》第三卷第一期，1927年3月，见李楚才编《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资料》，第448—449页。

校复员之后，还是这样。以学校论，是阳奉阴违，以政府论，是明知不向。”^①不仅是韦卓民这样说，立案后的金陵大学校长陈裕光持相同的看法，认为真正的权力并不在中国校长手中。作为当事人，他们的看法是事出有因。因为参照当时国立大学和其它私立大学而言，教会大学校长的权力是受到外国差会董事会的制约的，即使在教会大学内部，有些中国校长只是学校与国民政府打交道时的招牌。但实际上，特别是与立案前相比，虽然差会一直牢牢地掌握最终的审批权，但中国人在大学的事务中毕竟有了更多的主动权和发言权。^②中国人毕竟更熟悉自己的历史文化，也更深刻地感受到民族主义对教会大学国学教育的挑战。福建协和大学校长林景润上任之始就对学校的国文教育提出批评，认为只有在充分理解本国的语言文化及思想的基础上，才能推动民族的进步。^③因此他们借民族主义的东风，向差会提出改革课程的要求，聘用更多的中国人担任教会大学的教师。^④燕京在 1927 年，中外教师的比例已经从一比二变成了二比一，在其后的 20 多年中一直维持在这个水平上。^⑤这就为推进国学教育创造了校政和师资上的大气候。

① 韦卓民：《四十年来我国基督教的高等教育》，《金陵神学志》（1950年11月），第二十六卷一二期合刊，第53页。

② 魏思特认为在立案以前差会董事会有效地控制着燕京大学的行政，但到了 20 世纪 50 年代初大部分权力已经转到中国人手里。Philip West: *Yenching University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 1916—1952*, 1976, p. 98.

③ Roderick Scott: *Fukien Christian University*, New York, 1954, p. 62.

④ 出身辅仁大学的牟润孙曾记载了陈垣在校长任上虽然是“天主教教会的傀儡，作洋人对付中国教育部的招牌”，但还是选拔了许多出色的学者到辅仁和燕京任教。牟润孙：《发展学术与延揽人才》，见牟润孙著：《海遗杂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1990 年版，第 85—92 页。

⑤ Philip West: p. 116.

立案也影响到教会大学的资源配置。政府立案的要求之一是一切教会大学必须有三个学院才能作为大学注册，出于限制宗教的目的，神学院不能作为大学的组成部分。这种做法给起源于传教需要的教会大学提出了一个很大的难题，但却提高了其它学院的地位，特别是以前一直不被重视的文学院的地位。1917—1918年度燕大教师总数44人，宗教学院的教师是12人，占了四分之一还多。但到1925—1926年度下降到五分之一。在立案以后更下降到了十分之一。相反，国学及相关课程的教师人数却在不断上升。1917—1918年时教国文的仅2人，占教师总数的二十二分之一。但到1930—1931年度时，这个比例已经上升到了五分之一。在经费分配上也反映出这个变动。1923年燕京总经费的16%是花在宗教学院，3%是用于国文教育的。但到1930年时这个比例反过来了。在其后的20多年中一直如此。^①由于取消了强迫宗教教育，通过大学教育使中国全面和迅速基督教化的希望已经消逝了。这反而使得学校可以投入所有的力量使学校在学术上赢得尊重，并且更加“中国化”。^②其它教会大学也都或快或慢发生着这样的变动。^③

西方人创办的中国教会大学开办以来，就有一个如何从服务于传教事业转向服务于中国社会的过程。中学和西学、科学和神

① Philip West: p. 122.

② John Stuart: "Current Religious Issues as Faced at Yenching University", *Educational Review*, 23. 1: 42—44, (January 1931). see Philip West: p. 96.

③ 东吴大学的杨永清到任后，文理法科扩大为三个学院，“鉴于国文之重要，认为青年应务根本学问，竭力提倡筹募国文奖学基金，加增大学一、二年级国文必修课程。”见张圻福、陈少英、杨恒源编：《苏州大学校史》，第5页；沪江大学“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各方面均给人而日一新的感觉。宗教课止必须改为选修。”朱博泉，《沪江大学校史述略》，朱原为沪江书院的负责人，《上海文史资料》，第47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05页。

学的地位到底怎么确定，资源如何分配，一直是困扰这些学校的问题。显然，仅靠学校的内部动力是不足以解决这些问题的。非基督教运动和收回教育权运动则成为改革的外在推动力，正如魏思特指出的，非基督教运动在很大的程度上否定了教会大学的宗教目的。^①使神学和国学的教育几乎换了一个位置。立案不可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但却使教会学校在各方面前进了一步。正如韦卓民在同一报告中所说的“立案酝酿几年之后，基督教大学大都逐渐地变成中国人办理的学校，形式和内容都逐渐与我国国情结合。”^②司徒雷登则说：“在政府立案和其它微妙的力量已经结束了教会大学那种沉寂的离群索居的状态，把它从一个自我封闭的外国传教组织卷入了中国社会生活的激流中。”^③

立案也使得教会大学比较容易吸收优秀的国学师资。以前，在教会大学工作的国学教师，其主要来源是教会大学的学生，有些是从教会大学毕业之后再赴国外深造，重新回到教会大学当教师的。其次则是非教会大学的毕业生。数量不多的没有学历的著名国学家有时也列名教会大学。在学校和师资都有选择自由的年代，教会大学吸引人才并不是轻而易举的。在早期的教会大学中，出类拔萃的人才很少。直到 20 世纪 20 年代中后期，有些学者对到教会大学教书还是感到不舒服。吕思勉在 1925 年因朱经农介绍，到沪江大学教国文历史，但他说：“沪江风气，远较从前之东吴为佳。但予在教会学校中，终觉气味不甚相投。而其时光华大学初创，气象甚佳，确有反对帝国主义之意味。国文系主任童章伯君，

① Philip West: p. 173.

② 韦卓民：《四十年来我国基督教的高等教育》，《金陵神学志》（1956 年 11 月），第十六卷三期合刊，第 53 页。

③ Philip West: p. 96.

本系常州府中学堂同事，再三相招，1926年暑假后，予入光华。”^① 1925年初，博晨光请冯友兰到燕京大学教学。答应冯一半时间为哈燕社作研究，一半时间讲一两门课。1926年2月，冯友兰到燕京担任哲学教授，并任研究所导师。他对能有时间做研究是满意的，但始终感到教会大学非“安身立命之地”。他在1925年9月给胡适的信中说，已答应到燕京去教书，因为“此等研究中国文化之事，于中国有利无害，吾人作之原无不可，但纯在外人机关中服务，区区此心，终觉不安，故私意颇愿于中国诸机关中略兼小事，聊以自慰。”^② 钱端升则在清华说：“依我看来，二、三年内，北方国立大学，不会得有进行的机会。教会学校总是教会学校，不可教也。”^③ 把教会大学视为异类的情绪是相当明显的。教会大学立案以后，名义上归属于国民政府的领导，民族主义运动对教会大学的压力趋于减轻和消失了。中国教育界人士认为这是一个重大的变化。^④ 在教会大学的中国人，不再成为攻击的对象。学者和学生在接受教会大学时，民族感情的障碍淡化了，使其在20世纪20年代晚期能吸引更多优秀学者。如果说这种界限完全泯灭，也

① 吕思勉：《三反及思想改造学习小结》，见李永斯编：《吕思勉先生编年辑录》，第120页。

② 《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346页。

③ 《钱端升致胡适》，1926年1月，《胡适来往书信》上册，第408页。

④ 暨南大学校长的何炳松当时指出：“因此现在我国所有的教会大学几乎全由我国人充任校长主持办理。这不能不说是我国现代教育史上一件可注意的事迹。同时教育部对于教会大学的立案和课程亦很能注意，例如十九年三月间催令震旦大学的立案，（十九年三月三日《申报》）和三月间严饬金陵、沪江两大学停止宗教系及神学科，（十九年三月廿四日《时事新报》）以及六月间严令燕京大学撤消宗教的科目，（十九年六月十三日《时事新报》）都是显著的实例。”何炳松：《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大学教育》，刘寅生等编校：《何炳松论文集》，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434、435页。原载《商务印书馆创立三十周年纪念刊》，1931年9月。

不尽然。一个明显的例子是胡适与教会大学的关系，司徒雷登曾邀请胡适到燕京任教，但胡适始终没有在燕京担任教职。燕京曾以哈燕社名义请胡适到哈佛作访问学者，胡适也未去。^①胡适对教会大学一直比较友好，但似乎也想保持一定的距离和比较超然的地位。不过情况到底是有了很大的改善，立案以后，中国当时一流学者到教会大学的不在少数。这里面除了民族性的宏观因素外，另外还有一些具体原因。

第一，生活待遇比较稳定。教会大学的薪水在当时的大学中并不是最高的，但因其稳定和各方面的福利，较其它大学的不稳定就显示出很大的优越性。燕京的全职教师可以享有免费住房及医疗和牙科的保险、在国内公务旅行的费用、任职 3 年以上的教师可享有养老金及一名子女享有燕京大学的奖学金。^②1927 年到 1929 年顾颉刚在致胡适的多封信中自述了他选择燕大的原因，就是国立大学欠薪太多“无法维持我清苦的生活”。一些著名学者，如考古学家商承祚、历史学家张维华在晚年回忆自己的工作经历时，都认为在教会大学的几年是成果最多的时候，生活的安定是一个重要原因。商说：“我已足年近八旬的人了，回顾走过的生活道路，感触良深。一个人能否在学术上有所成就，决定于多种因素，本人必须刻苦努力，多读书、苦思索、勤写作，这是基础和前提，但客观条件，生活环境也颇关重要，如果生活不安定，心情不舒畅，终日为家务奔走操劳，学术研究，总难免要落空。”他认为自己离开金陵大学后的几年“既没有著作出版，也没有发表过几篇重要论文，这可以说是我一生中最不安定、学术上成绩最

① 联华档案缩微卷，335—5119，第 311 页。

② Philip West: p. 120.

少,因而也是最倒霉的时候。”^①

第二,教会大学的研究条件相对好一些。再引顾颉刚到燕京前给胡适信中的一段话:“这几年的烦闷、希望、奋斗,我有一中心问题,便是想得到一研究的境地。”因此顾在北大、厦大、广州中山大学、中央研究院绕了一圈后,最后在燕京一待将近十年,对燕京的研究条件极感满意。^②实际上研究条件的改善也离不开经济的基础,正是一些教会大学能比较稳定地聘任学者,提供研究和出版的资金,使学者能实现研究计划。这对学者来说是极其重要的一点。

第三,教会大学学术研究有更大的自由度。当过燕京法学院院长的吴其玉说:教会大学财政上的独立“多少保证了办学的自由,少受当时中国腐败而黑暗的政府的干涉,使校内较为安定,教员、学生能比较安心地从事学术及教育工作,把学校办得有成绩。另一方面,这又使得一些国内外的思潮可以在校内比较自由地发展。如基督教的教义和哲学、西方民主自由的思想、革命思想的传播等等,可以说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燕京特殊地位的保护。因为它既是私立的,就无须像一般所谓国立学校那样必须为当时的政权做不愿意做的工作来压制进步的力量。”^③胡适在请周作人去燕京时说,“最要紧的是自由全权,不受干涉。”^④可见学者对学术

① 《商承祚自传》,《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以下简称《社传》)四,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06—409页。

② 1927年2月,1929年8月20日,顾颉刚致胡适信,见梁锡华选注:《胡适秘藏书信选》,远景事业出版公司,1982年,第578、605、611页;顾颉刚“自序”,见《古史辨》,第二册,朴社:1930年8月版,第1页。

③ 吴其玉:《北京燕京大学的回忆(1923—1942)》,《燕大文史资料》,第二辑,第3页。

④ 《胡适来往书信选》,第124页。

研究的自由是非常珍视的，而教会大学能在这方面给学者以相对宽松的环境，因此也就能留住一些学者。蒙文通 1939 年以前在四川大学任教，因在“课堂讥刺时政而遭解聘”。1940 年转任四川省图书馆馆长，并自此一直在华西大学任教，直到华西大学院系调整。^①

当然，事情总是多方面的，教会大学也有令学者不满意的地方，特别是学校的发展过多地受到远在美国的机构的控制，有时候对学校 and 学者所提要求的反应迟缓。如顾颉刚在 1935 年接受北平研究院代理院长李书华之聘，担任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会历史组主任时说：“刚为个人研究计，燕京之环境已极好。惟为提拔人才，奖掖后进，倡导文化计，则燕京殊无发展之可能”。“在燕大办事，……不但我等无权，即诸西籍教员亦同样无权。每印一书，必向美国请示，得其答复须越半年，幸而批准实行，又须等下届预算之订入。又以窘于经费，致最有希望之青年，研究院毕业后无法留校任助教等职，以继续其学问工作。刚为此辈优秀青年计，不得不别觅出路。”^②

总起来说，立案以后的教会大学，实际上处于双重领导和监督之下。它们被国民政府承认为中国的私立大学，其教师和学生享有国立大学同等的权利，因此它们得以吸引了相当数量的优秀人才。值得一提的是在民国时期的中央研究院中，属于文史哲类的院士一共有 20 人。其中和教会大学工作有过渊源的有余嘉锡、陈垣、陈寅恪、顾颉刚等 4 人。如果算上在教会大学教过一段课

① 蒙默编：《蒙文通学记》，三联书店 1993 年版，第 190—191 页。

② 顾颉：《顾颉刚年谱》，第 232—233 页。

的话，还有冯友兰和李方桂。^①考虑到教会大学的学生数量从来没有超过中国大学生总数的 20%，那么在教会大学中的著名学者数量不算少。^②

学校的教育和学术研究，归根到底取决于学校拥有的各种人才。立案之后，教会大学能够吸引和留住许多学者，这对提高这些大学的学术水平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做到这一点也是不容易的，因为教会大学在与国立大学的人才竞争中，在政治地位，甚至经济条件上并不总是处于有利地位。^③它需要通过创造更好的研究条件，在帮助学者实现自己的理想方面下更大的功夫，而正是这种努力推动了教会大学在学术研究方面的迅速发展。

① 樊洪业：《前中央研究院的创立及其首届院士选举》，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所编：《近代史研究》，1990年第3期，第225—231页。

② 1936年基督教大学的学生接近中国大学生总数的12%，1947年基督教大学培养了中国大学生的15—20%。转自鲁珍珠著，曾钜生译：《中国教会大学史（1850—1950）》，第469页。

③ 例如，1928年8月，罗家伦代表国民政府接收清华，招当时在燕京的冯友兰、杨振声到清华。司徒雷登不敢得罪罗家伦，而且为求今后与国民政府打交道的方便，还要“表示特别好意。”因此同意放二人离开燕大。蔡仲德著：《冯友兰年谱》，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6、64、69—70页。

第四章

燕京大学国学教育 与研究的崛起

教会大学从政策上把国学教育和研究提到适当的位置后，如何开展这方面的活动牵涉到多种因素，其中包括经费、师资和学科发展等问题。燕京在这方面进行的比较成功，到抗战前后，燕京已经成为一所著名的教会大学，并在国学研究方面享有盛誉。

一、燕京的领导人物

燕京大学的发展，一方面是大势所趋，一方面也是燕京有一批人的大力推动，其中决策人物的态度和作用至关重要。

司徒雷登作为校长，是推动燕京中国化的关键人物。司徒雷登是和中国渊源很深的美国传教士，1876年6月生于杭州，在那里渡过了童年时代。12岁时，司徒雷登回美国接受系统的教育，1896年毕业于汉普顿学院，获文学士学位。1902年毕业于纽约协和神学院。1904年司徒雷登新婚夫妇受南长老会派遣赴中国传教，时年29岁。他到杭州后，跟中国人高敬甫专门学习汉语，诵读经史子集。他认为攻读中国经典的基本著作和小说，使他对

“中国浩瀚而伟大的文学有了初步的了解。”^① 1908年司徒雷登到南京金陵神学院教书，长期的学院生涯使其对中国的社会文化、人情世故有了进一步的认识。1918年底，他接受邀请到北京筹建燕京大学。当时，受“北京大学”（燕大1925年前的称呼）美国董事会派遣，专程来华考察司徒雷登的史密斯（Edward L. Smith）在向董事会的报告中评价说：“出生于中国的司徒雷登博士无论在传教士还是在中国人中都享有很高的声望和尊敬。他精通中文，了解中国人的思想，具有专业知识，著有《希腊——中文字典》、中文《希腊文入门》等著作。……一旦他被给予（校长）机会，他将展示他优秀的行政才能。”^②

司徒雷登属于第二代传教士，比起狄考文那一代人来说，司徒雷登这一代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更深入。他本人逐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崇拜者，喜欢中国古典文学，在中国哲学家中，他“最喜欢代表先进社会学说的孟子和集施政者、教师和具有罕见洞察力的思想家于一身的王阳明。”他在晚年曾说：“回顾我在中国的生活，我没有对丰富的中国文学宝藏中那些最精华的东西进行系统而又广泛的研究，实在是件遗憾的事。在我所读过的书中，除了一些比较重要的‘经典著作’之外，还包括了一些伟大的哲学家的部分或全部著作，一些最著名的近代小说和其他作品。这些书足以使我对这样一种被保存下来的成熟的文化及其伦理道德和精神思想有了一定的了解。”^③

司徒雷登这一代人思想上比较活跃，更关心中国社会的现实，

① 司徒雷登著，程宗家译：《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第78页。

② Edward Lincoln Smith: *Fifty-two Days in China*，转自陈时伟《司徒雷登与燕京大学》，见章开沅、林茵编《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第168页。

③ 司徒雷登，第78—80页。

作为社会福音派传教士，他对教会在中国的教育事业持比较开放的态度。^①他参加了 1922 年巴顿教育调查团，对中国的教育状况有全面的了解。他为燕大设计的目标是“让中国人在教学、行政、宗教、财务和其他部门中发挥日益增多的作用，把学校最终办成一所中国大学，让人们仅仅在谈到其历史的时候，才想起它的西方渊源来。”^②作为校长，司徒雷登坚定地支持学校的中国化，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加强中国文化的教学与研究。胡适后来曾高度评价司徒雷登的业绩。他说：“作为一个热切地关注着燕京成长的朋友和邻人，我想说，司徒雷登博士作为一个大学创建者的主要功绩在两个方面。第一，他和他的同事们从无到有计划和建设一所规模完备的大学——中国 13 所基督教大学中最大的一所——还建成了世界上最漂亮的校园之一。第二，他梦想中的大学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变成一所中国的大学，在哈佛燕京学社的帮助下，成为所有新教大学中第一个创建了出色的中国研究系的大学。”^③

除了司徒雷登外，在燕京的领导层中，对此持有共识的有相当一批人。在西籍人中有高厚德（Howard Spilman Galt 1872—1948）博晨光（Lucius C. Porter, 1880—1958）等，在中国人士方面有刘廷芳、洪业、陆志韦、赵紫宸、吴雷川等。后者不用说都是著名的学者，前者也都是学有所长的汉学家。如担任过燕大副校长的高厚德毕业于芝加哥大学，大学时代热衷于学生志愿运动，后入哈德福特（Hartford）神学院，遇到了在华北传教的谢

① Philip West: *Yenching University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 1916—1952*, p. 27.

② 司徒雷登，第 67 页。

③ Susan Chan Egan: *A Latterday Confucian, Reminiscences of William Hung (1893—1980)* p. 110.

卫楼，被其说服接受米华任教的聘请。高来中国后努力学习汉语，听说读写的能力惊人，在阅读中文典籍方面司徒雷登远不如他。这使他能和一切中国人交往，适应中国的风土人情。高后来由于燕大要办教育系，回哈佛深造，于 1927 年获教育学博士学位，回燕京后担任过教育系主任，主要精力集中在教学和古代中国教育制度的研究上。他的学生说：“他对古书的阅读能力和趣味，大大超过了他的中国学生们，有关中国教育方面的书籍，几乎没有不经他过目的。在班上他能把张之洞的《劝学篇》全文背诵过来。”他生前写成的《中国教育制度史》直到他死后的 1951 年才刊登出来，是一本人们公认的关于中国教育史的标准读物，受到学术界的赞扬。^①再如担任哈燕社第一任干事的博晨光，生于天津，也能说流利的中文，研究中国古代哲学，著有《中国对基督教的挑战》。^②可以说，这些人对开展中国文化的教育和研究都不是外行。

在发展燕京的中国文化研究中，洪业（字煨莲）也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洪生于福建侯官。父洪曦曾是署理山东鱼台、曲阜等县的知县。洪从小受到良好的经书教育，1910 年升入教会办的福建鹤龄英华书院，1915 年毕业后，获英华书院美国董事汉佛德·克劳佛德（Hanford Crawford）的资助赴美留学。1917 年毕业于俄亥俄韦斯良（Ohio Wesleyan）大学，获文学士，1919 年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获文学硕士，1920 年毕业于纽约神学院获神学士。1923 年洪返回北京担任燕京大学副教授，在 1924—1927 年期间担任大学文理科科长，肩负起改造学校课程设置的重任。1928

^① 廖初泰：《燕京大学建校初期的高厚德先生》，《燕大文史资料》第一辑，第 77—78 页。

^② Philip West: *Yenching University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 1916-1952*, pp. 28-29.

年曾经担任历史系主任与大学图书馆长一年。洪业执教燕大 23 年，与燕大同人苦心经营，使燕大从一个小小的教会大学变成与北大、清华齐名的国际性大学。洪还一直担任历史系教授，培养了大批史学工作者，其中有不少人成为知名学者。^①

燕京大学地处中国学术文化的中心，对中国学术潮流的变迁在教会大学中可以说是“春江水暖鸭先知”。正好在这个历史转折的关头，学校有一个比较有远见的领导班子，而且相当稳定，一干就是几十年，能把一些需要时日的计划付诸实施，并且见到了成效。1919 年春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之际，北大教授蔡元培、李大钊、陶孟和、顾孟余和胡适等与燕京的司徒雷登、博晨光等教会界人士在北京西山开了一天的谈话会，可能对当时教会学校的状况提出了一些看法。十五年以后，胡适在《独立评论》上发表《从私立学校谈到燕京大学》，认为“十五年来，基督教的领袖在司徒雷登先生的领导之下，都极力求了解中国新兴的思想潮流与社会运动，他们办的学校极力求适合于中国的新社会。……近年中国的教会学校渐渐地造成了一种开明的、自由的学风，我们当然要归功于燕大领袖之功。”并且说“凡是好的学校，都是国家的公益事业，都应该得到国家社会的热心赞助。”“燕京大学在这十几年中的努力，是最值得国家与社会的援助的。”^②作为当时中国教育界学术界的头面人物，胡适的话也许可以看成中国学界对这所大学的认同。

^①《序》，翁独健、王钟翰编：《洪业论学集》，北京，中华书局 1980 年版。

^②胡适：《从私立大学谈到燕京大学》，《独立评论》，第 108 期，民国二十三年七月十八日，第 2 页。

二、哈佛燕京学社与燕京的关系

哈佛燕京学社的建立对于燕京国学的发展，在方向和财政上都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个机构标志着中美大学间在人文科学方面合作的重要开端。学社的建立要追溯到霍尔（Charles Martin Hall, 1863—1914）基金。霍尔是铝电解法的发明人，这项新技术使霍尔成为美国铝业大王。1914年，终身未婚的霍尔去世时留下巨额遗产。遗嘱中规定三分之一的遗产必须用于资助由美国或者英国人控制下的亚洲或巴尔干地区的教育事业。关于霍尔基金有几个问题需要说明。第一，20世纪初，科学基金、教育基金及慈善基金在西方发达国家已经比较盛行。一方面，这是由于资本主义工业的高度发展，积累了巨额财富，如霍尔当时的遗产已达4,500多万美元。另一方面，私人捐献财富用于科学、教育及慈善事业，被认为是一种高尚的流芳百世的行动，并得到政府优惠的税收制度的鼓励。因此一些成功的企业家多有设立基金之举，大部分用以促进科学文化的发展。最著名的如诺贝尔基金、洛克菲勒基金等。基金的使用，完全取决于基金设立者的意愿。因此，设立基金者的个人经历和兴趣是非常重要的。第二，如第一章中所谈到的，文化交流总是双向性的，当西方思想在中国传播时，中国文化也通过种种渠道，传向西方。当时有些西方人和西方的教育机构，接触了中国文化，最初往往是通过民族^{*}异最明显的视觉艺术，如绘画和文物，逐渐对中国文化发生了兴趣，希望进一步扩大西方世界的文化视野，同时也扩大西方在东方的影响。这些就是霍尔基金设立的时代背景。

但是霍尔基金的规定是很笼统抽象的，只是划定了一个大致的范围，并没有指明基金必须用在中国，必须用来研究中国文化，更没有指明必须给燕京和其他教会大学。哈佛燕京合作研究中国文化，是霍尔基金的管理人与哈佛大学和燕京大学共同协商的结果。早在 1921 年到 1922 年，通过路思义（Henry Winters Luce 1866—1941）的募捐，霍尔基金已经捐赠款项给燕京。但是，在第一批按霍尔意愿的捐赠分配结束后，还余下 640 万美元，当时是一个很大的数目。哈佛大学也注意到这笔经费。哈佛商学院院长董纳姆（Wallace Donham）与霍尔委托的两名遗产管理人之一、铝业公司律师约翰逊（Homer H. Johnson）相识。不过，哈佛单独申请这笔经费，因与霍尔遗嘱不符，未能成功。1924 年，基金会的另一名委托人美国铝业公司总裁戴维斯（Arthur Wining Davis）指示司徒雷登与哈佛董纳姆接触，制定一项能符合霍尔基金规定，同时使哈佛和燕京都能受益的计划。司徒雷登后来说：“我感到十分有意思的是，一位美国大企业的代表人物和一位典型的大公司律师竟然想到共同办一所大学，用西方研究外国文明的仪器设备和技术，去帮助中国人研究他们自己的文化，同时也帮助美国学习中国的文化，以便在他们的同胞中传播。他们承认他们的想法还很模糊。但是不管怎样，最先想出这个主意的是他们。”^① 不过，费正清认为，司徒雷登也是实现哈佛燕京学社这一设想的“伟大的学术创业者。”^② 至于司徒雷登为什么这么重视中国文化的研究，在他参与学社协商的信件中明确地表示了“日益高涨的民族主义浪潮”对他思想的影响。他说：“我们认为这些

^① Susan Chan Egan, p. 111; 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第 58 页。

^② John K. Fairbank: *China Bound: A Fifty-Year Memoir*, p96

(教会)大学以这样的方式加强中国学的研究,是和中国的民族主义者取得更好的一致立场的最佳途径。”^①在这里,西方学者所认为的“西方冲击”引起“中国社会反应”的模式,似乎被颠倒过来了,中国民族主义浪潮成为促进教会大学中国文化事业的推动力。

哈佛最初希望建立一个东方研究院,在北京设立办事处,旨在参与中国的考古发掘和出版关于中国艺术品和古代文物的研究著作。哈佛最初选择北京大学为合作伙伴,并不想与当时还没有什么声望的燕京合作。但策划此事的福格博物馆(Fogg Museum)的工作人员、哈佛教师瓦尔纳(Langdon Warner)1925年赴敦煌盗窃文物失败,并把北京大学也卷入这一丑闻,哈佛与北大合作的计划于是流产。^②司徒雷登和董纳姆的计划则继续进行下去。1925年12月哈佛与燕京达成初步合作协议。^③在确定学社名称方面颇费斟酌,最后采纳了洪业最初的建议,定名为哈佛燕京学社。^④1928年1月5日经过反复磋商的学社章程中表明了哈燕社的目的是:

“从事及帮助有关中国文化的研究、教学和出版,或者亚洲大陆的其它地方及日本,或者土耳其及欧洲巴尔干国家文化的研究、教学和出版。在计划的发展中,不

^① 1927年3月31日,司徒雷登致诺思信;1927年12月15日董纳姆为哈燕社协商会议起草的报告,联董档案缩微卷,334--5116,第112页:335-5117,第196页。

^② Susan Chan Egan 的书中谈到,此次瓦尔纳盗窃活动的失败,是洪业和司徒雷登事先通知了中国政府,中国方面首先作了防范,第115-116页。

^③ 司徒雷登致哈佛大学托事部,密件,1925年12月9日,原件据北京大学藏燕京大学档案,卷宗四,目录1,案卷14,见张寄谦:《哈佛燕京学社》,见章开沅、林蔚编:《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第141页。

^④ 1927年5月24日,诺思给司徒雷登信,联董档案缩微卷,334--5116,第190页。

局限于上述规定：……如帮助有条件的中国和西方学者开展适合于文理学院研究生院程度的研究和教学，目前迫切需要帮助学者为进入学社工作提供学术准备；资助其它学校发展本科教育，考察、发现、收集和保存文化和古代文物，或者资助博物馆及其它机构从事此类工作。”^①

协议的文件还进一步解释说，关于中国文化的研究方向，准备把经费首先资助于以下课题：如中国文学、艺术、历史、语言、哲学和宗教史。“共同的任务在于激发美国人的兴趣和鼓励利用近代批评手段的中国东方问题研究。”陈毓贤（Susan Chan Egan）评论说，这个协议显然是三方妥协的产物，但可以说是司徒雷登和那些在燕京帮助策划争取基金的人们的胜利。准确地说，司徒雷登和董纳姆对基金的使用，是偏离了霍尔本来的意图，霍尔所考虑的很可能是帮助“日本、亚洲大陆、土耳其和欧洲巴尔干地区”提高现代科学的水平，而不是像哈佛燕京社那样致力于中国文化的研究。^②但从研究中国文化的角度来看，哈佛和燕京把握了这个机会。^③

不过，历来人们谈到哈燕社总是强调了它的中国文化研究活动，实际上，学社在中国的基本目标应该有两个内容：第一是加强中国文化科目的本科教育和开展研究生教育工作。在这个蓝图中，燕京将成为中国文化科目的研究生教育的中心，其它和学社

^① “Certificate of Incorporation”，联华档案缩微卷，183--3276，第 978 页。

^② Susan Chan Egan, p. 116-118.

^③ 齐鲁大学和岭南大学校史的作者、燕京大学教师郭查理说：“在中国文化看来面临西方影响的威胁下，这个由美国商人为研究及保存中国文化而设立的、资金雄厚的基金会真可谓是一个壮举。”郭查理著，李瑞明译：《岭南大学简史》，见李瑞明编：《岭南大学》，第 90 页。

有联系的教会大学将加强中国文化科目的本科教育，把学生送到燕京深造。在燕京学完硕士课程的学生将被选送到哈佛深造，以培养能用现代方法研究中国文化的人才，学成回国进一步推动中国文化的教育。第二是在有条件的学校开展中国语言文学、历史、宗教和哲学，乃至考古学的研究。在这一方面哈燕社特别强调加强图书资料的建设和用新方法米研究整理中国文化遗产。今天的学者可能会感到哈燕社对中国的教育，即使是教会教育也有点越俎代庖了。实际上，这些基本的内容大部分并非出自西方人之手，而是出自于燕京的领导层，特别是洪业根据教会大学发展的需要和参照美国教育体制作出的规划。应该说，从当时中国教育实际情况来看，这是一个有些远见的计划。^①

哈佛燕京社的总部设在哈佛大学。第一次会议选出 9 位代表组成的托事部，霍尔遗产执行团、哈佛大学托事部、燕京大学托事部各出 3 人。学社托事部是学社的最高权力机构，每年开会两次，一次在 4 月，一次在 11 月，审查工作报告和预算，决定学社的大政方针。起初学社的机构比较复杂，在托事部下有一个在哈佛的教育委员会负责日常事务。后来经过改革后，在哈佛的日常事务由学社主任负责。哈燕社第一任主任（社长）原打算聘请法国著名中国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 1878—1945），但他婉谢后推荐了他的学生叶绥夫（Serge Elisseeff, 1889—1975）于 1934 年正式出任主任，同时他也是哈佛大学远东语文系创办人。^②学社工

^① 1929 年 4 月 25 日，洪业、傅晨光：密件，“哈燕社备忘录”，联革档案缩微卷，335—5124，第 660 页。

^② 叶绥夫，俄国贵族出身，日俄战争前后至日本，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首名西欧学生，十月革命后流亡法国，从伯希和学习东方文化。精通多种语言，汉语能阅读一般古籍，担任哈燕社长至 1956 年。见张寄谦《哈佛燕京学社》，见章开沅、林蔚编：《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第 142 页。

作在叶绥夫主持下，有很大的进展，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学社设计者们“第一，创立一个高水准的机构；第二，在中美大学中有效地发挥影响，”这样一个长期目标。^①

哈燕社在北京（当时称北平）的机构最初有一个行政管理委员会和一个学术委员会。后来经过改革以后，哈燕社在北京只设办事处，由办事处总干事一人负责管理该学社在燕大的研究工作，并代表哈燕社同中国六所有关的教会大学进行联络。执行干事原则上规定由美国人担任。第一任干事是博晨光（Lucius C. Porter, 1880-1958）。1939年博晨光辞职后，由洪业继任，开了由中国学者负责北京哈燕社工作的先例。1947年由陈观胜接任。1948年哈燕社迁广州，后又迁香港。1950年迁到哈佛大学，燕大与哈燕社的关系就此终结。^②

由于中国教会大学的特殊性，它在财政上既没有可靠的政府资助，也没有充足的学费收入，多数大学要通过募捐来解决学校的经费问题，这当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期教会大学的财政状况并不乐观。就以教师的工资为例，教会大学教师工资水平，总体上一直低于国立大学。30年代的一份统计表明，在北京、上海、南京、杭州、济南（青岛）、广州的7所教会大学与7所国立大学相比，只有齐鲁的工资高于山东大学，其它的教会大学都低于同一地区的国立大学。^③金陵女子文理学

^① 1927年12月15日董纳姆准备的报告，联董档案缩微卷，335-5117，第196页。

^② 陈观胜著，熊人绎译《哈佛燕京学社与燕京大学之关系》，《燕京大学文史资料》第3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9-21页。

^③ 《附全国专科以上学校教职员之现状》：1934年2月26日，见《中华基督教年鉴》，第12册，1933年，第112页；又见教育部编：《二十三年度全国高等教育统计》，1936年10月，第63、141页。

院因为经费问题，一直只能聘用年轻优秀的教师，而不能聘得资深教授。^①而华西协合大学的教师的工资，一直维持在一个低水平上。^②

在这种情况下，哈燕社的建立，对燕京的意义就非同寻常了。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初，燕京通过路思义的募捐得到霍尔遗产 188,550 美元的资助。1928 年，燕京从霍尔遗产的美国国外教育基金的分配中得到 100 万美元用于全校的建设。这笔款项大大超过燕京的年度收入。^③具体到哈燕社的资金，霍尔遗产拨给在哈佛的哈燕社名下有 450 万美元的一般性经费，燕京有资格向学社提出申请。另外，在哈燕社拨给中国教会大学和一所印度农业学校的限制性开支 190 万美元中，燕京获得了 50 万美元。这笔钱在投资后的收入原则上由燕京用于中国文化的教育与研究，但须由燕京提出预算，报请学社批准。哈燕社的限制性开支是按年发放的，被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属于本科的，数目比较固定（最初每年约 3 万余美元），凡中国语文、历史、哲学三系的一切费用，都由这笔款项开支，直接由大学支配，执行干事对之只处于监督地位；另一部分是属于研究的，数目不大固定（1929 到 1930 年度每年约 2 万美元），凡购买图书、古物以及印行学报和研究生奖学金都从这里开支。这就为中国文化的研究提供了长期可靠的保证，并可以用这笔经费来聘请著名学者，甚至可以支援其它学科。据担任过学社北京办事处代理干事的聂崇歧说：“这两部分决算，用于研究项下者一向是真实的，用于本科者，就不然了。因为燕京大学

^①曾芳苗：《民国教会女子教育——“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个案研究》，1996 年硕士论文，第 117 页。

^②联亚档案缩卷，281-4424A，第 901-902 页。

^③按陈能治的研究《战前十年中国大学教育经费问题》，1931 年至 1934 年，燕京的平均岁入是 971,843 元，见《台北》师大历史学报，1983 年第 6 期，第 191 页。

有的院系经费来源并不固定，而哈佛燕京社拨付文史哲三系本科的款项又相当充裕，于是司徒雷登就教负责总务的设法‘裒多益寡、称物平施’，在帐面上弥缝的毫无痕迹。”^① 无论怎样，这终究使得以前不被重视的国学教育与研究，被置于一种经常性的关注之下。当这种关注和经费联系起来时，就能发挥很大的制约作用。

在哈佛与燕京的合作中，不只是具有经济意义。哈佛与中国大学合作，出发点是为自己争取基金，为了发展哈佛的学术事业。但是哈佛的参与，开辟了美国中国学研究的一个时代，这对中国文化研究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美国大学比较成熟的管理制度，西方近代的学术方法，通过哈燕社直接地影响了燕京以及其它教会大学中国文化的教育与研究，这对于处在学术转型中的教会大学来说，无疑是有很大的帮助。反过来，对哈佛大学也一样，燕京提供的多方面的合作，为哈佛跃居美国和世界汉学中心起了重要的作用。总之，哈燕社的建立为促进中西文化的相互了解，为在国际学术界扩大中国文化的影响，建立了长期的基础。正如司徒雷登说的：“哈佛燕京学社为燕京作了许多好事，其中一件就是使我们——并且通过我们使中国的其他儿所教会学校——能够把汉学研究提高到任何一所中国学府的同一水准上。”^②

三、二三十年代燕京的国学教师

任何学校成功的关键是汇聚高水平的知识人才。燕京从 20 年

^① 聂崇岐：《简述“哈佛燕京学社”》，见《文史资料精选》，第二册，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第 365 页。

^② 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第 59 页。

代后期起，开始对学者有一定的吸引力。首先是比较稳定的工资制度。燕京的平均工资虽然不算高，但晋升有序，支付有常。国立大学在军阀时期，经常拖欠教师薪水。一些北大教授如邓之诚等，应聘到了燕大。^①有的则因欠薪到燕京兼课如沈伊默等。^②而且司徒雷登为吸引优秀学者，高薪聘请名家。^③第二，相对稳定的校政。燕京在财政上的独立地位，多少保证了办学的自由，学校人事也不受国民党内部政潮起伏的牵连，校内比较安定。教员学生大致能安心地从事学术及教育工作。因此，一批优秀学者流向了燕京大学。第三，也有因人事关系到燕大工作的，如顾颉刚称“北大党派太多，攻讦太甚”，而婉拒北大聘书，就了燕京的教职。^④

20年代后期到抗战之前，燕京的国学师资中有一批知名度较

① Susan Chan Egan p. 131.

② 滕茂春：《纪念郑因百先生》，《燕京文史资料》，第7辑，第245页。

③ 1928—1929年燕京国学研究所人员工资预算：

姓名	课程	薪金比例	薪金数目(银元)
陈垣	历史、目录学	2/3薪金	2400
容庚	考古学、哲学	全薪	3000
许地山	佛教文学	全薪	3000
张星娘	历史、中西交通史	2/3	2000
冯友兰	哲学	1/6	600
韩德清	佛教	全薪	1000
黄子通	哲学、文学	1/2	1800
特聘国文教师	古代文献注释	全薪	3600
特聘国文教师	音韵学	全薪	2400

联华档案缩微卷，214—3631，第141页。

④顾颉刚著：《顾颉刚年谱》，第176页。

高的学者。这些学者大概可以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类是燕京的基本教学班底，和燕京的渊源比较深，长期在燕京任教。其中较著名的有：^①

姓名	教育背景	教职
吴雷川	清末翰林，民国政府教育部参议	国文系、宗教学院
马 鉴	1925 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师学院硕士	国文系
许地山	1924 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文学硕士	国文系、社会学系
谢婉莹	1926 年美国波士顿威尔斯利女子学院硕士	国文系
赵紫宸	1914 年美国温德别尔特大学硕士，纽约联合神学院神学士	国文系，宗教学院
郭绍虞	青少年时读过小学和中等工业学校两年	国文系
容 庚	1926 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研究生	国文系
顾 随	1920 年北京大学英文门本科	国文系
黄子通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硕士	国文系

①吴大新：《怀念吴雷川祖父》，《燕大文史资料》，第三辑，第 229—230 页；高长山：《马鉴教授在成都》，《燕大文史资料》第七辑，第 220—221 页；周侯松、边一吉：《许地山传略》，《新文学史料》，1980 年，第 2 期；刘洁芬：《赵紫宸先生传略》《燕大文史资料》第三辑，第 252 页；《郭绍虞自传》，《社家》，十，第 214—215 页；曾宪通编：《容庚选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4 年，第 6 页；《顾随传略》，《社家》，四，第 335 页；《黄子通传略》，《社家》，一，第 324 页；《原燕京大学校长韩志韦博士年谱》，《燕大文史资料》第二辑，第 14—15 页；《历史学系近十年概况》，见《燕京社会科学》第一期，1948 年，北京，第 247 页；《历史学系一年概况》，见《燕京社会科学》第二期，1949 年，北京，第 301 页；《洪业传》，北京大学版，第 67 页；《邓之诚先生传略》，《社家》，四，第 11 页；顾颉刚编著：《顾颉刚年谱》；吴兴华：《张尔田先生》，《燕大文史资料》，第七辑，第 220 页。

陆志韦	1920 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	国文系，心理学系
王克私	瑞士洛桑大学历史学博士	历史系
洪业	1919 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硕士， 1920 年纽约联合神学院神学士	历史系
邓之诚	云南两级师范学堂毕业	历史系
顾颉刚	北京大学毕业	历史系
张尔田	不详	历史系

第二类人和燕京的渊源比较浅，在燕京待的时间比较短，多则四、五年，少则一、两年，或者在燕京兼教一两门课。但这些人往往有较高的学术声望。抗战前和燕京有联系的学者大概情况见下表：^①

姓名	教育背景	教职
周作人	受过新旧教育，在日本留学数年	国文系
郑振铎	毕业于北京铁路管理学校，1927—1928 年游学欧洲	国文系
俞平伯	1919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	国文系
杨振生	1924 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	国文系
沈兼士	受过新旧教育，留学日本东京物理学校	国文系

^① 珙董档案缩微卷，334-5115，第 21-27 页；陈福康：《郑振铎传略》《社家》，八，第 269—272 页；《俞平伯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547 页；《山东大学校史》，1986 年版，第 108 页；钱穆：《在北平燕京大学》，《燕大文史资料》，第二辑，第 9、16 页；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长编》，第 61 页。

钱穆	自学出身	国文系
冯友兰	1922 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	哲学系
陈垣	光华医专	历史系
张星煌	留学德国，修化学	历史系

上述燕京国学师资的名单并不全，但已可略观大概。从上面看，30年代燕大国学教师的一个特点是教育背景多样化的趋势。从欧美回国的留学生占了多数，其中主要是美国留学生。多数留学生有硕士学位，少数人获得博士学位。20年代后期起燕大送往美国的留学生开始回国任教，以后的比例逐渐增多。王力从法国回来后，也在燕京大学教授《中国音韵学》。^①国内各类大学的毕业生担任教师的占第二位，这些人中有来自北大的，但最多的还是燕京自己的毕业生。个别的有科举功名，如吴雷川是清末翰林。还有如钱穆、郭绍虞完全是通过自学成名的。这表明了燕大重学历背景，但也不拘一格唯才是举。出自燕京的著名学者郑寿曾说1926年到抗战前的两三年，燕京的国学教师是“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当时著名的文史教授，如一钱、二周、三沈、五马，多数在燕大兼课或专任。^②这样的师资对国学教育自然是很有优势的。

燕京教师的另一个特点是相对稳定性。有教会教育背景的学者如洪业、陆志韦等始终以燕京为家。非教会大学出身的，如吴

^①张谷、王辑国：《王力传》，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272页。

^②一钱是钱玄可先生。二周是大先生树人、字豫才，二先生作人、字启明。三沈是沈先生士远，二先生尹默，三先生兼士。他们三兄弟好像都是以字行。……五马是二先生裕藻、字幼渔，四先生衡、字叔平，五先生鉴、字季明，七先生准、字太玄，九先生谅、字隅倾。……一说去掉五先生季明，加上马叙伦。郑寿：《燕京大学中文系》，见《燕大文史资料》第四辑，第119页。

雷川、顾颉刚、郭绍虞、顾随、邓之诚等也在燕京一直服务到抗战爆发。特别是顾颉刚，在入燕京前，曾辗转北大、厦大和广州中山大学，相比之下，他在燕大待了 10 多年，是解放前他工作时间最久的地方。

把这一时期北大、清华的国学师资与燕京的相比，可以发现三校在师资方面各有一个核心的班底，同时又有教师互相兼课兼职。如许地山、黄子通在燕京任教授，又任清华的讲师。邓之诚也兼北大的工作。^①顾颉刚在燕京任史学系教授的 9 年中，一直是北大的兼职讲师。^②同时，当时各大学的著名学者彼此邀请讲学的非常多。除了本校的教师，燕京还请各界名流来讲学。1930 年燕大历史学会请清华史学系主任蒋廷黻讲《鸦片战争之意外结果》，请清华校长罗家伦讲《太平天国》。^③当时，燕大、辅仁和北大、清华在师资上有一种合作关系。一些著名学者往往在几所大学任职，形成了一个研究国学的学术圈，推动了各校学术的发展和学风的交流。

四、国学教育与学生的毕业论文

国学的师资直接影响到课程的水平。燕大当时开出关于中国历史文化的课程达 80 门左右。其中有些课是第一次被列入大学课

^① 蔡仲德：《冯友兰先生年谱初编》，第 93 页；萧超然等编：《北京大学校史》，第 201 页。

^② 顾潮：《顾颉刚年谱》，第 199 页。

^③ 燕京大学历史学会编：《史学年报》，第二卷第二期，第 167 页。

程。如史前学（考古学）被列入大学课程，是以燕京为开端的。^①大部分课程往往是学者所擅长的或者正在进行开创性研究的领域。顾颉刚在燕京开设的课程有《尚书》、《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春秋战国史》等，这些都是他的研究重点，对学生的治学精神和道路，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

毕业于燕大历史系的郑德坤说：“我当时是跟容庚先生念文字学的，因为文字学跟考古学有很密切的关系，我对考古学也就特别有兴趣。在许地山、顾颉刚、容庚、洪业、张星烺老师的指导和鼓励下，我开始整理研究几种重要的古代舆地图书。首先研究的是《山海经》。”郑毕业后专门研究《水经注》。在历史系当研究生的张维华谈在燕京跟顾颉刚学习的经历时说：“顾先生才力过人，在他所研究的过程中，以极为锐利的眼光和卓越的识力，发觉问题，解答问题，在史学界开辟了一时的新学风。”^②中文系的教学也很出色。毕业于燕大中文系的郑鸾说“因为承袭北大传统，燕大中文系课程范围、研究方面，以及纯文学、文字声韵、学术思想三方面的分配情形，大致与北大中文系相同。”“虽然课程内容仍以古典文学、声韵文字，以及古代学术思想为主，而讲课治学的方法态度，以及师资标准，一切都是新颖的。本系毕业校友，不论是早期或较晚，都很自幸而且自信，虽未站在时代前端，却能紧随其后，循正确的途径，趋往正确的方向，不曾变成抱残守缺的假古董。”^③

这一时期燕京对全面的国学教育也有所强调。在司徒雷登的

^① 裴文中：《中国史学前上之重要发现》，《史学年报》，第三卷第二期，1940年12月，第1页。

^② 《张维华自传》，见《社传》第六辑，第231页。

^③ 郑鸾：《燕京大学中文系》，见《燕大文史资料》第四辑，第118页。

倡导下，燕大规定学生必须在要求的 60 个学分中选修 12 个学分的中国文学和 4 个学分的中国历史。^①此外，除了在文史哲三系培养本科生外，燕京也开始了培养研究生的工作。

1928 年秋燕京就开始招收研究生，本校和外校的本科毕业生兼收。录取后，按年予以津贴。哈燕社提供的研究生奖学金一般是一年 500 元左右。^②数目前后有些变化，大致除了交纳膳宿费之外，还可以剩一半作购书和零花之用。如罗根泽 1927 年考入清华研究院国学门，同时为解决经济问题，又考入每月有津贴的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③最初研究生有一年就毕业的，后来依照国民政府教育部的规定，修业至少二年。第一年，在指定导师的帮助下，精读几种中文和英文典籍，通过笔试后，选定题目预备论文。论文交导师审查通过后，就由哈佛燕京学社北平办公处执行干事延聘校内外教授级的人组成口试委员会，等口试通过，就成为“硕士待位生”，毕业典礼时接受学位。至 1950 年夏，这项研究生获得硕士头衔的约有 30 人左右，其中过半是历史系的。

在培养历史人才的方法上，燕京也有所革新。1928 年在刘廷芳兼管燕京的哈燕社事务时，曾模仿北大、清华的做法，建立了燕京的“国学研究所”，由陈垣当所长，还聘请了当时的燕大副校长吴雷川，此外还有顾颉刚、容庚等，想继承中国学者治学方法培养青年人。但是，洪业对此持相反的看法。他认为学习中国学也不能完全走传统的老路，也应该到国外去学习新的治学方法，开辟新的思路。在洪的规划下，在以燕京为主的教会大学中，选派

① Dwight W. Edward: *Yenching University*, New York,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1959, p273.

② 《1932—1933 年哈燕社基金资助下燕京大学的研究室工作报告》，联董档案缩微卷，315-4822，第 669 页。

③ 周勋初：《罗根泽先生传》，《社家》，八，第 235-236 页。

了优秀的青年学者，按国内学术的需要，由哈燕社的奖学金资送到哈佛大学学习。燕京从 1931 年秋开始派研究生赴哈佛大学留学。第一个选派的是历史系刚毕业的学生。不久哈佛燕京学社定出规章，凡受资助到哈佛大学留学的必须在燕京取得硕士学位，据说这样可以缩短在美年限，因而能够节省经费，多培养人才。^①齐思和、翁独健、郑德坤、周一良、陈观胜、王钟翰等就是由这种方式到美国深造的。^②

燕京开展研究生教育，不仅在教会大学中，就是在国立大学中都算是比较早的。那么当时燕京是如何安排这类高级课程的？下列 1931 年燕京的研究生课表提供了一个分析的依据。^③

国文系研究生课程			
教师	课程名称	课程内容	学分
马 鉴	笔记分类研究	本课选授各时代之笔记，讨论其文学上之价值，并分类收集资料以为研究各种学术之资	2
马 鉴	中学国文教学法	一、研究并讨论教材之选择之支配； 二、研究并实习教授方法。	2

^① 聂崇岐：《简述“哈佛燕京学社”》，见《文史资料精选》，第二正，第 367 页。

^② 另外还有不是教会大学毕业生，但出国后也受哈燕社奖学金资助的有杨联升，清华大学经济系 1937 年学士，抵美后获哈燕社资助，1946 年获博士学位。专长经济史。张寄谦：《哈佛燕京学社》，章开沅、林蔚编：《教会大学与中国文化》，第 153—155 页。

^③ 联华档案缩微卷，315—4827，第 880—882，890—891 页。

顾 随	骚赋研究	本课选授骚赋代表作品，使学者得赏味并审识古人神思形貌之所在，藉以明散文与韵文之关系。	2
黄子通	唐诗与西洋诗比较		2
黄子通	宋诗与西洋诗比较		2
扬振生	近代文学比较研究	择取欧洲各国之名著与中国之作品作比较的研究。	2
郭绍虞	文史研究	研究中国文学批评之书籍。	2
郭绍虞	陶集之研究	研究陶渊明之个性、文辞与其渊源影响。	2
许地山	佛教文学	选授中国历代佛教关于文学之作品。	2
容 庚	说文研究	本课注重练习，为考读古书之门径。	3
容 庚	甲骨钟鼎文	认识及应用此种材料以为研究之资并比较古代文字。	3
李少时 (音译)	近代语之研究	就宋元以来约 900 年间之语体文学作品，及其他著述记载，考其语言之特征及变迁。	3
	校勘学		2
历史系研究生课程			
教 师	课 程	课 程 内 容	学 分

顾颉刚	中国古史研究	研究包括在中国经书和哲学书中关于古代史的材料，考察不同历史时期古代史记述中的变化。	3
顾颉刚	中国古史研究	以同样的方法研究史书中的材料。	3
张星烺	宋辽金元史	研究历朝代民族的兴衰及其政府、外交和文化特点。	2
张星烺	西北史地，上	研究中国西北历史地理，特别注意欧洲和亚洲的接触。	2
张星烺	西北史地，下	同上	2
陈垣	中国基督教史研究	研究基督教在中国的起源、发展和影响，特别注意康熙以来的文献资料。	2
洪业	基督教研究	研究基督教运动的发展及其与文明的关系。	2
王克私	国联的起源和发展	国联的筹备和形成及其到目前的发展和活动。	3
洪业	高级史学方法	年谱学、地理学、目录学及解释，论文写作。	2
陈垣	中国史目录学	介绍中国历史著作。	2
陈垣	中国重要史著讲评	研究中国史学名著的起源、形式和结构，注重引导初学者区别和使用它们。	2

Mrs. Frame	西方历史学家	考察西方历史学及不同时期史学家科学方法的发展。	2
容庚	考古学资料		3
洪业	历史的教学	历史教材的选择, 课堂组织、备课、讲解和练习。	2
<p>硕士论文写作时间一年, 在系指定的教授指导下进行。</p>			

从上表可以看出：第一，燕京对研究生师资是比较重视的，无论文史的指导教师，都是学有专长的专家。第二，研究生课程的门类不算多，可能是为了符合当时人常说的高深的专门研究。第三，课程厚古薄今的倾向很明显，但也不是完全没有现代的内容。文史两系比较起来，历史系的课程更加系统一些。这可能是后来国民政府正式承认燕京历史系硕士生资格的原因。总的看来，在立案和哈燕社参与燕京国学教研以来，正规的研究生教育从无到有，进步和不足之处都是很显著的。

但是，燕京文史哲三系的学生数量一直很少。事实上，正如前面章节中谈到的，近代废除科举以来，中国青年选择专业方向的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实用性的专业，就业前景好的专业比较能吸引学生。重理轻文、重经济轻文史的倾向已经开始显露出来。在文科中，像文史哲这样的专业对学生的吸引力比较小。顾颉刚日记里记载，1932年9月，燕大开学。燕大学生有张维华、邓嗣禹、李晋华、王育伊、罗香林等9人，又有旁听生翁独健、乐植新。北大学生有杨向奎、王树民来听课，如此著名的学者也不过有10来个人听课，可见有兴趣的学生之少。^①另外，政府的政

^①顾潮：《顾颉刚年谱》，第203页。

策也重在发展实用性的专业，在宏观上不鼓励发展文史哲这些专业。国际大气候也不利于这些专业的发展。20世纪30年代中国民族危机日益深重，许多学生无心钻研故纸堆，因此以国学为专业的学生并不多。国民党政府于1934年发布研究生条例，燕京只准招收历史、生物、化学和政治的研究生。虽然燕京继续招收中文及其它学科的硕士研究生，但只有这4个专业的学位在政府的任命、奖学金等方面得到承认。由于政府规定的限制和日益紧张的国际局势的影响，燕京在校研究生的总数从1930—1931年度的94名下降到1936—1937年度的48名。中文系的本科生人数一直少于25人。以历史系为例，从1924年到1939年的15年内，得学士学位者一共91人。平均每年才6名学生多一点，几乎不及任课教师的数目。研究生一共29人，平均一年毕业不到2人。^①

燕京文史哲学生的数量不算多，但他们受到了比较规范的新方法的训练。国学教育对学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是在潜移默化中深化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而对民族文化的深厚感情则是一种高层次爱国精神的源泉。其次则是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燕京在这方面的工作到底开展的如何，应该来考察学生的毕业论文，因为这是衡量学生能力的重要标志之一。在上面提到的学士和硕士毕业生中，他们的论文题目都刊载在《史学年报》上，有些还全文发表在各种刊物上，部分硕士论文还有文章的摘要。

从太平洋战争前本科生的91篇论文来看，学生的研究大致分

^① 《史学年报》，第三卷第一期，第198页。

为三个方向:^①

第一,比较关心鸦片战争以后的历史,这样的论文有 27 篇。其中有关于政治和革命史的文章,如《太平天国之内政及文化》、《二十年来中华民族之自觉》、《中华民国革命史》等这样现代意识很强的选题,甚至刚刚发生的济南事件也是学生研究的对象。学生对中国边疆和外交问题也很感兴趣。如《英人侵略西藏史》、《新疆之民族与宗教》、《中国与苏俄之外交》、《美中关系简史》、《1926 年以来中比重要交涉史》等这样现实性很强的题目。作为教会大学的学生,他们对基督教问题可能很敏感。因此在他们的毕业论文中有如《非宗教同盟运动之研究》、《近年中国基督教运动受爱国运动之影响》和《1916—1917 年中国争取宗教自由的运动》等,显然都着眼于这个问题。学生们对近现代人物也进行了研究,如《论袁世凯史略》、《李鸿章年谱》、《康长素先生年谱》、《张文襄公之洞年谱》、《清恭忠亲王年谱》等,都是距离当时很近的历史人物。

第二,中国古代史上下两千多年,可研究的问题更多,因此这方面的论文有 59 篇之多。内容比较庞杂。一是关于中外关系、民族关系,如《唐朝与日本关系》、《明清时中国与朝鲜之关系》、

^① 《史学年报》,第三卷第一期,第 198—201 页:

内 容	篇数	内 容	篇数	内 容	篇数
先秦史	7	两汉史	4	晋史	1
隋史	1	唐史	6	宋史	4
元史	2	明史	5	清史	9
鸦片战后至清末	9	民国当代史	13	通史	3
民族史	7	地区史	8	世界史	7

《蒙古人征欧洲小史》、《宋与西夏之关系》、《突厥对外关系考》及《匈奴兴亡与欧亚关系》等都属这一类题目。二是考察制度史，如中国奴婢制度、中国外交礼仪、中国考试制度、唐代官制和府兵制、元代土地制度等等也是论文比较集中的领域。三是研究历史人物。比较起来讨论帝王将相的不算多，只有明太祖、清高宗、史可法、王猛、郑成功几个人物，对古代学者的研究不算少，进入学生视野的有刘知几、顾炎武和李贽等人。四是古代典籍的考证，其中有讨论史记、三礼、清三通、旧唐书、隋书的论文。五是研究某一特定的地区。大范围的如对京兆疆域、黑龙江、台湾、广东、前蜀的研究。小到对北京海淀和柏林寺的考察。六是讨论先秦史的文章，如《黄帝之制器故事》、《由诗书考定周公之事迹》。讨论农民战争的不多，仅有《赤眉与黄巾——两汉农民运动史之一部》以及《李白成叛乱史略》。

第三，世界历史研究的题材也开始接触到了。这样的论文大约有 5 篇，其中有《1789 年法国革命的背景》、《法利赛人的兴起和影响》、《大日本史之史学》、《庚戌之后的朝鲜》、《1912——1913 年巴尔干战争时期的俄奥外交》。

今天的读者从题目上来看很容易指出他们的缺点，如题目太大、太笼统，有些学术概念和今天有很大的差别等等。但是从这些题目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燕大史学的倾向性来。第一，比起传统中国史学来说，历史已经走出了帝王家谱的窄胡同，已经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甚至农民战争也成为研究的对象。第二，从论文的历史时期分布来看，应该说比较重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研究。这不能不说是学术研究上的一个进步。

除了学士论文，当时硕士论文题目的总体倾向也是如此。1926 年到 1939 年燕京 29 篇硕士论文的题目有如下表：

年 代	姓 名	毕业论文题目	年 代	姓 名	毕业论文题目
1926	杜连哲	读史名人生卒表	1935	李子魁	汉代郡县考
1931	张立志	康熙帝之研究		李延增	汉代官制研究
	朱士嘉	中国地方志综目		邓嗣禹	唐宋元明清中枢官制之研究
1932	谭其骧	中国内地移民史 (湖南篇)		王育伊	宋徽宗至孝宗时 代宋金之国交
	叶国庆	平闽十八洞		翁独健	元代政府统治各 教会僧侣的官司 和法律考
1933	陈源远	唐代驿制考		姚家积	明季遗闻考补
	邱继绳	春秋时代之交通	1937	张诚孙	中英滇缅疆界问 题
	薛澄清	张燮及其东西洋 考研究	1938	张玮英	清代漕运
	陈懋恒	明代倭寇		赵丰田	晚清五十年经济 思想史
	严星辅	五胡华化考		刘选民	清代东三省设治 始末
1934	张维华	明史佛郎机和兰 意大里亚三传注		陆钦墀	英法联军之役
	陈观胜	清代中国人对西 方知识的发展		蒙思明	元代社会阶级制 度
	冯家升	辽史与金史新旧 五代史互证举例		葛启扬	六书说考
1935	邝平樟	唐代公主和亲考		曹诗成	诗经中蔬菜植物 考
	梁 愈	明初控制东北考			

硕士学位论文在研究的精度和深度方面显然进了一步，学术界流行一时的新考据更深刻地影响到这些文章。其中 10 篇文章是直接以“考”字命题，其他大部分论文也都带有考据色彩。但考据毕竟只是一种方法，问题还在于到底考据什么。这批论文研究了许多古代历史的新问题，特别是对中外关系、民族关系史格外重视，因

为这是以往历史研究的薄弱之处。论文依然反映了学生对现实问题的重视,如 1931 年以后的论文中研究了明代倭寇、明、清东北问题、晚清五十年经济思想史、中英滇緬疆界问题、英法联军之役等课题。^①

总之,过去学术界认为当时研究国学是引导青年钻故纸堆这个说法,看来是不太确切的。因为上述论文中大约三分之一是集中在近现代历史,实际上,即使是钻故纸堆,也要看他究竟在钻什么问题。中国知识分子饱受经世致用传统的影响,著书立说总是想要有点“现实意义”的,这些题目充分地表明了这一点。

这些文章到底做得怎样,不能一概而论,其中一些人如蒙思明、张维华、冯家升、翁独健、赵丰川的论文后来都由《燕京学报》出了专号,当时就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更多的为这些作者此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在这个意义上讲,燕京的国学教育在培养研究人才方面是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五、燕京的几种国学研究出版物

燕京的国学研究在抗战以前,形成了蓬勃兴旺的局面。最明显的标志是燕京出版了一批有影响的书刊。

名声最大的是《燕京学报》。哈佛燕京学社正式成立虽在 1928 年,但在 1927 年已拨到一笔款子,编印出第一期《燕京学报》。第一期学报的编委会中,容庚当主任、赵紫宸、许地山、冯友兰、黄子通、谢婉莹、洪业、吴雷川是委员。以后陈垣、郭绍虞、刘廷

^① 《史学年报》第三卷第一期,第 202~203 页。

芳、马鉴、张星烺、顾颉刚、钢和泰、博晨光、王克私 (Philippe de Vargas, 1888--1956) 等人都曾列名编委会。1930 年学报出到第七期后顾颉刚和容庚轮流着当编委会主任。冯友兰担任编委一直到抗战爆发。其后学报编委会人数减少到 8 人。陆志韦、张东荪、齐思和、王静如、翁独健、高名凯、陈观胜、聂崇歧后来也加入编委会。总的看来，这个编委会中大部分是中国的著名学者，其中史学家占了大部分，文学、哲学、考古、文字学的人选比较少。

《燕京学报》规定一年出两期，发行量大致一期以 500 册为准，当时也算是不小的发行量了。学报出到 1941 年冬第 29 期时，日美开战后燕京大学被日寇封闭，学报也停刊。1946 年夏以后恢复出版，至 1950 年冬出至第 39 期。1951 年春燕京大学改为公立，又印行第 40 期，以后停刊。学报创办宗旨是“以发表中国学术译著为主旨。”实际上纵览全部学报，是以研究著作为主，译作很少。稿件来源多属燕京大学文史哲三系教授的作品，偶然有研究生的文章，外来投稿也予接受。燕京学报是当时与北京大学的《国学季刊》、《清华学报》鼎足而三的著名刊物。在《燕京学报》上发表论著的作者约有 148 人，有许多作者不止发表了一篇研究作品。在这些作者中不仅有当时已经名满天下的王国维、陈垣、陈寅恪、钱穆、顾颉刚、冯友兰、许地山等，而且还有在 50 年代以后影响极大的学者，如郭沫若、范文澜、吴晗等学者。郭沫若在日本流亡时，曾以郭鼎堂的署名在《燕京学报》第九期发表两篇关于青铜器研究的论文。一些在中国的外国学者也在燕京学报上发表论文，比较著名的如钢和泰 (Stael-Holstein Alexander von, 1877-1937)、顾立雅 (Herrlee G. Greel)、鸟居龙藏 (Ryuzo Torii,

1870—1953)等。^①

学报还刊载“学术消息”，开创了介绍各方面学术动态的先例。《燕京学报》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初先后介绍了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金文丛考》、《卜辞通纂考释》、《古代铭刻汇考四种》、《屈原》、《殷契萃编考附考释》、《青铜时代》等著作。范文澜的《文心雕龙》、翦伯赞的《中国史纲》出版后，学报都有书评发表。

学报登载的文章最长不能超过4万字，超过这个标准则出学报专号。值得一提的是专号的作者并不仅限于哈佛燕京社的成员，而是旨在帮助学社内外的学者出版著作。^②专号一共出版了23册专著，1933年开始出版，到太平洋战争以前出了19册。抗战以后只出了2册。解放后还出了第23册。^③专号中包括了14册史学，4册考古学，3册文学史和2册语言学著作。可以看出当时所谓国学研究中史学是占了最主要的部分。这些作者一部分是当时燕京的教授如顾颉刚、郭绍虞、容庚、陆志韦和陆侃如等。有不少是燕京和其它大学的学生和研究生，如冯家升、张维华、杨向奎等。作为专号的著作是当时学术界的精品，有比较大的学术影响。

抗战前燕京的国学刊物还有《史学年报》和《文学年报》。燕京的国学教育，不仅注重理论方法，而且也给学生实践的机会。学生在教授的支持下，组织学会，创办刊物，是燕大的风气，也是燕京国学教育很有特色的一点。1927年燕大历史学会成立，1929年出版《史学年报》，全由学生一手主持，顾颉刚、邓之诚、洪业

^① 参见本书附录二：《教会大学三种主要学报目录》。

^② 哈佛燕京社年度报告，1940—1941年，见 Philip West, *Yenching University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 1916—1952*, p. 190.

^③ 参见本书附录二《教会大学三种主要学报目录》。

等大力扶持。每期以学生文章为主，也必有几篇当时名人的作品。除了燕京的教授外，陈垣、张星烺、唐兰等也在年报上发表文章，以扩大刊物的影响。这份刊物一直出到太平洋战争前夕，给学生提供了一块学术耕耘的园地。除了燕京的学生外，范文澜和吴晗都在这份刊物上发表过文章。^①

燕大国文学会原来创办了《春潮期刊》(月刊),专载小说、戏剧、诗歌等创作,文学论著不多。出两期以后就辍刊,改为《文学年报》。1932年7月出了第一期,但直到1936年才出了第二期,以后每年一期,直到1941年6月出至第7期后停刊。《文学年报》的宗旨是发表本系师生和校外学者研究“中国文学、文字学之论文”。《文学年报》和《史学年报》略有不同的是,除了第一、二期外,比较多的发表教师的著作。胡适、钱穆、郑振铎、王力、容庚、高名凯、郭绍虞、顾随、陆侃如、陈梦家、许世瑛、闻一多、周作人、凌景埏、张长弓、郑騫等都曾在《文学年报》上刊有论著。郭沫若曾在年报第二期发表了和法国汉学家马伯乐(H. Maspero)商榷的文章。^②

燕京还有一项在哈燕社资助下出版国学书籍的计划。凡是“绩学之士”阐扬国学的著作,或者藏有他人的遗稿希望出版的,经审查合格可由燕京帮助出版。资助的内容很广,包括了历史、文学、哲学、文字学、考古学、宗教及美术等方面。这些出版物的版权归燕京,但著者可获得稿酬或版税。^③在这项计划中,燕京刊

^① 齐思和:《史学年报十年来之回顾》,《史学年报》第二卷第五期,第543—544页;范文澜:《与顾颉刚论五行说的起源》,吴晗:《山海经中的古代故事及其系统》,均见《文学年报》第一卷第三期。

^② 《燕京学报》第二十一期,第315页;郭沫若:《答马伯乐先生》,见《史学年报》第二卷第三期。

^③ 《燕京学报》,第六期。

布了不少学者的论著，数量之多在大学中也是少见的。燕京还印行了几种未经刊布的古人撰著，如《西园闻见录》、《王荆公年谱》之类。对校外印行古籍，也时予资助，如北平图书馆影印《宋会要辑稿》，就是由哈佛燕京学社北平办事处拨款的。

燕京图书馆也出版了大量的古籍。到 1940 年时已经出到 26 种。其中绝大部分是清人的著作，也有少部分是明人的书稿。简又文翻译韩山文（Theodore Hambery, 1819—1854）的《太平天国起义记》，邓嗣禹编辑的燕京大学图书馆类书目录和王伊同编辑《竹汀经史子答问分类辑》也在这里出版。^①

古物购藏也是燕京的中国文化研究的一部分。从 1928 年起，哈佛燕京学社北平办公处为了教学和研究参考，就着手采购一些古代文物。投入的款项有限，可是方面很广：有殷墟甲骨，商周彝器、兵器，有汉唐铜洗铜镜，有佛道画像，有景教十字架等。开辟了一间不足 20 平方米的古物陈列室，以便学生随时观摩。^②

燕京这些众多的出版活动，对学术发展意义是非常明显的。首先，这些出版物推动了师生积极开展学术探讨。在燕京的出版物中，教师和学生的成果不在少数。而且这种创办刊物的活动本身也促使学校的学术活动变得更为制度化和有计划性。所以燕京的成果多是和这些活动分不开的。其次，也使学术界能与燕京的国学研究保持经常性的联系。当时的学术界颇以在燕京的学术刊物，特别是《燕京学报》上发表自己的研究成果为荣。所以，燕京的出版物实际上不仅反映了本校学术研究的情况，也反映了当时全国学术的发展状况。最后，以《燕京学报》为代表的燕京的学术出版活动，也明确地表现了学校的学术风气。统观学报的内容，除

① 《史学年报》，第二卷第三期。

② 聂崇岐：《哈佛燕京学社》，见《文史资料精选》第三册，第 370 页。

了研究还是研究，既不涉及政治，也不涉及教会，这就是以后人们所指出的为学术而学术，学术对政治的独立性。虽然燕京师生在政治上，特别是抗日救国活动中非常活跃，但他们的学术研究则与当时的社会生活有一定距离。因为这一点他们常常受到人们的批评。^①不过，也许正是这种特点，使燕京的一些学术成果具有了超越时代的比较长久的学术价值，并且也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认可。^②

六、两个重点：洪业和顾颉刚的研究事业

燕京学术研究的方向，基本上取决于学者个人。当时通行的做法一般是某先生在任何方面有专长，学校聘来之后任其进行这方面的研究。当然在学校方面也是考虑到文史哲的总体布局和各种不同专题的师资分布的合理性。但在燕京各有重点的个人活动中，有两个方面的研究是发动了集体的力量，开辟了一些有长远影响的事业，这就是洪业和顾颉刚的学术活动。

洪业在燕京文科的地位举足轻重。他到燕京时正好 30 岁，很有把燕京办好的抱负。他于 1924 年起，参与了创立哈佛燕京学社的过程，并从 1928 年起实际上支配着燕京的哈燕社经费，并对其它有关大学的事务有很大的发言权。1928 年洪赴哈佛，与伯希和

^① 张东荪：《现代的中国怎样要孔子》，《正风半月刊》第一卷第二期，1935 年，转引辽宁大学哲学系编：《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1982 年版，第二集第六册，第 72—73 页。

^② 联董档案缩微卷，315—4822，第 664 页。

等协商，帮助解决哈佛本科生和研究生在东亚语言、文学、历史等方面的问题。1928—1930年洪在哈佛担任客座教授两年之久，1930年秋被燕大敦促回校，除担任历史系教授之外，并兼任大学研究院文科主任和导师，一直到1946年春出国为止。

洪业美国留学多年，常用中西比较的眼光看问题。他很早即注意到旧辞书的体例及其缺点，认为整理中国古典文献，首先必需有一套科学的工具书。在他主持下的“引得编纂处”主要集中力量以西方方法整理中国古籍，为重要的经籍编制目录索引。“引得”一名，是英语“index”一字之音译兼意译，即索引的意思。1928年，洪业前往哈佛大学讲学。发现学习中国学的美国学生，在检索浩如烟海的中国古籍时，极感困难。同时，中国学者也需要一部按科学方法编排的索引。所以洪提出用哈燕社经费，从事这项基础工作，得到学社托事部成员布莱克的大力支持。洪业在1930年秋提出创办引得编纂处之计划，很顺利获得学社本部年会的通过。编纂处一直由洪负责，1933年于主任之外，增设副主任兼主编一人，由聂崇歧兼任。

引得的编纂是一项艰巨的工作。燕京引得的编纂从选题到出书大致经过十个步骤^①，其中选择应编引得之书和版本，需要广博的中国文献知识，具体编纂时需要高度细致和责任心，最后撰序则需要很高的学术水平，要能够叙述原书撰者之来历及其版本之源流，并恰当地评论其价值。1931年至1951年20年间，“引得编纂处”的出版物可分两类：一为正刊，共出41种；二为特刊，共出23种。两类合计64种，81册。每部都有序言，撰序最多的是洪业。其代表作为《礼记引得序》（五、六万字），《春秋经传引得序》（十万字以上）和《杜诗引得序》（七、八万字）三篇。因

^①《燕京学报》，第二十八期，第254页。

《礼记引得序》发表在先，得到法国铭文学院伯希和的赞赏和推荐，于 1937 年获得在巴黎颁布的茹埋安（儒莲）奖金。“引得”是国内较早运用科学方法编纂的中国古典文献工具书，曾受到国内外学者的高度赞扬。1937 年 11 月 8 日，哈燕社社长叶绶夫在中国考察回美之后在托事会议上指出：“燕京的出版物有很高的学术水平，对中国历史研究有重要的贡献。引得的编纂工作在不同学者的批评下不断地取得进步，一册比一册编得好。”^① 胡适、费正清对此书也颇有好评。^② 直到今天，除一些被更新的索引所代替外，许多种引得仍被国内外学者广泛使用。^③

图书收藏也是洪业花了很大力气的工程。图书收藏不属于直接的学术研究，但却是学术研究的基础。燕京大学成立 10 年时，藏书不过 3、4 万册，而且西文书多于中文书。洪业在执掌文学院期间，精心制定图书馆管理制度和大力采购国内外新出版的书籍杂志以及明清史志善本图书。他多次通过个人关系向美国朋友募

① 哈燕社 1937 年 11 月 8 日会议记录，联亚档案缩微卷，214—3633，第 328—332 页。

② 胡适说：“我还要向燕京的中国学者、特别要向洪业博士表示敬意，他在燕京创建了一所特别好的图书馆，他编辑和出版了燕京学报，他还编纂了非常有用的燕京引得。为此，他值得我们表示特别的敬意。” Susan Chan Egan, p. 110；费正清说：“哈佛燕京学社取得成功的另一方面因素，还在于洪业教授和其他一些人的贡献。例如，他们在燕京编辑了一套索引丛刊，为大量中国古典名著和人物传记提供了方便的检索资料。” John K. Fairbank, *China Bound, A Fifty-Year Memoir*, p. 98.

③ 1959 年、1960 年，中华书局曾经重新影印出版过《艺文志二十种综合引得》，《食货志十五种综合引得》、《四十七种宋代传记综合引得》、《辽金元传记三十种综合引得》、《八十九种明代传记综合引得》、《三十三种清代传记综合引得》六种。为了满足研究工作者的需要，中华书局又于 1987 年将上述六种引得中的后四种，即宋、辽金元、明、清传记综合引得重加订证，并附《四角号码人名索引》影印出版。与此同时，上海古籍出版社将引得编纂处所出版的正、特刊引得 64 种，81 册缩小影印，予以全部出版。

捐,扩大馆藏。自 1928 年获得哈燕社支持后更尽力补充中国古籍。1929 年时燕京的中文图书已经增加到 140,000 册。1933 年达到了 220,411 册(其中 36,744 册是西文图书)。1940 年时燕京图书馆已经收集了大部分清代丛书和 2,003 种 20,021 册地方志。抗战期间,燕京图书馆在鸟居龙藏的主持下编辑了 175 种日本刊物中的东方学研究论文索引。日文图书增加到了 1,854 种。^①同时哈佛大学中日图书馆为要充实中文藏书,在燕大设立办事处,就近向北平市场购书。当地书商知有此优越出路喜出望外,于是大量供应各种中文书籍。燕大图书馆利用此种便利尽力收购,因此燕京中文藏书质佳量丰,直到 1950 年,燕京图书馆藏书达 40 万册,除了极个别的大学外,国内其他大学图书馆很少有超过燕京的藏书量的。经过几十年的努力,燕大图书馆成为一所现代化的图书馆,缙有几套查书目录并刊印分类书目,工作人员的效率很高,为教学和研究提供了出色的服务。

如果说洪业比较注重于学术研究基础设施的建设,那么顾颉刚则活跃在当时中国历史研究的前沿领域。顾颉刚 1929 年到燕京时是 37 岁,按现在的说法还是青年学者,在燕京的日子也正是他大有作为的岁月。

顾在燕大时,学术上的第一件事是继续编写《古史辨》。顾在 1926 年出版《古史辨》第一册后,由于生活工作的漂泊不定,第二册迟迟不能着手。顾到燕京后的第一年《古史辨》第二册就出版了。到抗战之前,顾把《古史辨》一直编到了第六册(其中两

^① Philip West: *Yenching University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 1916-1952*, p. 191.

册是他支持罗根泽编的)。^①众所周知,古史辨派在中国学术史上曾经发生了重大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许多工作是顾颉刚在燕京时进行的。

顾在燕大的第二件事是出版《禹贡半月刊》,创办“禹贡学会”。这是顾颉刚在讲授《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催生出来的一项成果。顾研究中国上古史总觉得自己知识不够,因此希望通过开设新课更多地了解中国的历史地理。当时谭其骧正好在辅仁开设类似的课。他们经常见面,共同切磋。1934年2月,他们合作编辑了《禹贡半月刊》,以推动燕大、北大和辅仁三校学生为历史地理的课题发掘资料,开展研究。这份杂志自1934年创刊,到抗战被迫停刊,一共出了82期。为进一步扩大这方面的研究,顾颉刚和刊物编辑同人发起成立“禹贡学会”。1936年禹贡学会在燕大开成立大会。理事7人有顾颉刚、钱穆、冯家升、谭其骧、唐兰、王庸、徐炳旭。候补理事3人有刘节、黄文弼、张星烺。监事5人有于省吾、容庚、洪业、张国淦、李书华。候补监事2人有顾廷龙、朱士嘉。会员400多人。^②这个刊物和这个学会联络了一大批学者,打下了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的基础。

除了上面的活动,顾颉刚在燕京时继续进行早年在北大时就着手的收集民歌、民谣的活动。1932年他通过洪业向哈燕社申请经费编印《尚书研究》。他在燕京时还经常外出考察。1936年,顾颉刚被聘为燕京大学历史系主任,很想大展宏图。他和司徒雷登协商增拨经费,增聘韩儒林、冯家升、齐思和、谭其骧、张国淦

^① 《古史辨》第二册出版于1930年8月,第三册1930年11月,第四册1933年3月,第五册1935年1月,第六册1938年9月。

^② 顾潮:《顾颉刚年谱》,第252页;顾潮:《顾颉刚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128页。

为兼任讲师，侯仁之为助手。^① 同年创办燕大历史系《史学消息》月刊。顾还在燕大历史系新开“古迹古物调查实习课”，培养学生收集资料的兴趣和能力。聘请史学界名流如钱穆、雷海宗、萧一山等来燕大演讲。由于绥东问题事态严重，顾与冯家升发起成立边疆问题研究会。1936年9月21日，边疆问题研究会在燕京大学成立。历史系学生称自顾主持系务以来“各方面都有新的计划与设施，颇有一番蓬勃的气象。”^② 1937年“七七事变”后，顾颉刚于7月22日逃离北平，中断了他在燕京的事业。

当然，探讨顾颉刚和洪业的学术业绩不是本书的任务，在此只是想指出，洪业和顾颉刚代表了燕京国学研究中殊途同归的两种流派。一位是有欧美背景的留学生，另一位则是在国内成长起来的新学者。他们在学术研究、人才培养上略有不同。洪受西方学术传统的影响，为学术而学术的思想是很明显的。在为哈燕社起草的发展计划中，他非常明确地说：“我们的目标只限于对所有这些方面（历史、宗教、哲学、语言文学、考古学、艺术和人类学）作出文化的、科学的和创造性的贡献。因此，我们相反地要避免研究和讲授当前的政治经济问题，不进行通俗性的工作。”他还进一步解释说：“就文化的贡献而言，我们所涉及的只是现存的中国文明的生活、思想和制度。就科学的贡献而言，是指用科学的方法去研究、调查和表述。就创造性的贡献而言，我们将避免任何新闻评论式的和通俗的东西，避免重复其他学者已经做过的解释性研究。”^③ 在他看来只有这样的科学的研究才能“提高中国

① 顾潮：《顾颉刚年谱》，第256、257页。

② 《史学消息》1937年第6期。

③ 机密《备忘录二，哈燕社计划草案，限定研究领域》，联董档案缩微卷，335—5124，第646页。

学研究的地位，使其在学术上获得美国学者的尊重。”^① 洪业是有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感情的人，太平洋战争一爆发就被日本人关进监狱。但他的学术活动与现实政治是有距离的。从《洪业论学集》所收的文章来看，他一生是遵循了这个原则，^② 并且也影响了燕京的学术传统。但是顾颉刚似乎更受中国经世致用传统的影响。在燕京时，他与一班同道研究古代历史包含着强烈的现代动机。当时由三位燕京学者主编的《禹贡》在发刊词中称“历史是最艰难的学问，各种科学的知识它全都需要。……尤其密切的是地理。”“倘使不把地理沿革史痛下一番功夫，真是开口便错。”他们还说，“这数十年中，我们受帝国主义的压迫真够受了，因此，民族意识激发得非常高。……民族与地理是不可分割的两件事，我们的地理学既不发达，民族史的研究又怎样可以取得根据地呢？”^③ 因为受到外族的压迫，民族危机深重，所以要编一部中国通史出来，从“故纸堆中整理出一部中国地理沿革史来。”^④ 这个学会刊印边疆丛书，是因为晚清自道光以来，中国丧师失地，长此以往中国将无以自存。因此中国人要洞悉边情，沟通内地与边疆的文化，消除隐患。^⑤ 顾颉刚认为“改造中国历史，即可以改造一般民众的历史观念。第一部史应为民族史。”^⑥ 学术致用的影响在顾这里是很明显的。

虽然顾颉刚和洪业对学术功能的看法可能有差别，但他们对中国学术的终极关怀却是一致的。据刘子健回忆，洪业“培养历

① 机密《备忘录三，哈燕社计划草案》，联革档案缩微卷，335—5124，第 648 页。

② 翁独建、王钟翰编：《洪业论学集》，第 434—445 页。

③ 顾潮：《顾颉刚年谱》，第 217 页。

④ 《禹贡》，第一卷第一期，1934 年 3 月，发刊词。

⑤ 《边疆丛书刊印缘起》，《史学年报》，第五期。

⑥ 顾潮：《顾颉刚年谱》，第 200 页。

史人才是很有计划的，主要是断代史。他鼓励学生中郑德坤研究考古，齐思和 research 春秋战国，瞿同祖研究汉代，周一良研究魏晋六朝，杜洽研究唐代，冯家升研究辽代，聂崇歧研究宋代，翁独健研究元代，王伊同研究南北朝，房兆楹、杜联夫妇和王钟翰研究清代。此外，他栽培了治佛教史的陈观胜、治地方志的朱士嘉、治海上交通史的张天泽、研究各种制度的邓嗣禹，这些学生后来对重估中国文化都很有贡献。”^① 顾颉刚对学术界的影响当然更大。他一生所办的刊物中，以《燕京学报》、《禹贡半月刊》等最有成绩，尤其是后者成就了整整一代历史地理学的人才。^② 在燕京时期的学生罗根泽、谭其骧、张维华等都是—方专家。事实上，洪和顾的治学方法同多于异。因为前者直接受到西方方法的训练，而后者则是间接地通过胡适接受了西方方法的训练。同时乾嘉考据传统也是从实证这条路下来的。值得一提的是，他们早年的教育都是没润在儒家文化的传统中，都属于把四书五经能背诵下来的那一代人。洪业为燕京引得作的序，在写作方法上显得古朴厚重，他很为自己能写漂亮的文言文而自豪。而顾颉刚的许多文章则更是白话风格，今天读来毫无窒碍。这两批学人在燕京互相合作，共同编辑杂志，共同参加实地考察，共同把燕京的国学研究提高到全国—流的水平。陈毓贤说，到抗战以前，洪业“这一代学人完成的工作是很可观的。他们既受过传统教育，又经过现代的科学训练，可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随着时间的流逝，洪业这一代人耳熟能详的传统中国社会一天比一天更远离我们，而他们对自古以来—切文献实物的见解就愈为宝贵。将来世世代代都

① 陈毓贤：《洪业传》，中译本，第 120 页。

② 顾颉刚：《顾颉刚评传》，第 150 页。

得依赖他们建筑的这些学术桥梁。”^①

七、中外学术交流

燕京作为哈燕社的成员，中外学术交流在学校工作中占有重要地位。中外学术人员的流动，是学术交流的重要途径。经燕京哈燕社安排，不少年轻的西方学者来学校或者在北京待上一年左右，提高语言水平和积累研究经验。其中一些人后来成为著名的汉学家，如：李约瑟（Joseph G. Needham）、顾立雅（Herrlee C. Grell）、魏鲁男（James R. Ware）、嘉德纳（Charles S. Gardner）、克雷夫（Francis W. Cleaves）、柯睿格（Edward A. Kracke）、海陶玮（James R. Hightower）、毕乃德（Knight Biggerstaff）、卜德（Derk Bodde）、戴德华（George Taylor）、芮沃寿（Arthur F. Wright）、狄百瑞（Wm. Theodore deBary）、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西克门（Laurence C. S. Sickman）^②等。燕京也把自己的学生派到国外去，燕京学生在哈佛获得博士学位比较有成就的有齐思和、翁独健、王伊同、蒙思明、邓嗣禹、郑德坤、周一良、陈观胜等。有些燕京学生的英文著作在美国大学中颇有影响。魏思特说甚至中国专业的本科生都熟知方朝英（1928年毕业）、石育春（1930年）、郑德坤（1931年）、杨庆堃（1933年）、费孝通（1933年硕士）、瞿同祖（1934年）、刘子健

^① 陈毓贤：《洪业传》，第124页。

^② Philip West, *Yenching University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 1916—1952*, p. 190. 与西文对应的中文名字除个别外参见张寄谦先生前引文。

(1941年)、徐中约(1946年)和余英时(1951年前在燕京)等人的著作。^①

除了人员的交流之外,燕京也积极进行学术成果的交流。一方面是把研究成果介绍出去,另一方面则是把国外学者的研究介绍进来。

《燕京学报》作为比较有影响的刊物,为国外学术机关征订。但当时西方学者中真正能使用中文的还比较少,因此学报每期都有英文提要,这对向国际学术界介绍中国学术显然很有帮助。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对《燕京学报》的英文摘要非常赞许。^②学报也直接发表外国学者的论文,如卜德的《左传与国语》,顾立雅的《释天》,钢和泰发表的《佛说圣观自在菩萨梵赞》,日本学者鸟居龙藏,在学报上发表的文章有15篇之多。^③此外,学报也介绍一些国外的汉学著作,有些是译文,有些是重要著作的书评,如安志敏介绍安特生(Johann G. Andersson, 1874--1960)的《史前中国人研究》,高名凯评论罗秋(Rowley)的《中国绘画之要》。

《史学年报》也发表外国学者的著作,如王克私的《历史和信仰的进步》,阿姆斯特郎(Mervyn Armstrong)的《帕麦斯顿与鸦片战争》等文章。《史学年报》发表的译文比较多。郑德坤、翁

^① Philip West . *Yenching University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 1916—1952*, p. 192.

^② 陈观胜著,熊大绛译《哈佛燕京学社与燕京大学之关系》《燕京大学文史资料》第3辑,第21页。

^③ 卜德是1931—1935年度哈燕社的研究生,曾把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译成英文,论文见《燕京学报》,第十六期;顾立雅是1930年度哈燕社学生,论文见《燕京学报》,第十八期;钢和泰是俄国梵文学家,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后为哈燕社成员,曾发起成立中印学会,论文见《燕京学报》,第十七期;鸟居龙藏,日本人类学家,1939年后被聘为燕京大学历史系研究教授,论文见《燕京学报》,第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三十、三十一、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三十六、三十八、四十期。

独健、牟传楷、于式玉等把英文和日文的中国学论文译成中文。齐思和则对外国人写的中国上古史发表了书评。^①

在中国学者中能直接用英文论著与西文学者交流的，当时还为数甚少。洪业 1929 年第一次用英文出版学术著作，是一篇关于赖德烈(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1884--1968)《中国基督教差会史》的书评。此外很少看到中国人用英文写作的中国学术著作。反过来，西方人能用中文写作的更是绝无仅有。这种文字形式的学术交流，当时已经出现了不平衡的趋势，也就是在学术语言上的“西高东低”。即中国学者，特别是年轻的学生往往有较强的外国语能力，特别是英语阅读能力，同时，只有为数很少的西方学者能熟练阅读中文。一方面由于英语是国际语言，另一方面当时西方在学术方法上走在前头，所以在交流中西方成果译成中文的比较多，中文成果译成西文的比较少。中国学术中的精品如顾颉刚的《古史辨》中的内容，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都被译成了英文，在西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两件事和燕京都有一些联系。

哈佛燕京社另一个成果是促进了美国对东亚的研究。在这方面燕京也发挥了一些作用。和欧洲相比，在 1930 年以前，没有一所重要的美国大学有这样的研究中心。哈佛燕京社的建立就是希望改变美国学术界这种滞后的状况。哈燕社建立以后，经常有燕京的学者到哈佛，参与学术交流。1928—1929 年洪业和博晨光到哈佛讲学，并同当时在那里的伯希和合作，参与制定学社的研究和教学计划。毫无疑问，在哈燕社哈佛与燕京的合作中，哈佛方面实际上居于领导地位。但燕京方面也参与作出许多重要的决策。洪业在哈佛时，与博晨光合作起草了系统的学社的规划。其

① 王克私论文目录见《史学年报》第二卷第五期，第 547—557 页。

中的内容大部分体现在学社此后的工作中。^①但哈佛美国亚洲研究中心的真正形成是在叶绥夫任职时期。叶绥夫是第一个从日本帝国大学毕业的西方人。在他的领导下，1937年哈佛建立了美国第一个东方语言系，建立了美国第一个东亚图书馆，出版了哈佛亚洲研究杂志。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哈佛在哈佛燕京社的支持下成为美国亚洲研究的领导中心。^②直到今天还持续地对中国学术界产生着影响。当然这和燕京大学只有间接的联系了，但是当年司徒雷登等提出的促进中国和美国“文化理解”这个远大目标，则是一直体现于燕京大学和哈佛燕京社的持久努力中。

① 联董档案缩微卷，335—5124，第641—642页。

② Philip West, *Yenching University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 1916-1952*, p. 193.

第五章

辅仁大学:以国学为重点

与燕京大学相比，天主教会创办的辅仁大学历史较短，在教育资源方面显然也不占优势。但是辅仁有自己的特色，它自创办之日起，就突出地重视国学的教育与研究，因此国学就成为辅仁大学的强项，在当时中国所有的大学中，辅仁的文史研究是值得称道的。

一、中国人参与创办的教会大学

辅仁大学是由罗马教廷创办的，但与其它教会大学不同的是，中国人是创办辅仁的最早推动者。1912年，天主教知名人士马良（相伯）、英华（敛之）联名上书罗马教廷，请求在中国创办天主教大学。在《上教宗为中国兴学书》中，他们分析了中国国情，回顾了天主教在华传播的历史经验，认为在中国传教，利玛窦时代用学术来扩大宗教影响的办法是非常成功的，使得明末清初的天主教徒中“人才辈出”，因此这种方法是“断不可无”的。他们比较新教和天主教在中国教育中的地位，指出“在我华提倡学问，而

开大学堂者，英、德、美之耶稣教人都有，独我罗马圣教尚付阙如，岂不痛哉！”天主教在教育事业中的落后，造成了“求能略知时务，援笔作数行通顺语者，几寥落如晨星。”他们向罗马教廷描绘了这场教会办学竞争中天主教面临的危机，希望罗马教廷“多遣教中明达热切诸博士，于通都大邑，如北京者，创一大学，广收教内外之学生，以树国中之模范，庶使教中可因学问，辅持社会，教外可因学问，迎受真光。”^①

这封上书是两个中国知识分子写给罗马教廷的，他们要创办的教会大学比起早年的传教士来说，有一致的地方就是要用科学来过渡宗教，来扩大天主教在中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影响，这一点是无庸讳言的。但是，他们更强调要继承利玛窦、汤若望开创的传统，传播西洋科学，研究中国学术，沟通中西文化，既有益于天主教的发展，更有益于中国社会的进步。马相伯是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先驱人物，和同时代的先行者们一样，他办学也借助了西方教会的学术力量和知识背景，因而也属于教会办学的人物。但是马相伯具有强烈的建设中国新文化的责任感，他对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重视远在同时代的中外人士之上。在他和英敛之上书罗马教廷的同时，曾向袁世凯力争仿照法国科学院的模式，创办函夏考文苑，作为研究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最高学术机构，为国家的文化事业奠定久远的基础。马相伯的家庭有深厚的中国文化背景，这使他在毕生倾心西学，传播西学的同时，一直重视本国的文化。他在经营复旦时，倡导国学，规定学生如果“有意唾

^① 马相伯、英敛之上罗马教皇请兴学书，见《辅仁生活》，北京，1939年第二期，第9页，见《学制史料》，第四辑，第415—416页。

弃国学，“随录取亦随时屏斥”。^① 马相伯有过和传教士合作办学的经历，很了解西方人在中国办学时容易产生的偏差。他在 1926 年给英千里的信中说，洋人办学有两个弊端，其一是不重视汉文，或者重视而不得法；其二是教授西文程度太浅。因此他希望“以公教之精神、公教之捐款，办一华生眼前所需要者”。^② 英敛之的背景和马相伯有很多相似之处。美国学者佩拉根指出：“他（英敛之）致力于重整那种已经被不少人废弃了的知识分子的使命感，在社会杰出人士中发展教会及其哲学思想的影响，并通过他们将这种思想传播到现代中国社会中去。同时，他还致力于调整教会的教育方针和方向，加强中国神职人员自身的力量。”英先生是一名真正的爱国者，他感到通过传播教义、教育以及发展工业，中国将从自己当时落后的水平，发展到自立于世界之林的地位。^③

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在中国办学没有被提上罗马教廷的日程。但是，英敛之和马相伯并没有就此作罢。1913 年英敛之感到教中青年不太重视学习，文化水平较低，在北京香山静宜园办起一个小型学校，定名为辅仁社，专为教中子弟教授国学，但维持了几年就停办了。^④ 英华的这个创举虽然没有成功，但体现了马相伯和他上书罗马教廷的一致思想。他们的思想和实践对未来

① 《复旦公学章程》（1905 年），第五章“入学程度”，《复旦大学志》，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5 年，第 68 页。

② “致英千里先生书”（1926 年元月），《马相伯（良）先生文集续编》，台湾文海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75—76 页。

③ Paragon D. (1961). ‘Ying Lien-Chih (1866—1926) and the Rise of Fu Jen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of Peking’. *Monumenta Serica*, XX165—225, 见董黎、吴小新：《中西文化交流与融合的产物：辅仁大学新校舍建造的历史背景及其建筑艺术分析》见 1995 年华中大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未刊稿）。

④ 方豪：《英敛之先生年谱及其思想》，见沈云龙主编《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三辑》，台北，第 23 辑。

辅仁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辅仁以后重视文科，重视国学，不拘宗教、国别，延揽文化精英办学的方针，是和他们的规划分不开的。

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罗马教廷终于开始支持马相伯、英敛之在中国建立大学的设想，数次派人来中国考察教育状况，并多次与英敛之磋商。最后，罗马教廷将在华创办大学的任务委托给美国本笃会。1923年9月，全美本笃会大会通过了在中国建立一所天主教大学的决定，这项工作进入了实质性阶段。但此时，比起马相伯、英敛之十年前上书时的情景，中国思想界已经是今非昔比。新文化运动对传统文化的冲击和矫枉过正的偏颇，使英敛之和马相伯更相信，在介绍西学的过程中要重视中国的文化遗产。1925年在马相伯起草的《美国本笃会创设北京公教大学宣言》中抨击了那种蔑视和嘲笑，甚至要使中国文化“尽绝根株以为快”的现象，对全盘否定中国文化的浪潮痛心疾首。宣言中说：“今本会创设大学于北京，……即介绍西欧新得科学文化之最精者，并保存中国旧有文学美术之最善者，舍短取长，不使偏胜，此物此志也。”^①英、马的这种办学方针，在当时已经是国内一般大学的潮流，辅仁办得比较晚，可以汲取其它大学的经验，这是势所必然的。但是，联系到他们民初的建议，他们对国学的重视是一以贯之的。不仅如此，他们在宣言中还强调：“近此大学初创之人，虽皆美产，但来华之意，非仿殖民，吸取人才，造成附属品也。本会在一国，便为一国之会士。极愿同志之人，同力合作，数十年后，会士为中国之会士，公教为中国之公教，大学为中国之大学，

^①《美国本笃会创设北京公教大学宣言》，1925年9月，《辅仁生活》，1940年第四期，第12页。

懿欤休哉！而本会之志愿方成。”^① 这非常明确地表现了他们的民族主义立场，以及在他们心目中未来大学的方向。

值得一提的是，20 世纪 20 年代中国民族主义思潮风起云涌，非基运动给基督教会以强烈的震撼，推动了教会大学的改革。上述宣言虽然出自中国人之手，但也反映了美国本笃会的立场。后来被任命为辅仁大学校长的本笃会修士奥图尔（George B. O'Toole, 1888—1944）在 1924 年 3 月给英敛之的信中说：“当这所大学正式开学后，我们希望您能担任中国文学、历史的教授。我们希望在中国人民的眼里，天主教会并不是他们的敌人，而是他们在本民族语言、传统、古典文学等方面的朋友。我们希望北京公教大学成为一个中国文化的储聚点，一个中国文化的中心，并通过自己特有的天时、地利，将其发扬光大，有助于中国这一强大、古老的国度发展自己的艺术、语言、哲学等。”^② 奥图尔的这种态度充分表现了 20 世纪 20 年代传教士在观念上的变化，也就是西方史学家所指出的传教运动对本土文化的适应性。无论这种适应性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它总是有利于辅仁更多地倾向于中国人所设计的模式。

持这种立场的不仅是奥图尔一个人。随着中国政治形势的发展，传教士在教育与宗教的问题上，逐渐采取比较灵活的立场。罗马教廷在中国的代表蔡宁（Mario Zanin）明确地提出了“学术传教”的口号。他说：“科学为真理的分析，信仰为真理的综合，那么求真理的倡明，必得把科学与信仰联合起来，才能乐观，否则

^① 《美国本笃会创设北京公教大学宣言书稿》，见方豪编：《马相伯（良）先生文集续编》，第 70—80 页。台湾，文海出版社，1972 年版。

^② O'Toole, B. (March 6, 1924). "Letter to Ying Lien-Chih". St. Vincent Archabbey Archives, Latrobe, Pennsylvania. 见董黎、吴小新前引论文。

只有悲观，这是理论。讲到实际，我们当使科学与信仰携手，当以学术用于信仰上，就是以学术传教。这种工作，在以往天主教初来中国时，利玛窦、汤若望等人曾利用过。利玛窦氏抵华后，深知学术中传教之秘诀，端在工具。所以他曾利用长久的时间，从事研究中国语言文学，并且研究中国文献，风俗人情，开学术传教先河，成绩惊人。在学术上，利氏专心致力于中国遗产，使与西洋科学合并，以引起士大夫之注意。……植了公教基础于中国的成績。”他还认为：“因此，我们当前的使命，是以学术传教，这种使命，是紧张而不可稍缓的。因为目前中国的现象，须要我们急起，逼迫我们负起这种使命来。”^①辅仁大学从罗马的角度来看，就是学术传教的一个典型。无论怎样看，在宗教事业中把学术放到一个极其重要的地位，最直接的结果终究是最有利于学术的发展。在这一点上，英、马等人和辅仁大学的支持者达到了一定程度的共识，或者说美国本笃会的传教士们，甚至罗马教廷接受了英、马等人的建议，使辅仁沿着这个宣言的方向运行。

二、国学系所在辅仁大学结构中的地位

也许由于实际的条件和形势，辅仁创办之初就从国学起步，逐渐造成了国学的系、所在学校结构中的突出地位。1925年辅仁创办之初，最先设立的是文科预科，校名沿用辅仁社，由英敛之担任社长。这个学校和以前的香山辅仁社一脉相承。主要讲授中国

^① 蔡宁：《学术传教的重要》，《公教进行》1936年10月，第8卷第25期，见李楚才编著《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料——教会教育》，第562--563页。

文学、历史、哲学、英文和数学等课。1927年，当“公教大学辅仁社”成立时，大学本科班就按原来已有的史学系、国文系、英文系招生。哲学系因未筹备就绪，暂未招生，这个模式一直延续下去。1928年秋，学校开始招收哲学系新生。当时，辅仁实际上只是一所文科大学，或者说是一所文学院。1929年，为在国民政府注册，辅仁发展起了文学院、理学院和教育学院，总共11个系。

但是，发展理工科教育，需要投入更多的资金。辅仁的经费来源一直比较紧张。1933年，由于本笃会在经费上难以为继，决定由美、德两国圣言会接管辅仁。圣言会接办辅仁后，大力充实校内设备，增聘国内外有名学者来校授课，改进校务。在学校的建置方面，增加了文理科两个研究所，实际开办的有文科史学部和理科物理部。但史学部的实力和地位远在物理部之上。就总的办学经费来说，辅仁和燕京、金陵、齐鲁等学校不可同日而语。因为经费困难，其基本的校舍问题，也长期迁延不决。因此，辅仁很自然地走上偏重文科的道路。

在辅仁大学的文科中，国学占有突出的地位，这和学校的主持人有极其重要的关系。辅仁的第一任领导人是英敛之，前面已经提到他对国学的重视。1926年英去世，临终把校务托付给陈垣，这对辅仁国学的发展更是意义深远。

陈垣(1880—1971)，号援庵，广东新会人，出生于药材商人家庭。陈垣早年的经历颇多曲折。青少年时期，以科举考试为目标，通过私塾和自修打下了深厚的国学根底。20世纪初年，陈垣参与革命活动，编辑报纸，进行反清宣传。1907年，科举制废除两年以后，陈垣开始学习西医，1910年在光华医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1913年当选为国会议员，北上定居北京。

在早年的这段经历中，已经透露出贯穿陈垣一生的精神倾向。一是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1905年，陈垣积极参加抵制美货运动

他原来在美国教会办的博济医学院学医，因愤于学校当局歧视中国籍教员和学生，转到中国人办的光华医学院。他本人既是这所学院的发起人，又是它的第一届毕业生。二是酷爱史学。陈垣从小阅读了大量史书。1903年，他在读清代大史学家赵翼的《廿二史札记》时，就很有创见地用“史法”和“史事”的范畴来划分这部名著的内容。在其发表论述政事和医学的文章中，也长于用史实来阐发自己的观点。

陈垣入京之初，很想在政治上大展抱负，但现实很快使他希望破灭。而北京人文荟萃，藏书丰富，则唤起了他一直在心中潜流奔涌的献身学术的激情。他后来说：“眼见国事日非，军阀混战连年，自己思想没有出路，感到生于乱世，无所适从，只觉得参加这样的政治是污浊的事情，于是就想专心致力于教学与著述。”^①1917年陈垣发表了《元也里可温教考》，这成了陈垣一生事业的转折点。

1917年春，陈垣立志写一部基督教史，填补《四库总目》中的一个空白。他到处收集明末中国基督教书籍。后来看到英敛之的《言善录》，了解到英藏有这类书籍，前往借阅。英不但极为慷慨地倾其所藏，供陈垣阅读，而且把他当时正与香山辅仁社的学生探讨的问题，如元也里可温考，与陈垣切磋。陈垣对基督教的知识已有相当的积累，因此在旬日之内，写就《元也里可温教考》，并以此文向英敛之和马相伯请教，获得两位前辈的激赏。从此陈垣深得英、马的信任，和辅仁结下不解之缘。同时，也激发陈垣弃政从文，献身于学术事业的决心。此文发表后，陈垣逐步转入学术界和文化教育界。1922年，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导

^① 陈垣：《竟使我获得新的生命》，转自陈智超：《陈垣传略》，《社传》，第一辑，第188页。

师和京师图书馆馆长。1925年任故宫博物院图书馆馆长、清室善后委员会委员。1926年，接手管理辅仁社，以后一直任辅仁大学校长。陈垣在一段时期内还担任过北京大学、燕京大学和北平师范大学的兼职教授，但他最重要的岗位一直是辅仁的校长。

陈垣在辅仁的地位是不同一般的，从行政上讲，他是继英、马之后的学校实际创办人之一，资历最深；从学术上讲，他当时已经以宗教史、元史和中西交通史的卓越成就蜚声海内。在基督教和天主教的所有教会大学的校长中，无人可以同时在这两个方面与陈垣相提并论。作为校长和学者，这两个角色是相互影响的。陈垣的民族主义立场使他对推进中国学术文化的研究有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在辅仁的有关章程中要求学生，“对于中国固有文化之特长，发扬光大，以增长其民族自信力。向之所短，则利用科学，救其弊、补其偏，务使习国学而毋故步自封，读西籍而毋食欧不化，不托空言，斯裨实用，此本院共同一致之所冀图者也。”^①据郑天挺回忆，早在1921年他在北大上学时就听陈垣讲过“现代中外学者谈汉学，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说东京如何，没有提中国的，我们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到中国、夺回北京。”^②辅仁成立后，陈垣的这种决心更为迫切。翁独健回忆说：“半个世纪以前，1928年，当时我是大学一年级学生，在课堂上听到陈垣教授甚有感慨地说过这样的话：今天汉学的中心在巴黎，日本人想把它抢到东京，我们要把它夺回北京。”^③学术文化的研究在这里已经超出学术本来的意义，而是体现民族竞争和文化竞争的大事情。以后陈垣多次

① 北京师范大学藏《私立北平辅仁大学档案》案卷第21号，见何建明《天主教辅仁大学之国学与陈垣》，1995年华中大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

② 刘乃和：《励耘承学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88页。

③ 同上。

重复这样的话题。1935年11月，在日本人策划“华北国”的阴谋时，北大的学生在教室里都能听到朝阳门外日本兵的打靶声，陈垣对学生说：

“一个国家是从多方面发展起来的，一个国家的地位，是从各方面的成就积累的。北平市商会主席到日本去观光，人家特别派了几位商业上的领袖人物来招待，倾谈之下，我们的商人什么都不明白。连谈话的资格都不够，像这样凭什么去和人竞争？凭什么能使人重视？我们必须从各方面就着各人所干的，努力和人家比，我们的军人要比人家的军人好，我们的商人要比人家的商人好，我们的学生要比人家的学生好。我们干史学的，就当处心积虑，在史学上压倒人家。”^①

陈垣是属于深暗“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那一代人，他这么强调学术上的竞争，把它与军事和经济相提并论，看成是涉及国家地位和命运的大业。正因如此，他全心全意致力于辅仁的事业，特别是在他得心应手的国学领域中，建立了流传久远的事业。

陈垣当校长期间，虽然有外国人担任校务长，但国学方面的一切应该是出自陈垣和中国学者的策划。推进一个大学的学术研究，牵涉到多方面的因素。辅仁在1933年就成立了文科研究所，培养研究生。首先开办的是史学部，这对于提高大学的教学与研究水平在制度上是重要的一步。当然，诸事之中人的因素第一。辅仁在国学方面的进步首先在于陈垣等聘请和维持了一班优秀的研究人才，特别在国文、历史两系，汇集了一批学术名人。

^①《北大与北大人》，《社传》，第一辑，第198页。

三、辅仁的师资

辅仁大学按规模来说，是一所不大的学校。因此文史哲三系向来人数不多。1936 年时辅仁的文学院有国文、西洋语言文学、史学和社会经济等四个系。每系平均教员有 10 余人。其中可以纳入国学范畴的国文系有 11 人，史学系有 12 人，文史两系中的资深教员同时也担任文科研究所的研究人员。^①但是，由于教师的流动性，除陈垣外，前后在辅仁大学担任教席的学者名流为数不少。下面略加介绍。

沈兼士(1886—1947)，浙江吴兴人，早年留学日本时曾与鲁迅、马裕藻、钱玄同、许寿棠、周作人等师从章太炎学习国学，以语言文字学家知名于世。1912 年秋到北京，先后担任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故宫博物院文献馆馆长、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通信研究员、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主任。从 1925 年到 1947 年，担任辅仁大学国文系教授，代理校长、文学院院长兼文科研究所主任。^②

余嘉锡(1884—1955)，父亲是晚清进士，家学渊源深厚，自幼博览群书。17 岁时开始从事《四库提要辨证》的工作。1902 年中举人。1927 年来北京，先后在辅仁大学讲授目录学、古籍校读法、世说新语研究、经学通论、汉魏六朝文等。曾任国文系主任、

^① 《私立北平辅仁大学一览》，民国二十七年年度，陈垣著。

^② 葛信益：《沈兼士先生的学术贡献和爱国精神》，《风云录》，第 71 页。

文学院院长。^①

张星烺(1888—1951)，从小受过经典教育。1909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化学系，后到德国留学，是我国第一个生理化学留学生。1912年回国后，因条件限制，无法实现科学救国的理想。1917年被蔡元培聘为国史特别纂辑员，到日本收集资料。1926年被聘为厦门大学国学研究所所长，从此以历史研究为职业。1927年被聘为辅仁大学历史系教授兼主任，经历了辅仁大学兴衰的全部过程。曾经同时教授“中西交通史”、“历史地理”、“高等有机化学”等不同学科领域的课程。他的历史课不仅沟通了中外历史，而且联系了许多自然科学知识。^②

刘半农(1891—1934)，江苏江阴人。“五四”新文化运动初期的重要作家，近代著名语言学家。1920年到英国留学，次年转入法国巴黎学习。刘是辅仁大学的第一任教务长，从1929年春就任到1931年夏辞职，刘为辅仁擘划甚多。辅仁大学在教育部立案是他一手办理的。同时他多方罗致，敦请名教授来辅大担任功课，例如周作人教近代小品文；马衡（后任故宫博物院院长）教金石学；朱希祖（前北大历史系主任，后任中央大学文史研究室主任）教历史及文学史；刘钧（后任河南大学教务长）教教育。刘半农是当代的文学家，是中国新文艺开山大师之一，担任辅仁教务长时，对学生的国文非常重视，他亲自担任现代文学课程，教授认真，并亲为学生改文章。^③

朱希祖(1879-1944)，浙江人，14岁时，其父授以《左传》。

① 马英林：《忆恩师余嘉锡先生》，《风云录》，第77—78页。

② 刘绍荣：《张星烺和他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风云录》，第55—58页。

③ 《辅仁广东同学会半年刊》，1925年6月，见《辅仁校友通讯》，北京，第11期（1989，11月）第16—17页。

1905 年就学于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和鲁迅等师从章太炎学习国学。1913 年以后任北京大学国文系及史学系主任。1930 年留美派肇断北大，朱应聘为国立清华大学和辅仁大学教授。^①

英千里(1900—1969)，北京人，1924 年毕业于伦敦大学，即返国帮助筹建辅仁大学。英不但通晓哲学、逻辑学等，还精娴四种语言——英文、法文、西班牙文和拉丁文。^②

台静农(1902—1990)，安徽霍丘人，1922 年入北大国学系当旁听生，后在北大研究所国学门肄业。1927 年起任北京中法大学国学系讲师。1929 年起先后任辅仁国学系讲师、副教授，兼陈垣秘书。1933 年离开辅仁到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任教。1936 年到青岛山东大学。1940 年赴台湾。^③

于省吾(1896—1984)，辽宁海城人，幼时受私塾教育，中学毕业后考入奉天教育会国学专修科，后该校并入沈阳国立高等师范，1919 年毕业。于以研究古文字学、古史名世。1929 到 1949 年，任辅仁大学讲师、教授，燕京大学名誉教授、北京大学兼职教授，讲授“古文字学”。^④

在辅仁兼职或短期任职的名人中还有柯昌泗，史学名家柯劭戩之后人。入辅仁前在山东作过道尹。精于历史地理，对商周铜器也有研究，拓本收藏很多。朱师辙是清史馆编修而在辅仁兼课。朱的祖父朱骏声是清道光年间音韵训诂大师，传世之作是《说文通训定声》。朱师辙偏重于史学，任《清史稿》的纂修时在辅大兼

①《社传》，五，60 页。

② 汪川俊：《为辅仁大学操劳毕生的英千里》，《风云录》，第 40 页。

③《台静农传略》，《新文学史料》，1990 年第 2 期，第 118 页。

④《社传》，三，第 3 页。

课。^①

30年代以后，学校的规模有所扩大，辅仁增聘了下列教师：

容肇祖(1897—1994)，容庚之弟。少年时自学文字学和文史古籍。1922年入北大哲学系。1926年毕业后到厦大、中山大学，1930年到岭南大学任国文系副教授。1934年到辅仁任国文、历史、哲学三系副教授。^②

谭其骧(1911—)，1930年燕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1932年初任辅仁大学教师。1934年起在北大、燕大兼课，在辅仁开过《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③

方壮猷(1902—1970)，1926年毕业于清华研究院。1930年在北大、燕大、辅仁任兼职讲师。讲授宋辽金元史和日本史。

罗庸(1900—1950)，1920年毕业于北大，入国学门深造。考古、语言学家。1931年起，任北京大学、辅仁大学教授。^④

朱士嘉(1905—)，1928年毕业于燕大，1932年获硕士学位。1936至1937年加入禹贡学会和地理学会，并在该会编辑禹贡半月刊和《地学》杂志。同时担任辅仁大学讲师和燕京大学图书馆中文编目部主任。^⑤

史念海(1912—)，1932年入辅仁，禹贡学会成立时，尚在北京辅仁大学读书。由于顾颉刚的引导，走上了研究历史地理的道路。^⑥

① 台静农：《北平辅仁旧事》，见《辅大五十年》，台北，辅大出版社1979年，第55页。

② 《自传》，《社传》，三，第365页。

③ 《自传》，《社家》，四，第325页。

④ 《社家》，六，第233页。

⑤ 《自传》，《社家》，二，第88—91页。

⑥ 《自传》，《社家》，三，第26页。

上面所列出的大致包括了辅仁一些当时和后来比较著名的教师。和当时北京的几所大学如北大、清华和燕京相比，辅仁教师中留学生比较少，在为数不多的留学生中，留日的比较多。留学欧美学习人文科学的极少。这和辅仁主事者自身的背景是有关系的。余嘉锡在系主任任上选聘国文系教师时，以确求真才实学为准绳，认学历但不唯学历是举。^①另外这也和天主教会以前不注重高等教育有关，它没有自己派出的留学生，当然也没有人回学校服务。政府派出的留学生往往首先在国立大学服务，新教学学校派出的留学生一般有回母校服务的义务。台静农当过辅仁校长的秘书，在谈到辅仁最初的师资时说：“这一新兴的大学，主要教授多未从其它大学物色，而是从大学范围以外罗致来的。因为援庵先生居北平久，结知的学人多，一旦有机会，也就将他们推荐出来。”而且教师大多中年以上，台静农和英千里是最年轻的。^②20世纪30年代以后，北大、清华和燕京的毕业生成为辅仁教师的比较多。不过，辅仁的教师中受过传统教育的人还是多于其它学校。因此，从辅仁师资背景来看，更具有中国色彩和新旧交融过渡的特色。相对他们的中学根底来说，他们的西学知识要薄弱一些，这使得辅仁与传统国学有更多的亲缘关系。

四、三十年代辅仁的国学教育

课程设置是反映国学教育程度的标准之一。随着学校的逐步

^① 《辅仁校友通讯》，第11期（1989，10），第60页。

^② 台静农：《辅仁日记》，《辅仁校友通讯》，第八期，1986年，第15页。

发展,到抗战以前,辅仁的国学课程已经比较完备了。1936 到 1937 年度辅仁的国学课程如下:^①

教授	国文系课程
沈兼士	文字学纲要、文字学史、说文、释名、初期意符字之形态与性质、
余嘉锡	经学通论、目录学、文章著作源流
郭家声	汉魏六朝文、各体散文习作
孙人和	词及词史、庄子研究、骚赋
储皖峰	汉魏六朝诗、唐宋诗、中国文学史、指导研究
赵万里	中国戏曲史、校勘学
赵荫棠	声韵学纲要、声韵源流
朱以书	中国现代文学
陆宗达	文字学纲要、尔雅方言、古韵源流
戴君仁	声韵学纲要
唐 兰	诗三百篇、三礼通论、甲骨钟鼎文字
	史学系课程
张星烺	秦以前史、宋辽金元史、南洋史地、欧化东渐史
陈 垣	魏晋南北朝史、中国史学名著选读
叶德礼	日本文明史
胡鲁士	西洋上古史、西洋文明史、公教史
司徒资	西洋中古史、西洋近世史
余嘉锡	秦汉史
史禄国	俄国膨胀史、亚洲东北史地

^①《私立北平辅仁大学一览》，民国二十七年度。

张鸿翔	隋唐五代史、明清史、中国历法研究
韩儒林	中央亚细亚民族史
刘滋厚	金石学
王静如	新疆考古概要
王光玮	地理学概论

辅仁 1936 年到 1937 年的课程中没有哲学系的内容。^① 国文课程的传统色彩较重，教授所擅长者，往往就是常年的课程。在基础课和专题课方面并不平衡。专题的分量比较大，基础课方面显得薄弱一些。历史课程是比较丰富的，也能照顾到基础课和专题课的全盘规划。中国历史在断代史方面分得比较仔细，世界史除了有通史之外，还注重了中国周边地区，如俄国、日本、中亚地区和南洋地区的历史。考古和历史地理学也被列入了课程。历史课程中，中国历法研究是辅仁的特色课程之一。

辅仁经民国政府批准的研究生教育在抗战前仅限于史学。当时的研究生课程如下表。

文科研究所史学部课程：

教授	课程
张星烺	部主任
沈兼士	初期意符字之形态与性质
陈垣	清代史学考证法
叶德礼	日本文明史
胡鲁士	西洋文明史

^① 事实上辅仁一直到 1938 年都有哲学系毕业生，但学生最多时也没有超过 3 人；1940 年毕业生就和心理系合起来为哲学心理系。学生仍然很少。见《辅仁学志》第九卷第一期，“本校学术消息”，第 3 页。

雷冕	宗教之起源及其发展 人种学及史前史研究法
司徒资	西洋史学方法概论
余嘉锡	文章著作源流
史禄国	俄国膨胀史

上述课程中除了陈垣的史学考证方法、雷冕的宗教学和人类学及司徒资的西洋史学方法论外，其它都与本科的课程相同，但在程度上可能是不一样的。比起燕京的研究生课表，辅仁的课程要少。总的说来，辅仁的课程中，务“实”的比较多。这和辅仁的教授们，特别是陈垣等资深学者比较重视实证的专题研究是有关系的。陈垣认为思想史、文化史，过于空泛，不成一专门学问。^①因此在辅仁的课程中文化史和思想史的课程几乎没有，比较重视的是中国语文的基础，包括文字学、断代史和专题研究。辅仁课程中的另一个倾向是厚古薄今，先秦两汉的内容并不多，课程和研究都重在魏晋隋唐一直到明清史。但在清史中，鸦片战争以后的历史课程也不多。这和陈垣后来所说的，因想“不问政治”而不研究近代历史的说法是相一致的。^②

辅仁国学教育中重视专题研究，在学校的教育方针中也有所反映。它规定学生一、二年级学习基础科目。三、四年级，在教师的引导下进行专门课题的研究，目的在于“对于中国固有文化之特长，发扬光大，以增长其民族自信力”。^③这个规定决定了课程的相对集中性，以便使学生在进入具体研究时，不至于因为领

① 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355 页。

② 陈垣：《自我检讨》，《光明日报》，1952 年 3 月 9 日。

③ 北京师范大学藏《私立北平辅仁大学档案》案卷第 21 号，见何建明《天主教辅仁大学之国学与陈垣》。

域过于宏大而不着边际。同样，为了达到这个要求，辅仁在引导学生掌握研究方法和熟悉资料方面开设了不少课程。陈垣的“清代史学考证法”，有时也称“史源学实习”课。“这个课是以一本史学名著为底本，选出其中某篇文章，上课时，分析其内容、材料、结构及文章的思想，然后留下作业，让同学查此文中引书的史源。”^①所谓史源，就是历史著作中引用史料的来龙去脉。学生“找出史源，然后指出这篇文章引用材料的正确处和误引处，指出其删节、改易、不实之处。最后写成文章，或写心得，或写考证。”这种联系实际训练方法，是非常有效的，在当年的学生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它培养了学生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在写作上也得到了锻炼。特别是使学生懂得了如何正确严谨地使用资料的科学方法，引起了学生探讨新问题的兴趣。^②

辅仁重专题、重考证、厚古薄今的国学教育，在学生的毕业论文中也反映了这个特色。1931年到1937年辅仁国文系毕业生48人，在刊出的论文题目中做专题考证的占了绝大多数。可以算作通论性的题目约有4个，如《中国古代宗教思想史概观》、《建安文学概论》、《建安文学研究》及《中国戏曲之变迁》等。同一时期毕业的历史系学生有54人，只有4篇论文，如《太平天国与西洋之关系》、《曾国藩评传》、《清代之中俄伊犁交涉》和《中英

① 刘乃和：《励耘书屋承学录》，第10页。

② 当年上过陈垣史源学的程华说：初上课先生就嘱每人各备赵翼《廿二史札记》一部，并指定若干条目，命于课外将这些条目与引用书核对一遍，如有舛错，一一指出，于下次课时作为练习交回。原意赵翼是清代著名史学家，《廿二史札记》又一向享有盛誉，可能引文不会错吧。那知与所引原书一一核对，不但有错，而且错的地方还不少。后来在先生所授的另一课程中，又命我们将顾亭林《日知录》中的一些条目与引用原书加以核对，那时原先还以为顾以考索著称于世，他的引文还能有错吗？可是一经仔细核对，错误也还是不少。可见作学问要认真，要一丝不苟。”程华，《陈援庵先生二三事》，见《辅仁校友通讯》，1990年10月，12期，第3—4页。

滇缅边界之交涉及其问题》是专门探讨近代历史的，可见当时辅仁的学术风气。^①

除了学生自己选题外，辅仁对学生的论文还有一种新的办法。1935年沈兼士担任文学院院长时，曾经认为当时学生论文有三个弊端。第一，本科学生学力不足，对论文的选题立说均少有把握，大多数文章敷衍成篇。第二，这些不成熟的作品，徒耗费学生和教师的精力，而很少有学术价值而值得保存。第三，学生数口多时，选题过于纷繁，指导教师也难以应付。他认为比较可行的办法是由教师确定题目，由学生负责收集资料，在资料完备时由教师负编辑之责。在这一过程中学生可以博览群书，掌握分析和收集资料的基本功，而且可以培养学生的合作精神，开教授与学生合作著述的风气。在中国当时的人力财力条件下，这种方法可以完成各种学术史和学术词典。1935年文学院确定的课题有陈垣、余嘉锡负责指导的“四库全书提要考异”和“各史姓名各检”。沈兼士本人则早在1932年开始师生合作编辑“广韵声系”。后来的结果表明，这个方法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这些项目大都成书出版。有些参与工作的学生日后在这些领域也有相当建树。^②

辅仁对国学各科的教育质量是相当重视的。学生回忆说：“辅仁大学，尤其是国文系，其开课之认真，分数之严格，不但可以说是全北平最严格，并且可以说是全国最严格者。”在开课方面如果没有专门人才，即使是必修科目，也是宁缺勿滥。如易经一科，因为没有合格的师资，始终没有开课。^③辅仁当年的学生，无论日后在大陆或台湾对教师的看法颇为一致，教师教学认真，学生负

① 《辅仁学志》，第六卷第一、二合期，1937年6月，第275—281页。

② 《本校学术消息》，《辅仁学志》，第五卷第一、二合期，第1—6页。

③ 赵雅博：《忆》，见《辅大五十年》，第59页。

担较重。^①

但是，尽管文史是辅仁最强的学科，学生数量还是少于西洋语文系，更少于学经济类的。国学系的学生数量只有西语系的三分之二，经济系的五分之三。^② 学生对学习国学，选择以国学系科为专业并不踊跃。晚清以来中国社会转型，对学生择业择学的深刻影响，并不是可以靠学校来转移世风的。1925年辅仁社的招生简章中，仍给学生以很多的优惠，入学不考笔试，仅需提供一、二篇自己的作文，除了饭费外学校不收学费和住宿费。^③ 但直到战前，学习国学的学生并不多。这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就业机会仍然是一个很现实的因素。另外，日本侵略的阴影也使得学生不能全心全意的学习这些似乎与社会实际离得比较远的学问。后来投奔八路军抗日根据地的陈叔亮说：“我在辅仁大学读书是1934—1938年。1934年辅仁大学新楼落成，招生扩大。我考入中文系。当时中文系的名教授很多，除陈垣校长外还有：沈兼士、余嘉锡、范文澜、郑振铎、伦明、赵荫棠、罗膺中、储皖峰、陆和九、台静农、魏建功、李霁野诸先生。教授们学识渊博，课程内容丰富，可以说是一个研究学问的良好环境。可惜正值国家多难，帝国主义要吞吃中国，当局却把精力放在连年内战上，加以苛捐杂税、灾荒频仍，人们呻吟于水深火热之中，要求教授正常授课，学生安心是不容易的。”^④

不过，同燕京一样，学生数量是一回事，教学质量又是一回事，在战前的学生中，后来一部分人成为著名的学者，这也算部

① 王哲芝：《北平辅大国文系忆旧》，见《辅大五十年》，第92页。

② 《辅仁学志》，第六卷第一、二合期，1937年6月，第275—284页。

③ 《北京公教大学附属辅仁社简章》，《学制史料》，第四辑，第421页。

④ 陈叔亮（原外交部大使）：《忆旧迎新》，《辅仁校友通讯》，第4期（1985，10），第4页。

分达到了辅仁的目标。

五、战前辅仁国学研究的几个重点

战前辅仁大学在相对的平静中发展了十余年，除陈垣一直担任校长外，一些著名学者也比较稳定地在辅仁从教多年。如沈兼士从 1925 到 1937 年一直在辅仁大学工作，曾任文学院院长、文科研究所主任兼国文系教授。余嘉锡，张星烺教授也都长期在辅仁教书育人，著书立说。有时辅仁教授也在燕京等校兼课，但主要工作还是在辅仁。他们不但培养出了一批文史界的新秀，还取得了不少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在学术上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使得辅仁大学的文科在中国学术界有了相当的影响。

新文化运动以来，所谓国学研究，实际上都离不开对乾嘉传统的治学方法和内容的扬弃，以及对近代西方社会科学方法和历史观的汲取和应用。当时辅仁的国学也不例外，整理古书、训诂和校勘学依旧是学者们注意的中心，但研究的范围扩大了，远远超出了经书的范围。同时他们对过去的文化遗产进行有计划有系统的整理，进行专史式的研究。胡适在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发刊词中曾说：“我们提出‘专史式’的整理——诸如语言文字史、文学史、经济史、政治史、国际思想交流史、科技史、艺术史、宗教史、风俗史等等。”他说这种专史式的研究，中国传统学者几乎全未做过。^① 如果以胡适列出的专史门类作为参考，那么辅仁在语言文字史、国际思想交流史、宗教史等方面作出了相当的成绩。

^① 唐德刚译注：《胡适口述自传》，第 20—21 页。

首先谈陈垣的学术研究。从 1917 年陈垣投身学术到抗战爆发前的 20 年间，陈垣的研究硕果累累。按其弟子刘乃和列出的《陈垣主要史学著作编年》来看，这一时期陈垣撰写的论著共 47 种。其中关于宗教史的约 26 种，超过总数的一半。他对外来宗教在中国传播变迁有极大的兴趣。火祆教、摩尼教、一赐乐业教、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都曾是他的研究课题。对于中国本土宗教道教，他也著有专书。他所著《火祆教人中国考》、《摩尼教人中国考》、《开封一赐乐业教考》、《基督教入华史略》和《基督教入华史》，标志着中国历史学家开始认识到宗教史在历史学中的地位。所以说他是中国宗教史研究的开创者是恰如其分的。值得一提的是陈垣在宗教研究中“态度客观，以平等眼光看待各种宗教，不讳言基督教的偏见，并有意消弥基督教新旧派之间的裂痕，主张‘凡事信仰基督者，均可称为基督徒’”。^①实际上，陈垣是以宗教史的研究开始了他的学术事业，宗教史的研究又是陈垣结缘于辅仁的契机，宗教史研究通过陈垣在辅仁发展起来，有一定的必然性。辅仁的开创者包括陈垣在内都是耶稣教或者是天主教信徒，他们对宗教的来源和发展，一般来说也许比其他学者多几分兴趣，多一些责任感。正其如此，辅仁在宗教研究方面作出了开拓性的贡献。

陈垣这一时期的研究，在元史方面独树一帜。《元西域人华化考》的著作始于陈垣任教北大时（前四卷），完成于辅仁时期（后四卷）。此书被认为是陈垣早期著作中久享盛名的书。^②陈寅恪评

① 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第 112 页。

② 白寿彝：《纪念陈援庵先生诞辰一百一十周年》，《史学史研究》，1990 年第 3 期，第 1—3 页。

价此书“材料丰富、条理明辨，分析与综合极具其功力。”^① 1931年成书的《元典章校补》被史学界誉为“以功力著称”，是校勘学的一个范例。他的《元典章校补释例》，后改称《校勘学释例》，是我国校勘学史上带有总结性的著作。相比宗教研究，陈垣的元史研究数量远不如宗教研究之多，但质量远在后者之上。特别是《华化考》，从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角度来看，是北大《国学季刊》出版以来第一部划时代的杰作。^②

陈垣的第三个贡献是在历史年代学、避讳学、校勘学等历史学的辅助学科。陈垣是历史文献学的奠基人之一，他在目录学、年代学、史讳学、校勘学等几个方面都有研究。他认为目录学是治史的门径。为了掌握中国历史文献的概貌，他对《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他亲自查对了文津阁本《四库全书》，编写了《文津阁四库全书册数、页数表》、《四库书目考异》等。他所著《中国佛教史概论》，论述了有关佛教的重要史籍，也论述了这些史籍对一般历史研究的史料价值。这是目录学方面有创造性的一部著作。

年代学的研究是历史文献研究的重要课题。以中、西纪元之差异，近代学者往往以中历的某年当西历的某年。实际上，这只能说是大约的对算。陈垣所著《二十四史朔闰表》、《中西回史日历》，为这三种历法的纪年提供了可靠的换算工具，为中外史料的运用在纪年方面开辟了方便的途径。年代学的工作，在陈垣的史学工作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中国佛教史上，他的重要著作，如《书内学院新校慈恩传后》、《大唐西域记撰人辩机》等，都是善于利用年代学的方法，排难解纷，获得新解。

① 陈寅恪：《重刻元西域人华化考序》，见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第115页。

② 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第114、115页。

中国自周以来就有避讳的习惯，因为各个朝代所避讳的字不一样，正可利用它们作为辨别时代的标志。宋代和清代的学者对避讳都有专论，但没有系统的论著。陈垣总结前人在这方面的成就，并加以发展，写成了《史讳举例》这样的专书，为历史文献学作出又一贡献。

除陈垣这样的国学研究中的大师级人物外，辅仁的国学研究中卓有成就的还有许多学者，以下扼要述之。

张星烺早年留学美、德等国，后来弃理从文。由于家庭的影响和在海外的经历及接触的资料，他一生对中西交通史情有独钟。^① 1926年受聘于厦门大学，任国学研究所所长。1927年被辅仁聘为教授，“从此得以安心教学和研究”。他带给辅仁大学的一份厚礼就是《中西交通史料汇编》。张为这部书稿花了17年时间，为完成这部巨著，参考了274种中文书籍和42种外文资料。此书内容包括了自上古到明代的中国与东起葱岭以西和印度，西至非洲的这一广大地区各国交往的历史。1929年这部书作为“辅仁大学丛书第一种”出版，共6册。这部书自从出版以来一直受到国内外有关学者的关注。1954年英国学者李约瑟出版了《中国科学技术史》，在“中国和欧洲之间传播科学思想与各种技术的情况”一章中指出，他使用的中文参考书首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② 1931年张出版了专著《马可·波罗》，1933年出版了《欧化东渐史》。这部书连同《中西交通史料汇编》为我国中外关系史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张星烺可以说是我国中外关系学科的开创人物之一。

^① 张星烺的父亲张相文（1867—1935）是中国著名的地理学家、历史学家，辅仁社（1925）的史地教授，辅仁大学第二届董事会董事，曾发表过一些关于中国地理、历史的研究著作。刘绍荣：《中国现代地理学的倡导者——张相文》，《风云录》，第48—49页。

^② 刘绍荣：《张星烺和他的〈中西交通史料汇编〉》，《风云录》，第57页。

沈兼士早年留学日本，回国后即在北京各大学任教。沈首先提出了“文字画”的学说，后来，又进一步提出了文字学上的“初期意符字”阶段。他的创见是认为“初期意符字”为“文字画”与《六书》象形字中间的过程，它的形、音、义未尚固定。建设汉语字族学是沈研究的重要课题。他在 20 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许多著述大多是围绕这个问题立论的。1933 年沈发表了《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一文，受到蔡元培、李方桂、陈寅恪、林语堂的高度评价。^① 同年，他着手主编《广韵声系》，历时十载，最后到 1945 年才由辅仁大学出版。直到现在此书被学者认为是“研究语言文字学者，尤其是汉语字族学者所不可不备之书”。沈治语文学的同时，对整理清代遗留的文献档案做了开山的工作，对史学也有很大的贡献，总之，沈在学术上有开风气的魄力，又有高人一筹的治学方法和才能。^②

余嘉锡是现代著名目录学家和史学家。他从 17 岁开始，就逐日研读《四库全书提要》，分别考证，每年录为一册，积 50 余年，写定《四库提要辨证》490 篇，成为我国目录学的鸿篇巨制。余 1927 年到北平后，在辅仁大学讲授目录学及古籍校读法、楚辞、骈文、《世说新语》研究等课程，使学生明了学术源流及演变，掌握如何利用史料进行研究之方法。抗战之前余嘉锡在《辅仁学志》上除第一卷外，几乎每年都有分量较大的论文问世，研究的范围上起两汉下至明清，题目以专题考证为多。如第三卷第一期和第四卷第二期的文章分别是《晋辟雍碑考证》、《汉池阳令张君残碑跋》。

^① 沈兼士著，葛信益、启功整理：《沈兼士学术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 1986 年版，第 176—185 页。

^② 葛信益：《沈兼士先生的学术贡献和爱国精神》，《风云录》，第 65—67 页；《辅仁校友通讯》，第 5 期（1986，1），第 15 页。

有宏观意义的题目也有，如在第六卷一、二合期上发表的《小说家出于稗官说》，就涉及文学史上的重大问题了。

战前辅仁大学的国学研究处于继往开来的历史阶段。正如当年辅仁的学生，后来的著名学者史念海曾经说过“援庵先生是以史学名家，当时以史学名家的大师，无不用力于考证，援庵先生在这方面的功力不仅上承乾嘉诸老，甚至还要超过乾嘉诸老。这是当时史学界的称道，是无有任何异议的。”^①牟润孙说：“陈先生极注意研究史学的方法，他能读日文书，通过日本人的翻译，他读了西洋人的史学方法论，确是事实。他年青时候学过西医，对于西洋科学方法曾经接触过，至少，生理学、人体解剖学、内外科医学，他都应当学过。虽然后来改了行，他曾受过科学洗礼，则是毫无疑问的事。他和胡适很友好，但他从不谈什么科学方法，只谈史学方法。他分析史料的细密谨严比受过西洋史学方法训练的人只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著的《元西域人华化考》，日本史学家藏原骧藏博士当时就竭力称赞他的研究成果与方法。出版 40 年后，美国汉学家、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富路特 (Luther C. Goodrich) 将它译为英文。由此足见不仅陈先生研究的成果足以使外国治中国史的人佩服，即其研究方法亦同样为现代日本、美国史学界人士赞赏。”^②

其实在辅仁不只是陈垣注重中西结合的方法，这也是当日辅仁的风气。张星烺留过学，并且是学化学出身，自然也受过欧美方法的训练。沈兼士留学日本。余嘉锡等对西洋学术也同样关心。启功回忆当年辅仁学校的风气时说过：“一首诗、一张字，常见老先

^① 史念海：《忆先师陈援庵先生》，1932—1936 年辅仁学生，见《史学史研究》，1990 年第 3 期，第 6 页。

^② 牟润孙：《从〈通鉴胡注表微〉论援庵师的史学》，《史学史研究》，1981 年。

生们自己拿着图钉按在墙上展览。一件小古董、一张拓片、一本书、也常有人拿来共赏。莫尔根一本论古代社会的书，有人新译成中文，几位老先生互相传观赞叹。值得注意的是这些老先生特别是陈、沈、余诸位都是纯读古书的，他们未曾接触西洋文化，即使接触过一些，也是间接的或科技的常识。但他们这时是如此的虚心，立刻联想到治中国古史的种种问题。”^①可见，这些学者对西洋学术也是非常关注的。

不过，比较燕京有一批在欧美学习人文科学的归国留学生在唱主角的情景，辅仁还是有自己的一些特点。辅仁的学术研究著作大都是用文言写作的。与《燕京学报》不同，《辅仁学志》的文章绝大部分都是竖排的。战前辅仁的研究课题基本都是古代史。厚古薄今的倾向更明显。同时，中国传统中学以致用的影响也非常强烈。前面已经说过陈垣立志要夺回汉学中心的民族主义情感。另外，陈垣之所以研究宗教，多少是有感而发。启功说过：“陈老师家庭是接近基督教的，他在 20 年代做教育部次长时，因为在孔庙行礼拜迹近拜偶像，对‘祀孔’典礼，曾‘辞不与也’。但他对教会，则不言而喻是愿自立的。……于是老师不放过任何机会，宣扬中华民族文化对宗教的关系。吴历，号渔山，是清初第一个国产神甫，老师对他一再撰文表彰。即是他代表了具有华化倾向的宗教家。”^②张星烺在《中西交通史料汇编》自序中说出了他十多年辛勤治学的动力是感慨于“近代中国外患俱来自欧洲”，而中国学术太落后，“中国史地西洋人且代吾整理”，因而他认为弄清中

① 启功：《上大学》，《风云录》，第 111 页。

② 启功：《夫子循循然善诱人》，《辅仁校友通讯》，第 14 期，第 9 页。

西交通的历史，乃是当务之急。^①这种学术致用的思想，在抗战爆发之后更有明显的发展。

另外，辅仁的学风是强调专题研究。陈垣在1933年6月给蔡尚思的信中曾以学术知己的口吻说：“什么思想史、文化史等，颇空泛而弘阔，不成一专门学问。欲成一专门学者，似尚须缩短战线，专精一二类或一二朝代，方足动国际而垂久远。不然，虽日书万言，可以得名，可以吃饭，终成为讲义的教科书的，三、五年即归于消灭，无当于名山之业也。”蔡当时先后任职沪江大学和华中大学，著作颇多宏观通论。蔡与陈有师生之谊，给《辅仁学志》投稿，但终未见刊出，辅仁学风之重专精可能是原因之一。^②

六、面向中外的学术出版事业

抗战以前，辅仁的学术出版事业有三项，其中包括了《辅仁学志》，《华裔学志》和学术著作单行本。

辅仁大学成立的第一年就创办了《辅仁学志》。在写得古色古香的发刊词中，申明了很是新潮的刊物宗旨：随着世界形势的变迁，中外学术的交流，学者必须发掘利用新材料，开辟新领域，采用新方法，只有这样才能取得新的成就。《辅仁学志》的发刊词有两点颇值得注意。第一点是高度评价中国传统治学方法，文中指

^① 张至善：《广泛团结校友，致力振兴中华》，《辅仁校友通讯》，创刊号（1984.9），第10页。

^② 陈智超编著：《陈垣来往书信》，第355、356页。

出：“百年以往，乾嘉诸老努力朴学，极深研几，本实事求是之精神，为整理珍密之贡献，三古文史灿然大明。”第二点是对新方法和中外合作的肯定，即所谓“迨海国棣通，新知输入，……倾向既异，工作自殊然则欲适应时代之要求，非利用科学方法不可。阐发邃古之文明，非共图欧亚合作不可。昭昭然也。”^①总之，辅仁办刊的使命是“沟通文化”。

杂志的编委会由陈垣领衔，编辑秘书是储皖峰，雷冕 (Rev. Rudolf Rahmann, 1902—1985)、英千里、胡鲁士、沈兼士、张怀、余嘉锡、张星烺、张重一和丰浮露，他们都是编委会成员。编辑在二十多年中也有变动，但维持了基本的格局。《学志》每年出一卷两期，并随时增刊专号。1928年12月，出版了《辅仁学志》第一卷第一期。到抗战以前，《学志》出到第六卷。从《学志》上发表论文的作者来看，虽然《学志》也接受外稿，但著者主要是辅仁的教师。如果说《学志》与其他学报相比有什么特点的话，那就是刊物出版比较正常，这一点也许可以和《燕京学报》同为旧中国学术刊物之冠。

《辅仁学志》的内容比较广泛，按其征稿要求：“凡关于历史、语言、文字、宗教、哲学、美术、金石等著作或译文，均所欢迎。”不过，从论文的内容来看，古代史占了绝对主导地位。其次是古文字研究，古籍、古书、古器物的考订。^②这和当时学术界的倾向是一致的。至于从学术方法来看，考证是学者们得心应手的方法。

《辅仁学志》发表了一系列著名学者的论著，介绍了国外学者对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对当时中国学术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提高了辅仁在国内学术界的地位。

① 1928年12月，《辅仁学志》第一卷第一期。

② 《辅仁学志总目》，参见《辅仁学志》重印本第一卷第一期，第1—7页。

辅仁大学的另一著名刊物是以英、法、德文在国外出版发行的《华裔学志》，专门刊登研究中国古籍的文章。《华裔学志》创刊于 1935 年。1985 年 11 月 28 日在西德波恩附近的圣·奥古斯丁举办了纪念它创刊 50 周年的活动。

《华裔学志》最早的主编人鲍润生（Francis Xavier Biallas, 1878—1936）是以研究屈原文学著作而获莱比锡大学博士的圣言会德籍神甫。1933 年他到辅仁大学主管校务后，一面任教于社会学系，一面积极开展汉学研究工作。20 世纪 30 年代的北京是欧洲汉学家的黄金之地，尤其是在初创的辅仁大学，这里的文科人才济济，中西学术交流空气活跃。鲍润生看准了这一点，遂决定将原有的辅仁大学校刊（Bulletin of the Catholic University, Peking）停办而改办学术刊物，取名为《Monumenta Serica》（原意为丝域的史迹），专载汉学方面的学术研究成果，不登一般性的文章。刊物的中文名字《华裔学志》是陈垣选定的。“华裔”二字现在一般理解为在外国的中国人后代，但陈垣当时选的“裔”字是指远方的人民。《华裔学志》就是中国与远方人民间文化关系的学术研究刊物。刊物初创时的编辑有欧洲汉学家孟斯达特（A. Mostaert）钢和泰（Von Stael Holstein）、艾克（G. Ecke）、谢礼士（E. Schierlitz）和中国学者陈垣、沈兼士、张星烺、英千里。鲍在一年后去世，乃山雷冕任主编。以后又有著名的汉学家福克斯（Walter Fuchs）、卫德明（Helmut Wilhelm）、谢盛德（Koster Hermann）等多人参加编辑。

《华裔学志》1935 年出版，每半年一期，每卷约 500 页左右。《华裔学志》是面向西方的专业性很强的刊物，中外学者发表的文章都是西方汉学界比较有兴趣的问题，同时也是距离现实相当遥远的所谓“纯学术研究”，和当时欧洲汉学流连于中国古代文明的

风格是一致的。^①到 1948 年底,《华裔学志》共出刊 13 卷,刊载中外学者的论文 104 篇,短文 102 篇,书评 193 篇。其中除了西方人的作品外,也翻译中国学者如陈垣、沈兼士、费孝通的文章。这些文章内容深湛,考证扎实,论述的科学性、系统性强,显示了这一时期华北汉学家学术成果的精萃。除当代人的研究文章之外,《学志》还把中国文化中的精品,如杜甫诗等译成德文。《华裔学志》真正起到了沟通中外文化的作用,它刊出的主要文献也成为世界上汉学研究的宝贵财富。^②

除了刊物之外,辅仁还出版一些学术著作的单行本,陈垣的励耘书屋钞本《名理探》、《明季滇黔佛教考》、《旧五代史旧本发覆》、《吴渔山先生年谱》,张星烺的《中西交通史资料汇编》等都是以此形式出版的。

辅仁的学术出版事业,无疑刺激了学术研究的发展。谈到辅

^① 这一点从《华裔学志》最初几期目录中就反映的很清楚。《华裔学志》第一卷第一期刊登了 8 篇文章,其中有《亚洲最古的文化圈》(Wilhelm Schmidt, S. V. D)、《北平武英殿雕版的技术》(Ernst Schierlitz 谢礼士)、《商代铜器花纹和制造的起始》(H. G. Creel)、《阿巴亥的死》(Walter Fuchs)、《佛说净土孟盆经译注》(Jan Jaworski)、德译杜甫诗(E. von Zach)、德译《楚辞》(F. X. Biallas 施润生)、《十七、十八世纪公教在中国文化演进中的地位》(Henri Bernard)。

^② 1949 年后《华裔学志》迁至日本,先在东京,后在名古屋南山,在那里设立了研究所,继续出刊,主编人是圣言会中的汉学家布什博士(Heinrich Busch)。至 1954 年,在东京出版了《学志》的第 14、15 卷。1955—1963 年在名古屋出版了 16—22 卷。1963 年《华裔学志》应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的邀请迁至该校的东亚研究所,仍由布什主编。1972 年起,《华裔学志》归入西德北部圣言会所办的人类学研究所,作为该所的出版物,并在圣·奥古斯丁设立了自己的编辑部、图书馆、会议厅和接待厅等学术活动场所。现已出至 35 卷。《华裔学志》自始至终保持原订宗旨,所刊均为汉学研究,包括文学、艺术、语言、历史、哲学、宗教等,内容以古代为主。目前编辑者都是国外的汉学家。《华裔学志》成为德国各大学和欧洲汉学家的重要学术刊物。张至善:《〈华裔学志〉庆祝创刊五十周年》,《辅仁校友通讯》,第 7 期(1986, 9),第 2—3 页。

仁的国学，归根到底是看学术成果。辅仁从国学教育、国学研究到成果的出版，形成了一个合理的体系，它的持续的努力奠定了辅仁在国学领域的地位。1937年5月，当时已经是中国教育界权威的胡适暂作辅仁董事会主席，参观辅仁之后，在日记里写下的评价是“甚有进步”。^①

^①《胡适的日记》下，第567页。

第六章

三十年代教会大学的国学热

燕京和辅仁在国学教育研究方面的发展，显然是教会大学中比较突出的例子。不过，这一时期其它教会大学，特别是历史比较长、发展已具一定规模的，如齐鲁大学、金陵大学等，国学教育和研究的进展也颇为可观。事实上，30年代初期到抗战爆发，中国的学术领域中曾出现过自民国以来的相对繁荣时期，一些教会大学也终于从徘徊于中国学术主流的边缘，进而成为推波助澜的角色。

一、潮流和压力

北伐以后，国民政府控制了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大多数教育比较发达的城市都在南京政府管辖之下。蔡元培出任大学院院长，锐意整顿高等教育，虽然进展得并不顺利，但国民政府替代了北洋军阀，对教育的控制和管理都有所加强。

1929年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提出教育宗旨的同时，制定了8条实施方针。其中第四条规定“大学及专门教育，必须

注重实用科学，充实学科内容，养成专门知识技能，并切实陶冶为国家社会服务之健全品格。”^① 1929年公布的《教育设施趋向案》中提出：“大学教育以注重自然科学及实用科学为原则。”1931年在《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中规定高等教育“应发挥学术机关之机能，俾成为文化的中心”。^②

国民政府比较强调实用科学，一则因为中国科技落后，经济衰落；二则 1922年学制颁布以来，大学设校的限制放宽，导致设校过滥，系科比例失调。因此，要控制文法科的发展。但 20年代初以来文科的发展，到 20年代末 30年代初，已经形成了学术上的一些新气象。

首先是北京大学的国学研究继续发展。成立于 1922年的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成为国学研究的中心。据 1927年的记载，受聘为国学门导师的有王国维、陈垣、铤和泰、伊风阁^③、陈寅恪等。郑天挺、容庚、罗庸、商承祚、张煦、魏建功等后来的著名学者当时都受教于北大。国学门在出版刊物如《国学季刊》、整理明清档案资料、进行考古调查、收集古籍、编纂学术工具书等方面颇著成效。国学门的师生还走向社会，收集民间歌谣、着手方言调查和风俗调查。^④ 30年代，北大文科研究所取得进一步的成就。历史学方面孟森主持的明清史料整理室，购入了清内阁大库所藏有关明清史档案 60余万件。自 1933年开始对这些史料进行系统的整理、

① 《第一次中国教育年鉴》(上),第 16页。

② 《教育法令大全》，世界书局 1933年版，第 3页。

③ 铤和泰，俄国梵文学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来华，任北京大学梵文教授，后为哈佛燕京社研究员。伊风阁 (Ivanov, Aleksei Ivaovich, 1878)，汉学家，首任苏联驻华大使馆汉文参赞。从事西夏文字和文化历史研究，所著的《西夏国书说》即发表在北大《国学季刊》第一卷第四号 (1929年 12月)上。

④ 萧超然、沙健孙、周承恩、梁柱：《北京大学校史》，第 148—152页。

研究和刊印工作。马衡主持的考古室收藏了大量古器物。语言方面设有语音乐律实验室，对全国的方言、古代音韵等开始了开创性的研究。文史哲研究成果不断问世，孟森、钱穆，汤用彤的许多著作都在这一时期出版。^①

清华这一时期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1925年吴宓在清华主持筹建国学研究院，宣称建院宗旨约分三层：“（一）值此新旧递嬗之际，国人对于西方文化，宜有精深之研究，然后可以采择适当，融化无碍；（二）中国固有文化之各方面（如政治、经济、文学、哲学）须有透彻之了解，然后于今日国计民生，种种重要问题，方可迎刃而解，措置咸宜；（三）为达上言之二目的，必须有高深学术机关，为大学毕业及学问已有根底者进修之地，不必远赴欧美，多耗资财，所学且与国情隔阂。”吴强调说：“所谓国学者，乃指中国学术文化之全体也。”^②到1925年6月，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被聘为教授，李济任讲师。清华国学研究院一时声名远播。北伐之后，清华进一步改革。冯友兰回忆说：“1928年南京国民党政府的政权达到北京的时候，派罗家伦为校长，接收清华。清华也乘机把这些残余（留美预备学校的制度），一举扫除，成为一个正式的国立大学。”冯友兰评论说：“1928年以后，北大和清华是旧中国教育界比较有影响的大学。‘五四’运动的‘科学与民主’的口号，在这两个大学中，得到了比较具体的实现。”^③

国民政府还扩建新的国学研究机构。1928年国民党政府决定成立中央研究院，蔡元培担任院长，傅斯年被聘为历史语言所所

① 如孟森的《明元清系通纪》、《清初三大疑案考》；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近三百年学术史讲义》、《秦汉三国史》；汤用彤关于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的著作等。

② 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9—30页。

③ 冯友兰：《‘五四’前的北大和‘五四’后的清华》，（1962年8月于海拉尔）《文史资料精选》第二册，第379—381页。

长。傅斯年在报告中明确指出了创办历史语言所的目的和方向：“中央研究院设置之意义，本为发达近代科学，非为提倡固有学术。所以，历史语言方面的研究方向应是：扩充材料，扩充工具，以工具之施用，成材料之整理，乃得问题之解决，引出新问题，更要求材料与工具之扩充，如是伸张，乃向科学成就之路。”傅氏号召要“以历史语言所为大本营在中国建筑‘科学的东方学正统’”。^①这一号召颇有鼓舞力，与中国学者的民族意识一拍即合。在很短的时间内聚集了不少的运用现代学术工具的中青年学者，很快在整理清宫大内档案和考古发掘方面打开局面。^②

这些研究活动在经费上还得到以庚款为背景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The Board of Trustees of the China Foundation for the Promotions of Education and Culture)的资助。1930年蒋梦麟就任北京大学校长后，为解决财政困难，1931年和“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签订了“合作研究专款”的协议。根据协议，1931年到1935年间，每年双方各出资20万元用于延聘教授、充实图书设备、设置奖学金等。1931年度中基会还拨款支持历史语言研究所语言实验和考古作业。^③

事实上，不仅上述有全国影响的大学和研究所，诸如中山大学、国立山东青岛大学等地方上的国立学校的教育事业都有所发

① 《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一本第一分，第10页。

② 李济：《傅孟真先生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载《革命人物志》，台北，第13集；《傅斯年》，聊城师范学院历史系等编，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48页。

③ [日]阿部洋著，钟启泉译：《孟禄与中国近代的教育》，《外国教育资料》，北京，1996年第1期，第19页。

展,国学领域教学和研究的进展也同样显著。^①

仔细考察起来,当时的国学研究颇有几分类似今天人们所说的“国学热”。虽然真正在大学里学习文、史的人并不多,如北京大学 20 年代国文系和史学系的学生通常只有 3 到 5 名。^②但是在五四以来民族主义不断高涨的形势下,对任何一所大学来说,没有像样的国学系科就等于不重视中华文化,所以,研究国学也成为大学在社会上立足并赢得名望的重要条件。^③

国立大学的发展,显然给教会大学带来了很大的竞争压力。同时,立案以后,教会大学至少在名义上被置于国民政府教育部门的管辖之下,结束了教学内容和学术方面完全自行其是的时代。其教育业绩也为国内教育界所推崇。郭秉文说:“教士之视教育,初不过为宣传宗教活动之一种。然能以牺牲的精神,切实的方法,惨淡经营,始终不辍。以简陋之基,亦渐应时势之需求,进而为高远之计划。其获今日之成绩,盖有由也。”^④正其如此,教会大学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希望被看成是中国人自己的大学。毕业于东吴大学,后来成为著名教育家的沈体兰在 30 年代初说:“基督教

① 黄福庆:《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国立中山大学(1924—1937)》,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 1988 年版,第 142—148 页;山东大学校史编写组:《山东大学校史(1901—1966)》,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 1986 年版,第 61—67 页。

② 《北京大学校史》,上海教育出版社 1981 年版,第 155 页。

③ 当时 13 所国立大学中除了同济大学和暨南大学之外,其它如中央大学、北平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平师范大学、武汉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暨南大学、浙江大学、四川大学等都设有文史哲三系或文史,或国文一系。黄建中:《十年来的中国高等教育》,载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书目,第 82 种《抗战前十年之中国》,第 506—507 页。

④ 郭秉文:《五十年来中国之高等教育》,转白何炳松:《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大学教育》,刘寅生等编校:《何炳松论文集》,商务印书馆 1990 年版,第 414 页。原载《商务印书馆创立三十周年纪念刊》,1931 年 9 月。

学校在现代中国的教育界中，是处于一个先进者的地位，这话是无可怀疑的。在过去的 60 年内，教会学校一方面既做了新教育的提倡者，而另一方面又做了教会事业的文化基础。基督教学校已清楚地向我们表示：借着近代的教育设施，它实在有改造社会和振兴国家的可能性。它已根据基督教的中心旨趣，建造了各级基督教学校。它树立了一种教育效率的标准。这种标准，到了近代才为其他官立和私立学校所竞争。”沈在肯定教会学校地位的同时，充分意识到它面临的挑战。他指出：

“岁月如流水一般的过去了，中国的物质环境已起了剧烈的改变，于是基督教学校就当重新研究它在教育界的地位，并需作种种必要的变迁，以求适应它的新地位。……

就内部而论，它希望从一个差会的学校，变成一个教会的学校，又希望从一个教会的学校，变成一个基督教的学校。换一句话说：它希望从一个外国人的和教会性质的学校，变成一个中国人的及平信徒的学校。”^①

沈当时是东吴大学的校董，毕竟对教会学校有真切的了解，他看出教会学校在竞争中的危机，从教会学校演进历史的反思中，明确地认识到教会学校当前面临的本土化问题就是要从教会学校变成中国人的学校。在教会教育方面有很大影响力的美国信徒团体则对教会大学提出了更明确的看法。1933 年美国平信徒调查团发表了对中国、日本及印度教会大学的调查报告。报告认为基督教大学本来有两个目标，“一是传扬基督教；一是辅助青年们得到高

^① 沈体平（沈做过解放后华东教育部副部长）《基督教学校在中国教育界的地位》，见《教育季刊》第八卷第四期，1932 年 12 月，见李楚才编著《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料——教会教育》，第 435—436 页。

等教育。”报告认为现在要从第一个目标转移到第二个目标。它肯定了“一般富有思想和开通的领袖，渐渐地萦念到发展一种良好的大学教育上去了。他们所要发展的大学：第一，当使成为研究社会问题的优美工具；第二，当保存原有文化的最优美点；第三，当使之成为西方文化上所能贡献的最优美点之模范场所；第四，当培养青年男女，使之对民众能作有用的服务工作。”报告要求学校一定要注意提升高等教育的水准。^①

教会大学当时在这方面已经开始作了一些努力。立案以后的金陵大学、齐鲁大学、东吴大学、沪江大学、华中大学、岭南大学、华西协合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之江文理学院及福建协和大学都分别设有国文或历史等专业。只有规模最小的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尚没有国学系科。^②

但是国学教育和研究的开展，除了教会大学当局的认识之外，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学校的经费来源。教会大学经费并不像想象中的那样充裕。鲁珍晞指出 20 年代教会大学建设强大的中国语言文学系的努力大部分没有成功。^③除了别的原因之外，经费也许是个主要困难。20 世纪 20 年代末，在以美国股票市场崩溃开端的世界经济大萧条中，教会大学在资金筹募方面更遇到一定的困难，要进一步平衡大学中国学和科学的教研只能是做到哪里算哪里。

^① 美国平信徒调查团，《基督教大学的目标与其重心点的转移》，《教育季刊》第九卷第一期，1933 年 5 月，见李楚才编著《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料——教会教育》，第 146—147 页。

^② 载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书目，第 82 种《抗战前十年之中国》，第 513 页。

^③ 鲁珍晞著，曾钊生译《中国教会大学史》，第 484 页。

了。^①

二、国学成为研究重点： 与哈燕社有联系的其他六所大学

正如社会发展进程中，偶然性的因素能加速或延缓历史的运动一样，1928年，教会大学，至少是部分教会大学终于得到了一次发展国学研究的机会。当年12月，前面提到过的霍尔基金会提出了该组织美国国外教育基金的分配方案。在其决定资助的名单中，包括了中国的6所教会大学。在第一笔公开分配的基金中，除了前面提到的燕京大学获得100万美元之外，岭南大学获70万，金陵大学30万、华西协和大学20万，齐鲁大学15万，福建协和大学5万。这对教会大学的财政来说，无疑是山重水复后的柳暗花明。另外，霍尔基金的其余640万元，其中450万用于哈佛燕京社的一般性开支，余下的列为限制性开支的190万元中，上述6所教会大学可按比例获得一定的款项。^②对教会大学的国学研究来说，这笔限制性开支特别重要。因为，所谓的限制性开支，是这笔钱原则上必须用作中国文化教育和研究的专项经费。

但是，该项经费的拨发是有条件的。一是基金必须放在美国，获得利息后按年拨发；二是必须专门用于国学教学与研究；三是

^① 1935年以后，国民政府开始对办理“优良”的32所私立高校（1936年扩大到40所）给予经费补助。除圣约翰之外的十二所新教大学和辅仁大学都列名在内，但一则僧多粥少，总数为72万元法币，二则“注重理农工医之发展”，可能对国学系科的帮助有限。载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书目第82种，《抗战前十年之中国》，第515—516页。

^② 其中燕京可获50万美元，岭南、金陵、华西各30万，齐鲁和福建协和各20万，还有10万归印度农业学校。联董档案缩微卷，184—3279，第1146页。

在经费使用方面要接受哈佛燕京社的监督指导。这类似于今天在中国已经很盛行的专项学术基金制度。换言之，如果教会大学在国学研究和教学方面没有具体计划和行动，这笔钱还是拿不到手的。这笔研究经费对教会大学很有吸引力，以齐鲁为例，如果按年拨发，这笔款子接近文学院常年经费的两倍。^①因此，为了争取这笔经费，各有关学校纷纷制定国学研究的规划，一批教会大学国学研究机构就此问世。到抗战前夕，这些学校的国学研究出现了很热闹的局面。

应该指出的是，通过经济纽带，哈燕社和一批教会大学建立了在国学教育与研究方面的一种合作关系，但这并不是严格地就某一个学术问题共同参与研究，而只是致力于同一个学术方向。在这种关系中，正如我们将在下面看到的，哈燕社虽然居于主导地位，但教会大学有很多的自主权。具体的运作方式是，教会大学必须就每年中国文、史、哲方面的教学和研究制定计划和预算，在每年 11 月前送达在哈佛的哈燕社。哈燕社托事会议将对各校报告进行审议，最后投票表决哈燕社对这些教会大学工作的看法和拨款数额。哈燕社特别强调受资助的大学必须有效地把经费用于提高中国语言、文学和历史的教学与研究水平。它最经常性的工作就是对经费的使用提出建议和进行监督。^②在这种模式下，教会大

^① “齐大文学院改过计划草案”，《齐大校闻》第 2 期，1950 年 6 月 10 日，齐鲁大学档案，山东省档案馆藏（以下简称“齐档”），J109—05—15。

^② 1929 年 7 月 2 日，哈燕社 Howard C. Hollis 在给金大的信中解释哈燕社政策：“基金会托事们认为，这笔钱说来应该用在加强中国语言、文学和历史各系，每个受助学校在这方面的工能能有经费。基金会不希望用这笔钱来替代这些系以前的费用，以使这些系以前的费用被用于其它系。今年基金会不想用明确的限定来代替以前通信中所谈到内容，但是它注意到可能出现的与原来政策不一致的危险。”联董档案缩微卷，214—3631，第 13 页。

学在国学教研方面接受哈燕社的指导，哈燕社也派人到各大学考察。应该指出的是，哈燕社和中国教会大学对这个计划到底怎么进行，开始时除了大方向外，彼此都不是十分明确的。大约到 1933 年以后托事部的目标才变得越来越具体。1934 年叶绥夫出任哈燕社社长后，学社的管理逐渐加强。^① 当时，哈燕社为提高“被中国教会大学可悲的忽视的中国文化研究”而设计的办法是，把 7 所（后来加上华中大学）教会大学分为两类，燕京大学是一类，致力于学术研究和硕士研究生的培养；其它 6 所大学为一类，都以加强文史哲本科教学为主。优秀的本科生毕业以后，先送到燕京上研究生，再选送到哈佛深造，以加强各大学师资的培养，从长远上改变国学教学的面貌。^② 这里面有一个前提，即在中国自身历史文化的研究中，中国学者的方法比较落后，需要到哈佛接受训练。这个前提不免令中国学者有些尴尬。但当时的学术合作，包括国立大学都是在这个前提下推进的。另外，哈燕社强调燕京以外的其它大学以教学为主，从美国对各类大学的分工标准来看可能是无可厚非的，但在中国这些教会大学已算是老资格的高校了。因此在这一点上，双方看法有相当差距，以致后来屡有磨擦。不过哈燕社也表示，如果由国民政府拨经费在有关高校培养研究生，它是不能表示反对的，所以后来金陵和齐鲁都突破了 this 限制。

无疑，哈燕社对教会大学的国学研究是有影响的，但这种跨国的文化合作一方面是史无前例的，由于国情不同，双方对教育

^① 1934 年夏陈裕光致哈燕社的年度报告，见联董档案缩微卷，214—3632，第 241 页；1935 年 12 月 6 日叶绥夫致陈裕光信，联董档案缩微卷，214—3632，第 259—260 页。

^② 1929 年 3 月 14 日司徒雷登致陈裕光信，联董档案缩微卷，214—3631，第 136 页；1933 年 5 月 26 日 George H. Chase 致陈裕光的信，联董档案缩微卷，214—3632，第 171—189 页。

和学术的发展理解上有些差异。另一方面毕竟距离遥远，互相联络不很方便，哈燕社对这些学校的影响受到一定的限制。同时，哈燕社的资助只是为教会大学的国学教育提供了有利的外部条件，各校行政的态度和原来的师资基础对后来的发展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有些学校这种合作比较成功，有些学校的效果就差一些。但是，无论何种情况，这种以定向基金为杠杆的合作，在不同程度上都推动了这些大学国学教研的进步。

金陵大学的中国文化研究所

金陵大学的国学教育和研究也许是除燕京之外的新教大学中最有成绩的。

金大国学教研的改革，在立案之前就有所动作。陈裕光当校长之后，各方面有进一步的发展。值得一提的是，金陵早期的校长福开森对中国古代文化推崇备至。1928年在金陵大学作演讲时，他告诫学生“不要重蹈过去重英语而轻国文的覆辙，要以英文水准高而国文水准低为耻。”认为学生只会讲英文而不会作国文是一种耻辱。^①以校长的身份这样强调中国文化，是会影响学校的方针的。

从1929年起，金人在美国霍尔基金限制性开支中另外获得30万美元的资助，指定用利息来补助中国历史文化教育。这笔收入多的时候达17,000多美元，少时1万美元上下。^②文学院久患经费不足之苦，有此机会，在中国文化的教育和研究方面，就可作长远计划。校长陈裕光认为金大虽是教会大学，但首先是中国的学校，中国人要研究中国文化，还要让外国人知道中国文化，所

^① 1928年7月25日，福开森向学生作演讲，见《金大校刊》民国18年6月25日，转自《金陵大学史料集》，第45页。

^② 咸宜档案缩微卷，214-3632，第205页。

以决定用这笔捐款，切实加强金大的国学教育，并办“一个像样的中国文化研究所”。^① 陈裕光对这项工作抓得比较紧。1931年他给哈燕社的报告中表明金大在国学教研两方面都已有所动作，一方面“通过添置有关中国文化方面的书刊，给教师和学生提供了更好的条件。大学中增加了中国学方面的新课程，高年级学生被鼓励开展研究，一些文章发表在去年6月开始出版的杂志上。”另一方面中国文化研究所成立起来，它的目的是：“第一，通过让所中人员一部分时间教授他们所擅长的研究领域的课程，以提高这些课程的水平（不包括研究生课程）；第二，为更好地配合学校的教育，让他们做有关中国文史的研究；第三，帮助提高文学院高年级学生和助教的研究兴趣；第四，通过提供研究条件和设备鼓励教师开展研究。”^② 陈裕光对哈燕社的方针了解得比较清楚，既重视本科教育，也注意到学术研究。实际上，比起教学来说，研究更容易取得看得见的成绩，金陵大学的中国文化研究所的成果也特别显著。

金大中国文化研究所是由陈裕光聘请校友、著名学者徐养秋负责筹建的。由于徐在外交部任职，又是中央大学教授，所以由李小缘襄助办理。这个中国文化研究所就成为金陵大学最早建立的一个科学研究机构。它实行科研与教学并重的方针，要求研究人员既致力于学术研究，著书立说，又要兼授本校文学院的课程，

^① 李永泰：《李小缘所长》，《金陵大学建校一百周年纪念册》，南京大学出版社，第155页。

^② 1931年8月陈裕光给哈燕社的信，联董档案缩微卷，214-3631，第171-173页。中文的中国文化研究所的章程是：（1）研究并阐明本国文化之意义；（2）培养研究本国文化之专门人才；（3）协助本校文学院发展关于本国文化之学程；（4）供给本校师生研究中国文化之便利。《金陵大学校刊》第75号民国21年12月5日及《私立金陵大学一瞥》，《金陵大学史料集》，第46-47页。

担负起培养人才的工作。因此，该所的研究员只有专任和兼任之分，没有不搞教学的所谓专职研究人员。而且专任与兼任，是按照研究时间多少来划分的。研究时间多于讲课时间约二倍以上者，为专任研究员，反之，则为兼任研究员。他们认为教学研究能够起到“相因而成，互相为用”的效果。本着以上方针，研究所除聘用本校教师担任专任或兼任研究员外，还积极从校外延揽人才。根据 1933 年的资料，中国文化研究所的人员大致如下：^①

姓名	教育和工作背景	职务
李小缘	1920 年毕业于金陵大学，曾在美国纽约州立图书馆学校和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深造，获图书馆学学士和社会教育硕士。	专任研究员
贝德士	Miner Searle Bates，美国人，1920 年英国牛津大学硕士、1935 年耶鲁大学博士，曾任金陵大学政治历史系主任、历史系主任。	兼任研究员
陈登元	东南大学文科毕业，曾任浙江中学教员，著有《中国土地制度史》、《荀子哲学》、《鸦片战纪》、《天一阁藏书考》等。	专任研究员
吴景超	清华大学毕业，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博士，世界书局《社会学刊》总编辑，任京内各大学教授。	专任研究员
吕凤子	历任南京、北京各大学国画教授。	兼任国画研究员

^① 《金陵大学学报》，第一卷第一、二期，第二卷第一、二期，第三卷第一期；“本期撰述人略历”李永泰：《李小缘所长》，《金陵大学建校一百周年纪念册》，第 155 页；章开沅：《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5 年，第 3—5 页。

王钟麟	日本东京高等师范文科毕业，曾任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讲师，河南新中华日报编辑。	专任研究员
刘国钧	金陵文学院毕业，美国威斯康星图书馆学科学毕业，威斯康星大学哲学博士，本校文科代理科长，国立北平图书馆编纂部兼阅览部主任。	专任研究员，图书馆长。
黄云眉	曾任宁波市立商业中学教员，金陵中学教员，著有《邵二云年谱》、《古今伪书考补证》等书。	专任研究员
雷海宗	清华大学毕业，美国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曾任国立中央大学副教授兼史学系主任，武汉大学史学系教授。	兼任研究员
商承祚	曾任东南大学讲师、中山大学教授兼任语言历史研究所主任、考古学主任，及清华大学讲师。现任本校教授。	专任研究员
徐益棠	巴黎大学博士，本校教授	专任研究员
杭立武	金陵大学毕业，英国伦敦大学政治学硕士。	兼任研究员
汪孔祈		兼任研究员
叶季英	国立中央大学教育学院艺术专修科毕业，编有《中国书画目录》等。	画学助理

黄玉瑜	助理
-----	----

从上述人员的教育背景来看，所中成员回国留学生居多，其中以留美学生占主导地位，国内大学毕业生次之。但自学成才如黄云眉，一生只上过两年学，由于在研究明史等方面成绩卓著，也被聘为研究员。这表明研究所能不拘一格，唯才是举。不过和燕京、辅仁相比，这些人员都属于当时的青年学者，已经成名的学者还不多。同时，文、史包括社会学三系的教师，并不都是研究所成员。如当时在金陵大学史学系任教的陈恭禄和王绳祖都未列名国学所。这和其它大学两块牌子，一班人马是有区别的，用现在的话说是个“科研实体”。他们不仅在自己所从事的研究领域中有所建树，同时，在他们的协助下，文学院在发展本国文化课程方面也得益非浅。由于都是学有专长、功底扎实的学者，他们上课深受学生欢迎。

金陵的国学研究所也出版刊物。1931年5月，《金陵学报》创刊，由李小缘负主编之责。学报主要是“发表师生研究及讨论学术之作品”，但也接受校外的投稿。学报对文字、文体及内容不拘一格，但“格式一律横行并用新式标点。”这在当时的刊物中也算是比较先进的。学报每年出一卷两期。最初文、理、农科的内容混在一起，很不方便。到1933年才分别出理科专号，农科专号及文科专号，但文科每年能占到一期。该刊也刊登校外来稿。当时国内著名学者如王重民、向达、闻一多、常任侠、陈梦家等都有文章在《金陵学报》发表。^①

金陵中国文化研究所还出版一种丛刊，是以研究所经费印行

^① 包仁娟，《中国文化研究所的成就》，《金陵大学建校一百周年纪念册》，南京大学出版社，1988年，第42—50页；王运来：《从金陵大学看中国的教会大学》，章开源、林蔚编：《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第260—266页。

的著作和古籍。战前这种古籍已经出版了十余种，如陈登原的《范氏天一阁藏书考》、《颜习斋哲学思想述》、黄云眉的《邵二云年谱》、《言今伪书考补正》、蔡桢的《词源疏证》、商承祚的《福氏所藏甲骨文字》、《殷契佚存》。文化研究所还出版了商承祚的其他有关考古学方面的论述，其中《十二家吉金图录》一书，列举了河南出土的 70 余件铜器的图像，其底版全部提供给河南省通志馆，作为编纂文物志之用。此外贝德士的《西文东方学报举要》也在战前出版。这些活动得到了哈佛燕京社的大力支持。^①

研究所最初确立了五个研究方向，即史学、哲学、对外对中国文化之研究、目录学、国画研究。从学报和丛书的内容来看，金陵中国文化研究所的研究重心也是以古代历史为主。但与燕京、辅仁不同的是：第一，南京一度是明朝的都城，因此明史研究的分量重一些。第二，金大的学报也有按现代分期法，可以划入中国近代史的内容，如对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天津条约的考订等。第三，室内考古研究。1933 年以后，关于考古的内容逐渐多起来。这个重点的形成多少也出于一种偶然。1934 年，金大的创始人、后任校董的福开森将他在中国 40 年来，耗费巨资收藏古物的一部分（约千余件）捐赠给金大文化研究所，作为教学与科研之用。这批文物对开展考古学的研究提供了良好的条件。此时，商承祚来校，以主要精力投入对福开森所藏的彝品、铭文和拓片的整理和研究，所以有《福氏所藏甲骨文字》等著述问世，并为福氏编写的《历代著录画目》一书作了校订。

^① 金大的刊物称：“1931 年 10 月，哈佛燕京学社干事博晨光先生由北平南下调查该社附属机关。10 月 21 日抵京，参观本校前组织之研究所，并详细分别与各研究员谈话，研究各计划之工作纲要，甚为诚意。并谓如有新计划或十分巨大之稿本，尚可格外请款，彼极愿从中赞助之。”《金陵大学校刊》第 75 号民国 21 年 12 月 5 日及《私立金陵大学一览》，见《金陵大学史料集》，第 46-47 页。

至于在治学方法上，新考据之风从北京到南京，并无多大的区别，因为当时中国学术的中心在北京，许多学者都通过不同的途径，接受过这种治学方法的熏陶。如商承祚自幼承家学酷爱古文物及文字，1921年北上天津“拜上虞罗振玉先生为师，在他的指导下钻研甲骨文、金文。”商还曾得到王国维指点。1923年左右还进北大国学门当研究生。^①在学术上从选题到研究，受到这些国学大师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即使从其它大学毕业，学风所及，是一个时代的特征。

研究所在这一时期还加强了图书馆建设。金大对图书馆一向重视，早在20年代初，农业经济系即成立农业图书研究部，收集中国古今农业书籍及各种图册，编纂《先农集成》及《农业索引》，为收集、整理我国农业文献，做了大量的工作。图书馆对地方志的收藏，更是不遗余力。金大中国文化研究所成立后，美国人贝德士是图书馆学专家，李小缘和刘国均都是留美学图书馆专业的，经费又充裕，所以对图书资料的建设和整理抓得更紧。文化研究所附设的博物室藏有殷墟甲骨数百片，包括《老残游记》作者刘鹗陪嫁女儿的甲骨文。这里值得一提的是馆藏名画真迹，如海内仅存的南唐画家王齐翰（晋卿）所作的《挖耳图》，图上有北宋、南宋至清末各代名家的题跋。^②1934年时，图书馆能容250人，藏书计有中文书10万余册，外文书2万余册。1935年获国民政府奖助，财政部拨款30万元，作为建筑图书馆的经费。^③金大图书馆对自己的收藏很为自豪，说是“虽不能普置善本，而元明刻本，清代殿本，及家刻精本，一律略备”。1947年时藏书有408,401

① 《商承祚自传》，《社家》第一辑，第315—316页。

② 陈裕光：《回忆金陵大学》，《金陵大学建校一百周年纪念册》，第18—19页。

③ 沙兰芳：《金陵大学沿革》，《金陵大学建校一百周年纪念册》，第28页。

册。其中中文书除经、史、子、集共计千余卷外，地方志和丛书为大宗，计有地方志 2,000 余部、24,000 余册，丛书 200 余部，15,000 册。类书也不少，主要种类一一略备，共计 70 余种，5,000 余册。该图书馆对农书及动植物书搜集“尤为苦心，各种版本，广事罗致，其难得者，往往手抄以足之。”^①

金大的国学除了研究所活动外，还计划招收研究生。大约 1934 年，鉴于社会上建设中国本位文化的声浪高涨澎湃，华东基督教会希望金大能致力于中国文史方面高级人才的培养。同时，金大文科毕业生数十人也联名提出此类请求。文学院成立国学研究班，招收国内各大学文史哲专业毕业，有志于从事国学研究者入学。学制二年。聘请著名国学大家胡小石、胡翔东、黄季刚、吴梅等为指导教师。研究方法除上课外，主要自学，学生各认专题，导师给予指导。学生所定专题，经、史、子、集各门皆有，研究成果分小学、史学、文学汇编成刊。该研究班举办两期，毕业生有 30 人，古词典学家沈祖棻、语言学家殷孟伦、博物馆学家曾昭鹗等都是该班毕业生。该班在学术界产生良好影响，是中国东南各大学培养研究生最早的例子。1935 年，文学院根据教育部颁布的大学研究所暂行组织规程，在国学研究班的基础上，筹备成立文科研究所史学部及中国文学部。1936 年，教育部核准成立文科研究所史学部。文科研究所所长由院长担任，史学部主任为李小缘。因抗战爆发，至 1940 年才正式招收研究生。这和哈燕社最初的设想是有分歧的，但鉴于金大的发展情况，哈燕社最后表示了支持。

除了中国文化研究所，文学院的教师各据所长，开展专题研究。这个时期有多种著作出版，如刘继宣的《南洋拓殖史》、陈恭禄的《中国近代史》、《日本史》，王绳祖的《欧洲近代史》等，均

^①《金陵大学的图书设备》，《金陵大学史料集》，第 232 页。

在全国有些影响。虽然这些著作，有些并不属于狭义的国学范围，但外国历史的研究，对深入研究中国学术，是有参照作用的。^①

总起来看金大比较正规的国学研究，虽然起步较晚，但发展较快，^②是最早被国民政府授权招收研究生的大学之一。比起其它大学来说，金陵的国学研究发展得比较平稳有几个原因：一是学术组织和领导比较稳定。陈裕光一直当校长，李小缘作为中国文化研究所的组织者和管理者“经历了从建所到结束的全部过程。”金大的学术组织和效率也受到哈佛燕京社的赞扬。^③二是经费比较充裕。除了国民政府的补助之外，哈佛燕京社的经常性资助使学者能在一个比较安心的环境中从事研究。金人是比较严格地按哈燕社的要求来使用专项经费的。^④最初的几年，由于有利的汇率，金大中国文化研究所的钱一直是有积余的。^⑤当时研究所的骨干商承祚在自传中说过：

“1933年秋，金陵大学拟聘我去南京任教授兼中国文化研究所专任研究员。当时在北京因忙于教书，不能专心致志从事研究。金陵大学请我，月薪280元（我在北京月薪500多元），专搞研究，编书写文章，不必上课。我愿意干，于是就应聘了，从事于甲骨文、金文及古物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由于生活安定，经费充足，心情

① 《南京大学校史》，第501—502页。

② 学报的出版是一个学校学术发展的重要标志。《燕京学报》1927年出版，《辅仁学志》1928年出版，《金陵大学学报》在1931年5月出版，所以说国学研究起步比这些大学要晚。

③ 哈佛燕京社社长1945年12月在给齐鲁大学校长吴克明的信中，对金陵大学的国文系及课程设置给予了很好的评价。见齐档：J109—01—102。

④ 联革档案缩微卷，214—3632，第241页。

⑤ 联革档案缩微卷，214—3632，第201页。

舒畅，我的研究工作进行得相当顺利。”^①

商自认为一生中这一时期研究成果最多，一方面是个人的学术积累已经到了一定程度，另一方面专心致志是很重要的因素。这和金陵当时致力于发展国学研究，以及中国文化研究所提供的学术环境是分不开的。通过一些学者的努力，金陵大学在全国国学研究界终于取得了一定的地位，作为教会大学有了可以和其它著名大学相提并论的国学系所了。

齐鲁大学的国学研究所

20 世纪 20 年代末，地处山东的齐鲁大学也感受到了国内学术潮流的变化。当年在齐鲁的杨懋春说“当时大学内设立国学研究所，请国学大师如顾颉刚之流研究国学，乃是很流行的学术界风气。”^② 实际上齐鲁大学大张旗鼓搞国学，积极推动国学教育的直接动因也是为了争取拿到霍尔基金。齐鲁大学是由美国、英国和加拿大三国的教会联合创办的，其经费由设在纽约的三国 14 个基督教差会联合托事部提供。1928 年 10 月霍尔遗产托事会分配给齐鲁 15 万美元，但必须用于医学院的发展。另外在由哈佛燕京社掌握的限制性开支中，齐鲁可以获得 20 万美元的基金用于中国文化课程和学术研究。当时齐鲁向国民政府立案久而未成，文学院的师资和图书馆藏书量是问题的症结之一。从校方来讲无疑非常需要这笔经费来帮助学校发展，为了符合哈燕社拨款的条件，国文系教授栾调甫提出组建国学研究所，利用这笔经费延聘师资，开展研究，据钱穆说顾颉刚当时也参与了这一创举。^③ 齐大当时的代

① 《商承祚自传》，《社家》第一辑，第 317 页。

② 杨懋春，《齐鲁大学校史》，见《山东文献》，台北，第九卷第四期第 85 页。

③ 顾颉刚：《顾颉刚年谱》，第 294 页。

校长林济青支持这一计划，于 1930 年秋成立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①，1931 年起由哈燕社每年资助约 8947 美元。这样，通过经济纽带，哈燕社和齐鲁也建立了在国学教育与研究方面的一种合作关系，其直接的结果是推动了齐鲁大学的国学教研。

国学所甫经建立，自学成才的墨学专家栾调甫做第一任所长。齐鲁大学增聘了一些人充实了文学院，许多学者列名国学所，由哈燕社经费支付工资。1934 年的国学所年度报告中提到的总共有 19 人：^②

姓 名	教育背景	课 程
舒舍予	毕业于北平师范学校，留学英国伦敦大学。国文系教授。	文学概论、文艺思潮、欧洲文艺思潮之变迁、但丁研究、小说作法等。
慈丙如	美国芝加哥大学哲学博士，国文系哲学教授。	上古思想史、美学、逻辑学、西洋哲学史、思考与教育等。
郝立权	北京大学文学士、国文系主任。	文字学、音韵学、文选、庄子、辞赋选、陆士衡诗等。
齐树平	北平农科大学毕业，故宫博物院古物馆科长，国文系研究教授。	国学大纲、金石研究。

① 许慕贤：《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简介》，《济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第 152 页。

② 齐档，J9—3—3，第 40—50 页。

周干庭	日本东京弘文学院毕业，前清拔贡，国文系教授。	古今文选、唐代诗选。
张锡嘏	美国爱欧瓦大学理学硕士，社会学系主任。	社会学原理、乡村工作、农村经济。
张立志	燕京大学硕士，历史政治系助教。	中国通史、隋唐史、宋元史。
胡道远	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硕士，社会学系讲师。	经济学、商业组织及管理。
范迪瑞	齐鲁大学文学士，社会学系助教。	教育概论、都市社会学、农村社会学、家庭社会学、谱系学。
皮松云	美国梅阿梅大学毕业，社会学系讲师。	货币与教育。
赵振元	北大文学士。	清代学术史。
栾调甫	自学成才，国学所所长。	名学、墨学。
胡立初	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科学业，国学所助理研究员。	古今文选。
彭翔生	山东高等学堂毕业，国学所助理研究员。	
马彦祥	复旦大学文学士，国文系副教授。	戏剧原理、文艺思潮、文学概论。

张维华	燕京大学硕士，历史政治学助教。	中国沿革地理、近世中欧交通史、中国史学通论。
余天麻	美国克拉克大学哲学博士、任社会经济学系主任。	人类学、考古学、社会演化史、社会学。
明义士	(J. M. Menzies) 主要从事甲骨之研究。	
王献唐	山东省立图书馆馆长，国学所名誉讲师。	山东碑刻。

其中有外籍教师 3 名，留学美国 3 人、日本 2 人、英国 1 人，9 人毕业于国内大学，1 人自学成才。这个师资构成比燕京相去较远，与金陵相比也有一段距离。一方面是文史专业的国学人才较少。其中当时比较著名的有老舍、马彦祥、栾调甫和王献唐等。但老舍、马彦祥以文学和戏剧为主，王献唐实际并不参与学校工作。另一方面真正从事国学研究的人知识结构陈旧，受过系统的新方法训练的只有张维华等个别人。因此，齐鲁国学师资的弱点是比较明显的。另外，齐大的国学所并非是一个独立的研究机构，除了个别助手之外，几乎包括了文学院的全部教师，国学所实际上成了原来文学院的一个教学和研究的组织机关。

这时国学所的重点之一是要提高学生的国学程度，课程设置是关键所在。从 1934 年的报告来看，齐鲁在这方面作了不少努力，虽然以现在的标准看还是缺乏必要的系统化和多样性，但“教授已切实讲授研究国学之基本知识”，国学系学生人数增加，其它系选修国学的也较以前增多。^①

^① 齐鲁大学文学院国学研究所 1934 年报告书，齐档，J9-3-3，第 2-9 页。

比较显著的变化还是在国学研究方面。这一时期，栾调甫在研究规划方面出力很多。栾本人虽未上过大学，但对《墨子》颇有研究。曾在《东方杂志》发表过《谈梁任公墨经校释》、《梁任公五行说之商榷》，引起梁启超的注意，被称为海内研究墨学第一人。后来给齐大文学研究会的同学讲过“墨子的物理”，并在1925年由学生荐举，白文学院聘作国文系的教授。在1931年10月哈燕社于北京召开的有关大学的国学研究会议上，栾认为一个大学的声誉在于能否培养学生成为专门人才，能否在学术研究上具有特色。他把齐大与其他5所受哈佛燕京社资助的大学比较后，认为山东是齐鲁故地，齐鲁文化是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齐大有责任研究齐鲁文化，而且有地理、材料方面的优势，是其它学校所不可比的。因此栾把齐鲁文化确定为国学所的研究范围。^①栾的看法当然是有道理的，问题在于用什么样的方法做什么样的题目。

从1931年到抗战爆发，国学所出版了几种书刊，其中《国学汇编》、《齐大季刊》是两种主要刊物。另外已经成书出版的有《沈休文诗注》、《谢宣城诗注》、《公谷研究》。从书刊内容来看，当时齐鲁的研究成果有几个特色。第一，绝大部分是校订整理古籍和大量的考证，如历代郡县沿革与河道变迁、山东的石刻。《国学汇编》是竖排本的线装书，上面所登几乎全部是考据文章。《齐大季刊》主要也是考证。分量不多的专题论文，也集中在先秦诸子百家和古代的音韵、诗论方面。^②第二，国学研究所也注重当代中国文化的探讨。老舍在国学所时期计划做的“文艺批评”、“小说作法参考”，马彦祥的“清末上海戏剧”都属于这一范围。不过，

^① 齐档：J109—03—3。

^② “齐大国学所1932—1936年出版书录”，见齐档J109—01—99，第60—64页。

这类现代题材的数量相当少，多数一直没有出版。值得提出的倒是齐鲁对甲骨文的收藏和研究，经过白广文书院以来美国传教士的积累和加拿大传教士明义士的扩展，已经有了相当的基础。^①

明义士（James Mellon Menzies, 1885—1957）是加拿大传教士，1910年受加拿大长老会派遣，到河南传教。1914年调彰德，即今天的安阳。安阳是商朝古都，地下文物丰富。明义士对中国文化有浓厚的兴趣，开始搜求中国历代文物，特别是甲骨。他是学者身份考察安阳小屯“殷墟”的第一人。^②1927至1928年，明义士为避军阀混战到天津，后在北京燕京华文学校教书，并从事中国古代史的研究。1928年明义士利用回国休假，参观印度等国的考古工地，并参加了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威廉姆博士主持的发掘工作，获得了科学考古方法的训练。1930年回到安阳。1931年结识正在安阳发掘的中国著名学者李济。1932年—1937年，任齐鲁

^① 1935年报告中叙述了当时正在进行中的研究有慈丙如：中国古代法家思想之发展及其影响；齐树平：山东石刻；周下庭：山东土话与古音异同之研究；张维华：齐长城考；栾调甫：中国文字之研究；胡立初：齐记考述；彭翔生：邓析子校正；明义士：商代甲骨研究导言、商代王妃世系考、殷墟卜词后编、殷墟卜词类考、卜词中商代之战争、商代器皿形式考、齐大古旧物室录簿、中国初时之美术、殷墟卜词文字索引、殷墟卜词考释。当时出版完成的项目有：（1）郝立权：沈体文诗论四卷，载于《齐大季刊》第3、5合期。（2）明义士：汇印聂克逊先生收藏青铜十字序，汇印聂克逊先生收藏青铜十字图和青铜十字图表、铜十字分部编次附索引表、马可波罗时代中国的基督教。（3）彭翔生校录：牟庭同文尚书，山东省图书馆出版。（4）郝立权：牟庭淮南子校正，牟庭韩诗外传校正、谢灵运年谱。（将出版）（5）张维华：明辽东边墙建置考，《禹贡》，3卷第1期，葡萄牙第一次来华使臣事迹考，《历史》，第1卷，第5期。（6）马彦祥：清末上海戏剧。（7）中国初时上帝，河南季刊，1935年。出版物有《齐大杂志》，《齐大半月刊》、《国学汇编》，齐档J9—3—3，第2—9页；齐栏，J109—3—11。

^② 方辉：《明义士在华期间的文物收藏及其对中国考古学的贡献》，宋家钰、李巍主编：《加拿大传教士在中国》，北京，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第259页。

大学文学院教授，讲授考古学通论和甲骨学课程。这使齐鲁成为中国大学中讲授现代考古学较早的大学之一。明义士在这一时期的著作相当丰富。^①在甲骨著录、辨伪、缀合、断代及教学方面作出了突出成就，在中国和欧美学术界赢得一定的声誉。中国考古学界著名学者李济称明义士“适当的职务与他的考古天才有机地结合起来，为他在外国学术界对甲骨文研究作出特殊贡献开辟了道路。”^②

对齐鲁大学来说，这一时期文史研究的成果是空前的，但从总体来看，国学所的研究传统学术的色彩过于浓重。学术研究停留在“汇集诸家校注，纂为集解”，理论分析和抽象几乎没有，当时出版的《国学汇编》基本上未脱这种学术路子。1936年以后，国学所在人事上有一些变动，在研究方面还是一仍其旧。^③这种陈旧的研究方法与结果当时还没有引起哈燕社方面的注意。1936年2月，哈燕社制定了协调与哈燕社有关教会大学关系的计划，希望在这些大学中作一些分工，以免重复劳动，浪费资源。该计划要

① 在齐鲁时期，明义士著有：1932年，《商代文化》，《齐大季刊》第一期；《商代之文化》，北平《导报》。1933年，《甲骨研究初编》，齐鲁大学石印讲义；《表校新旧版殷墟书契前编并记所得之新材料》，《齐大季刊》第二期；《中国商代之卜骨》，刊济南扶轮社报告，又抽印本。1934年，《论汇印葛克逊先生所藏青铜十字押》，《齐大季刊》第三期。1935年，《柏根氏旧藏之甲骨文字》，《齐大季刊》第六期。1936年，《西周的美术》，《商代的文化与宗教思想》，《亚洲文会》杂志第六十七期。另据齐大档案J9-3-11载，1934年—1935年间，明义士尚有下述未完成的著作。《商代王妣世系考》（草稿）、《殷墟卜辞类考》、《卜词中商代之战争》、《商代器皿形式考》、《齐大古器物室录簿》、《中国初时之美术》、《殷墟卜辞文字索引》、《殷墟卜辞考释》。

② 李济：《安阳》中译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6页。

③ 当年梁调甫以专心研究文字学为口，辞去所长一职，调任山东大学教授，马宗乡接任所长。马是东北人，日本占领东北前是东北大学中文系主任。舒舍予1934年离开齐大国学所，1937年又被请回齐大作国文系主任，原来的主任郝立权则离开济南。张维华1935年到北京找顾颉刚，明义士同年回加拿大。

求齐鲁大学加强本科教育。就国学教育来说，就是注重本科课程，研究则并不重要。^① 1937 年哈燕社社长叶绥夫在访问齐鲁大学时反复强调了要注重本科的国学教育，要为所有学生学习国学打基础。但齐鲁文学院显然对此感到有点难以接受，国学所在给哈燕社的报告中，认为国学所的人员应该以一半时间教学、一半时间研究，而且保证要将研究成果传授给学生。^② 双方在齐鲁应该如何处理教育和研究的关系上已经产生了一些分歧。

不过国学所的建立，使得师资和设备都有改善。特别是齐鲁的图书馆在这段时期有很大发展。1935 年图书馆藏书已近 10 万册。哈燕社社长叶绥夫对齐鲁在图书资料建设上的成就给予很好的评价，并应校方要求承诺拨给 10 万元法币扩建图书馆，使图书馆同时还可以展览明义士收藏的甲骨。^③ 总的说来，战前齐鲁加强国学教研的努力，收到了一定的成效。

华西协合大学的国学研究

华西大学在 1926 年组建国文系。该系提出的目标是“发扬中国固有学术，兼收罗古物评确考证，贡献于海内外。”但华西向来重实用科学，国学教育和研究并没有受到相应的重视。30 年代初，为在政府教育部立案，华西于 1932 年正式成立文学院。1934 年担任文学院院长罗忠恕对华西重医、牙、理科轻视文科有过很尖锐的批评。他认为国家需要人才，不能单重“实科”，学生选择院系也要根据个人志趣，不能强其学习实科。大学应该充实文学院，“健全大学与提高学校地位”。他还认为中国文化在文学、美术、哲

^① 1936 年 2 月 3 日《哈佛燕京计划与中国基督教高等教育的相关计划》，齐档，J109—01—98，第 39—40 页。

^② 1936—1937 年度报告，齐档，J9—3—11，第 108—128 页。

^③ 齐档，J109—03—11

学及政治思想方面能对世界有所贡献，所以“今日学校之教育方针，不仅当尽量吸收西洋文化之优点，尤应发扬中国文化之特殊精神，如欲深究我国文化，则不能不多聘本国教授讲学。”^①

华西在注意到加强中国文化教研之际，也正是与哈燕社发生联系的时候。华西在哈燕社限制性基金中的份额与金陵大学相同，但每年得到拨款少一些。1929、1930 年实际收到一万美元左右。^②这些收入约占华西常年经费的 11% 左右。^③有了这些经费，华西在文史课程方面也下了一些功夫。1931 年华西组织了华西大学哈燕社委员会来监督和指导在哈燕社经费资助下的工作。华西计划开展三方面的工作，即中国学研究系（国文系）、中文图书馆和博物馆。中国学研究系的目的是使学生在中国历史、文化、文学、艺术和哲学方面打下良好的基础。图书馆的目的是提供文献资料如图书杂志，使教育的目标得以实现，使华西用科学方法的学者能进行有成效的研究。博物馆要以实物资料说明西部中国汉族和非汉族文化的发展。“用毕启校长的话说，大学博物馆将成为世界上研究华西汉族和非汉族文化最好的博物馆。”^④华西提出的这个计划比较切合实际。前两项是哈燕社对所有学校的要求，后一项因华西的古物收藏已经有很好的基础，哈燕社对此也比较赞同。

但是，四川是偏远的省份，要加强国学教育，或者说以现代的方法进行国学教育，不是一件很快可以见效的事。最重要的是人才和师资。学校也看到了师资的问题，1931 年学校的报告中说：

① 郭荣良：《文学院概况》，《华大校刊》，1949 年 4 月。

② 联董档案缩微卷，281-4424A，第 816 页。

③ 张奇谦：《哈佛燕京学社》，章开沅、林蔚编：《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第 146 页。《华西医科大学》，第 45 页；秦和平：《张凌高与华西协合大学》，未刊稿，第 6 页。

④ 《1932 年 7 月 1 日到 1933 年 6 月 30 日哈燕社在华西的工作报告》联董档案缩微卷，281-4424A，第 808 页。

“在这个西部省份一个几乎无法克服的困难是找到有符合要求的，有前瞻观念的国文教师，老一代的著名学者正在消逝，有水平的学者太少而需求太多。因此我们的教师大部分是兼职的。这在国立大学也是这样，他们和我们及其它学校分享这些优秀的教师。”^①当时在国文系中只有一名燕京毕业的硕士生。到抗战前夕，华西的国学师资和课程如下表：^②

国文系课程与教师			
课 程	教 师	课 程	教 师
声韵学甲	李培甫	声韵学乙	赵少咸
目录学	龚向农	礼记	龚向农
史传文	林山腴	宋明理学	彭芸生
孟子	彭芸生	左传	钟稚珩
小学甲	钟稚珩	小学乙	钟稚珩
国文	陶亮生	各体文甲	庞石帚
各体文乙	钟稚珩	各体文丙	庞石帚
荀子	杜奉符	墨子	杜奉符
中国文学史	杜奉符	中西文化交通史	郑德坤
中国历史研究法	郑德坤	中国考古学	郑德坤
中国神话之研究	郑德坤	通史甲	庞石帚

① 联董档案缩微卷，281—4424A，第797—798页。

② 《华西大学致哈燕社年度报告，1936，6，30—1937，7，1》，联董档案缩微卷，281—4424A，第899—900页。

专史	朱少滨	尚书	朱少滨
诗经	陈家骥	诗经导读	赵少咸
庄子	李炳英	文艺评论	庞石帚
各体诗选	庞石帚		
非国文系学生的国文课程			
国文	杜奉符	国文	杜奉符
中国文学史	杜奉符	国文	陶亮生
国文	陈家骥	东亚史	刘藜仙
中国文化史	刘藜仙		

在档案中没有列出有留学经历的学者。最高学历是郑德坤等 3 位燕京硕士毕业生。但几位当地著名的学者，如朱少滨是由政府教育经费特聘的教授，庞石帚、李培甫等也是很有名的文史专家，但教师中兼职者一直比较多。1937 年时国文系 14 名教师中，8 名是兼职教师，而且工资都低于其它教会和国立大学。^①如果从教育背景来考虑，那么华西较齐鲁也有一段距离。

华西开出的国文课程相当多，包括了文史和考古等所有课程。学生被分为两个组，一组学经典和历史，一组学哲学和文学。学生要修满 100 左右学分才能毕业。这一点在受到了哈燕社的批评后，作了重要的改动。首先是削减了课程数量，使同学有更多时间自习。其次增加公共课程，密切国文与其它系的联系。再次取

^① 钟稚川 200 元，朱少滨 300 元，杜奉符 110 元，陈家骥 85 元，庞石帚 160 元，郑德坤 150 元。以上是全职教师，兼职最高 68 元，最低 24 元，联董档案缩微卷，281—4424A，第 901—902 页。

消国文系学生分组，“给学生打下中国文化的广泛的基础，重点放在培养学生爱好和钻研中国历史和文学。”^①华西学习文史专业的学生也较少。不过比起 1928 年只有 1 名毕业生，到最多的 1935 年有 15 名毕业生，这个进步是很显著的。^②

在国学研究方面，华西以前的基础比较薄弱，明显影响到它当时的发展。1933 年开始出版《华西学报》，每年一期，内容包含了名言部、学术流别部、文史部、地形部、故事部、杂文录、韵文录等，是一份综合性刊物，还不能算像燕京、金陵那样的专门学术刊物。就研究内容来看，也存在与齐鲁类似的问题。^③

华西的图书馆和博物馆有较快的发展。图书馆的中文图书收藏部在哈燕社经费资助下得以完成。开始图书资料建设也遇到一

① 联董档案缩微卷，281-4424A，第 905、906 页。

年 级	课 程
一年级	文字学甲，声韵学甲，各体文选，中国文学史，中国通史，孟子，诗经。（公共课）英语，逻辑学（伦理）
二年级	文字学乙，声韵学乙，各体文选，文艺评论，中国通史，荀子，论语，礼记。（公共课）哲学概论
三年级	各体文选，各体诗选，老子，目录学，经学通论。（选修课）骈体文，专家文，史记，考古学、中西文化交通史，商君书，韩非子，宋明理学，尚书，中国文化史，清代史
四年级	各体文选，各体诗选，庄子，诸子通论。（选修课）词典选，专家诗，汉书，中国历史研究法，墨子，吕氏春秋，仪礼，周礼，周易

② 联董档案缩微卷，第 281-4424A，第 919—930 页。

③ 1937 年 9 月将出版第 5 期《华西学报》，第四期的文章有：《释词补笺》，朱少滨；《五释》，朱骏声；《唐写残本尚书释文考证》，龚向农；《访棘十方堂古窑记》，杨枝高；《声韵学》，李培甫；《屈宋韵谱》，王受天；《匡故论衡疏正》，庞石帚；《章太炎先生学术述略》，庞石帚。联董档案缩微卷，281-4424A，第 906 页。

些困难，“因为购书很难。四川离出版中心很远，能买到的书经常要么是质量太次，不适于收藏，要么与原价比太贵”。^①后来学校让图书馆主任到外地去购书。30年代初学校的中文书有41,000册，包括一位藏书家长借给学校的25,500册书。1935年以后，除了继续用哈燕社的专款添置图书外，开始从教育部得到专门图书补助费购书。1936年华西图书馆所藏中文书籍达70,000册，外文书籍15,000册。50年代初华西大学藏书20余万册，与当时的四川大学相当。^②

博物馆的工作比较有成效。华西收集西南文物的工作早在1914年就陆续开始了。在得到哈燕社经费以后，1932年成立了博物馆，馆长是美国人葛维汉（David C. Graham）。博物馆分为考古学部和民族学部，建馆后加强了对中国西部古物及边疆各民族器物的搜集，致力于建成中国西部文化和部落文化的中心。同时，按科学方法进行分类编目和陈列工作，以对学生和社会开放。^③1936年该馆有各类文物18,000多件。其中，汉族文物有13,600多件，边疆民族（苗族、羌族、藏族、彝族）有3,400件。最有价值的是北京周口店中国猿人时代的兽犬骨化石、猿人食余的草食外壳化石等。出版物有《广汉发掘之初步报告》一册。到解放前夕，收藏文物中仅史前石器就有一千多件。值得一提的是，1935年到1939年间，该博物馆收集了红军长征史料，50年代初就成为长征文献中最珍贵的材料。^④

① 联董档案缩微卷，281—4424A，第798页。

② 《文物参考资料》第二卷第十一期，文物参考资料编辑委员会1951年12月15版，第44、41页。

③ 联董档案缩微卷，281—4424A，第797—798页。

④ 《华西大学古物博物馆概况》，《文物参考资料》，第二卷第十一期，文物参考资料编辑委员会，北京，1951年12月15日版，第61—66页。

对华西来说，它计划的三方面工作中，难度最大的是国学教育和学术研究。从不重视到重视当然是一个进步，但与哈燕社要用新方法改造传统色彩太浓的教会大学国学教育的要求相去甚远。1934年叶绥夫接任哈燕社主任，加强了对与哈燕社有关学校的中国学事业的联系和检查，进一步提高华西的国学教育和研究水准就成了一个新的问题。

岭南大学的中国文化研究

岭南大学在教会大学中有点特殊。第一，岭南是中国人当校长并拥有许多实权的第一所基督教大学。^①第二，岭南在1927年之前，一半以上的经费来自国内，而且每年都接受国民政府中央及省政府补助。^②因此岭南可以说是教会大学中中国化进程较快的学校。岭南大学地处南中国，按陈序经的说法是西方文化最先输入中国的地方，是近代新文化的策源地，又是历史上传统文化传播最迟的地方。^③这种文化氛围可能对岭南大学的系科体制和学术取向有所影响。在立案之后，岭南发展较快，但在这所中国人当一大半家的大学中，似乎更重视应用学科的发展。岭南校长钟荣光在接回自办仪式上强调“学校所设置各学科，不是书本上之文章，乃求实际上之知识与技术。”认为学习社会科学不注重调查参观实习，多一批毕业生即多一批“高等游民。”1928年受港粤社会委托，为训练商务人才设立商学院，1929年受铁道部委托开

^① 岭南大学1927年8月1日举行接回自办的典礼。参见高冠天编撰：《岭南大学接回国人自办之经过及发展计划》，岭南大学出版委员会1928年版。有关岭南办学特色，亦可参见吴梓明：《从广州私立岭南大学看基督教大学应以何种形式为国家教育事业服务》，载章开沅、林蔚编：《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第241—259页。

^② 《本校发展计划委员会报告书》，《岭南大学校报》，第70期。

^③ 《社会学与西南文化之研究》，《岭南大学校报》，第89期。

设工学院，训练土木工程人才。^①1936年合并日夏葛医学院和博济医院成立医学院。而且，在岭南各系科中人数最多的一直是经济商学系。

不过，要说岭南在学术上对国学、对传统文化全不重视，那也并非事实。在教育部立案之后，岭南需要按照统一的科目开课。岭南的中国语言文学系要开42门课，包括在社会科学系中的史学也开22门课，哲学开8门课。^②

如前所述，岭南在公开分配的霍尔基金中获得70万美元，仅次于第一大户燕京。第二笔指定用于国学教研的限制性开支是30万美元的利息。^③哈燕社经费至少在两个方面推动了岭南对中国文化的研究。第一是出版学术刊物。岭南历史最悠久的是文学院，但长期以来，并没有自己正规的学术园地。1929年岭南创办了一种文科季刊《岭南学报》。岭南的记载称“学报虽用中文编印亦引起广泛之注意，而受哈佛燕京学社之资助”。第二是促成岭南大学于1934年建立中国文化研究室，由岭南毕业生、哈佛大学历史学博士黄延毓主持。由于抗战爆发，许多活动刚开始就告停顿。^④

《岭南学报》一年出一卷四期，到战前已经出到第六卷第三期，总数23册，这在当时也是不少的成绩。学报完全采取横排本。第一、二卷的数期在发表文史哲学术成果的同时，还发表一些农科的内容。第三卷以后，完全是文科的内容了。从学报发表的文章来看，除了当时风行的考据论述之外，岭南的研究很有自己的特色。第一，有一些涉及到中西文化交融的论文。如谢扶雅的《菜

① 抗战爆发后由于资金问题，两学院后改为系，分别并入文理学院。

② 李瑞明编：《岭南大学》，第154、160页。

③ 郭查理著，李瑞明译：《岭南大学简史》，见李瑞明编：《岭南大学》，第89页。

④ 《本校发展计划委员会报告书》，《岭南大学校报》，第70期，1948年1月10日。

布尼兹与东西文化》、《道与 Logos》、陈受颐的《十八世纪欧洲文学里的赵氏孤儿》、《鲁滨逊的中国文化观》、《好迷传之最早的欧译》、《十八世纪中国的园林》。这类题目在其他的学报中不算很多，显得很有点新意。第二，注重广东历史的研究。学报各卷几乎都有关于广东的内容。此外，还经常出版关于广东的专号。1935年的学报第四卷第一期出过一个广东专号，完全是关于历史上与广东有关的官吏文人和书院寺院。第四期是《潮州艺文志》，1937年的六卷二、三合期又是《潮州艺文志》。学术区域化的倾向很明显，看得出岭南是以研究南粤文化为己任的。第三，并非完全厚古薄今。岭南学报发表的关于清史的研究较多。如黄善生的《清代广东贸易状况》、全汉升的《清末的西学源于中国说》，朗敬霄的《清代粤东械斗史实》，在今天都可以被看成近代史的研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岭南论文中已涉及到了当代的历史文化问题。如1934年5月学报第三卷第三期用整期的篇幅发表了陈序经的《南北文化观》。1936年的第五卷第一、二期分别发表了陈的《东西文化观》。这在其它学报中是罕见的。总之，欧风美雨在南海的长期飘洒，使这一时期岭南学报染上了更多的近代化的气息，其研究的内容、行文的方式、选题的角度，在今天看来，还感到并不那么遥远。^①

不仅如此，抗战以前，新旧思潮、中西观念不时在中国学术界引发所谓的论战，教会大学很少成为首当其冲的角色。但30年代关于中西文化的论战却由岭南发端。这场论战导源于陈序经的“全盘西化论”。陈序经，海南文昌县人。生于1903年，1920年在岭南中学上学，1925年毕业于复旦大学，1928年获美国依利诺大学哲学博士。回国后在岭南社会学系当助教。1934年被聘为南开

^① 参见《岭南学报》第一至第六卷目录。

大学教授。陈于 1934 年 1 月在广州《民国日报》发表了《中国文化之出路》，后来又在学报发表论文，主张全盘西化，激起热烈的讨论，前后延续了好几年。胡适的参与、有名的“十教授宣言”的发表，一时颇为热闹。^① 岭南大学学生自治会于同年 4 月出版了《全盘西化言论集》。在以后的两年分别出版了《全盘西化言论续集》，和《全盘西化言论三集》，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关于中西文化的特点和中国文化发展前途的讨论。无论这场讨论的性质和结果如何，追根溯源，这场大讨论发端于岭南大学，这说明教会大学已加入到中国学术的主流中，并且也搅动了思想界的潮流。

另外，岭南的学术队伍也正在形成之中，如陈受颐是国文系主任，先在岭南后到北大历史系当主任。谢扶雅作为哲学家宗教学家当时名气很大，文字学家容肇祖从北大国学门研究生毕业后，1930 年到岭南大学任国文系副教授。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张长弓当时正在燕大读研究生，也于 1930 年到岭南担任国文系讲师。终身在岭南服务的洗玉清也开始在学术领域崭露头角。自然，这些学者中还少有像陈垣、顾颉刚那样的名流，但在地方大学中已经是人才济济的了。

但是，岭南的缺陷也是非常明显的。和上面提到的大学相比，它在国学教育的基本建设方面几乎没有做什么工作，既没有大量的添置图书，更没有像样的古物收藏。它只把很少的经费投入到国学教育中去。它和哈燕社在经费的使用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分歧。原因是岭南是中国教会大学中最早和霍尔基金发生联系的大学，岭南在美国的代表曾和霍尔本人见过面，并且和管理霍尔遗产的

^① 王新命等：《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见《文化建设》月刊第一期第四卷，1935 年 1 月 10 日。

约翰逊律师相熟。^①早在哈燕社建立之前，霍尔基金就曾承诺捐助岭南 1 百万美元。但后来把其中 30 万作为岭南的限制性基金拨给了哈燕社。在作出这种安排的时候，1927 年 12 月 29 日，美国铝业公司总裁戴维斯在给岭南的信中说，将给岭南价值 100 万美元证券。其中 70 万是按霍尔遗嘱无条件赠给岭南的。但 30 万美元将给哈燕社，其收入将由哈燕社按照已经说明的条件付给岭南，即重视中国学的研究，并且希望岭南的这种工作要与设在北京的学社的工作多少协调起来，并与燕京的研究生工作联系起来。戴维斯说：“我们对你们及其它（教会）大学一样，希望你们尽可能地避免重复，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尽可能地使历史、文学、艺术、考古及其它方面的中国学研究更有效率和更集中（深入），让他们得到西方研究方法的益处。在可能的情况下，学到西方以博物馆和出版物的方式发展、保管和收集历史的、艺术的和有文化价值的物品的方法。我们正在谈到的这 30 万是学社的财产，为了达到我们所期望的一致性和和谐性，因此批准使用这笔收入的权力最终必须在学社手中。”戴维斯强调了学社是裁判，有权来判断经费使用的问题。^②但岭南一直感到这笔经费原来就应无条件给岭南，所以没有严格地按照条件使用经费，并多次试图把由哈燕社控制的经费要回来。^③当学社经过实地考察比较全面地了解岭南国学事业中存在的问题时，抗战已经开始了。

福建协和大学的中国文化研究

^① 1926 年 3 月 25 日，候赫宜 (Herbert E. House) (加州) 给格兰 (William H. Grant) 的信，联董档案缩微卷，183—3275，第 800 页。

^② 1927 年 12 月 29 日，戴维斯在给岭南美国校董会的信，联董档案缩微卷，183·3274，第 774—775 页。

^③ 1938 年 2 月 16 日，黄念美 (Olin D. Wannamaker) 给香雅各 (James M. Henry) 的信，联董档案缩微卷，184—3280，第 1171—1173 页。

福建协和大学是教会大学中办得较晚，规模较小的学校。因此在公开分配的霍尔基金中，仅获 5 万美元的资助。20 世纪 30 年代福建省政府也资助协和大学，但其重点是扶助农学和农业经济系，以及开办农事试验场。总起来看，福建协和与岭南有些相似，也比较重视实用科目，因为资源和学校倾向的问题，国学教育的程度不尽如意。

哈佛燕京社在霍尔基金限制性开支中给予福建协和大学 20 万美元的资助，与齐鲁大学相等，并且规定必须用于中国文化的课程和研究，这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协和大学对国学教育的做法。^① 1929 年 11 月，协大校长林景润给哈燕社寄去了“福建基督教大学中国学计划”，其中包括了加强师资重新组织国文系课程，开展学术研究，进行图书馆建设等内容。^② 这个计划的具体内容非常完备，但是对于协大这样的小大学来说，可能更多意义上是一个打动哈燕社的远景规划，而不是可以全部付之实施的行动方案。不过，协大在 30 年代确实采取了一些措施，来开展以前被忽视的中国文化的教育和研究。当时，全校藏书只有一万多册，基础确实比较薄弱。1928 年起用这笔经费扩充文学院各系。^③ 协大文学院后来发展有国文历史、外国语文及教育等系，但直到 1938 年国文和历史才分别独立成系，而且系的规模很小，师生数量很少。教师也没有达到华西的水平。

1930 年 6 月协和大学的出版委员会出版了年刊《协大学术》，刊登协大的学术成果。1931 年协和大学成立了福建文化研究会，出版了《福建文化》，1935 年协大的国文系出版了《协大艺文》。这

① Roderick Scott, *Fukien Christian University*, New York, 1954, p. 64.

② 联董档案缩卷，114-2468，第 1119—1121 页。

③ 《协大校刊》，第三十卷第二期，1948 年 5 月 1 日。

三种学术刊物中,《福建文化》的影响最大。王治心在发刊词中说:“我们所说的文化,并不是像一般人的思想,专注到精神方面,我们知道文化是包含物质生活的,所以我们要研究的范围,是包括一切属于生活的各方面。”《福建文化》反映出协大的学术研究有浓厚的地方特色,曾出过 7 期专号,如李卓吾专号、风土特辑、漳州史迹专号、福建谜语专号,福建谚语专号、福建理学专号和郑和专号,充分利用地方的优势,对福建人文地理历史文化进行了广泛的探讨。^① 协大 1934—1935 年给哈燕社的报告中列出的出版物有 9 种之多。^②

图书资料也逐步扩充,1933 年末代皇帝宣统的老师陈宝琛把 12,814 种 80,000 卷书捐赠给大学,这使学校的藏书增加到了 6 万余种。^③ 美籍教授沙善德(Farley)爱好收藏古物,研究中国古代文化,学校设立沙氏考古馆,内存古物 3600 余件,包括夏、商、周等朝代的瓷器、陶器、石斧,还有宋代的古船。这些收藏曾在 1937 年到世界各地展出,并有两篇关于这些古物的文章发表在《亚洲》杂志上。可惜抗战期间,这些古物被日寇洗劫一空。

哈燕社最初根据协大的报告,一直对它的中国文化研究工作比较赞赏。1934 年叶绥夫就任哈燕社长后,称赞了协大的“报告显示教育和研究方面的出色的活动。”并说“我希望你们确信我对你们在福建进行的工作极感兴趣,我希望在哈燕社和福建之间有密切合作,并以任何可能的方式帮助你们。”^④ 1935 年 12 月 6 日叶

① 《福建文化》第二卷第一期,1944 年 1 月。

② 《福建文化》,《协大艺文》,《中国学术体系》,《李卓吾论》,《中国民族气质与文化》,《沙恭达拉与宋元南剧》,《陈氏书库福建人部著述》,《诗之叶》,《中外艺术的理论与实际》。联重档案缩微卷,114—2469,第 1214 页。

③ Roderick Scott: *Fukien Christian University*, New York, 1954, p. 66.

④ 叶绥夫致福建协和大学的信,联重档案缩微卷,114—2468,第 1170—1171 页。

绥夫在给林的信中说福建的年度报告“好极了”。但对课程和研究提出一些意见。他认为课程中文学课的比重大大超过了历史，是否学生对历史不感兴趣？他对沙善德到德化搞的调查很感兴趣，希望能读到出版后的报告。对沙善德的《中西艺术的理论和实践》提出了批评，认为太多地依靠了派特鲁奇（Petrucci）的《中国画家》，指出后者的书中有许多错误，并列举这方面一些比较好的西文和日文著作。叶对协大组织师生到长汀和泉州的调查深感兴趣，问在中国音乐方面有什么新的发现，因为东西方有很大区别，他本人对中国的词与诗的音调有特别的兴趣。他对纪念李卓吾的《福建文化》专号表示有很大的兴趣。同时，希望以后列出出版物的页数，以了解它们的重要性。最后，叶将其它基督教大学正在进行的研究课题转给福建协和大学参考。^①

抗战之前，协大的中国文化研究算是开始起步了，但它和华西类似，离开文化中心比较远，高水平的师资比较难聘。直到 1948 年哈佛燕京社干事陈观胜到协和考察，发现协和的文科师资比较薄弱，“深觉该系（历史）有扩充之必要”，答应为协和物色北方驰名教授，来加强协和的国学研究。^②另外，协大送给哈燕社的报告可能和实际有点出入。因此，当哈燕社深入地了解情况以后，对其批评比较多。

华中大学的中国文化研究

20 世纪 30 年代初，华中大学的系科设置规模是比较小的。文学院设有中国文学系，以培养中国文学的专门研究人才及中学的国文教师。一、二年级注重一般的训练，学识和技能双方兼顾。三、四年级注重中国文学的专门研究，分为文艺和学术两部分。历史

^① 叶绥夫致福建协和大学的信，联董档案缩微卷，114—2469，第 1237—1238 页。

^② 《协大校刊》，第三十卷第三期，1948 年 6 月 20 日。

社会系是由历史系和社会学系合并而成的。其目的是训练社会工作人才，能以历史眼光看待社会的变动，分析社会问题，并培养中学历史师资。哲学宗教组，为全校各院系开设哲学宗教选修课程。^①华中文学院的课程设置中，国文系的国学课程比较重，但社会科学系则体现了中西兼学，西学为主的特色。^②这也许和学校培养中学师资的目标有关，缺乏一些比较深入的课程。

华中大学财政形势一直相当严峻。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时，差会最先削减的就是给国文系的资助。华中加强国学教育的资助来自国民政府。1935年国民政府执行扶助民办大学的政策，给华中大学拨了15,000元的专款。这笔钱使华中大学得以聘请3位必需的教员，其中包括了聘请北京大学文学士、曾在国立山东大学任教的游国恩来担任国文系教授。^③

华中校长韦卓民曾经留学英美，他对中西文化都有很高的素养。1915年他以英文撰写了《孟子之政治思想》，其后陆续发表了《佛教净土宗与基督教之比较》（1920）、《东西文化之综合问题》（1927）、《孔子伦理》（1928，博士论文）。1947年在校长任上还出了英文版的《中国文化之精神》。^④韦卓民深暗中西文化的奥义，一生致力于中西文化的沟通。加之他对西方学术体制运作方式的深

① 注文汉、宋才发等编《华中师范大学校史》，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94页。

② 马敏：《教会大学的国际化特色——华中大学个案分析》，论文单印本，第15页。

③ John L. Coe, *Huachung University*, New York, 1962, p. 114.

④ 该文原名为：*The Spirit of Chinese Culture*，韦卓民曾获选为1945—1946年度“亨利·鲁斯访问学人”，在美国发表系列演说，文章旋由纽约Scribners出版社编辑出版。参见吴梓明：《韦卓民眼中的基督教及其与中国文化之关系》，载马敏等编：《跨越中西文化的巨人：韦卓民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武汉，华中师大出版社1995年版，第83—98页。

刻了解，所以，他在争取海外资助，发展华中大学方面卓有成绩。1934年韦卓民在美募捐期间，华中发展的蓝图打动了庄斯顿小姐（Miss Mary E. Johnston），以后她每年向华中文学院提供 5,000 美元的资助，一直到 1950 年为止。这笔经费使文学院发展成为华中“最强的学院”。^① 华中最初没有被列入与哈佛燕京社有联系的中国教会大学，但韦卓民说动了哈佛燕京学社的主任叶绥夫，叶 1936 年到中国学术考察时，访问了华中大学。华中发展中文系的设想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它被列入哈燕社在华有经常联系的第七所教会大学。^② 从 1937 年起，中文系得到学社的资助，用来研究长江中游的文化。^③

即便如此，华中起步较晚，在战前的文科研究中，还没有多少成就。正如章开沅指出的：“华中大学在 13 所教会大学中算不了顶尖角色，但它却办得相当有活力并有自己的特点。韦先生一直主张控制学校的规模，而把质量的提高放在第一位。华大虽然位于内地，但他通过哈佛燕京学社和雅礼协会，它与国内外的名校联结起来，在教学、科研、师资、图书、设备诸方面都受益非浅。”^④ 总之，抗战前夕通过中外合作，华中的中国文化研究终于被提到一个重要的位置，显示出发展的势头。

① John. Coe; *Huachung University*, New York, 1962, p. 118.

② 联省档案缩微卷，214—3633，第 328—332 页。

③ 马敏、方燕：《华中大学档案在国内外分存情况简介》，第 281 页。

④ 章开沅：《序》，见马敏等编《跨越中西文化的巨人——韦卓民学术思想国际研究会论文集》，第 2—3 页。

三、平衡国学教育：长江下游的几所大学

长江下游是教会大学比较集中的地区，除前面提到过的金陵大学外，在苏沪杭地区还集中了东吴、沪江、圣约翰、之江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五所大学。如果按现在的华东区概念，华南女子文理学院也在这一地区。这些地区有一些共同的特点，西学输入较早，经济比较发达，社会风气和价值观念的潜移默化非内地可同日而语。和北京等中国学术中心相比，这里的商业气息更为浓厚。这种氛围当然对教会大学有所影响。当地社会和学生对教会大学的期望是得到较好的西学教育。一些喜欢国学的学生，就会像顾颉刚、王伯祥一样，负笈北上求真经，或者求学于以国学教育著称的无锡国专。另一方面，这些教会大学的规模也小一些，如果把教会大学作一区分的话，那么这些大学中的国学教育都不能算作大学的重点。这些学校和哈佛燕京社没有经常性的联系，也没有发展国学教育的专项资金。它们所能做的，只是在学校经费许可的前提下，改变此前的偏颇，建立起平衡的教育和学术的机制。所以，在立案以后，随着整个教会教育制度的改进，它们的国学教育与研究，也有可资评点之处，但各个大学是各有千秋。

东吴：学生主办学报

在这批大学中东吴的国学教研算是比较好的。在教会大学中，东吴大学是以法律、生物和化学出名，并不以国学研究和教育见长，但东吴大学对中国社会文化的探讨起步很早，辛亥之前国学教师中也有过吕思勉等名人。东吴校史一直认为，在中国所有大学中，东吴大学是最早开展社会科学研究的学校之一，《东吴学

报》是全国创刊最早的高校学报。^①学报的宗旨是“表学堂之内容，与当代学界交换知识”，并期望“此报为强种强国之起点”。但仔细考察，20世纪30年代以前的东吴学报实际上是包括了时事、政论、文艺等内容的综合性杂志，并不像《金陵学报》那样是严格意义上的学术刊物。^②1933年以前，《东吴学报》是由学生会主办的。学报的编辑，以学生为主，教师仅任顾问。学报主要面向学生，办刊是密切“毕业诸君与在校同学之关系”。由于刊物的主办者和读者是学生，一切对学生负责，而学生的需要是多方面的，所以学报的内容就比较庞杂。但这份学报也有自己的特点，青年学生的思想往往是比较激进的，《东吴学报》上的文科论文与现实联系比较密切，经常讨论社会问题，反映了时代脉搏的跳动。从现存的学报内容看得出当年学生的动向。五四时期，学报上曾刊载宣传新思潮和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国民革命时期，展开了对三民主义和中国政体的讨论，还有些文章就国民运动与劳工问题发表了见解。学报对当时颇为流行的实业救国问题、妇女问题，也展开了热烈的讨论。《东吴学报》还利用地处苏州的地理条件，对苏南社会的各个侧面进行了广泛的调查，形成了学报的地方特色。^③从狭义的国学研究来看，东吴的研究就显得比较单薄了。30年代以后，其它大学的正规学报不断问世，《东吴学报》显得名不符实，所以《东吴学报》改由学校接办，成为东吴大学的综合性刊物。学

^① 《复旦学报》1918年创刊，《北大月报》1919年创刊，《清华学报》1937年创刊。《东吴学报》出版时间至少有30多年。其间学报的刊名屡次更换，前后曾用过《学粹》、《东吴月报》、《东吴》、《东吴季报》、《东吴学报》、《东吴杂志》和《新东吴》等七种刊名，出版几经停复。

^② 参见《东吴学报》，第一卷，1919年版目录。

^③ 张梦白、许周鹤：《东吴大学的社会科学研究》，1991年南京师范大学教会大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

报分为各种专号，文理轮流分别出刊，从此面貌焕然一新，可以列入当时流行的国学研究刊物中了。^①

值得一提的是东吴学报的主要作者是东吴学生。从 1906 年至 1918 年间，《东吴学报》所刊文章 50% 以上为学生所撰写。1919 年至 1927 年学报的作者几乎全是学生。1933 年学校主办学报后，仍有 70% 的文章为学生所撰写。学生在读书期间就有发表文章的园地，有利于他们钻研学业。例如，1921 年毕业的吴止芳，在学生时代就经常发表文章，知识面广，思路清晰，能击中当时中国社会的弊端。由于学生时代基础扎实，后来担任东吴大学政治系主任、教授。1922 年毕业的沈体兰，曾任东吴学报社社长，学生期间撰文十多篇，不仅学业优秀，而且社会活动能力强。他深入社会基层，写出了反映中国社会上的童工问题、义务教育问题和农民问题的文章，均有独到见解。沈毕业后从事中学教育，后任上海麦伦中学校长，成为教育界著名人士。^②如果说早期的学报风格反映了早期文科教育内容的话，那么 1933 年以后的学报则反映国学教育的深入和规范化，一种新的学术文化在东吴慢慢地发展起来了。

之江、沪江、圣约翰和两所女子大学

先谈之江大学。之江在立案前已有些名气。吴晗在 1927 年慕名进之江预科，一年以后因为学校停办，才进了中国公学。立案前后，朱经农和李培恩为整顿国文科四处网罗人才。从燕京请得顾敦铎规划国文系。^③到抗战之前，学校的课程进行了多方改革，

① 参见《东吴学报》，第三卷第三期文学专号，民国 24 年 7 月。

② 许周鹏：《东吴大学学报沿革考札》，见《苏州大学学报》，1987 年第 3 期，第 171 页；许周鹏：《试评《东吴学报》的地位和作用》。见《苏州大学学报》，1988 年第 2 期，封三。

③ 陈智远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第 362 页。

“所开课程可以看出它们是十分重视中国的传统文化的”。教师中颇多知名之士。^① 国文系的几个主要教授，如钟泰讲经学、诸子、宋明理学；徐昂讲经学、文字学、音韵学；夏承焘讲诗词和古代文学方面的课。词学专家夏承焘 1930 年起到之江大学国文系任教，他在自传中写了所开的课程和所做的研究：

“我在之江所授的课程主要有词选、唐宋诗选、《文心雕龙》、文学史、普通文选五门，每周共十六课时，虽纷繁不得专心，但是，做学问的条件总比以往优越。此时，我所作《石帚辨》、《姜白石词考证叙例》、《白石词校律》以及《温飞卿系年》、《韦端己年谱》、《冯正中年谱》、《南唐二主年谱》、《张子野年谱》、《二晏年谱》、《贺方回年谱》、《周草窗年谱》、《姜白石系年》、《吴梦窗系年》等十余种词人年谱，大都陆续地在《词学季刊》上发表。”^②

夏早年进过孙诒让办的温州师范，也在东南大学听过胡适的古代哲学史等课程，当时已是出了名的教师。著名学者任铭善当年在之江当助教，毕业论文是《说文解字建首小笺》，治学以文字音韵为主。^③ 之江的学生对教师的教授印象也颇深刻。后来也成为语言学家的蒋礼鸿回忆说“我在之江念书的时候，老师钟中山（泰）先生的反复涵泳，细究文章脉理的读书方法，夏瞿禅先生谦虚乐受的读书态度，徐益修（昂）先生的诚挚不已的治学精神都

^① 曾钜生、徐辉：《之江大学档案片断》，见吴梓明编：《中国教会大学历史文献研讨会论文集》，第 247 页；张文昌：《之江大学》，《浙江文史资料选辑》，第二十九辑，浙江人民出版社，第 127 页。

^② 夏承焘：《我的治学道路》，《社家》，第一辑，第 306 页。

^③ 任铭善：《传略》，《社家》，第三辑，第 62 页。

对我有所熏陶、启发。”^①可见，之江在中国古典文学和文字学方面是有一定实力的。之江在 1932 年 6 月还出版了《之江学报》，发表研究成果。

沪江在刘湛恩的领导下，各院系课程日臻完备。所聘教师中有一些当时和日后较为著名的学者。如在沪江国文系担任过教授的有蒋维乔、蔡尚思、朱维之等。不过沪江的师资比较紧张。蒋维乔于 1923 年以后，在沪江大学教授过中国文学史，《诗经》，《说文》等。^②蔡尚思从 1935 到 1952 年一直在沪江任教。一人主讲中国通史，最多时文理商三院学生 500 多人来听课。此外还分教大一国文，还要开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政治史、中国社会思想史、中国社会史等课。^③朱维之是教文学史的。学生也比此前重视国学课程，他们组织了文学会、国语研究会等。沪江的国文系规模一直较小，教师少，课程比较重。^④但在学术研究方面也出了一些成果。到 30 年代，教授著作中比较重要的有国文教授林朝翰著的《中国文学讲义》、历史教授张立民著的《纲鉴札记》，国文教授王治心著的《中国基督教史纲》和《中国哲学史》。蔡尚思认为最能代表“生平学术研究的一部书”《中国思想研究法》就是在抗战前完成的。^⑤

圣约翰大学曾被校友称为“东方的哈佛”、“外交人才的养成

① 蒋礼鸿：《自传》《社家》，一，第 341 页。

② 陈秉仁：《蒋维乔传略》，《社传》，六，第 436 页。

③ 蔡尚思：《自传》，《社家》，四，第 312 页。

④ 徐口玉：《沪江给我留下了美好的记忆》，见沪江大学校友会编：《沪江大学纪念集》，上海 1986 年，第 65 页。

⑤ 葛祖兰：《记上海三所教会大学》，《上海地方史资料》四，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年版，第 161—165 页；蔡尚思：《最值得我回忆的沪江》，见沪江大学校友会编：《沪江大学纪念集》，上海 1986 年，第 25 页。

所”，英文科目是强项，但一直有过分洋化之嫌。圣约翰大学晚至 40 年代后期才在国民政府立案。国学教育一直是弱项。1925 年五卅事件后，一批中国教师和学生愤于学校当局的倒行逆施，离开圣约翰创办了光华大学，在重视国学方面与圣约翰适成对照。圣约翰很少有著名学者主持国学教育。后来成为著名英美文学研究专家的黄嘉德，1931 年在圣约翰大学英文系毕业后留校工作，虽是英语系出身，却在中文系讲授《史记》、《汉书》等课程。但在各方都谈重视国学的气候下，中文系情况也略有改善，抗战前蔡正华任中文系主任，致力于提高该系的教学水平。^①原来的校长卜舫济在抗战时期对中国教育有一个很有见地的自述，他认为：“中国的教育已经从旧的人文主义教育这一端转向科学教育的另一端，现在把重点放在工艺性和功利性的课程上，忽视了哲学和文化学科的研究，走向世俗主义。这种教育并未造就愿为调查研究工作而献身的学者。如果它要取得最好的结果，这些弊病必须得到纠正。在中国存在着一种照搬西方教育制度而忽视保存自己古老文化优良成分的危险，新旧结合的问题还没有完全得到解决。”^② 卜氏说得不错，但在上海这种商业社会中，做起来并不容易。未来的文学院院长黄嘉德在抗战前夕与黄嘉音以及林语堂三人合资创办《西风》介绍西方文化，一时很红火，显然热衷西风超过东风。^③

至于两所女子文理学院，规模比较小。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设有中文、历史系。课程也比较整齐。当时历史系开出的主修专业

^① Mary Lambertson: *St. John's University, Shanghai 1879-1947*, Hong Kong, 1988, p. 166.

^② 徐以骅译：《卜舫济自述》，见丁日初主编《近代中国》，第六辑，1996年，第260页。

^③ 黄嘉德：《自传》，《社家》，三，第282-283页。

课包括了中国通史、中国古代史、中国近代史、各朝代段落史、西洋通史、西洋古代史、中世纪史、近代史、亚洲史、非洲史、各国简史。但学校小，教师毕竟少。历史系一共只有 4 个教师。两个人教西洋史，其中有金陵大学历史系主任贝德士，两个中国人教中国历史，其中有后来以研究严复见长的王弼。学生人数一般一届 10 人左右，最少的时候仅有 1 名毕业生。^①相对于教学来说，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学术研究相当薄弱。吴贻芳认为：“金女大山于教学有一定水平，对学生严格要求，所以在国内外有较好的声誉。……但是金女大对科学研究工作开展不够，科学仪器设备不够完善。由于教师不足，专业教学的广度和深度都不够。培养学生的创见能力注意不够。学校对通过独立探索写得颇好的论文没有进行表扬鼓励。学校没有办过专门的学术性刊物，所以有些教授的著作只得在校外各类刊物上发表。教师中的特殊贡献，或者说他们学术上的成就，也没有提出来让大家了解研究。”^②华南女子大学的规模更小，1928 年因不合教育部关于大学的规定，改为华南女子文理学院。改制后，文科设立国文、英文、教育、史地四个系，主要培养中学师资。

四、在学术近代化的潮流中

五四以后到 30 年代，是中国学术文化的活跃期，传统的诗经

^① 郭节恩：《关于当年历史系情况的回忆》，金陵女校友会编：《永久的思念》，南京，第 140—141 页。

^② 吴贻芳：《金女大四十年》，见《江苏省文史资料》，南京，第十二辑，第 15 页。

转向现代范式的学术研究，传师授徒演变成为近代的教学，都是在这个时期逐步开始的。此前，中国有历史悠久的学术研究传统，但是这种研究一直是少数有钱人和有闲人凭兴趣和爱好的一种业余活动。另一方面除了受政府控制的修纂官方史书的衙门外，中国一向没有独立的学术机构，没有专门的学术刊物。民间的自由学术活动一直是很不发达的。因此，以大学为依托的学术研究机制的建立在中国是一个创举。大学教育奠定了学术发展的基础，构成了学术体制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教会大学的资格要比官办的大学资格老些，大部分教会大学要比官办或者私人办的大学要稳定些。^①因此，它们在学术近代化的过程中自然就占据了一席之地。如前所述，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辅仁、燕京、金陵、齐鲁、岭南、华西、福建协和、华中等8所大学都比较重视中国文化的教育和研究，有些还有专门研究中国文化的研究所。这些研究机构都很简陋，大部分是系所不分，但这些系所的建立毕竟使国学教研有了一种常设机制的依托，有了各种各样的专门学术刊物，使学术研究不再是一种个人的行为，依赖于个人的所好，而成为一种社会化、制度化的行业，它是学术研究持续发展的保证。齐思和在总结近代以来中国史学发展时说：“到了民国十年以后，专门的学术杂志便纷纷的出现了。其中最著名的如北京大学《国学季刊》（1923）、《清华学报》（1924）、《燕京学报》（1927）、《史学年报》（1930）、《辅仁学志》（1928）、《金陵学报》（1936）、《武汉大学社会科学季刊》（1930）、《地学杂志》（1909）、《禹贡半月刊》（1934）、《食货半月刊》（1934）、《中山大学历史语言辑刊》（1927）、《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

^① 国民党政府教育部的文件中承认教会大学“经济绝对公开”、“管理严格”，《1933年上海之教育》，第4—5页。

及专刊报告》(1928)、《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史学集刊》以及其他学报杂志不下数十种,我们史学的拓荒工作,多半首先在这里发表,这里面实蕴藏着近三十年中国史学研究的大部成绩。”^①其实这里留下来的,不仅是史学还有文学、哲学和文字学、考古学等所谓“国学”的广泛内容。这些杂志都是国内很有影响的刊物,其中约半数出自教会大学。30年代以后,有4所教会大学获国民政府的批准有资格招收历史研究生,这是官方学术机构对这些教会大学国学教研水平的认可,也促使这些大学把国学研究提高到新的层次。

当然各所教会大学的国学水平是不一致的。如果根据师资和学术成果,大体可以分为三种类型。燕京大学和辅仁大学属于第一类,哈佛燕京社联系的其它学校是第二类,其余的学校大致可以归为第三类。如果以出版成果为一个标准,教会大学在学术界已经占有一定地位。在全国层次上,除了北大等国立大学居于“领袖地位”外,燕京与辅仁已经有相当的影响。从地区层次看,金陵、齐鲁、岭南、华西等大学一直正常运作的大学,在这些省份有重要地位。在福州、苏州、上海、武汉等地教会大学的国学教育同样有一定的影响。^②

当然,成绩和问题同样存在。教会大学中国学教学研究不平衡是一目了然的事。1936年到1937年夏,哈燕社社长叶绥夫亲自到中国考察有关教会大学的国学研究进展。他肯定了燕京、齐鲁、金陵和华中这4所大学。他对燕京大学的进展最为满意,教师构成已经发生了变化。他非常支持洪业、顾颉刚等通过开设俄语、蒙

^① 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燕京社会科学》第二卷,第34-35页,燕京大学法学院,1949年10月。

^② 参见《南京大学史》;《解放前上海的学校》,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古文和法文课程树立燕京国学研究特色的发展计划。在齐鲁大学访问时，对图书馆工作的改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认为“这个图书馆已经有了一些很重要的珍贵图书的收藏。收藏比较有系统，很恰当地选择了记载山东省各县历史的图书。”古器物的收藏“有很高的考古学价值”。他表示支持齐鲁开展佛学的研究，因为山东是中国佛教中心之一。在谈到他在金陵大学访问时，他认为金大有一个特别的中国文化研究所，一直在做很出色的工作。“他们的杂志和其它出版物有很高的学术水准，为中国历史和考古学的研究提供了许多新认识。”叶绥夫说他在武昌的 4 天访问了华中学院，华中正在进行的工作也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他对福建、华西和岭南大学的国学状况不很满意，一是图书馆建设经费太少或使用不当。福建只用 200 多美元买历史和社会学的书。华西“图书馆缺乏许多重要的门类和许多应有的图书。哈燕社给大学的经费花在别的事情上，图书馆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岭南“图书馆收藏的中文著作仍然少，西文的汉学著作也很少。许多重要的著作仍付阙如，图书馆的负责人甚至对最近的出版物很不熟悉。”二是师资不符合要求，福建协和大学把可以教授中外关系和考古学的教师派去教英语，华西“所有的讲解都以传统的方式进行，没有超出使用相传已久的注疏讲解经书的范围。”“华西的国文教育只有小学院的水平，教员不可能进行真正的学术研究。它的杂志只是一些用漂亮的风格写成的散文集，并没有任何科学的价值。”而且教师工资太低，人浮于事。岭南“国文教学一直被看成是次要的，这就是为什么这方面的工作一直没有提升到具有学术水平层次上的原因。教师们对传统的中国词章要比对历史和语言学方面的学术研究更有兴趣。”叶在考察中所得结论受时间限制或者个人学术倾向的影响，偏颇之处可能是难免的，但是他从图书资料、师资和研究成果几方面来衡量学校的学术水平，对将经费挪作他

用提出批评，不能不说是抓住了问题的要害，并为今后的改进提供了前瞻性的认识。他要求“每一所大学应寄给他一份所有将被聘为教授的候选人员名单，包括一份他们学术经历的说明，这将使他有可能对教员有全面的了解，也可以防止因政治或其他方面的影响选用教员。”^①这一要求以后对这些大学的师资构成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国内教育界对其它教会大学也有一些看法。著名学者吴大琨 1934 年夏到东吴大学上学，说：“我在东吴大学念文科除了觉得可以学好英语之外，其余功课简直都是不值得学的。”^②国民党教育部官员 1933 年视察沪江大学时仍然批评“学校一切多趋于欧化，……一年级学生国文程度太差，甚至造句尚不通顺，此因招生时未能注意之故”。^③担任过燕京文学院长的刘廷芳认为教会大学国学都不强，要达到“研究高深学术，养成专门人才”的水平，不是容易的工作。^④但应该承认的是教会大学在经费、设备、图书方面的优势，特别是教会大学拥有全国大学 1/4 的图书，师资水平较高的和办学有效率，奠定了进一步发展的基础。教会大学的学者们认为，虽然在高等教育中国立大学已经担当起“领袖地位”，但教会大学仍可以有预期的发展。^⑤

另外一个问题则是国学研究的方法和目的。从学术刊物来看，教会大学的出版物与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和北京大

① 哈燕社托事部 1937 年 11 月 8 日会议记录，联董档案缩微卷，214—3633，第 328—332 页。

② 《社家》，一，第 120，122 页。

③ 《教部视察沪江大学报告摘要》，见《1933 年上海之教育》，第 4—5 页。

④ 刘廷芳：《教会大学办学之困难》，《教育季刊》第十五卷第三期，1939 年 9 月。

⑤ 谭天凯：《基督教大学在吾国高等教育中之地位》，《教育季刊》第十三卷第四期。

学的《国学季刊》、清华的学报在研究的方法和方向上基本是一致的。研究的课题重在专题研究，研究的方法是结合了乾嘉考据和实验主义的历史新考据。虽然有些年轻学者和学生，多多少少受到新思潮的影响，如蒙思明的《元代社会阶级制度》等，看得出历史唯物主义的影响，但主流还在于考据。陈垣精湛的考证学、顾颉刚在燕京时从事的历史地理学的疑古，洪煊廉的“引得”编纂等等，虽然具体课题不同，方法上都没有出重资料重实证这个范围。有些学者对考据到了酷爱的程度。如在燕京读国文的杨明照，在晚年还说对考据“有嗜痂之癖”。^①不少人在具体问题的探讨上确有超越前人之处，但是认为学问之道尽在于此，则是很有偏颇之处的。

至于研究学术的目的，这些学者都希望“超政治”，为学术而学术。事实上，对任何学术来说，都存在着客观社会效应和主观科学价值的矛盾。这两者的关系并不是常常一致的。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这两者的关系常常被扭曲的百口全非。显然，人文学科的研究者不可能完全摆脱现实社会对学者研究方向的牵制，但教会大学中一些有影响的学者力求做到学术要“求真”，而不强调现时的社会功能。这实际上是对中国传统学术过份依附于政治，过于强调“通经致用”的学术实用主义，缺乏独立的科学精神的一种逆反行动，是希望学术按其自身规律独立发展。在这种学术风气背后，看得出其跟踪西方，特别是美国汉学发展的轨迹。教会大学由于跟西方学术有更紧密的联系，影响也就更深刻。

但是 30 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和美国是相去太远了。抗日救亡和人民革命的时代主旋律，实在与这种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学术方向不太相宜。燕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张东荪就说：“假使我们对于

^① 杨明照：《自传及著作简述》，《社家》，四，第 215、220 页。

固有的旧文化不能使其再发生新芽；而只是把外来的新种移植进来，则中国的民族性便无法养成。所以我的见解和时流很少相同。我以为‘整理国故’所负的使命实在很大。而可怜一班整理国故的人们完全见不及此。他们把国故当做欧洲学者研究埃及文字与巴比伦宗教一样看待。简直把中国文化当作已亡了数千年的骨董来看。所谓国学直是考古学。外国人研究中国学术取这样的态度原不足怪。最可笑的是中国人因为外国人如此，所以亦必来仿效一下。而美其名曰科学方法。我愿说一句过激的话：就是先打倒目下流行的整理国故的态度，然后方可有真正的整理。有了真正的整理方可言有所谓国故。不然全是骨董，我们今天救死不遑，那里有闲暇去玩弄骨董呢！”^①艾思奇则站在另一个角度批评说：“我们虽然不能完全否认整理国故的意义，我们得承认这也是价值的重新估计，这里也有新思潮的表现。但我们要说的是，新的思想文化刚才出马，就一步也没法子走远，只好攒到旧字纸篓里，这也可以见得资本主义势力是没有能够完成它的任务了。”^②这种批评虽然也有值得商榷之处，但这确实是说出了新学术在中国进退维艰的处境，同样也是教会大学学术的困境。

对于这个问题，抗战前一直在燕京的顾颉刚后来认为专家的研究是“史学界的基石，万万缺少不得”，而普及者即是“接受专家研究的成果，溶汇贯通之后，送给一般人看。……唤起民族意识，把握现代潮流，都靠在这上了。”他承认：“抗战前的史学界，大家投向专的方面，而忽略了通的方面。”“一般民众万想不到他

^① 张东荪：《现代的中国怎样要孔子？》，《正风半月刊》第一卷第二期，1935，见《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二集第六册，第72—73页。

^② 艾思奇：《论思想文化问题》，《认识月刊》创刊号，1937，6，见《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第二集第一册，第15—16页。

们会和史学发生什么关系。”^① 那么接着的问题是抗战之中，教会大学的学术是如何推进，或者有什么新的动向？

^① 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第 327 页。

第七章

抗战时期教会大学的国学教育与研究

抗战爆发，对中国的文化学术事业是一次重大的打击。一批国立大学在开战前后奉命迅速撤往大后方，但国民党政府对私立学校包括教会大学的搬迁，开始时举棋不定，并没有明确的决策。^① 教会大学既在国民政府注册，又直接受西方支持的双重地位，在日美开战前，有些大学还存观望之心。日本侵略者对教会大学也多一重顾忌，不敢轻举妄动。这双重因素造成了教会大学在战时办学的多种局面。

第一种是辅仁大学。由于德国人参与创办辅仁，日本与德国是盟国，所以八年抗战，辅仁因这一层关系，一直得以留在北平办学，并且是国民党政府所承认的沦陷区唯一合法的大学。第二种情况是在太平洋战争前，托庇于欧美在华治外法权，仍在原地或租界办学。太平洋战争后，逃往后方。其中，燕京在“七七事

^① 金大校长陈裕光说：“国民党政府起初对教会大学的内迁态度暧昧，表示公立大学都迁了，你们教会大学不迁也没有关系。还说目前情况下需要几个人中学校撑场面。但 20 多天后，局势更加险恶，教育部突然通知停课，却又表示无法提供迁校所需的交通工具。金大只好发动群众，依靠师生的力量，前后历 3 个月的时间，金大校本部迁成都华西坝，理学院迁重庆。”陈裕光，《回忆金陵大学》，《金陵大学建校一百周年纪念册》，第 20 页。

变”后，以美国在华学校的名义维持了 4 年。华东的东吴、之江、沪江、圣约翰及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先是在上海租界办学，1942 年以后学校被日军接管，或在后方重新办学、或者是更改校名，支撑到抗战胜利。^①第三种情况是抗战开始，立即迁往后方。如金陵大学、齐鲁大学和华中大学等，在战事逼近学校所在地时就开始搬迁，很快在大后方择地办学。第四种情况是原来就在大后方的学校，如华西大学，继续在原地开办。

战争对教会大学的冲击是极其沉重的。困难当头，军事第一，教育与学术的地位更相形削弱。即使在后方开学，学校体制也完全被打乱，学术队伍星散，元气大伤。以学者个人的研究条件论，如顾颉刚在芦沟桥事变后，因被列入日人欲捕名单之第二位，匆忙离开燕京，连手稿都留在家中。老舍在日军兵临济南之际，离开齐鲁大学只身奔赴武汉。许多学者抛妻别子转徙千里奔赴大西南，身家性命都历尽艰险，书籍资料流散，各种学术研究计划都被迫中断。一种正在形成的学术发展的新局面，被日军的入侵打乱了。

但是，抗战八年，中国的教育和学术事业未被强敌所毁，在边区和大后方，教育和学术仍在延续民族文化的命脉。就大学来说，国立和私立大学如西南联大等在昆明坚持战时教育，教会大学也在艰难的环境下求生存，求发展，成为战争年代中国学术文化发展的重要力量之一。

^① 1937 年抗战爆发，沪江商学院部分内迁重庆，上海则在刘湛恩领导下坚守办学。1938 年 4 月 7 日刘为日寇枪杀。沪江勉力坚持到 1942 年初，日军接管沪江财产。沪江大学改为“沪江书院”，一直苦撑到抗战胜利。朱博泉：《沪江大学校史述略》，朱原为沪江书院的负责人，《上海文史资料》第 47 辑，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206 页。

一、辅仁大学：提倡有意义之史学

辅仁大学在 1933 年因为美国圣本笃会的经费困难，改为由美、德两国圣言会合办。这一变动使这所大学与德国产生了联系。抗战前夕德国人雷冕接任校务长，日本人不能对辅仁为所欲为。结果使得辅仁大学成为所有教会大学中唯一在沦陷区继续开办一直到抗战胜利的学校。同时，国民政府的承认也给辅仁以一种特殊地位。这双重地位给辅仁带来发展的机会。

北平本来是学者教授云集之地，抗战以后，国立大学南迁；太平洋战争以后，燕京关闭。大批大学教师面临何去何从的重大抉择。多数中青年学者转入根据地或大后方。有些年龄较大的学者，或者因家室之累或因其它原因滞留北平，又不愿到日本人控制的学校中任教，辅仁原来的声誉和战时的地位使不少知名教授转入辅仁。^① 当时国文系有高步瀛、沈兼士、郭家声、余嘉锡、罗常培、魏建功、唐兰、孙人和、顾随、陆宗达、赵万里、刘厚滋、王静如、许世英、孙楷第、于省吾、刘盼遂、夏宇众、陈君哲、储皖峰等。史学系除陈坦外，还有张星烺、陆懋德、宋师辙、邓之诚、韩儒林等。^② 后来辅仁自己培养的研究生和本科生也加入到教师队伍中来，如柴德庚、葛信益等。台静农也辗转回到辅仁。虽然

^① 如顾随的儿子记载，顾随原在燕大任教。开古典韵文、佛学、书法，讲授中国古典文学方面的课程。1937 年抗战爆发后，由于家庭的拖累，不得不仍留北平，在燕京和辅仁教课。1941 年北大关闭，因为北平只有辅仁不向日伪注册，所以一直在辅仁教书。

^② 《北京师范大学校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第 236 页。

长期留在辅仁教书的还是和辅仁渊源较深的学者及辅仁的毕业生，但这么多的名家出入辅仁，登台授课，对学校的水平无疑是一个推动。后来成为著名学者的叶嘉莹、郭预衡等战争期间在辅仁求学，当年的教师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①

抗战期间的辅仁，也是华北一些未能离开沦陷区的青年学生的深造之处。学生回忆说：“40 年代之初，辅仁大学在沦陷的北平城里，是一所令人称羨的学府。有些教师不愿到日本侵略者直接管辖的学校去教书，便来这里任教。有些学生来这里上学，也怀着同样的心情。”^② 因此学生人数激增，特别是 1937 年抗战后人校，1941 年毕业学生最多，国文系达 61 人，历史系 48 人，此后虽有下降，仍较战前为多。1943 年国文系毕业生 40 人，历史系 29 人。1944 年国文系毕业 47 人，历史系 35 人。1945 年国文系 40 人，历史系 32 人。这是辅仁有史以来学生最多的时期。抗战胜利后，学生数量明显下降。1946 年国文系 24 人，历史系 21 人。值得一提的是，抗战期间，历史系的毕业论文中，近代题材较战前多了一些。历史系 1945 年的 32 篇论文中有 12 篇是论及晚清政治和外交的内容，其中包括了研究李鸿章对日交涉和义和团的起源等问题。也许是学生毕竟年轻，与时代联系密切的现代题材对他们更有吸引力。^③

^① 之京：《顾随传略》，《补传》，第四辑，第 335、338 页；《辅仁校友通讯》，第十三期，第 29—31 页。

^② 《辅仁校友通讯》，第 13 期，1991 年，第 29 页；抗战时入学的张振玉回忆说：“七七事变”卢沟桥的炮声，惊醒了我投靠北京大学国文系的美梦。因为不肯读敌伪‘教育总署’主管的大学，我乃去投考一个与世俗红尘关系疏远的天主教高等学府——北平辅仁大学。”见《辅仁校友通讯》，第 15 期，1993 年，第 28 页。

^③ 《本校毕业论文目录》，见《辅仁学志》，第十卷第一、二合期；第十一卷一、二合期；第十二卷一二合期；第十四卷一、二合期；第十五卷一、二合期。

在日军占领下的北平，辅仁始终处于一种矛盾的境地。一方面困难重重，一方面学校还在继续发展；一方面处于日军的威胁之下，一方面还享有有限的自由。在学术上也是如此。1939年暑假，为了应付学生急剧增加的局面，沈兼士和余嘉锡为帮助同学课外研究，发起组织辅仁大学国文系语言文字学会。教师、研究生和三、四年级本科生经人介绍均可参加。学会的活动有专题演讲和组织学生编纂文学字典。余嘉锡、沈兼士、于省吾、周祖谟、刘盼遂、陆宗达、陈君哲等都曾作过如何治学以及文字、音韵学方面的报告。1941年还出版了演讲集。1941年5月历史系成立了历史学会，陈垣、张星烺、余嘉锡、牟润孙、柴德赓、胡鲁士、顾随、叶德禄都参与其事。《辅仁学志》称该会“成绩斐然”。^①

《辅仁学志》也是抗战中为数不多能正常出版的学术刊物之一。从1938年起，在《学志》上发表文章的学者有陈垣、方苏生、刘厚滋、启功、周祖谟、余嘉锡、唐兰、牟润孙、单士元、王静如、英千里、孙楷第、冯承钧，储皖峰、张鸿祥、沈兼士、于省吾、张德泽、魏建功、叶德禄、葛信益、赵光贤、柴德赓、余逊、冯先慈、孙德宣、朱师辙、李玄伯、戴君仁等。《辅仁学志》1943年出到第十二期后也告停顿。^②除了学报之外，1938年到1945年间出了《华裔学志》第三卷至第十卷。1942年到1945年出了《民俗学志》第一卷至第四卷。1939年到1942年《辅仁文苑》一至十期出版。此外还出版了为数不多的文史著作，计有：《天壤阁甲骨文存并考释》，唐兰著，1939年；《释氏疑年录》，陈垣著，1939年；《明季滇黔佛教考》，陈垣著，1940年；《古礼制研究》，高步瀛遗著，1941年；《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陈垣著，1941年；《民元

①《本校学术消息》，《辅仁学志》第八卷第二期；第十卷第一、二合期。

②《燕京学报》，第三十期，第340页。

以来天主教史论丛》，叶德禄编1943年；《广韵声系》，沈兼士编，1945年。

《燕京学报》在复刊后的第三十期上全面介绍了辅仁在战争时期的各类学术著作，可见对这些成果的重视。就学术方法而言，辅仁学者与战前是一脉相承。但国学是民族性很鲜明的学问。一个国家历史文化的教学与研究，本身就是在宏扬一种民族文化。辅仁在日军当局用行政手段强制推进日本语言文化教育时，组织学会讨论和研究祖国语言文字、历史文化，其意义不言自明。中国历来有经世致用的传统，辅仁抗战时期的国学研究，已经不纯粹是为学术而学术，而是贯穿着一种民族主义精神。1943年陈垣在给友人的信中曾经概括说过：“至于史学，此间风气亦变。从前专重考证，服膺嘉定钱氏。事变后颇趋重实用，推尊昆山顾氏。近又进一步，顾提倡有意义之史学。故前两年讲《日知录》，今年讲《结奇亭集》，亦欲以正人心，端士习，不徒为精密之考证也。”^①

实际上，陈垣本人不仅提倡而且身体力行做“有意义之史学”。八年抗战中，陈垣的考辩之学结合现实需要，用“以古证今”的办法，接连写出七部专著，有些发表在《辅仁学志》上，有些单本出版，这些书都是陈垣要“正人心”，也就是要在沦陷区的知识分子中宣传民族意识的著作。

陈垣的《旧五代史辑本发覆》是用清代四库馆臣在异族统治阶级压迫下，为了逃避文字狱的灾难，战战兢兢改易犯讳字句，以避杀身之祸。陈垣以此研究来影射在日本人高压统治下撰著不得自由的情况。

宗教研究是陈垣最擅长的领域之一。抗战中陈垣发表多部关

^① 陈垣：1943年11月24日，致方豪，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第302页。

于宗教的研究，但每项研究都以古鉴今，发人深省。《明季滇黔佛教考》一书中，他引用了自己首次发现的佛教大丛中明清僧人语录，阐明了明末清初云南贵州地区佛教大盛，不是简单的宗教信仰问题，而是一种“政治避难”，是明末的遗民用“逃禅”作为抗清斗争的一种手段，表现他们忠于故国的思想感情，是一种坚持民族气节的政治行为。陈垣自己提到写此书时，感到“三十年来所著书，以此书为得左右逢源之乐。”多年以后他在“重印后记”中说，此书“所言虽系明季滇黔佛教之盛，遗民逃禅之众，……其实所欲表彰者乃明末遗民之爱国精神、民族气节，不徒佛教史迹而已。”著名文字学家沈兼士写诗称颂此作，其中有“傲骨撑天地，奇文泣鬼神”的评语。《清初僧诤记》是讲清初东南一带抗清的历史，叙述了佛门中故国派与新朝派，即抗战派与投降派斗争的历史，也是在宗教史中表达自己的政治见解。《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更是陈垣的感时之作。陈垣身处敌占区，触景生情，着手研究历史上似曾相识的金灭北宋后北方人民的社会活动。他利用大量道教金石碑刻，弄清了南宋初年，河北人民先后创立全真、大道、太一三教的史实，论证了这些团体与以前的道教不同，它们的信徒都是抗节不仕的遗民，建立道教组织是为了反抗金人的统治，因此被称为新道教。陈垣特别点明这些道教团体创立之初，“不仅消极方面有不仕事敌的操守，积极方面复有济人利物之行，因与明季遗民之逃禅者异曲同工也”。日寇在沦陷区推行愚民政策、进行奴化教育，企图永远奴役中国人民。陈垣在书中对全真道刊行《道藏》一事借题发挥说：“全真家可贵，非徒贵其不仕也。贵其能读书而不仕也。……若因不仕而不读书，则不三二世悉变为无文化之人，此统治者所求而不得也。”他提醒青年在沦陷区也不可荒废学业，以备将来报效祖国。

《通鉴胡注表微》是一部充满爱国思想的抗战史学代表作。书

中对宋末元初胡三省其人其书进行了全面分析和研究，得出了新的结论。全书表达了他对祖国的感情。他把《本朝篇》放在全书之首，说“身在敌区”第一要义即为“爱祖国”、“爱父母之国”。此书的发表是抗战刚刚结束之际，但写作是在抗战之中。陈垣在该书后记里说：“我写《胡注表微》的时候，正当敌人统治着北京，人民在极端黑暗中过活，汉奸更依阿苟容，助纣为虐。同人同学屡次遭受迫害，我自己更是时时受到威胁，精神异常痛苦。阅读胡注，体会了他当日的心情，慨叹彼此的遭遇，忍不住流泪，甚至痛哭。”

陈垣抗战期间所写各书，是学术为现实服务的一种方法。正如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言道、言僧、言史、言考据，皆托词，其实斥汉奸，斥日寇，责当政耳。”^①

不仅是陈垣，其他辅仁学者也是这样。辅仁的教师在课堂内外向学生宣传民族意识和爱国思想，教育青年刻苦读书，等待时机，报效国家。辅仁一些师生在抗战中很为活跃。青年教师和不少学生分别参加了由共产党或者国民党组织的抗日斗争。1939年发起组织辅仁语文学会的文学院长沈兼士，实际上早在“七七事变”后就与辅大几位教授秘密组织了“炎社”，以顾炎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号召文教界参加抗日。后改为华北文教协会，以辅仁为总部，在国民党支持下进行抗日活动。1940年沈兼士以华北文教协会名义出版《辛巳文录初集》，是一本学术论文集，收有各家文章，沈称自己的文章是“汉字义读法之一例”。同年他又印

^① 刘乃和：《陈垣的抗战史学》，见《辅仁校友通讯》，第17期（1995，6），第39—43页。

一本《辛巳文录续集》，但未发行便被日军查抄。^①后来，日军逮捕大批辅仁师生。沈兼士被迫逃到大后方，“炎社”的教师英千里等数次入狱。^②

其他教授如余嘉锡作《杨家将故事考信录》，借“考证小说中明《春秋》严华夷之辨与为国家复仇之大义。”^③赵光贤作《明失辽东考》，周祖谟作《宋亡后仕元之儒学教授》，都是有所感而发。其实，学者向来有自己的政治信仰，任何学术活动从来都是在一定政治形势下进行的。当然学术不是政治，学术和政治的距离是有远近之分的，但是危机年代使得国学靠近了政治。辅仁的抗战学术，一方面是在战时继续挖掘民族文化的遗产，一方面体现了学术与现实政治的关系，成为近代国学史上的一个重要现象。

二、勉力维持：太平洋战争前的燕京 和 华东基督教联合大学

卢沟桥事变以后，司徒雷登决定以美国教会的名义，继续在北平办学。曾经担任燕京法学院院长的吴其玉在半个世纪后分析说：“从这个决策以后的效果来看，可以说是正确的，虽然也是不得已的。因为它至少使华北不愿投敌的优秀青年男女有一个像样的求学地方，还为抗战的后方培养一些人才。更进一步，还为敌

^① 《胡适往来书信选》，中华书局，1946年8月25日。转自《新文学史料》，1984年，第3期，第123页。

^② 孙金铭：《狱中纪实—勿忘国耻》，《辅仁校友通讯》，第17期，1995年，第19页。

^③ 牟润孙：《学兼汉宋的余季豫先生》，见牟润孙著：《海遗杂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34页。

占区的地下抗日力量提供一个隐蔽所，或联络站。但它是付出了一定代价的。因为它必须在当时的情况下托庇于美国国旗的保护，作为一个美国办的学校而存在。”^①

当时燕京的情况有点像辅仁，由于许多学生不愿在日本人控制的学校上课，燕京教师接纳的学生也大大超过了战前。^②抗战中燕京的国学师资仍有改进。语言学家林焱回忆说：“我入学时已是抗日战争开始后的第二年，大部分高校都已南迁，但是燕大国学系的教师阵容仍是相当强的。教授有吴宓川、郭绍虞、容庚、董璠、顾颉等先生，那时凌敬言、王西澄、杨明照、许世瑛、瞿润缙、林培志、黄如文等先生还都是中青年教师。1940年以后，国文系又陆续聘请了梁启雄、王静如等先生来校任教，高名凯先生不久也从海外回来，教师阵容进一步加强。”^③当时国文系的师生都相当活跃，国文学会每学期都有几次学术报告。以后成为燕京学术强项的现代语言学教研计划，就在这时提上了日程。^④

燕大历史系在太平洋战争之前也有发展。1940年新聘裴文中、翁独健、聂崇歧、侯仁之、王钟翰任教师。除了原来的本科外，还增设清史、隋唐五代史、上古史、蒙古史、日本史、西洋史的研究班。特别是历史系史前古物陈列馆经裴文中的筹备，在1940年12月正式开放。馆中收罗史前古物标本极为丰富，大部分

^① 吴其玉：《成都燕京大学的一些回忆》，《燕大文史资料》，第一辑，1988年，第50页。

^② 司徒雷登在1939·1940的年度报告中说：“1939到1940年整个大学入学人数罕见地增多。尽管由于受这一地区大学生住宿能力的限制，我们以前把入学人数规定在800人，但1939年秋入学人数是932人，1940年春是934人。”联董档案缩微卷，315—4822，第676页。

^③ 林焱：《培育我成长的燕大国文系》，《燕大文史资料》，第四辑，第124—125页。

^④ 联董档案缩微卷，315—4822，第679页。

为裴文中历年在周口店发掘所得者。裴称“在中国，考古学发达很早，但史前学之开始，也不过是近二十年之事。至于史前学列入大学课程之中，更是以本年在燕京大学开始。”^① 为了抵制日本人想插手燕京的企图，在新聘教师中还有“热爱中国的”70多岁的日本人鸟居龙藏。鸟居龙藏是当时中外学者都很佩服的著名考古学家。^② 他在燕京时期发表了许多优秀的学术成果。

卢沟桥事变前，燕京大学的学术事业有一派发展的景象，国学研究中尤其是史学的业绩特别显著。抗战爆发后，顾颉刚离开北京，以他为中心的一些活动都停顿下来。但其它的学术活动还得以维持着。燕大教师的研究著作继续发表在燕京学报上。洪业主持下的哈燕社计划，在引得编纂方面仍然取得了很大的成果。引得编纂处在抗战爆发时已经出书正刊36种，特刊16种。这类引得在国内外都很受欢迎。洪业在1940年还赴哈佛作短期访问学者。

燕京的刊物如《燕京学报》、《史学年报》、《文学年报》等，太平洋战争前照常出版。齐思和在《〈史学年报〉十年来之回顾》中说：“十年来海内鼎沸，四郊多垒，举国无一口不在风雨飘摇之中。在此非常时期，本刊犹能维持至今，未尝间断，且内容逐渐充实，销路日有增益。反观国内其他同类刊物，或发刊数期而中途夭折，或昙花一现而寂焉无闻。及至今日，惟本刊硕果仅存，巍为灵光，实非始愿所及，则同人亦不得不私自庆幸矣。”^③ 这实际上是燕京所有刊物的共同特点。但是，学报也明显受到战争的影响，抗战中学报的作者大都限于燕京校内，校外的作者越来越少。

① 裴文中：《中国史前学上之重要发见》，《史学年报》，第三卷第二册，第1页。

② 陈毓贤：《洪业传》，第126页。

③ 《史学年报》，第二卷第五期，第543页。

抗战中哈燕社继续支持燕京的学术活动。在哈燕社的计划中燕京至少是中国教会大学中的重点大学。1940年,哈燕社请当时任哈燕社北平干事的洪业就学社的未来提出建议,洪业在报告中说:“自从哈佛与燕京的名字联在一起公诸于世以来,12年快过去了,两个学校明确地携手从事一项事业,这项事业不仅确保了对燕京的中国学研究给以财政上实质性的支持,而且也保证了以哈佛多年来最高水准的研究院教学的丰富经验,给燕京以有价值的指导。由于这些和其它方面的原因,这里研究生教育和研究的设施已经得到了显著的改进,教学和出版物的水平也得到了提高。”但是洪业批评了由于学社行政领导的不完善和因美国经济萧条而削减资助的影响,燕京的成绩还不够大。他希望学社在美国经济好转之后,增加对中国大学的支持。同时洪业系统地提出了在燕京开展研究生教育与研究的5年规划,希望通过5年的努力,燕京除了有较好的本科和硕士教育外,还可以培养自己的博士。^①当时中国抗战胜利的曙光还很遥远,但这批中美学者都相信中国的最终胜利只是时间问题,现在就要为未来作好计划,而洪业为发展燕京教育事业确实是目光远大,煞费苦心。不过,他们的看法可能过于乐观了,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这个计划尚未展开就夭折了。

“七七事变”后到太平洋战争前,燕京在日军用“新体制、新秩序、共存共荣和德政新民”等谬论来奴化人民之际,保持了学术独立的地位,这实际上表示了对侵略者的一种蔑视。正如司徒雷登在回忆录中说的:“四年多来,我们保住了我们这块小小的自

^① 1940年2月10日,洪业致哈燕社报告,联董档案缩微卷,315—4823,第718—744页。

由绿洲。”^①当然，燕京这样做引起了日本侵略者的敌视与仇恨，认为它是一个在占领区内的抗日文化及政治据点，事实上也正是如此。^②日本人早就想把它彻底除掉，只是碍于和美国十分紧张的关系而不敢动手。太平洋战争一打响，日军马上封闭燕京。日本侵略者在接收燕京时是极其残暴的，当日除在天津逮捕司徒雷登外，还把燕京校内全部的英美籍教职员作为战俘，送往山东的集中营。他们还逮捕了一批燕京学生和资深教职员，其中包括洪业、邓之诚，陆志韦、赵紫宸、张东荪、蔡一谔、周学章、陈其山、赵承信等。吴其玉叹曰：“吾人由此可知国家命运与大学教育相关之切。”^③

与燕京一样，东南沿海的基督教大学，包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④之江学院、沪江大学、东吴大学和圣约翰大学都在上海租界办学，借孤岛暂避战火。朱维之当时在沪江，在抗战初期还能从事《中国文艺思潮史略》和《基督教与文学》两书的写作。^⑤太平洋战争之后，各校各奔东西。沪江在上海改换名称，苦撑待变。当时所能维持教学的以文科为主。王治心教《中国文化史》，朱维之教《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法》，黄云眉教《诗词作法》，但学生人数很少。^⑥东吴和之江学校体制被打乱，一部分到福建邵武，借福建协和大学设备维持，一部分到大后方，还有一些则留在上海借中学校舍办学。

① 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第 128 页。

② 燕京师生中许多投身抗战，司徒雷登在写给燕京美国托事会的秘密报告中对日本侵华作了深刻的揭露。联营档案缩微卷，360—5541，第 15—17、41—43 页。

③ 《燕京社会科学》，第 208 页。

④ 金陵女子文理学院最后迁往成都。

⑤ 朱维之：《沪江的二八年华》，见《沪江大学纪念集》，第 28 页。

⑥ 丁景唐：《二进沪江》，《沪江大学纪念集》，第 57 页。

三、战时国学中心之一：成都教会大学

抗战爆发后，日军蓄意摧毁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战区的各类大学涌向大西南。因为有华西大学在成都，许多教会大学都与华西联系，华西也尽力相助。1938年夏秋之间，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和齐鲁大学最早在蓉复校。1942年秋，燕京大学也在成都重新开学。成都一时汇聚了5所教会大学，成为战时教会大学的集中地。

大学多，学者也多。从前各据一地的著名学者，如今战争时期不少流寓成都。当时蜚声海内外的国学大师中，顾颉刚、陈寅恪、钱穆、吴宓等都受聘于教会大学，成为一时的盛事。优良师资的人汇集自然会影响国学研究的发展。相比之下，理工农医各科目，样样离不开实验设备，教学与研究都极受限制。文科虽然也缺乏图书资料，但受到的影响要小一些。同时，大西南巴蜀社会和少数民族地区独特的人文景观和丰富的原始资料，则成为学者们新的研究对象。因此，在国学这一领域各大学既自谋发展又互相联系，既合作又竞争，一时出现了蓬勃的局面。

华西的机遇

华西大学本来就在大后方，没有搬迁之苦，却有无数师友远道而来，促成了许多新发展。尤其是1940年后，院长罗忠恕回国返校，眼见华北、华东各基督教院校文学院都比较健全，因此锐意发展本校文学院。

首先是扩大学校的规模。大量沦陷区青年赴大后方求学，生源空前扩大。抗战前夕华西约有学生560人。1942年增加到900

多人，1945 年达到 1300 多人。文学院的学生在抗战时期更超过其它学院，1945 年达到 500 多人，占学校学生总数的 40%。^①

其次是使学校系科更加合理。抗战前，文学院中有中国文学系、外国文学系、哲学教育系、历史社会系等。原历史社会系实际包括了历史、社会、政治、经济四个组。抗战期间，经济、社会分别独立建系，历史与哲学合并为历史哲学系。抗战期间华西还开始了文科研究生教育。1942 年成立历史研究部，1943 年成立国学研究部。因此，华西已不仅以医牙科闻名社会，文学院也很有起色了。

第三是延揽人才。华西趁一些著名学者流寓成都的机会，增聘名流来校任教，改善师资条件。哲学历史系成立之初即聘请蒙文通、何鲁之，蒙思明，郭木道，牟宗三，罗忠恕等任教。顾颉刚、钱穆也来系里兼课。1943 年聘请钱穆为专任教授，并曾主持历史研究部。1943 年春，聘请冯友兰讲学半年。1946 年春聘请张东荪、萧公权、唐君毅、常燕生、伍非百、郑裕文来校讲学。

抗战期间，华西各方面都有一些新气象，但是发展最快，对华西影响最长久的还是与哈燕社建立了直接联系，并有一定基础的文史教育和研究。抗战中期，哈燕社对有关中国大学的政策越来越明细，除了燕京之外，它极其强调各校的本科教育。^②哈燕社主事者当时认为中国大量的学术出版物是不合标准的，许多大学根本就不具备开展研究的条件。教会大学应该按照循序渐进的办法，从培养人才开始，通过长期的努力来提高中国学的教育和研究水平。哈燕社以哈佛标准来看中国的研究是否适合中国国情是

^① 《华西医科大学校史》，第 74 页。

^② 1940 年《哈燕社有关中国教育活动的政策和步骤的备忘录》，联革档案缩微卷，183—3275，第 743—741 页。

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但是它对包括华西在内的教会大学显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华西国学师资在战前受到哈燕社的批评，认为传统色彩过于浓厚，不能与现代教育研究相适应。抗战的几年中华西师资出出进进，前后有很大的变化，但总的趋势是吸收受过新教育的专门人才。1939年到1942年间，国文系的十多名专职和兼职教师中，除了当地的著名学者外，燕京的硕士毕业生有4名，北大毕业生1名。曾是燕京国文系教授的闻宥也到华西任职。这个师资的构成和战前比，现代色彩增加了不少。^①华西在1939年还筹建了一个华西的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里的研究人员则是清一色的新人，基本上以留学生为主。^②1943年，华西把蒙思明通过哈燕社送到哈佛

① 联革档案缩微卷，281-4424B，第1036页。

② 联革档案缩微卷，281-4424C，第1025页。

姓名	教育背景	姓名	教育背景
闻宥		韩儒林	巴黎大学
吕湘 (吕叔湘)	牛津大学、伦敦大学	刘咸	牛津大学
傅懋绩	北京大学	蒋大宾	燕京大学硕士
甄尚灵(女)	华西大学	杨汉先(苗族)	华西大学
汪慈仁			

闻宥担任所长，研究员有刘朝阳、吕叔湘、韩儒林、蒋大宾、甄尚灵、傅懋绩、缪钺、赵卫邦、傅康吾（德籍）等。闻宥历任燕京大学、中山大学、山东大学、四川大学、云南大学教授，多年从事语言音韵学的研究。刘朝阳多年来从事中国古代天文历法的研究，久已为国际学者所称许。吕叔湘毕业于东南大学外国语文系，是英国牛津大学、伦敦大学研究生，曾任云南大学教授，以语文学、文字学著称。韩儒林毕业于北平大学，肄业于巴黎大学、柏林大学东方语言研究所，历任燕京和辅仁大学讲师、国立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副研究员。缪钺毕业于北京大学，曾在河南大学和浙江大学教书。傅康吾是德国著名汉学家，研究所还专门聘请国内有名学者陈寅恪、刘咸、李方桂、董作宾等为特约研究员。

深造。华西在给哈燕社的报告中不无自信地说：“保持一个高水准的国文系，一直是我们大学的政策。我们大部分教师除了学术成果之外，都有现代大学的学位。在中国文学和音韵学领域中，我们可能有中国高水平大学中所能有的最好的新老学者的结合。在我校国文系注册的学生是成都 5 大学中最多的。”^①

国学系的课程也发生了变动，基础课得到了加强。在闻宥担任系主任后，课程中包括了历代文选、中国文学史、文学专书选读（史）、文字学概要、历代诗选、训诂学、声韵学、文学专书选读（子）、文学专书选读（经）、文学批评、诗史、传记研究、语言学概要等。^②除了本系的课程，为外系所开的课显著多了，有国文、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化概论、中国地理、中国近世史等。^③教育方法也有所改进。1943 年华西的报告中说：“担任新生课程的教师每月一次与新生开会讨论有关国文基础课的教学方法。每班的学生数量比以前减少许多，使教师能对学生的学业给予更多的关注。学生像以前一样每两周交一次读书笔记，教师可以看到他们读了多少东西。他们每两周要交两篇短论文让教师修改。对国文专业的学生，除了一般课程外，在不同的课上还安排了阅读，特别是阅读全书。”^④1944 年华西的报告进一步总结说：“国文系今年有实质性的改善，包括以下要点：第一，所有新教师都受过严格的现代训练；第二，大多数教材都是把问题或观点系统化和综合化了，而不像以前那样拿旧书当教材；第三，除了课堂教学外，注意到了学生的自学，帮助他们消化所学东西；第四，认识到了本

① 联查档案缩微卷，281-4424C，第 1046—1047 页。

② 联查档案缩微卷，281-4424B，第 997 页。

③ 联查档案缩微卷，281-4424B，第 943 页。

④ 联查档案缩微卷，281-4424C，第 1046—1047 页。

系学生过去对外语掌握太差，这使他们几乎不能学会新方法，使用可资比较的外文资料。现在有目的地提高他们的外语水平；第五，新生受到了更积极的培养，在有系统地安排下，教材增加了，组织得更好了。”“改作业的方法更现代更科学化了。在未来的两三年中，这方面还能取得更多成果。”^① 这些报告中的内容具体做得怎么样，现在已经不太容易考证了，但是至少教育思想的进步是非常显著的。

华西的学术研究比较以前也有很大的不同。《华西学报》继续出版。中国文化研究所的出版物有《华西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论丛》、《华西大学文化研究所集刊》（西文名 *Studia Serica*）两种刊物，尤以《集刊》学术质量高，在国内有较高声誉。从刊物的有关目录来看，研究方向非常具体明确。^② 大部分研究可以纳入人类学、少数民族历史研究的范围，这在所谓国学研究中令人耳目一新。^③ 华西的文字音韵学开始在学术界有较大的影响。闻宥所著《摩西象形文字之研究》在中央研究院《人类学刊》第二卷发表，被认为是具有创见的专著。华西中国文化研究所的刊物在国内外

① 联董档案缩微卷，281—4424D，第 1006 页。

② 如 1940 年的《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第二卷中的论文有：《中国人脑骨之初步研究》，吴定良；《大花苗体质之初步测量及观察》，颜回；《贵州安顺以苗之服装及刺绣图案》，鲍克兰；《四分一月说补正》，董作宾；《海南黎人面具考》，刘咸；《罗马凯撒与关羽在西藏》，韩儒林；《川西羌语之初步分析》，闻宥；《维西麽些研究》，陶懋孳；《成都蒙文圣旨碑考释》，韩儒林。

③ 闻宥的《论民族语言系属》、《民家话中同义字研究》、《羌语比较文法》，韩儒林《吐蕃之王族与汉族》、《蒙古绘刺尔考》，吕叔湘《释俺附论们字》、《汉语第三人称代词说》，刘朝阳《周初历法考》，《先秦历法考》，刘咸：The Myth of Dog Ancestry in Asia⁷、《亚洲关于犬的祖先的传说》，李方桂《沙佛、藏汉语的元音》，董作宾的《远方编摩西文字典四种》，刘念和《中国古汉语声韵系统之研究》等都是学术水平很高的作品。

学术界很受推崇，欧美日各国函购交换的很多。这个研究所规模不大，但图书资料不少，而且非常专门化，其中欧美及日本有关汉学和东方学研究（特别是语言学研究）的书刊尤其引人注目。^①此外华西还参与其它教会大学联合编辑出版《中国文化研究汇刊》，在汇刊上发表的文章居各大学之冠。中国文化研究所后来因与哈燕社的政策不符，于 1942 年春结束。此后研究工作通过国文系和博物馆进行，并与齐鲁、金陵和燕京密切合作。^②

抗战期间，博物馆在郑德坤的主持下继续发展。郑德坤对数百件华西史前石器进行研究，参考美国自然科学博物馆材料，把川康史前文化划分为四期，认为是远东新石器时代文化之一支，在史前考古学上有重大贡献。华西边疆研究所对西藏文化的研究，利用了该馆所藏的 4,000 余件西藏标本。李安宅由拉卜楞地区调查归来所著关于喇嘛寺院组织的论文多篇，都可以与馆存器物相印证。华西学者对西南边疆各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的研究，也利用了博物馆的资料。金大中国文化研究所著《蜀中陶石调查》，多取材于此馆珍品。^③博物馆真正发挥了为科研服务的功能。不仅如此，博物馆还对外开放。它的西藏文物特别受参观者的欢迎。1944 年春天到重庆国家展览会参展，200 多件西藏的展品展示了高原人民的生活，大约有 10 万人前来参观。这个博物馆在国际上也颇有名声。美国、英国和印度的学者都在战时参观过这些收藏，其中有许多著名学者，如英国 Durham 大学的仁维克（W. L. Renwick）教授，纽约 Syracuse 大学的葛德石（George B. Cressey, 1896 — 1963）教授，印度 Serampore 阿伯拉罕姆

① 陈翔华等编：《社传》第十一辑，第 50 页。

② 联大档案缩微卷，281-4424C，第 1046-1047 页。

③ 《华西医科大学校史》，第 81 页。

(C. E. Abraham) 教授以及华盛顿来的拉铁摩尔 (Owen Lattimore) 和凯德 (George N. Kates) 博士。华西的报告中说“拉铁摩尔对展示的方法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说这个博物馆可以列入世界上很少几个先进博物馆的行列，它们是以教育和研究为目标，而不是单纯储藏珍贵的古玩。”^①

除了和哈燕社有关的活动外，华西大学的边疆研究所成立于 1942 年，由张凌高校长兼任所长。其研究范围主要属于社会学、人类学方面，但也涉及到国内研究很薄弱的少数民族的历史。研究所经常邀请专家、学者作专题演讲，从华西自然地理、历史文化讲到少数民族的研究，与华西当时的其它研究一样，都令人耳目一新。^② 华西边疆研究所有计划地派研究人员到边疆进行实地考察，或搜集材料、文物，多次举办边疆文物展览，并写成调查报告或论文、专著发表。1944 年秋，该所组织考查团赴西康，分南北两路进行实地考察，并搜集大批西藏经典史籍，又聘请了精通藏文的谢国安、刘立千二人来所工作。他们阅览、摘译、整理了西藏自唐以来的政治史事、宗教源流、名人年谱等，为藏学研究打下了基础。

华西还建立了一些其它的研究机构。教育研究所成立于 1943 年，由傅葆琛主持，出版有《教育与建设》、《华西教育导报》、《华西教育月刊》、《华西教育通讯》等刊物。中国社会史研究室成立于 1944 年春，由姜蕴刚主持，出版《中国社会》月刊。1945 年

^① 联董档案缩微卷，281-4424D，第 1063 页。

^② 如 1942 年 10 月至 1943 年 5 月安排的专题演讲是：1942 年 10 月胡秀英讲《嘉戎族之生活与植物环境之关系》；11 月冯汉骥讲《成都遗存之铭刻》；12 月刘恩兰讲《气候及地理环境于部族社会风俗之影响》；1943 年 1 月戴谦和讲《部族带之模型》；2 月李安宅讲《四川农稼之介绍及改进》；3 月林耀华讲《云贵之苗族》；4 月刘承钊讲《华西之两栖动物》；5 月葛维汉讲《羌族人民的风俗习惯》。

顾颉刚主编《文史杂志》，曾委托该研究室编辑“中国社会史专号”。

总之，抗战中全国学术人士会萃西南，华西聘请教师较易，师资水平有很大提高。学校教育 with 学术研究都有所发展，华西不再是僻处西南默默无闻的教会大学中的小伙伴，而在教育界学术界小有名气，一直到战后还保持了发展的势头。

金陵的复苏

金陵大学是教会大学中较早在成都复校的学校。抗战爆发后，金陵大学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西迁入蜀。1938年3月在成都开学，直到1946年9月才回南京，前后在成都8年多，学校各方面的工作大受影响。成都复校之初，到校职工145人，学生387人，较在南京时少了一半。但金陵大学是一所凝聚力较强的学校，陈裕光多年当校长，办法比较多，校政比较稳定，在抗战中还是获得一定程度的进展。^①

对金大的国学研究来说，战争打断了30年代中期的发展势头。迁成都后也有一些实际困难，金陵的图书资料搬运到成都仅有1/10，有些教师未能同时入川。由于经费问题，原来已经很有影响的《金陵学报》在1940年终于停刊。商承祚描绘当时的情况说：“正当我潜心学术之际，日寇侵华，抗战爆发了。国难当头，迫论学术。”^②

但是，抗战前建立起来的中国文化研究所已经具有一定的经验和规模，迁川后仍能继续运作。中国文化研究所的研究人员比

^① 正如陈裕光总结的“抗战八年，处境虽然困难，但金大科系仍有发展，学生人数年年增加，我心中感到十分快慰。”陈裕光：《回忆金陵大学》，《金陵大学建校一百周年纪念册》，第21页。

^② 《商承祚自传》，《社传》第四辑，第408页。

起战前有增有减。李小缘、徐益棠、商承祚、刘国钧战前已经在所工作，王伊同、刘铭恕、吕叔湘、史岩则是国学所的新人，虽然商承祚 1942 年离开国学所，但从总体上看，国学所的专任研究员实际上与战前差别不大。至于和研究所有联系的国文、历史和社会学三系的教师共有 25 人，其中有不少教师，同时也进行学术研究。集中这样一批研究人员在战时的大学中是不多见的。因此，金大在川时期，在国学研究方面仍然作出相当的成绩。不过，由于地处大西南的实际情况，国学研究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大致说来，一方面沿着战前的学术领域继续深入，一方面开拓新的研究范围。

考古学仍是金大比较重视的领域，战前曾获哈燕社主任叶绥夫的好评。战争期间，由于图书、古物的缺乏，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不得不从书斋转向田野考古，从事古物的调查与考察。四、五年中，考古成果累累，共获得金石、拓片等 2,680 种，既弥补了福氏收藏的不足，又推动了考古学和史学的研究。入川初期，商承祚曾两次赴长沙考察。第一次是 1938 年初，在西迁去蓉途中，路过长沙，得知有古物出土的消息，便前往长沙近郊考察楚汉墓葬制度，又观察各古墓所藏器物形象，收集了该地文物 5 类 66 件。其中漆器、铜器、玉石器、陶土器、丝革等都非常精美，堪称楚文化的代表。1940 年，商得学校同意再入长沙，又获得 7 类 150 件文物。在交通运输很艰难的情况下，安全运抵蓉城，抢救古物于厄运。经过整理研究，他撰写了《长沙古物闻见记》一书以及《长沙古器物图录》、《楚漆器集》等文，在考古界颇负盛名。在以后的几年中，商承祚与刘铭恕等人不辞辛劳，从事古代石刻的调查和考察，如汉阙、崖墓、新津石刻、造象，乃至蜀汉时代碑刻、汉砖花纹等，足迹遍及四川，所得拓片甚多，并发现有字而未经著录之崖墓数处。商等历经数年考察，共得古物、金石、印窑、汉

画等多达 1,000 余件。商承祚将其整理成《四川新津汉崖墓砖墓考略》（刊于金陵学报第十卷一、二合期。）等文。与此同时，史岩进行了壁画调查，也发表了有关成果。文化研究所以有限的经费，支持了考古工作，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后来这项工作中断了。原因是 1940 年商承祚第二次带人去乐山描拓因作为防空工事而可看到的墓藏，但被新闻界误报为金大在发掘四川古墓，这引起了当地舆论的不满，这类考察因此被四川教育厅阻止。金大此后只能将研究转到其他方面。^①商承祚也离开了金大。他未及整理的考古资料，由刘铭恕继续整理，写成《崖墓稽古录》、《本所所藏之西蜀壁画研究》等论文^②

与华西一样，民族学也是金大国学研究的新重点。四川是多民族地区，极有利于进行民族学研究。徐益棠入川后深入少数民族地区，考察雷波小凉山少数民族罗罗的生活。他以实地采集的材料，撰写了《雷波小凉山之罗民》（列为该所的乙种丛书）及《小凉山罗民之类的政治组织》及《罗罗道均图说》等，分别发表于《中国文化研究汇刊》及《边疆研究论丛》等刊物上。1938 年西康建省委员会请金陵大学文学院院长刘国均组织西康社会调查团。该团由社会学、民族学两位教授和经济系、农经系两位学生组成，实地考察西康社会，为西康建省提供了资料。^③1941 年金大成立边区社会研究室，有时也称为边疆社会研究室，实际上是对四川周边的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社会学、历史学方面的研究，仍然可以归纳到民族学的范畴。当时这项活动开展得很积极。据 1943

^① 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 1940—1941 年度报告，联董档案缩微卷，201—3439，第 522 页。

^② 包仁始：《中国文化研究所的成就》、《金陵大学建校一百周年纪念册》，第 45 页。

^③ 程甫云：《西康社会调查团》，《金陵大学建校一百周年纪念册》，第 101 页。

年 4 月的报告,已经进行的工作包括中国边疆研究资料的整理、编制边地人文地图、发行边疆通讯双月刊等等。《边疆研究论丛》是 1940 年继《金陵学报》停刊后出版的一个刊物,共出 3 期,由徐益棠主编。

金陵在抗战时设立了中日战事史料纂辑委员会,由国文系和历史系负责,“纂辑范围则自卢沟桥事变起,至战事结束止。举凡战事经过、外交始末、各地方抗敌始末、各地方战事前后情况、抗战人员之事迹、死难烈士之行状,及匹夫匹妇忠义壮行等等,均在纂辑表彰之列。”虽然这项活动成绩不大,但把当代历史作为研究对象,不失为创新之举。

除了这些新的发展之外,传统意义上国学研究也仍在进行。国学研究所和文学院的教师各就所长,选择专题进行研究。据学校的报告,有许多研究已经写成专书,有的正在进行之中。^①据《金陵学报》和以后成都几所教会大学联合出版的《中国文化研究汇刊》来统计,金陵国学所正式发表的研究成果均出自刘国钧、商承祚、徐益棠、刘铭恕、史岩、吕叔湘、王伊同等 7 人,论文总共 30 篇,集中在古代史、考古学、文字学和历史学、社会学几个方面^②。

战时金陵国学研究所的人员有所变动。上列人员中,刘国钧

^① 1943 年文学院的报告中列举“写成专书的有陈仲子之晬发集注、罗倬汉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考证、高文之汉碑集释、程会昌之目录学丛考、张守义之中国文学疏证、孙望先生之全唐诗补逸、沈祖芬之双白词肌参、刘道和之方言疏证补、王纯祖之中国外交史、陈恭禄之西晋史、丁云孙之党史教材大纲、柯象峰之西康社会之鸟瞰等。现在进行的研究有刘国钧之六朝思想史、高石齐之汉碑研究、陈仲子之诗经集释、罗倬汉之经学通论、张守义之中国文学疏证、丁廷诤之先秦制度考。”《金陵大学史料集》,第 168 页。

^② 参见附录:“教会大学三种主要学报目录”。

是文学院院长。李小缘仍然是国学研究所的所长，但李的专业和志趣是建立一个良好的图书馆系统。李在成都时为了使图书在敌机骚扰时不受损失，在成都附近租房作为书库，亲自看管，一有警报，自己留下看护图书，表示：“要与书籍共存亡”。但李本人不搞研究。以前的专任研究员中，有几名没有到成都。商承祚 1942 年离开研究所，史岩和王伊同在 1943 年可能也离开研究所。1943 年后吕叔湘从华西大学到金大研究所工作，开创了语言学的新领域。白始至终在研究所的是徐益棠、刘铭恕，这两人的研究著作也最多，几乎每期刊物都有作品，甚至一期刊物有两篇论文发表。从发表的论文来看，学者的研究方向，并没有因战争有多大的改变。徐益棠 1943 年以前注重对西南边疆的社会学研究，在 1943 年以后又转向宋史和南京地方史的研究。刘铭恕的研究涉及了汉、辽、宋、元、明等朝代，从内容看有考古学、经济史、文化史。以今天的研究惯例言，这种研究范围的跨度比较大，不易深入。这很能反映出金大的研究受到资料限制的困难，与战前蓬勃发展局面比，是不可同日而语了。

齐大加强国学所

1937 年 10 月，齐大校方决定大部师生员工迁到大西南。1938 年秋，除了医学院之外，齐大也在成都复校。到 1939 年学校也已逐步走上正轨。当时刘书铭当校长，很想提高齐大的学术水平。

齐大到成都后，住进华西协合大学。迁校后国学所的人员发生很大变动。老舍投身抗战宣传动员工作，忙着编辑双月刊《抗到底》。国学所中只有个别人到了成都。但与济南相比，成都几乎成了抗战时期全国的学术文化中心，大西南聚集了许多流亡学者。齐鲁作为教会大学有相对稳定的经费来源，这给齐大延聘国学人才也提供了一些有利条件。特别是齐大校长刘书铭有意发展学术研究，提高齐大的声望。1939 年 5 月，齐大聘请国学大师顾颉刚

出任国学所所长。9月,顾到所工作。^①

顾是当时第一流的学者,此前一直在北大、燕京等最高学府从事研究,他到任以后满心希望把齐大国学所办成一个第一流的学术机构。他一改国学所在济南时多少带有学术地域化的作法,大刀阔斧地做了两件事来发展国学所。一是广邀国内名流来所工作。以顾的学术地位和名望,国学所聘请学术界的知名人士自非难事。钱穆接受顾颉刚的邀请参加国学所工作,先是在上海为齐大编辑《齐鲁学报》,1940年10月钱到成都。胡福林(厚宣)也于同年10月来所任职,胡为学生讲授殷商史,同时继续作甲骨研究。张维华在史学界已经颇有名气,此时回齐大继续作中西交通史的研究与教学。吕思勉曾接受国学所的经费,在上海为国学所购买图书设备,负责出版《齐鲁学报》。^②杨宽也为国学所编辑过战国史资料。^③顾颉刚还曾设法邀请北京大学的佛学教授汤用彤,不过因故未果。当时在齐大国学所的还有侯宝彭、汤吉禾、孙次舟、王树民、张维思等。研究所一时实力大增。1940年国民党政府组织了一个11人的“历史编撰委员会”,其中有3人(顾、钱、吕)在齐大国学所。^④1940年,顾颉刚又邀请一批知名学者作校外研究员,具体方法是请这些学者提出切实可行的研究计划,然后学校与学者签订项目合同,用哈佛燕京社的经费出版他们的研究成果。二是申请建立文科研究所,招收研究生。因为战争,一些原来的研究机构停止招生,一些学生继续深造成了问题。顾本人在燕大已培养研究生多年。1940年5月刘书铭和顾颉刚为此专门拟定计

① 顾颉:《顾颉刚年谱》,第290页。

② 齐档, J109-03-11。

③ 《历史激流中的动荡和曲折:杨宽自传》,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129页。

④ 齐档, J109-03-11。

划准备创办齐鲁大学文科研究所，先设立历史研究部，正式招收研究生。但教育部可能考虑到抗战期间齐大借地办学的条件，批文中建议应“致力于本科各学系的充实及发展，所请创办文科研究所一节，应暂从缓议”。^①因此这个建议没有能得到国民政府的批准。

顾颉刚采取这些措施是想提高齐鲁国学所的研究水平。但是这时哈燕社与齐鲁的看法很不一致。第一，哈燕社对齐鲁国学所在济南时的研究成果不很满意。1939年12月叶绥夫在给齐大校长刘书铭的信中批评了国学所的工作。他认为从送到哈佛的出版物看，研究人员缺乏创造力，也缺乏正确的研究方法，真正有价值的不多。他认为齐大非常需要有人来指导他们“近代的研究法”，希望齐大选送青年人到燕京进而到哈佛深造培养。^②第二，哈燕社一再强调的是本科教育。因此，齐鲁希望扩大研究所的做法遭到了哈燕社的反对。哈燕社社长叶绥夫认为齐人对哈燕社基金使用不当。1941年12月5日哈燕社托事会通过的齐大基金使用决议中说，哈燕社不同意将学社的基金用来出版和齐大无关系的人所撰的书籍，也不同意用基金来资助初学者的研究，而应用来补助大学中有能力的学者的研究工作。哈燕社认为齐大是小型综合性大学，应注重本科教育，首先充实大学普通课程，然后进行高级课程的教育，这仍是哈燕社的一贯方针。至于高级的研究生工作应由其它大学来作。^③总起来说，哈燕社主要从学社经费使用原则来考虑，如果齐鲁能用政府的资助建立研究院，哈燕社声明它“是不能有意见的。”同时在学术研究方面，它重视质量胜于数

① “教育部指令”，1940年9月9日，齐档，J109-03-2。

② 1939年12月19日叶绥夫致刘书铭信，齐档，J109-01-102。

③ 齐档，J109-1-102。

量。当时它竭力主张金陵、齐鲁、华西应联合出一刊物，这可以得到专款以外的支持，它称“此举是为了帮助提高中国出版物的标准及设法消除无数在质量上和学术标准不相称的出版物”。^①

顾的计划受到哈燕社的否定，哈燕社方面对顾也颇有微词。如1940年叶绥夫不同意顾使用齐鲁哈燕社主任的名义。1941年叶要求顾解释接受哈燕社资助但迄今没有完成的尚书研究项目。^②这一系列事情当然不会使顾感到愉快。哈燕社与顾的分歧，除了对工作重点的看法外，可能还有学术上的门户之见。^③1941年下半年起顾离成都赴重庆，指导学术研究，但仍以部分时间在国学所工作。1942年4月顾辞去齐大职务，主持中国历史学会的“中国历史研究计划”。钱穆接任国学所主任。^④

钱穆任职期间，国学所的政策发生很大变化。在1942年度的报告中，齐大认为过去研究所的工作沿着三个方面开展：研究、培养本科生、培养研究生，三者之中最着重的是第一方面。现在认识到这三个任务对国学所的经济力量而言是“太庞大了”，而且和哈佛燕京学社的宗旨也不符合。钱穆任职期间采取了坚决和大幅度的步骤，使国学所的工作与哈燕托事会的方针相一致。首先终止了聘请校外学者作研究的计划。那些能在1943年完成研究的学者可将手稿送吕思勉（国学所在上海的委托人），照付原定的经费。预期在1943年后完成的计划全部停止，按已完成部分付酬。同时，

① 齐档，J109-01-102。

② 1940年12月10日叶绥夫给顾颉刚的信，1932年4月，哈燕社决定于3年内给顾2000美元，请其做一部尚书历史研究。但叶注意到哈燕社没有收到该书，叶要求要么交书，要么退钱，否则董事会没法交代。齐档，J109-01-102。

③ 1946年1月4日叶给纽约齐鲁大学董事会的信，他认为顾颉刚是一个非常有力的推动者，但不是一个有建设性的学者。齐档，J109-01-102。

④ 齐档，J9-3-11，第242页。

国学所决定把重点放在课程上，增加授课时间，在国文系使中国哲学课程多于中国语言文学课。历史系重点在于古代和中国近代历史。在教课方面，教师负担都增加了，只有钱穆例外，他作为国学所主任每周有 6 课时。^①

在齐大收缩国学所时，哈燕社鉴于和该社有联系的燕京、齐鲁、金陵和华西都聚集在成都办学，它制定了一个协调这些教会大学国学教育和国学研究的备忘录。这份文件强调了这些大学应该首先注重培养本科人才，要在战后为全国学校输送“根据近代方法训练的合格国学教员”。其次，它还认为 4 所大学应该有一个平衡的国学教研计划，在“国学研究范围内应有语言、文学及历史课程，至少要有一门地理学或考古学课程”，同时学生“须详细地了解他们祖国的文学，应把中国历史文学作为普通课程来教授”。对于学术研究，它认为不应为研究而研究，只有利用当地原始材料及能够完成的研究才能得到资助。^②显然，哈燕社的重点是先完善课程，再是学术研究，学术研究要有充分的资料基础。此后成都 4 所教会大学成立了国学研究委员会。

齐鲁国学所压缩人员，加强基础课程，不仅符合哈燕社的要求，在战时条件下也只能如此。不过哈燕社几乎要砍掉齐鲁的所有研究，这对一所在竞争中的大学来说显然是不利的。因此齐鲁也不是绝对照章办理，如哈燕社要取消三大学的自办刊物。齐鲁的《齐鲁学报》、《齐大国学季刊》不久停刊，但《责善》半月刊经顾颉刚力争而保留了一段时期。^③当时，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大学、齐大和华西协合在学术上各有所长，如金大长于考古学，齐

① 齐档，J109-03-11。

② 1942 年哈燕学社备忘录，齐档，J109-1-100，98。

③ 顾颉刚：《顾颉刚年谱》，第 308 页。

大有古代史的优势，华西有语言音韵学方面的基础。各大学汇在一处有利于彼此的交流和合作。1941年根据哈燕社的意见，金大、齐大和华西各推 3 名代表，组成编辑委员会，联合出版《中国文化研究汇刊》，在学术界声誉很好。哈佛方面也比较推崇胡福林的甲骨文研究，钱穆的《中国历史读本》，张维华的中西交通史研究。在它看来这是属于以近代方法作出来的新研究。

但是从整个来看，直到抗战结束，哈燕社方面对齐大国学所批评较多。一是哈燕社西方式的财务制度相当严格，经费的来龙去脉必须明白无误，对齐大笼统的财务报告多次提出批评。二是哈燕社每年 11 月定期开会，就各大学送达的报告讨论在中国的活动，但齐大的年度报告经常不能在规定时间内送达哈燕社，这对哈燕社来说是难以容忍的。对齐人来说也有实际困难，这所由 14 个差会合办的大学中的宗派问题一直令人头痛，校长不断易人，校政经常陷于混乱。1944 年，校长刘书铭因与医学院意见相左，离开齐大，由汤吉禾代理校长。原来必须在 1943 年送达哈燕社的年度报告到 1944 年上半年还杳无音讯。哈燕社为此扣发了给齐鲁的款项，后经汤吉禾尽力弥补才取得哈燕社的谅解。^①但汤吉禾不久辞职，哈燕社又将和一位新人打交道。

汤吉禾代理校长时曾屡邀在重庆的顾颉刚回成都任国学所所长。在汤吉禾同意顾在齐大主要工作是完成标点二十四史的条件后，顾于 11 月回齐大再任国学所所长。顾打算把国学所分为两部分，语言文字部门留在成都，由胡福林主持。将史学部门移到重庆，由顾自己负责。^②但是，1945 年 1 月齐大发生学潮，顾离开成

① 1944 年，5 月 18 日，叶绶夫致汤吉禾的信，齐档，J109-1-1-102。

② 顾颉刚：《顾颉刚年谱》，第 319、320 页。

都赴重庆，这一计划就此搁浅。^①顾在重庆任复日大学教授和中国出版公司总编辑，不能再回成都，因此辞去齐大国学所所长之职，但齐大仍请他作名誉所长。顾去职以后，1945年齐大新任校长吴克铭请吴金鼎代理所长。吴金鼎毕业于齐大，后去英国伦敦大学深造获考古学博士学位。曾在中央研究院工作10年，是山东龙山（黑陶）文化的发现者。国学所在吴的主持下，聘请了一些著名学者，如历史学家丁山、文史专家彭举、社会史专家常燕生、文学家孙伏园来所工作。

齐鲁大学国学所在成都开展工作7年，在抗战胜利后的总结报告中说，1942年以前，较多发展。但“1943—1945年间，独山失守，人心惶惶。校内校长易人，一切仅维持现状，迄无发展。”并认为困难在于“一、印刷艰难，二、经费不敷，三、生活窘困。而人事多变，尤为牵制”。其实就抗战时期的学术大局看，齐鲁的出版成果是比较丰富的。^②其中胡福林7年中始终在国学所工作。除了在刊物上发表论文9篇外，在国学所出了8本关于甲骨学和商代史的专书。即《甲骨学商史论丛》初集四册，续集二册，《甲骨六录》一册，《甲骨学类目》一册。吴金鼎的《成都盆地古迹》也是考古学方面的重要发现。^③张维华在中西关系研究方面成绩显著，他后来出版的著作，大部分是在这一时期打下的基础。齐鲁为一批学者提供了较稳定的研究条件，使他们在抗战时期，得以继续从事学术工作。张维华在晚年认为，抗战时在齐鲁大学5年

① 顾颉：《顾颉刚年谱》，第319，320页。

② 其中，《齐鲁学报》出了二期，1941年1月及7月，齐大《国学季刊》出了两期；《贲音》半月刊，1941—1942年共出了24期；《甲骨学商史论丛》3集，1944年—1945年出版；四大学汇刊，1941年—1945年4卷；《清代地理沿革表》，赵承澄著，1941年7月。齐档：J9—3—3，第69—74页。

③ 齐鲁大学档案，J9—3—11，第265页。

之久，“才算安下身读了点书”，写出了两部书稿。^①

燕京名师荟萃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北平燕京关闭。1942年燕京在成都复校。当时的条件十分艰苦。燕京的资深教授大都留在北平，为日军所囚，只有一些中年和年轻教授，辗转来到成都。马鉴担任文学院院长。国文系中最初有杨明照。历史系由华西的燕京校友郑德坤当主任，最初的教师只有王钟翰等。起初，教师的配备是以燕京同人为主的。1943年以后，为加强燕京的力量，学校当局聘请了一批在战时流落到大西南的著名学者。成都燕大聘请了在国内外学术界享有盛名的陈寅恪（历史）、萧公权（政治）、李方桂（语言）、吴宓（文学）、徐中舒（上古史）、赵人隽（经济）等来校讲课，使学校生辉，学生受益。据说燕京“教授待遇，历来月薪以360元为限，但对于陈寅恪等6位特约教授，特订为450元，超过代理校长等学校行政负责人的月薪，聊表崇敬。”除了上述六位特约教授外，燕京文、理、法三院中的名教授、名学者堪称济济一堂，人才荟萃。^②

到1943年时，历史系中国史课程由陈寅恪、徐中舒、郑德坤和王钟翰担任，阵容相当强。^③国文系也是如此。林焘回忆说：“（国文系）刚复校时师生一共不到10人，有些课开不出来，只好到华西坝去听华西大学和齐鲁大学等校的课程。1943年学校请

① 张维华：《明清之际中西关系简史》，济南，齐鲁书社1987年版，第2页。

② 据不完全统计：文、法学院中荣获博士学位的教授有梅贻宝、吴其玉、李安宅、林耀华、郑德坤、李焯林、陈芳芝、施友忠等先生。马鉴教授、郑林庄教授、周劭秋教授、关瑞音教授、廖泰初教授等均为知名学者。《抗战期间迁蓉的燕京大学》，燕大成都校友会（姚志坚、陈恩元、王源、范敏一执笔）整理1985年6月，《燕大文史资料》第三辑，第184页。

③ 《燕京社会科学》，第一，1948年11月，第248页。

来了陈寅恪、李方桂、吴宓、萧公权四位大师来任客座教授，当时被称为燕大‘四大名旦’，文法学院教师阵容为之大振。陈先生是历史系的，但也为国文系开‘元白诗’。李先生是国文系的，但也为英文系开‘语音学’，并且一度任英文系主任。吴先生是英文系的，但也为国文系开‘人文文学’，并且常做与国文有关的学术报告。记得他做的《红楼梦》系列学术报告，非常受同学欢迎，小小的礼堂总是挤得满满的。那时生活虽然很艰苦，学术空气仍是很浓的。尤其是三位大师给国文系开课，国文系可以说是得天独厚。”^① 1948年从国文系毕业的钱家珏也说：“当时记得在成都时有：著名语言学家李方桂先生开的‘语言学’及‘台语系研究’；曾国藩孙女曾宪楷女士开的‘三国志’、‘资治通鉴’、‘史通通释’；红学家吴宓的‘人文文学’；杨明照的‘六朝文’；张静的‘宋词选’等等。那时还可以到华西坝四所大学（华西、金陵、齐鲁、金女大）去选课，如孙伏园先生的‘小说戏曲选’、‘鲁迅小说选’。”^②

在成都燕大担任法学系主任的吴其玉总结在成都办学的经历说：“依我个人的看法，燕京在成都的复校除了恢复校绪使不中断以外，更重要的是这种复校是对整个燕京教育、对燕京人（即师生员工）的一种考验，对他们民族立场或爱国心的一种考验。他们确实经受住了这些考验。……他们还在一个十分艰苦困难的环境下，以大无畏的精神、坚毅的魄力表现了不屈不挠的民族精神或爱国立场。同时尽力维持在燕京的教育理想和质量，而且还哺育了进步的力量。所以在短短的四年内能够在简陋的校舍内，设

^① 林杰：《培育我成长的燕大国文系》，《燕大文史资料》第四辑，第124—125页。

^② 钱家珏（1948年毕业）《四十年后话燕京》，《燕大文史资料》第三辑，第410页。

备情况很差的情况下，以数量不多的师生员工把学校办得蒸蒸日上，使燕京在成都变成一块‘金招牌’，并把成都的学术空气和水平推向前进。这一结论我认为是很客观的。”^①

不过，燕京原来的研究计划都因战时受到影响。《燕京学报》、《史学年报》和《文学年报》都随北平燕京的关闭而停刊。尤其重要的是，燕京的学术队伍星散，战前的许多学者失去了学术研究的条件，因此研究著作比较少。但在1944年以后，燕大参与原来由华西、齐鲁和金陵合办的《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的编辑工作。列名燕京的学者开始在《汇刊》上发表文章。陈寅恪、徐中舒在《汇刊》上分别刊出了《连吕宫词笺证》和《井田制度探原》两文。李方桂以燕京大学和中央研究院的两重身份在《汇刊》发表了一篇关于语言学的文章。真正以燕京学者名义发表文章的只有杨明照的《抱朴子外篇补正》、《汉书颜注发覆》和王钟翰的《三国志裴注考证》。就研究规模而言，是今非昔比了。

五大学的联合事业

金陵大学、齐鲁大学、燕京大学及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等教会大学先后迁到成都办学后，加上原来的华西大学，形成了一个教会学校群体。当时各个学校各有优势，同时也都有教师紧缺、经费紧张的困难，因此联合办学，优势互补，推动了各学校的教学和研究。

首先是教课方面的合作。吴贻芳说“华西坝有了五所大学。由于教授不足，各校所开课程允许五大学学生互相选读，各校承认学生读得学分。”^②事实上，当时的许多教授同时在几个教会大学授课的并不鲜见。如郑德坤同时在华西和燕京任职，至于著名学

① 吴其玉：《成都燕京大学的一些回忆》、《燕大文史资料》，第49页。

② 吴贻芳：《金女人四十年》，见《江苏省文史资料》，第十三辑，第8页。

者更是身兼数职，这对授课交流自然极其有利。

联合办学还促进了各校的学术交流。当时，大型、小型的学术讲演会、讨论会、座谈会，名口繁多，整个华西出现一派学术繁荣的景象。这些讲演和座谈讨论的内容非常广泛，涉及社会生活的很多领域，包括哲学、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1941年秋，华西文学院设置文化讲座，先后请国内外知名学者演讲。第一次山罗忠恕讲《文化与大学教育》。其后有史学家钱穆、蒙文通、何鲁之、哲学家冯友兰、医学家侯宝璋及牛津大学修中诚(E. R. Hughie)、剑桥大学李约瑟(Joseph Needham)等来开设讲座。1943年文学院为丰富文科学生生活，专门邀请何文俊教授举办生物哲学讲座。^①

教会大学汇集成都时期还创立了“边疆学会”。华西大学早在1922年就成立了华西边疆研究会。各大学迁来成都后，有兴趣研究中国西部少数民族的语言、风俗习惯和社会环境的学者增多。1941年2月，顾颉刚受委托起草了《中国边疆学会宣言》。3月1日，齐鲁、华西、金陵、金陵女子四大学共同发起召开了中国边疆学会成立大会。正式发表宣言、会章，确定该会以实现民族团结、建立国防、开发富源为目的，对边疆进行调查、设计。但国民党政府以重庆已有边疆学会，并谓总会应设重庆。“华西中国边疆学会”则为分会。该会对华西大学的学术有比较直接的影响。华西后来在学会的基础上正式成立研究机构——华西大学边疆研究所，与本校博物馆以及几个院系配合，进一步深入进行科研、教学与实地考察等工作。抗战期间，以研究边疆为宗旨的三个组织，即华西边疆研究会、中国边疆学会、华西大学边疆研究所，既互相配合又各自独立地开展研究，实地考察，在边疆研究方面取得

^① 《华西医科大学校史》，见73页。

了一定的成绩。

合作进行对外交流，也是当时教会大学联手开展的一项活动。抗战时期，国内战事频繁，交通阻塞，加上国际反法西斯战争正处于紧张阶段，中国各基层单位与国外的交往大量减少。但教会大学有一些有利条件，教职员工中有一部分是外籍人士，中国教师中有的曾经是留学生，有的正在国外留学，他们大都与国外大学、学术机关、文化单位或个人保持着或多或少的联系。这样，抗战时期的成都教会大学成了国内国际学术文化交流的一个中心。五所大学中对外交流较为活跃的是“东西文化学社”。1937年华西文学院院长罗忠恕去英国牛津大学留学。在罗的倡议下，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先后成立了致力于中英文化交流的委员会。剑桥委员会的干事是李约瑟博士。参加这两个委员会的有两校著名的专家教授。两校委员会分别致函中国各大学及华西五大学，希望中英两国大学加强合作。华西、燕大、金大、齐大、金女大 5 所教会大学，以 5 大学校长名义回复牛津、剑桥大学希望建立合作关系，交换学者，加强交流。5 大学后来联合组织了“东西文化学社”，“联络国内外学者，以客观的批判精神，检讨东西文化之价值，并直接交换思想，共同努力于文化之交融及新文化之建设为宗旨。”学社社址设在华西大学，学社定期开会，接待国内外来访学者。张东荪、梁漱溟等来讲学也住该处。1942 年学社接待了英国议会访华团，5 月接待剑桥李约瑟和艾格斯顿来华西进行学术交流。1985 年李约瑟在《李约瑟文集》的中文本序言中说：“1942 年英国政府要我去重庆，并任那里使馆的科学参赞。那时在那里可能只有很少的英国科学家懂中文。在此后的四年间（1942—1946），我负责中英科学合作馆（Sino -- British Science Cooperation Office）的工作，以帮助受封锁的中国科学家、医生、工程师、化学家和数学家。在整个工作期间，我有机会遇到他们

中的许多人。有些人当然对他们自己文化的科学技术史和医学史感兴趣，所以我能得到无可比拟的指导。”^①

成都教会大学最有成绩的学术研究上的合作，主要是创办《中国文化研究汇刊》。当时金陵大学、华西大学、齐鲁大学各有一个中国文化研究所，各自出刊物，哈佛燕京社建议合起来出一个“汇刊”。1941年1月至2月，华西、金陵、齐鲁三大学的国学研究所遵哈佛燕京学社的意见，成立三大学联合出版委员会，以集中人力和经费，出版高质量的学术刊物。顾颉刚、刘书铭、钱穆、张凌高、闻宥、陈裕光、吕叔湘、李小缘、商承祚等任编委会委员，负责编辑《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汇刊》，每年出版一卷。同时还处理三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的其它联合出版事宜。《汇刊》只发表三研究所专任人员的稿件，不收外稿。后来编委会对《汇刊》规定得更仔细，如《汇刊》的内容暂时偏重于中国西部之研究，论文限于考证论文、调查报告、重要史料、书报评论。^②《汇刊》1941年创刊，1943年以后燕京大学加入进来。到1945年9月，共出5卷6册。发表各类研究论文72篇，200余万字。在战时的国学研究中占有突出地位，被傅吾康认为是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的刊物同样重要。^③

① 《华西医科大学校史》，第98页。

② 《金陵大学史料集》，第57-58页。

③ 傅吾康：Sinological Research Work in Free China，《汇刊》，六，1946年。1946年以后，《汇刊》由金陵和华西继续出版至第8卷，第9、10卷成为华西的专刊。

四、动荡环境中的学术研究

比起成都来说，其它几所教会大学的环境要艰苦得多。这也可以分成两种情况。一种是稳定在一个地方办学，另一种是经常搬迁。属于前者有华中大学和福建协和大学，属于后者的有岭南、东吴、沪江等学校，环境不同，学术的发展也不可同日而语。

华中大学

华中大学在战争时期两次西迁。^①不过，由于战火波及较晚，华中搬迁时得以带走大量的藏书和设备。另外，在 1939 年 5 月至 1946 年 5 月间，华中一直稳定在云南大理喜州办学。它的教师构成也有所变化，在它给哈燕社报告中列出的 7 名国学教研人员中，5 名毕业于北大，另 2 名分别毕业于武汉大学和华中大学。其中 1 人有硕士学位。^②因此战争虽然中断了华中许多事业，但它还能坚持开展一些学术活动。特别是新环境给华中的师生一个难得的机会，实地观察和研究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在学术上作出新的探索。

华中的师生首先利用地理之便，研究前人很少接触到的少数民族社会文化。早在 1937 年，国文系得到哈佛燕京学社的资助，开展了对长江中游文化的研究，迁入云南后，研究方向转移到西

^① 余子侠：《华中大学西迁述论》，见章开沅、林蔚编《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第 302—303 页。

^② 卞卓民致哈燕社华中大学 1944—1945 年年度报告，联董档案缩微卷，165—3082，第 313 页。

南少数民族的文化。^①中国文学系、历史社会学系师生主办的《西南边疆问题研究报告》是当时国内、国际边疆文化资料的权威刊物。包鹭滨、游国恩、傅懋绩等人对滇西南诏、向国、佛教种族和各民族语言研究的论文，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另外，华中原先的国学研究计划也仍在进行。1944 年华中大学国文系编辑了“华中大学国学研究论文专刊第一辑”，包括了阴法鲁、包鹭滨、傅懋绩三位作者的 9 篇论文。1944 年华中大学为纪念建校 20 周年，编辑了《华中大学二十周年特刊》，其中国文系有 4 篇论文入选。^②华中这一时期的研究人员较少，成果也不算多，但质量比较高。傅懋绩对西南少数民族部落方言的实地研究报告，受到哈佛燕京社的高度评价。^③战后傅因此得到英国方面的资助，到英国学习语言学。王玉哲写的《鬼方考》获得了 1945 年度全国学术奖金。

另外在教学方面，也取得了新的进展。哈燕社在华中迁到云南后继续提供资助，但在哈燕社的计划中，华中这样的小型大学也必须首先提高国文的本科教育。因此，韦卓民在 1942—1943 年

^① 据现存档案记载，华中大学国文系 1940 年和以后 3 年的研究计划有如下内容：

1. 云南土著居民的分类与分布，包鹭滨； 2. “摆夷”(Bais) 的定义，包鹭滨； 3. “摆夷”的定义(续)，包鹭滨； 4. 云南少数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游国恩； 5. 云南土著民族的文化，游国恩； 6. 云南古代的各种方言，游国恩； 7. “民家”(Morns) 的定义，游国恩； 8. 昆明“倮倮族”的方言，傅懋绩； 9. “lip's”语言，傅懋绩； 10. 云南种族问题研究的参考提要，游国恩、包鹭滨； 11. 云南民族的文学编纂与分类，包鹭滨、游国恩； 12. 云南倮倮族各种方言的调查，傅懋绩。

^② 《华中大学校史》，第 92 页；1941 年华中新生中国文系 11 人，英语系 11 人，经济系 35 人，历史社会系 12 人。到 1945 年时国文系在校学生有 33 人，外文系 39 人，经济系 56 人，历史系 17 人。华中给哈燕社年度报告，联董档案缩微卷，165—307B。

^③ 韦卓民致哈燕社华中大学 1942—1943 年度报告，联董档案缩微卷，165—3082。第 303—306 页

的报告中解释说：“我们未把研究放在第一位，但如果没有研究就很难保持学校的学术兴趣。”^① 在 1944—1945 年的报告中再次强调：“我们主要工作不是研究，但如果不搞研究，就无法维持我们教师和学生的学术水平。”^② 哈燕社这种政策对华中加强本科教育应该是有影响的。战前华中没有国文专业的毕业生，但在离开喜洲时国文系终于有了自己的毕业生。华中的国学系成为学院中最强的一个系。^③

福建协和大学

福建协和大学在抗战期间迁到了邵武。由于日军进攻福建较迟，协和大学的设备、图书资料随校迁移。邵武又是产粮区，粮价波动不大，师生的生活没有受到大的影响。另外，邵武地处深山，很少敌机骚扰，这使得协和大学能在相对安定的环境中维持教学并且与华西一样有所发展。1939 年时学校学生仅 145 名，教职员仅 20 余人。1942 年学生增至 400 余人，教职工增至 60 余人。文科的陈文松、严叔夏、朱柏、黄玉树、陈易园等都是国内著名学者。1942 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官员视察福建协和后对其成绩颇加赞赏。^④

值得一提的是，协和大学的学术研究一直没有停下来，所出的学术刊物《福建文化》在抗战以前一直正常出版。在战争期间，

① 联董档案缩微卷，165—3082，第 303—306 页。

② 联董档案缩微卷，165—3082，第 313 页。

③ John. Coe: *Huachung University*, New York, 1962. p. 154.

④ 教育部参事陈津藻视察协和大学后指出：“协大白迁邵后，学校之内容和精神益形精进，其进步成绩不仅为一般教会学校中之佼佼者，即当前内地一般公私立大学之伦比者，恐亦不甚多见。”《协大校友》，第 37、38 号合刊，1942 年 5 月 15 日。《协大校友》，第 34 号，1942 年 9 月 15 日，见黄新宪：《教会大学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抗战时期的福建协和大学师生〉》。

因为时局紧张，学校搬迁，出版困难，先后停了三次，又恢复了三次。1944年由于形势的好转，福建文化研究会改组为中国文化研究会，原来的《福建文化》改为《福建文化季刊》。再度出版之际编辑者说：“这种为着战时的困难，致停而复出，至再至三，足以表明本刊对于环境的精神，我们希望这一次复刊以后，能克服一切物质之困难，维持出版，以冀能对于战时本国文化的研究作些微的贡献。”“际此抗战接近胜利阶段，教师生活的艰苦，工价纸张的昂贵，将使征稿与印刷更加困难。然我们想到最后的胜利快要来临，战后中国的建设，文化研究为其重要工作之一。所以本刊同人在此诸般困难中，仍想设法维持这一点研究工作，所望国内文化界人士能予以不断的指正，俾这小刊物能对本国学术作绵薄的贡献。”^①但战时的困难使得学术刊物的质量和数量都有所下降，页码减少，稿源也比较单一。

不幸的是，与华中相比，这一时期福建协和大学多次受到哈燕社的批评。叶绥夫在1937年到福建实地访问以后，对这所大学在哈燕社资助下的工作批评较多。当时他的印象是中国文化的研究在这所大学的地位不强。这部分是由地理条件造成的，同时显而易见的是，国学教师是从地方上聘用的，工资较低，并不总是符合大学教育的要求。从燕京来的报告也说，从福建到燕京的学生中文和英文都较差。叶绥夫还指出协大过去几年的报告只是在计划上标时间，意思是指协大只说不做。他指出有必要聘用有效率受过较好训练的教师以加强教学。他还指责学校的图书馆安排也不恰当。叶认为造成这种局面主要是学校内部的问题，校长和行政人员对中国文化研究缺乏兴趣，要求福建协和大学的美国董事会向该校打招呼。代表教会大学参加哈燕社会议的诺思博士

^① 《福建文化》，第三卷第一期（总32期），1944年1月31日。

说，不按原来的计划有可能失掉哈燕社的资助。^①哈燕社对协大国学教育的看法，后来证明与该大学的教师看法相符合。哈燕社对该校的资助并没中止，这种合作关系也一直维持下去。但哈燕社的批评及对福建协和大学报告表现出来的缺乏信心，从该大学送交哈燕社的报告来看，可能也影响了这所大学的积极性。^②

动荡中的几所大学

战争对岭南的打击非常大。岭南在华北战事之初，仍然上课如常。1939年秋，战火迫近，岭南迁往香港。1941年冬迁往粤北。1942年在离曲江不远的大村复校，开始的5个系中有国文系和历史政治系。1945年春日军占领曲江，岭南再度搬迁。经常处于动荡的状态中，维持教学已经不易，学术工作只能陷于停顿。^③

东吴大学和上海的几所教会大学的境遇差不多。1937年从苏州逃出来，四处徘徊一段时间后，落脚在上海公共租界，与圣约翰大学、之江大学和沪江大学合作教学。1941年12月日本占领租界后，东吴大学先到过福建邵武。后来又迁到广东，与岭南合作。但1944年日军进攻湖北威胁广东时再度迁走，整个战争期间没有太平过，正常教学都无法维持。

① “哈燕社致福建基督教大学托事会：对叶绥夫和诺思提交的哈燕社在福建计划进行状况的说明”，联董档案缩微卷，114—2470，第1324—1345页。

② 联董档案缩微卷，114—2471，第1360页。

③ 郭查理：《岭南大学》，见李瑞明编：《岭南大学》，第106—109页；广州中山大学文献馆藏：《抗战期间的岭南》。

五、学术研究 with 抗战

八年抗战，按顾颉刚的说法是将中国学术拖后了 20 年。^①德国学者傅吾康抗战时期一直在四川华西大学教书，1946 年发表长篇学术综述《中日战争时期大后方的汉学研究》。他在文中曾描述了战时的困难：“战时内地的条件对任何研究工作都是极其不利的：不断上涨的物价和极低的工资，对任何创造性的科学工作所需的最低限度的心灵平静和经济需求都无法保证。不断的空袭警报和敌军进攻的消息更加剧了这种困难状况。内地的印刷设备极差，只能生产质量低劣的纸张，进口纸张根本不可能。在这种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一些研究工作仍能完成和出版，这不能不让人赞赏。”^②

应该说，这一时期教会大学的研究是比较突出的。当时的学术出版物大都停了下来，但正如前面提到的，教会大学单独或联合的刊物倒一直在维持着，虽然到后来，纸张越来越差，篇幅也不得不缩小，但终究还能维持下来。就研究成果来说，这些学校在历史、文字和少数民族社会语言风俗等方面的研究，都有不同程度的进展。从傅吾康的综述中可以看出，许多研究成果均出自这些学校。这种情况和战时教会大学的条件有关。第一，经济状况要比国立大学强一些。战时教会大学不仅能从西方得到经费，国

^① 顾颉刚编著：《顾颉刚年谱》，第 327 页。

^② Wolfgang Franke, 'Sinological Research Work in Free China During the war Period 1937-1945', 《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六卷，第 140—141 页。

民政府也给教会大学拨发一些经费。特别是抗战后期物价飞涨时，对教会大学的影响要小得多。费正清在 1943 年 1 月 26 日去成都访问各基督教会开办的大学，他说：“那里的教会学校与我在昆明和李庄所见到的纯粹国立高等学府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前者学生生活得还算不错，后者却被迫接受“原始的农村生活。”^①越到抗战后期，大后方的经济状况越恶化，国立学校的问题也越严重。1944 年闻一多在昆明四大学学生自治会举行的晚会上就讲：“研究？难道我不喜欢研究，我若能好好地看几天书，都是莫大的幸福”，“可是饭都吃不饱，研究什么？”^②就在这一年 7 月李方桂离开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到成都燕京大学教书，一直教到 1946 年。据其夫人的回忆说，在李庄时政府贫困，每月只发起码的生活费用，但“教会学校有庚款补贴，薪金不恶。梅君（贻宝）眼光远大，不惜资金，很能罗致人才”。^③第二，哈佛燕京社对学术工作的继续重视。在抗战中，美中成为盟友，哈佛燕京社始终关注着教会大学国学教育和研究。哈佛燕京社社长叶绥夫通过拨发经费这根杠杆，对相关学校督促和检查非常认真。这对一些学校的学术工作有很大的推动。正其如此，许多学者如前面提到的陈寅恪、钱穆、吴宓一度在教会大学任教研究。众所周知，大学之大，不在于大楼，而在于大师。这些学者的到来对学术水平的提高，作用是很明显的。

但是，说到战争对学术的性质，即对学术的内容和方法有多大的影响也不尽然。陈垣在北平特殊的情况下，借古讽今，搞一点影射史学，发挥学术的时效功能。大后方学术界抗日宣传可以

① 费正清：《费正清自传》，黎鸣等译，第 284 页。

② 《闻一多全集》，第一卷，开明书店 1948 年版，“年谱”第 74 页。

③ 徐懋：《方桂与我五十五年》，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年版，第 64—65 页。

公开进行，学术探讨仍然研究专门学术问题。学术发展的道路一如既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是中国人都明白的道理，不少学者认为维护学术的发展，也是国家文化命脉所系，也就是学者对抗战的贡献。《齐鲁学报》在发刊词中非常明白地说：“夫学问研讨，本属半世之业，然兵文流离，戎马仓皇之际，学术命脉，未尝无护持赓续之望。”他们认为要维护学术文化的命脉，要以黄宗羲、顾炎武和王船山为榜样，“亲见夕阳苦熬黄昏，于沉沉长夜中延此一脉，转此一机，而开有清以来三百年学术之新运也。”^①但是，他们所期待的学术新运是什么呢？这恐怕不是大后方的学者所能预见和回答的问题，而是将由中国社会的政治变革来给教育和学术规范出新的道路。

^① 《齐鲁学报》第一号，1941年版，第1页。

第八章

大变动时代的学人和学术

从抗战胜利到新中国建立，不过短短 4 年左右的时间。教会大学经历了恢复、内战之后，又面临着跨进新社会的历史使命。这是一个决定中国命运的岁月，革命和战争成为时代的中心。在这轰鸣的主旋律下，文化教育事业也在变化，就教会大学及其国学教育和研究来说，这是一个旧时代的终结和一个新时代的开端。

一、战后的恢复和困境

抗战胜利后，大后方的教育机关纷纷迁回原地办学，沦陷区的学校重新开张。教会大学也努力恢复正常的教学秩序，学术研究的复兴是学校的重要目标之一。但是战后各大学的具体条件不同，教学工作好歹都开展起来，师资阵容和学术研究则各有千秋。如果以学报为学校学术发展的标志之一的话，这样的大学已经不

多了^①

燕京大学在 1945 年 10 月就重新开学，自称“筹备之速，复校之早，为其他因事而停之学校所未迨也。”^②复校后学校立即计划恢复出版燕京各种重要刊物，首先筹备出版的是《燕京学报》。当年出版了战后第一期《燕京学报》，刊出 7 篇论文和大量学术消息，再次成为学术界最重要的刊物之一。1946 年以后，燕京的情况已基本正常。^③历史学系“一切渐复旧观”。教授中洪业出国讲学。新聘到哈佛燕京社驻平干事陈观胜讲佛教史，美国芝加哥大学史考特(Scott)讲欧洲发展史、西洋史学史、西洋文化史诸课，邓之诚、齐思和、翁独健、聂崇歧等则担任中国史课程。研究院历史学部遵照教育部定章，改为历史研究所。燕京还计划按洪业在 1940 年的设想设立博士学位。^④

中文系中高名凯开汉语语法、普通语言学；梁启雄开《论语》、《荀子》、《韩非子》、《汉书》等。以后又陆续聘到孙楷第开小说史、戏曲史、目录学；周一良开佛教文学；陈梦家开说文、甲

① 在教会大学中，只有燕京、辅仁、福建、岭南等几所学校还出版学报。国立大学中有学报的更属寥寥。见《中国学报史》。

② 罗久蓉认为燕大复校如此迅速是由各方面因素促成的，第一，燕大是私立大学，免甄审。第二，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燕大被迫关闭，原教务长司徒吉登等二十余位教授被囚，教职员多半留平，转入其他私校授课，因此抗战胜利，师资无缺，复校工作在陆志韦、洪煊莲召集下，立即顺利开展。除此之外，燕京大学摆脱政治、道德包袱，专心致力于教学，为青年学子提供一个求学环境，应是它成功的最大因素之一。复校工作委员会规定除该校沦陷期间参加敌伪工作者一律不得参加复校工作之外，除了严格的考试外，未对学生作任何思想甄别，罗久蓉：《抗战胜利后教育甄审的理论与实际》，《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 22 期，第 231 页。

③ “二年以来，本系已复芦变前之旧观。继此人力物力如渐宽裕，则本系之教学及研究工作自将日趋充实。”《燕京社会科学》，第一卷，1948 年 11 月，第 210 页。

④ 《历史系近十年概况》，《燕京社会科学》第一卷，1948 年 11 月，第 247—248 页。

骨文、金文；林庚开文学史、现代文学史；阎简弼开词选；俞敏开过大众话。不过周一良、陈梦家先后离开燕京。燕大中文系为了开出更多的课，除了请本校的邓之诚、赵紫宸、陆志韦等开课外，又聘请了校外的朱自清、张伯驹、丁省吾兼课。这个课程表和这些教师在各大学中都是数得着的。

无论如何，燕大国文系历史系战前的风光不再，国文系历史系复校初都只有一两个学生，到解放后也只有十来个学生。^①但燕京的其他系科仍在发展，特别是经济和法学等实用学科，燕京法学院在 1948 年 11 月还创办了《燕京社会科学》，内容囊括了历史、社会学、经济学、法学等各个学科的研究成果。这种扩大出版社会科学研究著作的情形在战后是很少见的。不过在战前很有名的《史学年报》、《文学年报》再也没有能继续办下去。

辅仁大学是战时唯一在北京合法开办的大学，在抗战后期有些教师被日人逮捕，有些则被迫离开学校。1945 年 8、9 月间，被捕师生先后被释放，到后方去的教师，如学校秘书长英千旦、文学院院长沈兼士、代院长董洗凡等返回学校，人员有所加强。辅仁也迅速恢复了正常的教学研究，但文史两系的学生较战时下降了近一半。1945 年 12 月，辅仁恢复出版了在 1943 年停刊的《辅仁学志》，发表了陈垣、余嘉锡等在战时未能发表的论文。但到 1947 年，辅仁的经济再度发生困难，《辅仁学制》出到第十五卷终于停刊了。

岭南大学也算是恢复比较快的大学，战后报考岭南的学生超过了历史的最高纪录，学校似乎有很大的发展前景。同时，内战的枪声一时还离得很远，一些知名教授学者开始流向岭南，学校

^① 宋玉珂：《抗战胜利后的燕大中文系》，《燕大文史资料》第四辑，第 126—127 页。

不断聘请新的教员。1946年一直在北京任教的容庚出任了岭南的国文系主任。1948年原来在岭南，后到南开大学的陈序经回到岭南担任校长，陈大力延揽人才。他的新方针是西方教师应该教英语、自然科学和神学，而经济学、社会学和历史学要用中国教师，因为他们对中国的情况更熟悉，能够学以致用。^①同年聘得巴黎大学博士原来在中山大学的王力担任国学教授兼任文学院院长，并在岭南大学顾问委员会委员。^②留美的杨庆堃任社会学教授，讲解中国文化。1949年更聘到了国学大师陈寅恪任历史国文系教授。刘节任中国文学系教授。张纯明担任历史政治系教授。1947年1月因太平洋战争爆发而停刊的《岭南学报》重新出版，虽然学报从以前的季刊不得已改为半年刊，但篇幅很大，最少的一期有150多个页码，多数接近200页，最多竟有306页，这也是学校学术工作恢复的重要标志。^③

华西协合大学是战争中获得发展的少数学校之一。战后短暂的和平时期，华西的学术活动仍然比较活跃。1945年到1946年一批著名学者来华西讲学。^④1946年方叔轩继张凌高任校长后，要求已经有成绩的研究部门继续研究，其它有条件的各系，也要开展研究工作。学校规定“教授于讲课之外，皆兼任研究员，以期于高深学术，多有贡献，并使毕业学生，有志深造者，获得指导”。当时在华西研究中国文化的还有钱穆、闻宥、蒙文通、刘朝阳、庞

① 郭查理：《岭南大学》，见李瑞明编：《岭南大学》，第118页。

② 张谷、王辑国：《王力传》，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

③ 《岭南大学校报》，第34期，1946年10月21日；第83期，1948年10月10日；第94期，1949年3月10日。

④ 其中有潘光旦、张东荪、萧公权及墨学大师任非百等。印度加尔各答大学教授、研究东方美术的日勒博士来校讲印度佛教艺术问题。《华西医科大学校史》，第128页。

石帚、蒙思明、李安宅等，以后钱穆等离开华西。这几年中，以华西为基地的《中国文化研究汇刊》一直继续出版。比较突出的还有李安宅的西藏研究，对西藏人文地理的研究有极大的科学价值。^①值得一提的是华西的学生在国学研究方面也有一些新的进展。1946—1947年文学院学生的论文题目有：《中国话剧之研究》、《中国金元制度实行后物价变动与管理》、《鸦片战争后列强在中国经济之发展》、《成都市之乞丐》、《四川哥老会之研究》等，这些论文反映了学生比较注重对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的探讨研究。但1947年以后，“战乱不已，经费困难，不特发展不易，即现状亦难维持，且时代逼人，内心沉闷，学术空气，乃极为沉寂”。一部分教师，先后离校而去，以致文学院院长在1949年再次大声疾呼要“充实华大文学院。”^②

福建协和大学在福州的校舍在战争后期损失惨重，1946年5月才得以在福州旧址复课。对这所小型大学来说战后的几年是多事之秋。1947年校长林景润在美国去世，新校长陈锡恩一年以后又去职，学校由杨吕栋负责。文学院中国文系和历史系的主任相继去职。国文系教师呼吁校方聘请“博学名高的教授”来振作国文系。历史系情况更困难，在战后一度停止招生。不过这所学校的学报《福建文化》却始终维持着。1946年出了一期，1947年开始出到两期，但篇幅很小，每期只有50多页。哈燕社的新干事陈观胜到协和进行学术考察之后表示要加强该校历史系。1948年以后，福建协和大学校友、燕京历史学硕士陈增辉到校。1949年陈

^① 李收集了大量有关西藏问题的英文典籍并募集了充足的经费，自1945年又增加了谢国安、刘立千两位西藏问题专家，因而研究成果很多。李在美著有《萨氏宗教制度之研究》，还有《藏王世系明鉴》、《玛巴译师传》、《弥拉热巴大师传》等。《华西医科大学校史》，第102、128页。

^② 《华人校刊》1949年4月22日，第6页。

担任了协和大学学报编辑委员会主任，正式出版《协大学报》，取代以前由中国文化研究会编辑的《福建文化》和国文系出的《协大艺文》。在第一期也是最后一期上刊出郑德坤、方豪等人的文章。

上述学校虽然有一些看得见的东西，也是困难重重。岭南在战后属于处境比较好的学校。1947年12月岭南大学“本校发展计划委员会报告书”提出，在通胀日甚的情况下，即使英美籍教员也日感不敷。但是光提高薪金不够，“研究之便利与协助人员必须充分供应，俾此等薪给微薄之教师可于创造工作中获更大报酬，而此等创造工作对于一学府之生命生长关系大也，”要使刊物“常规出版如战前”。^①其它几所大学的学报在抗战后一直没有恢复起来。

金陵大学在国学研究上算是较强的学校。抗战胜利后，学校也力图恢复和发展。在战后大学的招生报告中介绍“金陵大学图书和特别收藏”时说：“大学图书馆有4万册西文书，相当大的世界各地的农书收藏和各种专业杂志。最主要的藏书是20多万册中文书，对地方和地区历史极为重要的方志收藏较多，其中包括了许多社会和农业的资料。图书馆有关于目录学、艺术和考古学的丛书。此外中国文化研究所还有为研究目的收藏的6万多册书，14种日文杂志，20种关于汉学研究成套完整的，或者已有很长历史的西文杂志，3,000种拓本和其它重要的考古资料。文化所收藏的地方志，主要是西南地区的志书，在世界上可居第三位。”“中国文化研究所除了帮助历史系和国文系进行本科教育外，通常有4—6名研究人员提供咨询，也培养为数不多的中国历史研究生。目前，它能在历史和文化研究的目录学、中国语言学和—些边疆和人种学研究的某些科目方面提供最好的帮助。所长在南京的图

^① 《岭南大学校报》第70期，1948年1月10日第10版。

书馆界有很广泛的联系。”^①可以看出经过多年努力，学校在文史哲学科方面已经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但抗战以后，内战烽火即起，国统区政治腐败，经济崩溃，更不是做学问的时候了。金大虽能获得美国救济总署的一些捐赠，仍不敷开支，教学科研经费不得不紧缩。在战后数年中，除农学院于 1948 年增设农业工程组外，系科设置基本维持现状。科研机构按照国民政府教育部 1947 年修订颁布的《大学研究院暂行组织规程》进行改组，撤消原来文、理、农科研究所所设各学部名称，系所合一，研究所均以系名称之，系主任及所有教师均为研究所人员，不另支薪，但也不得因此减少教师教课时数。改组后的研究所，因社会动荡，人心浮动，经费不足，研究事业未能得到振兴。南京大学的校史中说复员后的中国文化研究所“人员星散，已形同虚设。”^②这大概是当时的实际情况。原来在国内很有影响的《金陵学报》在战后一直不能复刊。金大中国文化研究所只能和华西大学合作出版《中国文化研究汇刊》，一直到 1950 年。

齐鲁大学的情况也差不多。抗战一胜利，齐大就计划迁回济南，但交通问题使国学所滞留成都，直到 1946 年才返回济南。这一期间常燕生、丁山先后辞职。国学所回到济南后，吴金鼎正式任所长。从 1939 年起一直在齐大作甲骨文研究的胡福林也离开国学所，但原所长栾调甫回所工作。研究所中还有吴忠臣、刘茂华、傅斯棱、徐庆誉、吴鸣岗、万九和、许衍梁、张维思、张维华等。此时国学所人员比不上在成都时的知名度，但基本上都和齐大有多年的联系，有可能长期在齐大教学和研究，从长计议对国学教育和研究也有益处。但是，此时齐大已经为国学所问题和哈燕社

① 联大档案缩微卷，238—3936，第 1006--1007 页。

② 《南京大学校史》，第 532 页。

发生了严重的分歧。

分歧的焦点还是把国学教育放在什么地位。1945年8月吴克铭出任校长。如同前任校长一样，吴雄心勃勃地要加强国学所的阵容。要在两年内聘请一批“第一流的学者在齐大国学所内工作。”^①叶绥夫对吴要加强国学研究的想法感到吃惊，因为1940年以来叶在给刘书铭和汤吉禾的信中就指出，按哈燕社限制性基金使用的原则，齐鲁在组织好本科教育以前不要开展研究工作。他指出国学所是与哈燕社的要求相背离的，也没有和董事会商量，同时国学所花费太大，花在课程上的费用太少。实际上，齐鲁在基础课程没有组织好的情况下，一直在扩大国学研究。如果把齐鲁的课程与其它大学相比，可见其课程组织不平衡，所有的课程都在古代史，1943—1944学年中基础课太少。学生没有选中西文化交流史。学校没有中国文学史、中国中世纪史、中国近代史。自1938年以来，齐鲁在加强本科教育方面少有改进，相反却增加了研究。董事会认为齐鲁这样的不合理情形由来已久，本科课程越来越少，由于齐鲁开展研究不符合哈燕社的宗旨，基金可能会被停止。因此国学所应被取消，基金应被用来加强本科教育。研究的机会应给予正在上课的教师，以使他可以作有兴趣的研究。最后他认为一所小型大学不必有研究所。^②叶还写信给纽约的齐大董事会，希望董事会对齐大施加影响，在战后制定合理的教学计划。此后，在1947年哈燕社还要求齐大贯彻前述1936年的计划，建立一所农村建设学院。

所有这些批评对齐大来说，有的是合理的。齐鲁大学确实需要改进本科教育。但要求齐鲁不搞研究，在与各大学的竞争中就

^① 1945年8月14日吴克明致叶绥夫信。齐档，J109—1—102。

^② 1945年12月8日叶绥夫致吴克明信。齐档，J109—1—102。

难以立足，齐鲁方面显然不情愿接受这种安排。不过钱在哈燕社手里，只要它想继续得到资助，除了接受哈燕社的要求别无选择。所以 1947 年以后，齐大只能以国文系代替国学所与哈燕社联系。文学院改为农村学院一事则一直拖了下去。1947 年以后，陈观胜担任哈燕社副社长兼北平办事处总干事。1948 年 6 月齐大英籍教授林仰山代表齐大与他讨论了国学教学问题，双方达成一些谅解。哈燕社仍然希望齐大做好课程和图书馆建设，由哈燕社资助的国学教师每周应该上课 9 至 12 小时，学社不聘专职研究员，但鼓励教师能利用时间研究感兴趣的课题。^①但是这段时期战火纷飞，时局动荡，齐大师生无论是什么立场都心系这场决定民族命运的大决战，不少师生投身于革命。学校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一切教学研究都无从谈起。齐鲁在战前的几种学术刊物，一种也没有复刊。

其它的几所大学本来的国学基础就不强，战后更顾不上恢复。学生很少愿意问津的文史哲这类文科系，更不用说来进行学术研究创办学术刊物了。即使有所发展的计划，也因时局的动荡而搁置了。^②

战后的学术研究比抗战时情况更差。相比之下，教会大学还算是出了一点成果。许多大学，象著名的北大、清华的刊物也难以恢复出版。国民党发动内战，国统区一片混乱，政治恶化，经济崩溃，殃及整个高等教育事业。苦熬了八年的师生复兴教育事业的希望，转瞬成为泡影。国立大学完全在国民党政府控制之下，

^① 林仰山 1948 年 6 月 15—16 日与陈观胜、哈托华博士的会谈报告，齐档，J109 -01- -99，第 74—76 页。

^② 华中大学在 1944 年时还制定了《战后华中大学发展计划》，但因形势问题，未获批准。‘Development of Huachung College after the War’，1944，转自马敏：《艰难的蜕变——解放前后的华中大学与韦卓民》，李开沅、林蔚编：《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第 320 页。

经济依赖政府财政，受祸最烈。时人评论说：“大学教育在多端的困难同困之中挣扎，把理想寄放在遥远的天边，脚踏着泥泞的崎岖的土地，如何复兴？如何创造？如何配合？如何发展？问题多多，亟待努力。”^①“教授厄于经济，于本身生活已感严重困难，无暇治理学术，更无心指导学生。”一般私立大学难以维持，1948年上海大夏、光华两大学请求改私立为国立。^②山雨欲来风满楼，一个时代的崩溃就在眼前了。

二、学者的政治新取向

对教会大学来说，比起财政上的困境更为严峻的问题是政治上的挑战。内战爆发以后，决定中国前途的大决战很快就见了分晓。教会大学将在新政权的统治下生存已成定局。新的社会潮流浩浩荡荡，冲刷着旧制度留下的一切，直接在西方教会支持下的教会大学，经受着史无前例的巨大压力。

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对外国在华教会的政策有一个重大的转变。毛泽东在与斯诺的谈话中肯定了外国教会在新政策下在中国办学等权利。在太平洋战争后，中共在党报社论中把基督教会、青年会和天主教会作为抗日统一战线的重要内容。^③根据何迪

^① 欧元怀：《战后两年来的中国大学教育》，《中华教育界》复刊第2卷，第1期，1948年1月15日，第9页。

^② 《论私立大学请改国立运动》，《中华教育界》复刊第2卷第6期，1948年6月15日。

^③ 陶飞亚：《抗战时期中共对基督教会的新政策》，《文史哲》，1995年第5期，第11页。

的研究，毛泽东在抗战中期和抗战以后和司徒雷登有过接触，并赞扬了他对中国教育事业的贡献，表示过不反对美国在中国兴办教会大学。^①但这种变化带有国际统战策略的意味，它将随着国际形势和国内政治风云的变幻发生变化。内战爆发以后，由于美国在中国内战中的立场，这种政策开始发生转变。1946年11月26日的《解放日报》社论，指责国民党允许美国人在华经营“科学、教育、宗教及慈善事业”；1949年8月30日，毛泽东在《‘友谊’还是侵略》一文中则抨击“美帝国主义比较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很长的时期内，更加注重精神侵略方面的活动，由宗教事业而推广到‘慈善’事业和文化事业。”文章还点了十所教会学校的名。^②这是由新华社播发的针对美国的社论，已经给教会大学送去了明白的信息。具体对这些学校怎么做，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中明确指出：“剩下的帝国主义的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可以让它们暂时存在，由我们加以监督和管制，以待我们在全国胜利以后再去解决。”^③显然，新政策的政策是明确的，也是非常谨慎稳妥的。

教会大学中的人对国民党政府丧失信心是毫无疑问的，但对前途的看法是有分歧的。两部教会大学校史的作者郭查理写道：“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内战正在华北地区激烈地展开，岭南忧心忡忡地注视着其它大学，看看它们在共产党的统治下会发生什么。”^④陈毓贤记述了燕京两个著名学者洪业和陆志韦早在抗战胜利前夕对中国前途的讨论。他们不无远见地看到共产党在中国胜利是迟

① 何迪：《燕京大学与中国教育现代化》，1989年华中师大“在中国教会大学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稿，第1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506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34-1435页。

④ 李瑞明编：《岭南大学》，第119页。

早的事，但在对共产党的看法上有尖锐的分歧。洪赞成共产党的社会主义思想，但唯物史观和他所信奉的儒家和基督教的人生观相冲突。他也不赞成他们为了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而摧毁一切传统事物的计划。洪相信人类的进步是逐步累积起来的，只因为是旧事物就要摧毁，那就太浪费了。但对陆志韦来说，恰恰是共产党这种强有力的和一针见血的方式吸引了他，正如许多那时的知识分子一样，都认为中国社会是无望和无用的传统的堆积。要在这个社会中找出有用之物是不可能的，开创一个全新的社会要简单的多。^①抗战胜利以后，洪业去了美国，再也没有回来。陆志韦担任了燕京校长，并在 1949 年 3 月 25 日被邀请到西郊机场迎接毛泽东。^②据说在北平解放后，陆志韦主张把燕京大学改为国立大学。他在 1949 年早春，曾托一位领导人给毛泽东带去口信，请求政府接管燕京大学，以后不再用美国资金办学。^③

对教会大学中的大部分知识分子来说，可能没有在哲学思辩的层次上来讨论中国的未来，他们对共产党并没有多少深刻的认识，但是对国民党统治下的局面是彻底失望了。教师们的情况已经坏到极点，他们相信今后只会更好一些。^④陈垣在北京解放前夕“婉谢”了国民党当局“三番两次的用飞机来接我”，要和青年学生一起“等待着光明”，“迎接着新的社会”，“要留下来和青年们一起看看这新的社会究竟是怎样的。”老先生在给胡适的公开信中意味深长地用学术界的术语说胡适收罗《水经注》的版本有 9 类

(1) Susan Chnn Fgan: *A Latterday Confucian: Reminiscences of William Hung (1893—1980)* p. 175.

(2) 《毛泽东与陆志韦》，见孙琴安等著《毛泽东与名人》江苏人民出版社，1993 年，第 439 页。

(3) 《毛泽东与陆志韦》，见孙琴安等著《毛泽东与名人》，1993 年，第 439 页。

(4) Roderick Scott: *Fukien Christian University*, New York, 1954, P. 118.

40种之多，可是为什么政治报告只看蒋介石那一本，不注意毛泽东那一本呢。陈垣表示愿意贡献这种版本，纠正胡适“孤证偏见的危险。”^① 在教会大学中，除了齐鲁大学曾经南迁外，其它著名教会大学的校长，如陈裕光、吴贻芳、韦卓民、陈序经都拒绝了再次迁校的要求，坚持在原地迎接解放。学术名流中，傅斯年屡次电催陈寅恪到台湾，但陈却留到了岭南大学。^②

解放后人民政府带来的新气象，使得教会大学的知识分子很快在政治上认同于新政权。韦卓民在写往美国的信中一再称人民军队和人民政府有纪律、有礼貌、讲道理。他感叹道：“生活在这样的时代很有趣，每件事是那么新奇，那么富有挑战性，每个人有着这样混合着一些焦急的期望，但这同样是有意义的，它使人又变得年轻了。”^③ 1949年7、8月间，吴贻芳在托人带到美国的信中说，她和新政权的联系很早就建立起来了。在7月22日的信中叙说了她和陈裕光在5月2日拜访了刘伯承和陈毅，“有一次非正式和非常友好的接触”。刘将军和南京文教委员会主任还分别宴请了一批学者和教授。吴在8月1日的信中说“在上海有一些反对美国的宣传和一些不幸事件，西方的朋友们可能要担心我们的情况，请告诉他们共产党对外国政府的政策和外国公民个人是有区别的。并说黄华明确向她表明，欢迎所有（外国）公民个人留下来，从事他们的工作。”吴表示：

“这个时期住在中国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国民党政权垮台是因为自己的无能和腐败，人民希望有一个变

① 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第192—195页。

② 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第128页。

③ Wei to McMullen, June 23, 1949,转自马敏：《艰难的蜕变》，见章开沅、林蔚编：《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第324页。

化。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是要造福于人民，这是好人和劳苦人民应该得到的。我们所希望的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联合政府也许不要严格地（在社会上）贯彻党的路线，而调整适应中国温和的传统。几十年来我们的人民已经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和动荡，大规模的战争打了 12 年。我们禁不住要希望在共产党以最热诚的精神开始建设国家时，将考虑到人民和民族的利益。我们基督教教育希望在教育妇女和培养人格方面作出贡献。我们是否能做到，在我们没有尝试前还不能说。”^①

齐鲁大学文学院院长张维华在白传中更具体地谈了自己对共产党认识的转变：

“我不虚伪的说，因为我出身很贫苦，而且在经济上长期受过窘迫，所以我很同情共产党，但是我要一心作学问，不肯参加革命，自然不愿意作共产党员，而且在国民党统治下得不到共产党活动的真正消息，也看不到共产主义的书籍，使我对共产党无所认识；同时因国民党宣传共产党很残酷，说对付知识分子和有产阶级很无情，从人道主义看，我反对。杭州解放后我第一次看见解放军，纪律严整，真是秋毫无犯。同他们谈话时，都能谈出一套理论来，这使我惊异钦佩，从历史上找不出这样的军队来，这一点使我对共产党有了初步的认识与好感。又一次，代表教职员会去文教部，接见我们的足

^① 1949年8月24日，在华基督教大学联合董事会执行秘书麦克穆伦（R. J. McMullen）把吴贻芳三封寄往美国的信摘要给有关人士。他说：“吴的信来自完全不受检查的渠道，因此没有理由不相信所述是简单的事实。请将其作为机密信息。”联董档案缩微卷，159—3005，第988—993页。

一个 20 来岁的女职员，当时觉得一个年青的女子怎能管理高等教育，初则有些轻视她，谈话之后，看她严中有谦和，态度磊落大方，从容不迫，谈话自然很有条理，这又使我惊异共产党对于工作人员训练的精干，这是我第二次对共产党发生了好感。后来又从理论上认识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上必经的一个阶段，无论如何，这个洪流是阻挡不住的，虽然在旧意识里，有若干一时转不过弯来，但人体的方向，我是认识清楚了。”^①

普通教师更对新政权充满希望。岭南的冼玉清表示：“我辈但冀新政府实事求是，一洗从前贪庸委靡、醉生梦死之风，人人努力日新，则国家前途有希望也。”^② 这种对共产党的认识当然不算深刻，但认同新制度的思想是明显的。

值得一提的是，甚至外籍教师也力图了解新社会，适应新形势。^③ 华中大学外籍教师发起了组织新民主主义讲习会，韦卓民曾亲自给外籍教师讲解《新民主主义论》。^④ 齐鲁大学的外籍教授在致国内的信中，对教会大学的前途不无信心地说：“一个正在进行着改革的国家对于基督教教会展现出许多伟大的机会：服务社会的机会。但是教会方面需要对新政府采取明确的态度。基督教徒不能接受共产主义的唯物哲学：基督教徒和共产党采取的方法是显然不同的，但很清楚共产党的许多目的是很可敬慕的。……未来十年对于教会的前途是极关重要的。”^⑤ 可见当时的革命胜利是

① 齐鲁大学档案 J9-5-35，《齐大教授简况》，第 82 页。

② 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第 760 页。

③ Philip West, pp. 223-225.

④ 《解放前后种种活动》，《韦卓民个人档案》，转自马敏：《艰难的蜕变》，见章开沅、林蔚编：《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第 330 页。

⑤ 齐鲁大学案卷 2-2-3，1949 年 11 月 30 日，济南市档案馆。

多么的深得人心。

不过，要说和旧政权及西方有密切联系的教会大学，对新政权没有一点戒备和心理紧张也是不可能的。1949年11月14日，金陵大学的毕律斯（Miss Elsie M. Priest）在给美国国内的信中说，表面上一切如常，但“每一举动下都有一股令人不安的潜流，使得所有人感到不安。”^①在南京军管区的高教部副部长访问金陵大学并作讲话后，情形有所变化。之江大学的报告在谈到1949年的情况时说：“这个学期是极其困难的。在旧法全部废除，新法尚未颁布之际，我们对缺少指导方针极为困惑。因此，为避免可能的严重错误，在重要事情上我们向浙江教育当局请求指示。在我们内部，我们进行批评和使自己适应变动了的形势，我们维持了团体的精神，但调整自己以适应新的思想。在外部，我们总是保持友好的关系，总是遵循爱和忍耐的原则。”^②

三、学术适应新形势

政治上认同，带来了学术上的认同。最有代表性的是陈垣的看法。1949年4月29日陈垣在给胡适的信中也批评了旧的治学方向。陈垣说：“说到治学方法，我们的治学方法，本来很相近，研究的材料也多有关系，所以我们时常一起研讨，你并肯定了我们的旧治学方向和方法。但因为不与外面新社会接触，就很容易脱不开那反人民的立场。如今我不能再让这样一个违反时代的思

① 联大档案缩微卷，238—3936，第1017页。

② 联大档案缩微卷，160—3017，第319页。

想所限制。这些旧的‘科学的’治学方法，在立场上是有着它基本错误的，所以我们的方法，只是‘实证主义的’。研究历史和其他一切社会科学相同，应该有‘认识社会，改造社会’两重任务。我们的研究，只是完成了任务的一部分，既有觉悟后，应即扭转方向，努力为人民大众服务，不为反人民的统治阶级帮闲。’^① 陈垣为儿子推荐的读物中有艾思奇的《社会发展史纲》，恩格斯的《从猿到人的转变》、沈志远的《历史唯物论》等。^②

与新的学术取向认同也是当时学术界的潮流，不仅是陈垣这样与范文澜等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早相过从的大学者，在一些学报中有了新的迹象。1949年10月，齐思和在《燕京社会科学》发表长文《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他说：“近一百多年来，西洋文化发生了空前的变化，改变了整个的人生，一切学术思想皆发生剧烈变化，而史学所受影响尤大。……历史的范围扩大了，历史的基础雄厚了，历史民主化了。在经济方面，工业革命的发生和发展，使西洋由中古式的农村经济社会踏进了近代工商社会。马克思看出生产技术和生产方式的改变对于文化进展的重要性，创唯物史观学说，指出了经济因素的重要性，历史学家受到了时代思潮的影响，渐放弃以前专以政治军事为主的历史而以经济的发展为主要脉络了。”^③ 齐毕业于燕京，执教于燕京，留学于美国，西方文化对他的影响不能不算深入，他对唯物史观的肯定，也反映出一代学人的新选择。华西的《中国文化研究汇刊》在最后一期刊登的启事中说：“1. 本刊今后主要内容，为以马列主义观点方法，研究中国民族、语言、历史、古物等学科，对于西南地区的

① 陈著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第193页。

② 陈著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第704页。

③ 齐思和：《近百年来中国史学的发展》，《燕京社会科学》第二卷，第2—3页。

实际问题，尤予以特别注意；2. 苏联东方学者的业绩，本刊亦拟为较有系统的翻译与介绍。”^①转向历史唯物主义，转向社会实际，转向苏联显然是这些学者在学术上的新方向。

除了个人的看法之外，教会大学的文学院还制定了改革国学教研的计划。齐鲁大学文学院的改进计划书中说，齐鲁国学研究所已经有 20 多年的历史了，对中国古代文化、古代哲学和一些专题研究在学术上“实已有相当的贡献”。报告总结说：“但以今日之观点论之，仍不免有其自身的缺点，即在研究工作上，仍不能超出东西汉学家及中国乾嘉学派范围之外，其重心趋重于个别文献之整理，而不能有系统的说明整个社会演进之过程。流弊所及则与现实脱节，与群众无联系，不能有助于社会之进步。今后当重订研究计划，在总的原则下，是以马列主义观点批判中国文化遗产及研究中国文化发展的过程。”这份报告还设计了个人研究与集体分工的研究方案，改变以前学者之间毫无联系的弊端，将齐鲁文学院的研究范围划定在自殷商起至秦汉阶段，依照社会发展史的过程，或研究基层的生产关系，或研究上层各方面的文化，这样可能形成一个整体的研究。^②张维华向哈佛燕京社报告说，齐鲁制定了邀请“杰出人才”来讨论研究工作的计划，并要“特别看重新观点”。^③实际上这一时期，这些大学的学术研究大都没有什么具体成果，比较有影响的东西，要算陆志韦在 1949 年 9 月 6 日在《人民日报》发表的《关于拼音文字方案的意见》。

新中国成立前后，人民政府重视教育事业，对高等教育更是高度重视。1949 年 9 月 29 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

① 《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十卷。

② 《齐鲁大学文学院改进计划书》，齐鲁档案 J109—05--227。

③ 1950 年 11 月 3 日齐大哈佛燕京社会议记录，齐档，J109—01—99。

同纲领》，在“文化教育政策”中规定，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们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①1949年10月12日，华北高等教育委员会发布了《各大学专科学校文法学院各系课程暂行规定》，要求高等教育在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这个总方针下真正提高一步、前进一步，使青年们获得科学的世界观、社会观和方法观，正确地了解中国与外国的历史，批判地接受中国的与外国哲学、文学以及其他方面的学术遗产，研究和解决目前的实际问题，培养出大批真正能够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和建国人才。明确废除“国民党党义”、“六法全书”等课程，规定文法学院的必修课是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新民主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文件还分别对中国文学系、哲学系、历史系等系的必修、选修课程作了具体规定。^②

国文系	历史系	哲学系
中国文学史	社会发展史	辩证唯物主义
中国语文	中国近代史	历史唯物主义
文艺学	马列主义名著选读	中国哲学史
写作实习	中国通史	西洋哲学史
中国文学名著选	世界通史	伦理学

教会大学的相关课程也努力适应新的形势。^③以1949—1950

① 徐达深总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一卷，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54页。

② 《人民日报》，1949年10月12日。

③ 1949年秋季文学院曾因课程等问题被政府要求暂停招生。见 Charles H. Corbett: *Shantung Christian University (Cheeloo)* p. 262.

年齐大为例，文学院的课程“在政府的协助下，及本院师生共同的努力，已经逐渐改换了旧有的面貌，向着新民主主义教育的方向迈进。”在中国文学系添了两门新课。一是文艺论，讲大众的文学是什么；一是鲁迅小说研究，讲鲁迅文学作品的革命精神。“这使学生逐渐认识了以往所讲的文学与今天所讲的为大众服务的文学基本上的不同点。”在历史系则添设马列主义名著选读、近代西洋革命史和苏联革命史，旨在使学生“了解革命的伟大意义和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①1949—1950年度下学期张维华还开设了“马列主义史学名著选读”，内容有列宁的《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论》，马克思的《法兰西内战》等。^②相同的变化也发生在其它教会大学。金陵“解放以后，更以安定热烈之情绪，井然进行教学与研究，一切事业概依常轨继续推进。为贯彻新民主主义教育方针起见，设新民主主义论、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社会

^①《齐鲁大学文学院改进计划书》，齐鲁档案 J109—05—2271949年9月20日，齐大给哈燕社的建议书，齐档，J109-1-98；1950年2月27日，张维华致陈观胜信，“1949年—1950年同学所工作正常开展，人员也比较充实。”当时主要教师及课程如下（齐档，J109—1—102）。

中文系		历史系	
教师	课程	教师	课程
栾调甫	文字学、墨子研究	张维华	明清史、专题研究指导
王锡昌	中国文学史、普通国文	徐形良	世界近代史
纪秀清	诗学概论	林秀惠	中国通史、中国近百年史
黄雨秋	文艺论	黄晓民	世界地理、中国地理
严薇青	小说研究、鲁迅杂文研究		
琦书耕	中国诗歌概论		

^② 齐档，J109-01-243。

发展史)及政治经济学等课。”^① 岭南的课程也作了修改,每个学生必须上新民主主义课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课。福建协和大学的课程中“三民主义、伦理、逻辑和哲学被取消。新民主主义代替了三民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代替了其它课程。中国近代史给予了新的解释。”政府“没有说到英语课的问题。但在新时代的气氛下,我们增加了一门俄语课程,这门课程非常受欢迎,有 100 人注册,还增加了一门法语课程。我们中没有人备好新民主主义论的课,但我们有一个师生学习组准备开展这门课的学习。新歌代替了旧歌”。^② 当然,这些活动都是在新政府指导下进行的。政府要求每个学生必修三种课程:社会发展史、新民主主义论和政治经济学,培养学生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来分析中外历史的能力。在齐鲁大学“政治学和社会学课程已自动取消,也没有学生来学外语。每周要上政治大课、小组讨论。”^③

青年学生的思想变化得更快。在新形势下他们对旧的内容、旧的教学方法厌恶到了极点。辅仁把宗教课改为选修,而燕京则主动添设了“新民主主义经济问题”、“马列主义基本问题”、“中国社会史”、“历史哲学”、“共产党宣言”、“联共布党史”。师资不够,就“师生互助,教学相长”。《人民日报》还报道了北大、清华、燕

① 金陵大学 1951 年 1 月 10 日给南京市人民政府交际处报送的材料,《金陵大学史料集》第 68 页。联董档案中,1950 年 3 月 24 日金陵大学的来信中谈到了当时的政治学习,“为了按照新民主主义的原则弄清我们的思想,制定 1950 年提高和进步的计划,我们中间进行了讨论。讨论的主要目标是: 1. 认识当前的形势,明确在现在条件下我们为人民服务的责任。 2. 对什么是为人民服务有准确的理解,强调政治学习。 3. 搞清楚什么是,以及如何改进符合新民主主义原则的教学方法。”联董档案缩微卷, 238—3936, 第 1024 页。

② 李瑞明编:《岭南大学》,第 122 页。

③ 联董档案缩微卷, 123—2588, 第 667 页。

京把课程改革推进了一步。^①这个过程也有一些冲突。1949年辅仁大学的课程上添设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主义等，图书馆购买政治理论书，并且设立了从猿到人的图片展览。这些活动引起了天主教在辅仁的代表芮歌尼（Harold W. Rigney, 1900— ）的不满，“屡以用类似警告的信件来提出他们的要求”。^②但大部分学校这个过程是比较顺利的。

当时，中央政府对教会大学还没有作为一个专门问题提出来。1949年10月21日，华北高等教育工作会议结束，《人民日报》的文章说各大学的初步改造已经完成，董必武作了总结报告。中共中央分管宣传的陆定一在1950年3月19日的《新中国的教育和文化》中乐观地说：“为了改造知识分子而进行的教育”“这种学习有显著的成绩，表现在知识分子中过去对于美帝的幻想和对苏联不了解，是被打破了。”^③

在这种气氛下，教会大学中有些人积极规划学校的发展。齐鲁大学文学院院长在向政府报告的计划中，说明了文学院的经费都来自美国托事部和哈佛燕京社，1949—1950年的收入约有一万四千美元，他颇为乐观地说：“若以此款全部用之于聘请教师及充实设备，必能使文学院进一步的发展，而于新民主主义教育之进展，亦必有相当贡献。”^④总之，一切都进行得既平稳而又顺利，教会大学似乎经历了晚清、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统治之后，已经迈进了新社会的门槛，搭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时代列车。

魏思特曾经在《燕京大学与中西关系》中提出一对发人深思

① 齐档，J109-01-102。

② 《人民日报》，1949年10月17日。

③ 《光明日报》，1952年3月9日。

④ 《齐鲁大学文学院改进计划书》，齐档，J109-05-227。

的问题，即：当毛泽东 1950 年 2 月从莫斯科回国时，是否苏联的影响和新民主主义政治已经使得燕京的终结成为不可避免的结局？或者当时的迹象是否表明燕京的教师们有理由指望燕京能在新制度下继续存在？大而言之，这实际上也是教会大学命运的问题。他研究的结果认为：在朝鲜战争之前，教会学校面临的主要问题是调整和适应的问题，而朝鲜战争之后则是学校能否存在的问题。^①从上面的资料来看，这个看法是有道理的。马敏对华中大学的研究表明：直到 1950 年 6 月中旬，中央政府高教部召开的高教会议上，政府的政策不是排除私立学校，而是帮助发展。与会的韦卓民对华中大学的前途增强了信心。^②

但是，中国共产党历来高度重视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作用，当然不会对外国人在主权国家办的这些事业坐视不管的。1950 年初，大学的政治学习已经加强。朝鲜战争之前，当年 5 月 30 日吴贻芳在给联董的信中说：“我们通常的在中国新年后的计划被开学以后一个月的政治学习所打断了。全体师生按一个计划学习是一件很新鲜的事，集中学习社会发展史。……这是一个要求很严格的计划，但我们学到了我们需要知道的新意识形态的东西。”^③对教会大学来说，还多一重与西方教会的联系问题。1950 年 5 月周恩来已经着手与吴耀宗谈话，认为中国人民对基督教印象很坏，把基督教叫作“洋教”，认为基督教是同帝国主义分不开的，因而也就反对基督教。他指出“美帝国主义仍企图利用中国的宗教团体来进行迫害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活动”所以要求宗教团体“把民族

^① Philip West, *Yenching University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 1916-1952*, pp. 198-199, 223.

^② 马敏：《艰难的蜕变：解放前后的华中大学与韦卓民》，见章开沅、林蔚编：《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第 334 页。

^③ 联董档案缩微卷，159—3005，第 1036 页。

反帝的决心坚持下去，割断同帝国主义的联系”“基督教最大的问题，是它同帝国主义的关系问题。中国基督教会要成为中国自己的基督教会，必须肃清其内部的帝国主义的影响。”^①但是建国之初政治军事经济等问题堆积如山，仅就当时基督教会的现状来看，并不是一个特别突出的问题，没有必要匆忙解决。周恩来在讲话中说：“其中有很多人信教很深。如果不采取谨慎步骤，不但不能使广大教徒从帝国主义影响下解放出来，而且还会使他们对我国发生极大反感和敌意，适中国帝国主义之计。”^②1950年6月，中国共产党七届三中全会召开，毛泽东作了对中国教育文化事业相当重要的讲话。建立与新的社会制度相适应的上层建筑是中国共产党明确的方针政策，但是具体操作仍要稳妥。周恩来在全国高等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还提到了“教会学校在与外国断绝关系后，经费上有很大困难，政府也应该照顾”。^③但另一方面，对教会大学的负面看法还是很明确的。1950年6月6日，毛泽东在《不要四面出击》中特别指出了教会学校、宗教界和国民党文化机构中的反动势力是敌人。对知识分子要使用他们，同时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要让他们学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等几门课程。“他们讲上帝造人，我们讲从猿到人。”^④因此，有着深刻的西方背景，特别是美国背景、宗教背景和旧时代的教育机构背景的教会大学，在这个社会剧变的时代，如何去适应新政权的要求，绝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放到当时中美关系和冷战背景中来看，这个问题是一定要解决的，只是以什么方式、在什么时间着手而已。

① 徐达深总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一卷，第244-245页。

② 《中共中央关于天主教、基督教问题的指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409页。

③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1992年版，第275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2、23页。

第九章

新政治与旧学术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军很快卷入战争,中美关系空前紧张起来。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中美进入直接的军事对抗,两国关系急剧恶化,迅速影响到与美国有密切联系的教会大学。教会大学因经费困难很快为政府接收。院系调整之后,教会大学在中国大陆的历史就此终结。在一系列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中,教会大学被彻底否定了,教会大学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教学和研究,因其带有的“封建性和买办性”则更在否定之列。但是仅从政治需要的角度,特别是在战时政治的影响下来评判教育和学术,留下的则是一个明显的有争议的学术问题。

一、从强化管理到接收

朝鲜战争之后,新政府马上加强了对教会及教会事业的管理和控制。在中美即将直接对抗之际,与西方,特别是与美国有多

方面联系的教会机构，确实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① 1950年8月1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天主教、基督教问题的指示，在建国后再次重提天主教、基督教，是被帝国主义长时期用来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工具。^② 同日中央政府发布《私立高等学校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私立高等院校一律重新立案，办理不善的，政府教育部门有权重组董事会，更换校长。^③ 这个规定也包括了教会大学在内。

在随后的一段时间里，针对西方在华教会的政治运动逐渐高涨起来。教会学校的小政治就跟着中美关系的大政治运转起来。教会大学的领导人物都积极表态，参与这些活动。1950年9月23日吴耀宗为首的中国基督教界发表宣言“防止帝国主义利用教会危害中国人民”，当时签名的有燕京大学陆志韦、赵紫宸、华中大学韦卓民、福建协和的檀仁梅、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吴贻芳、金陵大学陈裕光、齐鲁大学杨德斋、华西大学方叔轩、东吴大学杨永清、福建女子文理学院王世静等，十三所教会大学中除了之江可能因为缺席外，都签了名。^④

这个过程也有一些反弹。从1950年起，天主教会派在辅仁的代表芮歌尼对辅仁的革新和反天主教活动极为不满，天主教会从8月起停止给辅仁汇款，造成了辅仁的经济危机。辅仁大学的资助者最先试图以经济杠杆来影响和控制辅仁的发展方向，但适得其反。天主教教会最后向辅仁的中国委员会提出了四项条件，陈垣

^① 几十年以来中国教会大学与美国的资助机构之间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学校行政和美国机构保持着密切的通讯联系，如经济问题，如学校事务都要送去各种各样的报告。这种联系对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来说是难以想象的。

^② 徐达深总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一卷，第319页。

^③ 《人民日报》，1951年8月19日。

^④ 《人民日报》，1951年9月23日。

转向教育部请示。1950年10月13日，马叙伦在答复辅仁芮歌尼的书面谈话中，转达周恩来的指示：“在一个独立民主的国家里，不允许外国人办学校，除非为他们子女办的侨民学校。”“外国人在旧中国办的教会学校，因为它已经办了多年，所以在必须遵守《共同纲领》的前提下，允许办下去，但中央政府得有根据需要收回自办的权利。”同日政府接办辅仁大学，但声明与宗教无关。

《人民日报》在短评中说：“这些外国人本意并不是办理教育，也不在办理正当的宗教事业，而只是以这些来侵略中国的教育主权。”^①1950年11月28日，《人民日报》在评论中说：判断美国在中国的各种活动是好事还是坏事，应该研究它的目的和作用，看它是为谁服务的。并说美国在华文教事业是“培养亲美、崇美、恐美等买办思想和民族自卑感。”^②为如何评价教会大学及一切西方在华文化事业提出标准，定下了基调。1950年12月9日，陆志韦等领头署名了“打碎美帝的文化侵略”的声明，所有教会大学都参加了。有些教会大学轻视国学教育的问题，也被提到新的高度来抨击。上海圣约翰大学国文教授黄欣天说，美帝国主义对国文教授是特别歧视的，因其未到美国留过学。^③

朝鲜战争越打越激烈。与中国旨在统一国内思想的政治运动相比，美国先采取了影响教会大学前程的实质性行动。1950年11月28日，美国驻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奥斯汀（Warren R. Austin, 1877—1963）发表讲话，大谈“中美人民的友谊”。1950年12月16日，美国政府冻结了中国在美公私财产。同年12月，美国宣布禁止向中国汇寄资金，教会大学有数月得不到美国托事

① 《人民日报》，1950年10月13日。

② 《人民日报》，1950年11月28日。

③ 《人民日报》，1950年12月9日。

会的经费，经济上陷于困境。中国政府在 12 月 28 日也冻结了美国在中国的财产。12 月 29 日政务院公布了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机构的决定。1950 年 12 月 30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肃清美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经济和文化侵略势力》，指责美国在华文化事业是“收买人心”。^① 同月中共中央还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开展抗美援朝运动的指示》，号召开展控诉美帝的运动，清除人民亲美、崇美、恐美的心理。^② 1951 年 1 月 1 日，教育部长马叙伦要求全国教育界同人“扫除亲美、崇美、恐美毒素，切实贯彻政务院所颁布的方针”，陆志韦等表示“完全拥护”。

1951 年 1 月 15 日政务院颁布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机构接收办法。1 月 16—22 日，教育部召开处理接受外国津贴的高等学校会议。会议后改为公立的有燕京、金陵、金女大、华中、华西，接收后由中国人自办。仍维持私立的有沪江、东吴、圣约翰、之江、齐鲁、岭南等校。^③

一直与中国教会大学国学计划保持密切联系的哈燕社，在这种大势下决定终止在中国的活动。1951 年 8 月 3 日，哈燕社托事部主席董纳姆在致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主席亨顿夫人的信中说，由于 1949 至 1950 年的学社拨给有关学校的经费，大部分没有被用于学社要求的目的，并且联董实际上也已经失去了对这些学校的控制。这种形势看来将无限期延续下去。因此他建议根据有关法律，将学社的限制性基金转为学社的财产，用于符合霍尔遗嘱的其他方面的活动。这一提议后被托事部批准，学社与中国的联系中断。但亲手创建学社的董纳姆说：“这并不意味着

① 《人民日报》，1950 年 12 月 30 日。

② 徐达深总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一卷，第 421 页。

③ 徐达深总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一卷，第 432 页。

学社对中国失去了兴趣，相反，我们像联萱一样希望中国的情况发生变化，我们将恢复在那一地区的工作。我个人坚信，中国曾经是，也将继续是学社关注的一个重要地区，在那里进行的有价值的工作，将能有力地促进亚洲和西方文明之间的相互了解。”^① 哈燕社后来确实恢复了与中国学术界的联系，并以多种方式促进中美学术交流，但这都是中国进入改革开放，中美关系、正常化以后的事，已经不属于本书讨论的范围了。

二、政治运动与学术批判

接收之后的教会大学，它与教会和西方关系的历史已经成为过去，但是反对封建的、买办和法西斯旧教育的运动则刚刚开始。对教会大学来说，还特别要开展反对美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斗争。既然西方人已经离去，那么在实际意义上，批判教会大学文化侵略的活动，就要由与教会大学有关的学者和学生来担任既是批判者也是被批判者的双重角色。

1951年1月16日，九三学社召开了“反美文化侵略座谈会”。齐鲁大学杨德斋、金陵大学李方训、东吴大学杨永清、圣约翰大学潘世兹、燕京大学陆志韦等都出席了会议。陆志韦作了“清除民主个人主义思想，不要用美国人态度来看问题”的发言。燕京中文系的高名凯、辅仁历史系的柴德赓、之江的教务长黎照寰都起来批判美国对中国的文化侵略。^② 这些活动的消息都刊载在全

^① 联点档案缩微卷，046—1189，第1168—1171页。

^② 《光明日报》，1951年1月16日。

国的大报《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上，示范的意义是很明显的。而用美国人的态度看问题，则是一个严重的立场问题。很快学校的中层领导也反省自己。燕京新闻系主任蒋荫恩以《一个燕京人的自白》为题，说：“过去的教会学校，不仅止于宣扬美国物质文明，贩卖美国生活方式，还有更甚于此的，那就是造成青年学生的自卑心理，看不起自己的国家，觉得自己的国家什么都不行，因此也就渐渐地失去热爱自己祖国的心情。”^①文学院院长齐思和写了《我对于美帝文化侵略的控诉》，认为自己是“带了一付美国眼镜看一切问题，我沦为美帝思想上的俘虏而不自觉”。^②

在学校中开始了反帝爱国思想教育运动。首要的任务是反对美国的文化侵略。这个运动的第一阶段是揭露美帝文化侵略的罪行。当时把这些罪行分成三类：第一类是有些美籍教员敌视中国人民，散布思想毒素和反动言行；第二类是有毒的课程内容和为帝国主义服务的课程内容和学制；第三类是美籍行政人员和教员看不起中国人，欺压中国教员的帝国主义作风。燕京的学生说：“以前说美帝文化侵略，总觉得很抽象，恨不起来，经过这一阶段的揭发，才具体认识到了。”不过，当时还有一个普遍性的问题是“‘文化侵略，总起来讲是坏的，难道没有一点好处？如美国人教我们一些技术，像机械原理、弹钢琴、学英文、解剖等’”。据这篇报道说，经过讨论，认识一致了。运动的第二阶段，是对“文化侵略毒辣性的认识，并开始联系思想实际，对美帝思想毒害进行控诉”。这些控诉活动的结果是“认识到美帝文化侵略是要在中国人民中造成亲美、崇美、恐美思想，甘心为帝国主义所统治，并且训练一批为帝国主义服务的知识干部，为其经济侵略铺平道路，

①《光明日报》，1951年2月11日。

②《光明日报》，1951年3月12日。

而使中国陷于贫困落后的境地，就是因为美帝文化侵略压迫中国一百多年，使得中国民族工商业和民族技术不能发达。”^①

今天看来，在中美两国处于战争状态时，这种批判运动对于激发民气，同仇敌愆，自有其历史的意义。但是，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分析一种历史现象，当时的批判运动显然是有其局限性的，这就是缺乏对具体事情具体分析，往往凡是事涉教会学校，事涉外国人，都一概彻底否定。当时王力曾“在岭南大学揭发美帝罪行的大会上讲话说，‘我们要把美帝国主义和美国人民区别开来，美籍教授是美国人民，不是美帝分子。’”就是这样的讲话，使王力受到很大的压力。^②在前方战争激烈进行之际，这种战时政治的思维和行动方式显然也影响到了国内政治生活的许多方面。

以爱国主义为主题的反美批判很快就触及到了教会大学的教育体制。1951年6月，金陵大学和金陵女子文理学院的合并方案，对系科设置进行了调整。方针非常明确：根据国家建设人才的客观需要，并结合两校现有师资与设备情况的主观条件，以作适当的决定。其中，哲学系因师资设备而停办，历史学系则属于方针观点有问题暂停招生，而金陵的中国文化研究所连同古物存列室则被取消。^③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齐鲁大学、华西大学、福建协和大学等校，这些大学的中国文化研究机构都被撤销。

1951年9月24日，周恩来主持制定了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学习的内容、目的和方法。9月29日，周在京津高校教师学习会上作《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10月，思想改造运动在全国

① 《光明日报》，1951年3月7日。

② 张谷、王缉国：《王力传》，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113页。

③ 1951年6月21日《金陵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合并方案》，见《金陵大学史料集》，第78页。

展开。紧接着 1952 年 1 月中共中央指示在文教部门也开始“三反”运动。各校以“三反”为引子，从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入手，批判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影响，划清敌我界限，批判资产阶级思想。^① 思想改造和“三反”运动的过程，在高等学校里，实际上是教师们按照新社会的意识形态来批判和否定过去的自我，因为学者所从事的活动主要是教学和研究，所以否定过去的学术活动也成为主要的内容之一。

1951 年 11 月 23 日，当时已在北大的周一良在《我们思想改造从哪里作起》中说了可能有些典型意义的一番话：

“我是研究历史的，解放以后开始学习历史唯物主义，觉得过去写的有些文章观点不正确，立场有问题，应该否定它。但同时也觉得，自己大部分工作是偏于‘考据’的，考证一件事的有无，或者是一部书的真伪，不牵涉到理论和解释。这种带技术性的研究工作，不应该一笔抹煞，以为我研究的结果，在解决某些问题上，今天还可以供掌握历史唯物主义的学者们应用。我们这些讲‘文史考证’之学的人们，偶尔也谈起过去的工作是否为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问题，但大家异口同声地不承认，觉得我们的考据工作不作理论解释，更与政治无关。当然没有为统治阶级服务。可是，自己也没有很好分析，究竟在为谁服务。

在学习了周总理的报告和黎澍的‘关于近代中国历史上的改良主义’后，我已经知道那些考据研究只是满足个人兴趣和虚荣心，不是当时人民大众所需要的，对于轰轰烈烈的人民革命事业，更是毫无贡献。现在我更

^① 徐达深总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一卷，第 554 页。

认识到,这些‘超政治’的文章,并没有‘超’政治,它还的确起了反动的作用。钱副部长指出,改良主义派的教育思想在‘客观的’社会实践上,只是为反动派统治的粪堆插上了花朵。”^①

这就是说即使学术成果本身是没有政治性的,但一是当时的人民不需要它;二是客观上粉饰了在台上者的政治统治,因而也必须否定。这是离开了学术,也是离开了学术产生的社会背景来批判学术了。这种看法的影响是相当广泛的。1952年1月,一位中学教师要买陈垣的著作。陈垣复信说:“解放前我著书,只凭自己一时的兴趣,不问人民需要不需要,故所著多不切实用之书,现正深自懊悔。”劝人不必买书而白送给他。^② 到此为止,过去的学术业绩已经是在“客观”上起了反动作用。

1952年3月1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高校中进行“三反”运动的指示》,指出特别要依靠学生群众推动教师,批判和打击现在学校仍普遍和严重存在的各种资产阶级思想(如崇拜英美、狭隘民族主义、宗派主义、白私自利等),^③ 再次在高校中掀起了批判高潮。

此前几天,1952年3月6日,陈垣在《光明日报》发表了“自我检讨”,自称当辅仁校长时“除文史两系和例行公事,一切校务都不过问”。他说:“第一,我那时不晓得帝国主义是在披着宗教外衣进行文化侵略,还错误地以为他们在中国设立了一个大

① 《光明日报》,1951年11月23日。

② 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第777页。1950年初陈垣在一封信中回顾自己的学术生涯“所著已刊者数十万言,言道、言儒、言史、言考据,皆托词,其实斥汉奸、斥口寂、责当政耳。解放以后得学毛泽东思想,始幡然识前者之非,一切须从头学起。年力就衰,时感不及,为可恨耳。”

③ 徐达深总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一卷,第547页。

学，是对中国有好处的。这是一个根本的错误看法。我以为作校长可以教几点钟书，可以拿出大部分时间从事研究工作，又可以利用辅仁这个图书馆读书方便，又清闲。所谓清闲，就是如果作一个当时的国立大学校长，就要真正管事，作一个教会大学校长，他们不让我管事，我正乐得清闲，正想埋头念书。我当时还想，这是一个很好的读书处所，于是就读起书来。这三十年中我曾发表的论文，大约有八十六种，其中七十四种都是到辅仁以后作的。这并不是夸耀，是说明我在辅仁主要工作就是读书”，是“前清书塾的山长”。

陈垣追溯了自己的学术思想说：“我研究历史，不但立场、观点、方法是错误的，而且因为我自己想‘不问政治’，也就不研究近代史。因为近代史与当时政治关系密切，牵涉太多，为的是‘脱离政治’（当时自以为是‘脱离政治’），^①所以不研究近代史。所以对近百年的国际变化完全认识不清楚，认不清中国社会的性质，当然也认不清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本质，又加上对宗教的好感，因此就错误地认为中国自己办的大学不多，教会来到中国办大学，可以帮我们办教育，是对我们有利的。”^②作为几十年辅仁大学的校长，陈垣这番话在教会大学的知识分子中应当是有分量的，他不仅否定了过去研究学术中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而且批评了自己轻视研究近代史，而当时教会大学的研究恰恰是重视中国古代的历史文化。

1952年5月2日，中央发布了《关于在高等学校中进行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和清理“中层”的指示》，“三反”运动转入批判资

^① 原文如此。

^② 《光明日报》，1952年3月6日。

产阶级思想阶段，彻底清除学校中封建、买办和法西斯思想。^①许多知识分子作了检讨。齐鲁大学原文学院院长张维华写了《清除我的封建、买办思想》：

“我所学的、所研究的那一套恰是封建思想和买办思想的结合体，具体的说也就是恰恰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经济基础反映到我脑子里的那些丑恶东西。二十余年来我所学的、所研究的和欣赏的，一方面是个封建的东西，我虽不能作诗填词，但却最欣赏诗词。我不懂古董书画，却最喜欢冒充风雅玩一玩古董书画。我喜欢作散文，却要以司马迁的风格为极则。我的确也费了点功夫研究中国历史，但所研究的是历代统治阶级、地主用以剥削人民压迫人民的典章制度，如地理、官职、以及他们的言论学说。在这些方面夸耀他们的伟大，认为历史是他们创造的，绝没有看到和想到真正创造历史的是劳苦大众，自然也绝没看到统治阶级剥削的本质，和劳苦大众被压迫的惨苦情形。我这一套在过去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时候，是适合于他们的要求的，是对他们的反动统治有利的……另一方面我所学的和所研究的那一套，是带有极严重的买办思想，二十多年来所研究的另一个范围是中西交通史。我写了几本书，也写了若干篇论文，为什么要研究中西交通史呢？那就是买办意识在支配着，因为我长期受着教会学校的教育，错误的认为帝国主义国家的文化对中国成为一个现代化国家是有帮助的。同时又认为当时研究这门学问的人很多，因此我就走上了这一途。联系到我的封建思想，我承袭了清末反动的

^① 徐达深总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一卷，第 672 页。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说法。我觉得中国的伦理道德，还有分别保存的价值，而所需要的是西洋的物质文明。因此，我对于封建文化某些方面有着顽固的爱好，而对于外来的某些东西也表示欢迎。自此，在一定的范围内就使我逐渐地走向依赖外国人，亲近外国人，更变成为他们服务的洋奴。对帝国主义，尤其是美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剥削中国，使中国沦为殖民地的情形看不清楚。……

此外，也有着很严重的山头主义。对于自己的部门，有占山为王的思想。从不考虑到其他部门的实际需要，无意义地发展自己的部门，这种恶劣作风显著地表现在过去主办齐大国学研究所上。因为齐大国学研究所有了一笔固定的经费，就不顾实际的尽量使用，一年半内我备置了近乎 5 万册的书籍和考古资料。”^①

张的检讨实际上把自己半生的学术事业，从主观动机到客观效果全盘否定了，而且学术成果本身也是歌颂统治阶级，迎合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需要，因此给自己也是给过去的学术扣上了封建的、买办的大帽子。这篇文章还被刊登在山东大学当时很有影响的《文史哲》上，显然这种以政治帽子套学术研究的做法是得到认可的。类似的自我批判相当多，在当时的报刊杂志中留下了许多这样的记载，可见这场运动的广泛程度。50年代初的这些运动，并不是只针对教会大学一些人和事，被否定的学术遗产，也并不只是教会大学的东西，但对教会大学的政治批判和学术批评也许是最尖锐的。在其后的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中，许多学者有意无意地讳言自己在教会大学工作的经历。

^① 张维华：《清除我的封建、买办思想》，《文史哲》，1952年第四期，第26、27页。

1952年6月11日，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决定辅仁并入北京师范大学。陈垣等“热烈拥护院系调整”。其它地区的高校调整活动也纷纷开始。1952年夏天院系调整全面展开，根据中央改造调整旧大学的方针，教会大学的校名全部撤销，各院系被调整到其它大学，原先的教师、学者都到了新的学校。1952年9月25日新华社报导“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基本完成”，同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做好院系调整工作，有效地培养国家建设干部》，称“旧中国的高等教育制度基本上是为帝国主义和反动统治阶级服务的，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制度的产物。院系的设置是盲目的，是严重的脱离实际的。”“今天的院系调整工作，是在学校的政治改革和教师的思想改造已经取得重大胜利的基础上进行的。两年以前，在全国高等教育会议上即提出了调整院系的问题，但两年来这一工作很少进展。这主要是因为许多教师在思想上还存在着崇拜英美资产阶级、宗派主义、本位主义、个人主义的观点，没有确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因此就不能很好地贯彻执行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自从去年毛主席在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号召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运动和今年经过‘三反’和思想改造运动以后，各校教师进一步肃清了封建、买办、法西斯思想，批判了资产阶级思想，树立了加强为人民服务思想。这样就有条件把院系调整工作做好。”^①

虽然教会大学及其在教育 and 学术方面的工作被彻底否定了，有些学者也被视为落伍和封建，^②但大多数人还被安排在不同的

^① 《光明日报》，1952年9月26日。

^② 如余嘉锡被调离学校。“1949年在新旧交替之际，先生年近古稀，但是仍想尽其心力，委身教育，为国家培育人才，以遂平生之志，不料被谗言所毁，对他的道德学问，总加以‘封建’的罪名，夺去他终身所从事的教育事业的职务。”陈翔华等编：《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十一辑，第125页。

学校和研究机构，继续他们教书和研究的生涯。有些还担任学术领导职务。在这个意义上讲，除了宗教色彩外，教会大学在软件和硬件两方面，同时真正地融入了中国的教育体系，教会大学培养的知识分子，继续在新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中发挥作用。

三、尾声：教会大学国学事业的再评价

当政治运动的高潮过后，包括教会大学国学事业在内的过去的学术都被看成了资产阶级的东西，在此后的几十年内除了作为批判的资料，很少被人提起，就连许多大学相关系科的学生，对这些学校、学人和学术都所知极少。国学这个名词也沉寂了三十多年。但学术界对如何评价过去的学术，并不是一个没有争议的问题，从 50 年代以后的一次一次强调对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批判，反映出这种争议的坚韧性。1954 年 12 月中国科学院院务会议、中国作协联席会议决定批判在学术界影响至深的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周一良、游国恩、陈中凡、章书业等也发表文章批判胡适的历史观的反动性、买办性和危害性。^①1955 年 5 月，中共中央批转中央宣传部《关于胡适思想批判运动的情况和今后工作的报告》中说：对胡适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批判，已经展开为全国规模的运动，“大部分旧学者都参加进来，受到了一定的教育。少数并开始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对胡适的思想进行了认真的批判，而且联系到自己的唯心主义思想，作了自我批评。但是，还有许多旧学者仍然带着消极、被动的情绪，他们虽然表示

^①《胡适思想批判》，北京，三联书店，1955 年，第一册，第 109~114 页。

了态度，批评了胡适，但批评不少是浮浅枝节，轻描淡写，口气缓和，并且不愿联系自己的唯心主义思想。有的甚至表面一套，背后一套，文章上表示反对唯心主义，而在谈话时表示坚持自己唯心主义观点。还有不少则仍在一旁观望，不表示态度”。《报告》还说，一、这次思想批判运动对广大干部和知识分子群众的影响还不够深广。二、这次思想批判，在各个学术部门中的发展还不平衡。哲学方面批判比较充分，政治社会思想和文学思想方面次之。三、文章虽多，但理论工作基础薄弱。“好文章终究还嫌太少。”对胡适的所谓科学治学方法，如“拿证据来”、“实验室的态度”、“历史的态度”等，要组织力量进行批判。^①据当时批判者的看法，这些旧学术的问题在于：第一，研究方法是旧的；第二，学术研究中没有阶级观点；第三，研究成果不能为现实政治服务。随着中国政治继续向“左”倾斜，对所谓资产阶级学术的评价越来越低。1958年4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召集历史考古学座谈会，会议提出历史科学必须厚今薄古。^②古代历史文化的研究进一步削弱。至于后来横扫一切的“文化革命”，重点倒不在于批判这些解放前的学术成果和相关的学者了，因为这些事和人都已经被人们遗忘得差不多了。

70年代末，中国社会发展进入新的历史时期。经过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政策下对历史经验的总结，很快反映到对教育和学术的再认识和再评价方面。胡绳在一篇文章中说：

“史料考订工作是不是历史研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无论研究什

① 徐达深总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一卷（下），第1209页。

② 徐达深总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二卷（上），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75页。

么历史问题，研究者必须掌握大量的，而且可靠的资料，清除掉前人留下来的许多史料中的蒙蔽史实真相的迷雾，使有关的历史事实的本来面目显露出来。史料（实物或文献）的考订工作可以分为两个方面，‘外形’的考订是区别史料的真伪，确定其时代和作者，对历史文献的版本文字进行研究，使其尽可能回复原来的面目。‘内部’的考订就是辨明史料的实际价值，把有价值的史料和价值不大的史料区别开来，把错误的记载和正确记载区别开来。这两个方面的考订工作都是必要的，都需要用科学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去进行。近代西方的和中国的资产阶级史学都着重在这些方面做了工作。许多中国的史学家们继承了清朝‘汉学家’们的工作，并利用了从现代欧美的各种科学知识和比较精密的逻辑观念，而在史料的考订上，取得了不少成绩。他们的这种工作，现在看来，并不是做得太多，而是做得太少了。他们的工作成绩和工作经验不应当被抹煞而应当加以接受，加以发扬。今后我们还应当有计划地进行史料收集、整理、考订、注疏、翻译等等工作，并且使史料学成为有系统的科学。由于史料工作的繁重和需要各种辅助性的专门知识（如古文字学、年代学、古文书学、古文献学、历史地理学、版本学、印鉴学等等），所以有一批专门的人来负担这种工作是必要的，他们就是史料学家。史料学家是整个史学家队伍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①

胡绳这么详尽地来论证史学考订工作的必要性，是对以往学术界

^① 胡绳：《社会历史的研究怎样成为科学》，《枣下论丛》，人民出版社 1978 年版，第 141—142 页。

一度全盘抹杀这种工作价值的纠正。担任过中国学术权威刊物《历史研究》杂志主编的黎澎在回顾解放以来学术发展时说：“过去我们总是用很大的力量来写通史，战线过长，难以全面深入。事实证明，这样做往往是费了很大的力气，效果不大。今后如果致力于发展专门问题的研究，争取在这方面多出成果，可能更好一些。过去我们因为很少与外国通往来，总以为研究中国历史，人家不如我们。实际上，就有些专门问题而言，人家取得的进展，恐怕还是未可轻视。”^①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看作是对过去专题研究的否定之否定，同时也是对西方学术成果的否定之否定。由于胡绳和黎澎在学术界的地位，上述这些话实际上可以看做是对考古学、专题研究和过去的学术和学人的再认识。

与这种认识相一致的是，过去的学术成果，包括教会大学的成果以及这些大学自身也重新成为人们注意的对象。举几个比较重要的例子。1980年北京中华书局出版了由翁独健、王钟翰作序的《洪业论学集》，收集了洪业的几十篇论文，大部分是其在燕京的作品。中华书局1986年出版了《沈兼士学术论文集》。山东齐鲁书社接连出版了原齐鲁文学院院长张维华的7部著作，大部分是过去的成果。其他如长期在金陵任教的胡小石、之江的夏承焘、华西的闻宥等的作品也陆续被结集出版。1996年齐鲁书社还出版了加拿大传教士齐鲁大学国学教授明义士30年代撰就的《甲骨文通论》。

这批学者的地位也重新得到承认。北京图书馆《文献》从刊编辑部和吉林省图书馆学会会刊编辑部联合编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81年陆续出版了《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普阳学刊编辑部

^① 黎澎：《关于发展历史学的几点建议》，《再思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77页。

编辑、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2 年陆续出版了《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据不完全的统计，其中列入了在教会大学中毕业或者工作过的有一定知名度的文史哲学者约八十多人。其中如张维华等还被当地政府授予优秀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称号。

不过，从政治上的评判回到教育和学术的范畴，要就事论事地全面衡量教会大学国学教研的水平，仍然是一个比较困难的问题，因为这需要了解当年的总体学术发展。依据现有的资料，我们只能大致看出它们的国学教育与研究在当时所处的大体位置和基本走向。

学生是衡量学校教育成就的重要标志之一，这些学校的国学系科为培养中国文史哲专业人才作了重要的努力。辅仁大学 1931 到 1946 年的毕业生中，国文系 327 人，历史系 268 人，历史学硕士研究生 9 人。^①燕京大学自 1924 年到 1948 年培养历史系本科生 131 人，历史学硕士研究生 40 人。^②齐鲁大学 1935 年在校各年级国文历史系学生共 58 人。^③其中辅仁大学毕业人数最多，国文系平均每年毕业 20 余人，历史系则不到 18 人。因受战事影响，燕京历史本科生最少，平均每年仅 5 人，但硕士生接近每年 2 人，齐鲁战前与燕京的情况差不多。其它各校除了金陵和华西外，可能人数更少。这些数目在今天看来似乎很不足道，但是当时各大学的规模跟今天不可同日而语，即使全国高校首府北京大学 1930 年国文系仅招生 6 名，史学系 7 名，哲学系 3 名，到 1934 年文史两

① 《本校毕业论文目录》，参见《辅仁学志》，第六卷第一、二合期，第八卷第一期，第九卷第一期，第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卷一、二合期。

② 《史学年报》第三卷第一期第 198 页，第三卷第二期第 181—182 页；《燕京社会科学》，第一期第 252—253 页。

③ 参见《齐鲁大学文理两院同学录》，1935 年 5 月。

系在校生才分别接近 100 人。^① 所以比较起来教会大学文史两科的学生在当日并不算少。而且像齐鲁大学一直到解放是山东唯一设历史系的大学。学生成就跟母校并没有绝对的关系，但这些学生中不少人在文史领域作出了重要成绩。^②

图书资料等设备是教育和研究发展的基础。这些大学在国学图书资料建设方面作了不少努力。与哈燕社联系的教会大学 20 多年中大量投资于图书资料，对基础建设相当重视。燕京、金陵、齐鲁、华西的图书馆在整个旧中国的大学中，除了个别国立大学外，很少有大学可以与之相比。在私立大学中更有明显的优势。博物馆建设也是这些大学的一大特点。华西大学的博物馆与当时四川省立博物馆相差无几。齐鲁大学的古文物收藏后来成为山东省博物馆的重要部分。教会大学的博物馆建设在任何国立和私立大学中都是首屈一指的。

学术研究成果是反映大学国学水平最明确的标志。1992 年起复旦大学出版社组织编辑出版了《中国学术名著提要》，列出了从商周到 1949 年为止的学术成果中的划时代之作，其中名著的选择标准不一定没有编者的主观性和偏差之处，但在一定程度上不失为一种评价学术水准的参考。1992 年出版的《哲学卷》中的现代哲学名著 13 种，其中有燕京大学张东荪的《认识论》。^③ 同年出版的《宗教卷》中有近现代宗教名著 61 种，其中有辅仁大学陈垣的 5 种著作，燕京大学许地山 2 种、赵紫宸 2 种、吴雷川 1 种，福建协和大学王治心 2 种，沪江大学朱维之 1 种，齐鲁大学彭彼得、夔

① 《北京大学校史》增订本，第 278、316 页。

② 参见本书附录一。

③ 《中国学术名著提要，哲学卷》，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970 页。

德义各 1 种，总共有 15 种之多。^① 1994 年出版的《历史卷》中列出的现代史学名著 25 种，其中和教会大学学者有关的著作有两种，包括辅仁大学陈垣的《史讳举例》和燕京大学朱士嘉的《中国地方志综录》，间接有关的还有在燕京时期顾颉刚继续编辑的《古史辨》。^② 1995 年出版的《语言文字卷》列出的现代名著中，音韵学著作 5 部，其中有燕京大学陆志韦的《古音说略》。训诂学名著 3 篇，其中有辅仁大学沈兼士的《右文说在训诂学上之沿革及其推阐》。文字学著作 18 部，其中有辅仁大学于省吾的《双剑謠殷契骈枝三编》。21 部语法学著作中有燕京大学陆志韦的《北京话单音词词汇》，金陵大学吕叔湘的 2 部著作《中国文法要略》和《汉语语法论文集》，华西大学傅懋绩的《现代汉语动词形容词介词为一类说》，燕京大学高名凯的《汉语语法论》，方言学名著 15 篇，其中有岭南大学黄锡凌的《粤音韵汇》。^③

这里所列出的各个学科的开创性著作中，有时找出作者是比较容易的，但要确定某些作者的成果到底属于哪个大学则比较困难。因为学者经常是流动的，一项研究的完成也并非一日之功，象钱穆的《国史大纲》原是在北京大学时的讲稿，但出版之际钱穆在齐鲁大学任教。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也是燕京时期出版的。不过无论怎样计算，在这个统计中反映教会大学的总成果并不太多，但就其在中国高等教育中所占的比重来看，又是相当可观的。因为在雄居榜首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之后，就可以排到燕京和辅仁了。这大致体现了在学术变革中第一流国立大学依

① 《中国学术名著提要·宗教卷》，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5—11 页。

② 《中国学术名著提要·历史卷》，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548、744、544 页。

③ 《中国学术名著提要·语言文字卷》，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139、220、401、466、473、480、477、497、603 页。

然是中国学术重镇，而教会大学也已经居于重要的地位。

如果更进一步分析教会大学的学术成果，那么优点和弱点都是很明显的。

历史学在教会大学是一个强项。这一学科始终是中国学术历史最悠久、成果最丰硕、人才最多的领域。乾嘉以来的治学方法与五四以后盛行的新考据有异曲同工之处，突破的难度也更大，但教会大学在这方面的成果是值得重视的。它们在中国古代史、中西交通史和中国宗教史方面进行了大量开创性的研究，有些项目居于领先地位。在以现代方法大规模整理中国历史文献方面，没有一所大学可以与燕京相比。

教会大学的考古学研究主要集中在金石甲骨方面。明义士、商承祚、胡福林分别在齐鲁大学和金陵大学时期，完成了许多重要工作。董作宾在《中国甲骨学 60 年》中多次提到这些人的贡献。

语言文学方面在教会大学也有一定的优势。胡奇光在《中国小学史》中总结了自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之后，我国形成了一支实力雄厚的古文字学专家队伍，出现了董作宾、郭沫若、于省吾、唐兰、陈梦家、胡厚宣、容庚、商承祚、朱芳圃、李孝定等著名学者。音韵学方面有陆志韦、李方桂、王力、周祖谟。训诂学则有王力、沈兼士、蒋礼鸿和高名凯。^①其中 9 人是长期在教会大学从事教学和研究的。在文学史的研究方面，郭绍虞在燕京时期完成了许多重要的著作。现代词学史上被称为“一代词宗”的夏承焘，建国以前的主要成就是在之江大学完成的。发表于《燕京学报》的论文是其第一次取得稿酬的作品。^②

① 胡奇光：《中国小学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353、355-356 页。

② 谢桃坊：《中国词学史》，成都，巴蜀书社 1993 年版，第 410 页；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4 年，第 307 页。

在文史哲三个学科中，教会大学的哲学最弱，哲学系也是教会大学中设立的最少或者最年轻的系，中国哲学史家和哲学家们很少有在教会大学长期任教的，因此在这一领域的建树比较少。在大学的刊物中也较少发表关于哲学的研究著作。

宗教研究通常被包容在历史和哲学学科中，在中国近现代是一个比较薄弱的学术研究领域。但教会大学的宗教渊源，使其对这一领域的研究情有独钟，因此这方面的成果比较突出。特别是对于基督教的探讨大部分出于在教会大学任教的学者之手，而在其它大学几乎都是空白。

这里还要提到教会大学的学报。这些学报是对近代国学研究的一项重要学术贡献。到 1950 年止，在全国所有的大学学报中，教会大学如辅仁、燕京、岭南、华西及福建协和大学的学报是办得最久的学术刊物。除了定期出版的学报，还有各种不定期的刊物，都在学术界发挥了积极的影响。需要提及的是，在旧中国，学报的出版是极不正常的。^①相比之下，教会大学的学报情况要好得多，也许可以看成是旧中国到新中国初年连续性最好的刊物。同时，在学术价值上，也被看成是中国为数不多有长期保存价值的刊物，也是近几十年内极少的被学术界重印出版的学术刊物之一。

至于教会大学文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那么，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对资产阶级旧史学的批评同样适用于教会大学的历史研究。黎澎概括过：“解放前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大专院校从事教育工作或者在科学机关从事研究工作的老专家，他们在学术上有成就，有不少人声望甚高。但是由于主观和客观的种种限制，他们没有

^① 如北京大学 1923 年创办了著名的《国学季刊》，但 1925 年出到第二卷第 1 期停刊，1937 年出到六卷三期停刊，1946 年复刊后，出了一期又停刊，直到 1950 年才复刊。

机会接触马克思主义，因而他们的学术思想和治学方法或多或少的受到某些资产阶级学派的乃至乾嘉学派的影响。^①这一点教会大学中的学者们向来是没有异议的。应该指出的是考据的方法有其所长也有其所短。在教会大学的成果中，主要是微观研究，缺少宏观大作。他们能从具体到具体，在大量的专题研究上取得突破，但对社会发展的前因后果却鲜有理论的解释，在把握社会历史的全局上显得力不从心。这在总体上不能不说是这些研究的一个局限。进而言之，教会大学及其学术活动的年代，正是中国面临着深刻危机的岁月。革命和救亡成为压倒一切的主题。所以就连陈垣、夏承焘等也要问这种工作到底于国家民族和个人有多大的意义。^②建国初期，这些知识分子否定自己的工作，部分原因是出于一种真诚的自责心理，他们的学术确实和社会的生活和革命斗争保持了距离。不过，反过来看，也许正因为学术与急功近利的“求用”保持了某种距离，才使他们的成果在“求真”方面达到了一定的程度。

最后，教会大学的国学事业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积累了经验和教训。教会大学中各国学者长期相处，彼此语言易于沟通。双方学者都受过良好训练，交流容易取得成效。不过应该指出的是，近代国学教育研究在形式上受到了来自西方的刺激和推动，但这种推动的源头是在中国，是中国社会变迁和冲击在基督教大学方向上引起的反应。哈佛燕京社这样的组织是有着开创性意义的，这

① 黎澍：《中国社会科学三十年》，《再思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101页。

② 夏承焘在1928年11月9日的日记中说：“回念精力方壮，徒耗心血于故纸中，充其量不过为古人作功臣，则又废然思返。”1929年5月12日又说：“年来治旧学嫌琐碎支离，无安心立命处。”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4年，第55、94页。

种以基金计划为背景的合作推进了教会大学的国学教育与研究走出传统迈向近代化。在哈燕社影响下，无论课程安排，研究方向与领域，乃至教学与研究应该被置于何种地位等方面，这些大学都在逐渐改进。比照各所大学在和哈燕社合作前后教学和研究，就可以看出前进的轨迹。这种进步也影响了其它各类大学。但是需要指出的是，这些大学和哈燕社的合作成果并不总是很理想的，真正有影响的建树并不很多。战争、社会动荡无疑是影响学校发展的主要因素，但哈燕社和这些学校缺乏一个为双方都满意的通盘计划，以及与之相适应的长期和短期计划。在跨国的合作中仅有抽象的总原则显然是不够的。但是如魏思特所指出的“这个机构已经建立了一种模式和一种继续在运作的制度，这种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们西方人对东亚的看法。它反映了一种多元专业学术组织国际化的精神，迄今仍在世界上所有学术领域中焕发生机。”^①

^① Philip West: *Yenching University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 1916—1952*, p. 188, 189.

第十章

结 论

传教士到中国之后，为了传教的需要必须了解中国历史文化，有些传教士开始对中国语言、历史文化和社会民情进行了研究。有些人由需要演变成长久的兴趣，有些人由业余而成了终身的专业。因此在早期的汉学家中，有不少人是传教士。传教士研究中国文化成绩比较显著的是在语言文字领域，其次是中国经典的翻译介绍，再次是对中国社会历史的研究，在哲学方面了解较少。总起来看，他们的研究并不深刻。大部分只是把中国文化作为资料和信息来看。但是这种活动对西方来讲，是开启了近代西方汉学的大门。对在华传教活动来说，他们对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传统有所了解，在一定程度上使得传教士高度重视在中国的文化教育事业。

不过，在早期传教士初创的学校中，中国文化教育的地位是很不确定的。教学内容面临着神学与科学、中学和西学的选择。在教育资源的分配上也存在着很大的争论。既然在中国办学，学校不仅要跟着教会走，也要受到中国社会发展的牵引。这是教会学校始终面临的一对矛盾：为了得到教会的支持，它必须证明这类学校对于传播宗教的价值；为了在中国办下去，它又要证明对于中国社会的价值。因此在教会学校及后来初生的教会大学中，神学、西学和中学都占有一定的地位。在中国社会近代化的进程中，

传统学术的地位不断下降，教会学校中更是如此。传教士们虽然对此有过争论，但在中国社会既没有规章制度来规范教育，也没有为学习国学提供前景时，教会大学作为一种独立的教育制度在这方面只能维持现状，至于开展学术研究更是为时尚远。

五四运动前后，北京大学的革新标志着中国教育和学术近代化的新里程碑。国立大学在学术上的发展，使教会大学面临着有力的挑战，教会大学必须进行改革，其中一个重要的内容就是重视中国文化的教育。因此，所有教会大学的文科中，开始有了国文系、历史系，有些大学还有哲学系，有些系是和社会学系、政治学系合并在一起的，把中国历史文化的教育提上了日程，但是轻视中国文化课的倾向并未扭转。

随着民族主义思潮的汹涌澎湃，中国知识界发动的非宗教、非基督教运动，最终涉及到了收回教育权的问题。教会大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它们必须要证明这些学校的存在是有利于中国的利益。重视中国文化的教育与研究，不仅是传授一种知识，而且也是大学的民族性的标志。北伐之后，国民政府对教会大学的立案要求，大大促进了教会大学中国化的进程。立案之后，中国人在学校事务中有了一定的发言权，中国教师的地位也得到改善，中国文化教育的地位得以确立。特别重要的是，立案使得教会大学至少在名义上成为国家教育体系的一个部分，教会大学民族性的问题大大淡化了。由于教会大学比较有效率的管理体制和学术自由的氛围，更多的著名学者开始到教会大学教书，这为教会大学的学术发展准备了条件。

但是，学术发展牵涉到多方面的因素。学校对学术重视是一个因素，资源更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如果说国民政府的资金主要投向国立大学的话，那么，教会大学则较多地争取西方特别是美国基金的资助。燕京大学争取霍尔基金资助的成功，哈佛燕京社

的建立，对教会大学的中国文化研究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燕京借助这个机会聘请优秀的师资改良教学，开展学术研究，出版刊物，在当时风行一时的国学研究中独树一帜。洪业借鉴西方发展中国学术的活动，顾颉刚对传统学术的批判创新，构成了燕京自由主义学术的特色。燕京学术在中国学术史和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深刻的痕迹。

辅仁作为天主教的大学，在国学研究方面也有特点。一是辅仁一开始就以国学为重，二是校长就是国学大师，因此对国学研究更为重视。与燕京不同的是，辅仁的学者队伍出旧学而入新学者为多，但在学术研究上成就非凡，在历史和语言学方面著述丰富，并且达到很高的水平。

对其它新教大学来说，南京政府建立后到抗战前的十年也是发展的岁月。各个大学都把中国文化当作大学教育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在有条件的情况下，都开展学术研究。金陵、齐鲁、岭南、华西、福建协和、华中等在哈佛燕京社的支持下，改良师资和课程，增购图书设备，编印刊物，为促进学术研究的持续发展奠定基础。30年代以后，有4所教会大学获国民政府的批准有资格招收历史研究生，这是官方学术机构对这些教会大学国学教育的认可，也使得这些大学把国学研究提高到新的层次。但是情况的发展仍然是多样化的，在既缺乏西方基金也没有国内相关资源的另外一些教会大学，教育仍然受到社会就业市场的影响它们所能做的是建立平衡的国学、西学课程，作一些以个人兴趣为重的学术研究。这种国学强弱的趋势，一直延续到教会大学最后的岁月。值得一提的是，教会大学的学术特点，深受西方自由主义传统的影响，为学术而学术的倾向相当明显。就其发展规模而言，在抗战前的中国整体学术中，已经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

抗战爆发，打断了各个大学国学研究的进程，对教会大学也

是一样。但是相比之下，教会大学，特别是在华西的五大学，还在国学方面维持了一个热闹的局面，无论是学术水平还是教学质量，只有西南联大可与之相比，在整个大后方的文化事业中占了一个更重要的比例。

抗战胜利后不久，内战随之爆发。政治演进到了高潮，学术研究则陷入低谷，教会大学勉强维持局面。全国解放以后，教会大学主动或者被动地适应新的形势，在教育和学术上也开始面对新的天地。由于教会大学与旧制度和西方世界的联系，共产党对意识形态的高度重视以及对传统文化和资产阶级学术强烈的批判态度，注定了教会大学的各个方面要经受一番新的审视。

新中国成立以后，新政府对教会大学的政策是很慎重的。在这些学校中改革旧制、增设新课程计划在稳步进行。如果说教会大学已经被国民党政府认同为中国教育体制中一部分的话，那么新政府至少最初也是这样的。但是教会大学的西方色彩、宗教色彩和资产阶级色彩是新政府所担心的，从长远看，也是和共产党以后要求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难以兼容的。因此，当朝鲜战争爆发，政府加强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民族战线时，中外关系的大局已经决定了教会大学的命运走到了历史的尽头。在反对美帝文化侵略、三反运动和思想改造运动中，教会大学从动机到结果被全盘否定，其教育和研究也是如此。但是当漫长的政治运动的激动趋于平静之后，当中国人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再度审视过去时，新中国以来在教育和学术发展上的曲折和挫折，使人们对包括教会大学在内的前人的事业有了新的认识。

当然，这个认识的过程永远也不会完结。这个研究也许只是展示了这样一个过程，就是基督教大学在试图影响中国社会的进程时，反过来也受到中国社会的深刻影响。这些学校的政策既包含了西方人的设想，也体现了中国社会的需要，并且随着中国社

会的觉醒和进步，中国因素在基督教大学中的影响愈益增强。至于具体到各所大学的演进速度，很大程度上受到学校的外部环境和内部基础的制约。在这些教会大学中，近代国学教育和研究的兴起、发展和终结正是这种互动关系的体现。

附录一

教会大学的部分国学师资

曾在教会大学中工作过的有一定知名度者相当多。本附录根据北京图书馆《文献》丛刊编辑部和吉林省图书馆学会会刊编辑部联合编辑、书口文献出版社1981年起陆续出版的《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简称为《社家》)和晋阳学刊编辑部编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起陆续出版的《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简称为《社传》)中刊载有关学者的自传或由他人撰写的传略,列出在教会大学文史哲专业中工作过、解放以后在国内工作的、后来被称为“社会科学家”者的简介,以为本书正文的补充资料。名单的排列,按姓氏的汉语拼音字母为序。

蔡尚思(1905—1998),福建省德化县人,1925—1928年在北京求学,考入北京大学研究所。1931—1934年到武昌华中大学任教。1935年秋到沪江大学任特种教席。1937年到1945年沪江大学移入上海旧租界,蔡同时在复旦、东吴、无锡国专等校兼课。1946年仍任沪江大学教授。1949—1952年担任沪江大学代校长和副校长。“从1929年起,在各大学担任的课程,有中国学术大纲、中国历代文选、中国思想史、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近现代思想史、中国哲学史、儒家哲学、墨子研究、中国经学概论、中国史学概

论、中国通史、中国政治史、中国社会史、中国教育史等。担任时间最长的是中国思想史、中国通史、中国历代文选三门课程。^①

陈梦家(1911--1966),原籍浙江上虞人(父陈金铺曾任广学会编辑)。1931年毕业于南京中央大学法律系。新月派诗人。1932年由刘廷芳介绍入燕京大学宗教学院。1934--1936年在燕京大学做研究生,毕业后留校任教。1937年抗战爆发后,到西南联大任教。1944年到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古文字学并游学欧洲,1947年回清华。研究古文字的考古学。^②

陈寅恪(1890--1969),原籍江西修水,曾就读于复旦公学,游学欧美多年。1926年起任教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1943--1945年在成都以清华教授名义执教燕京大学。1948年受陈序经之聘,任岭南大学教授。^③

陈垣(1880--1971),广东新会人,光华医学院毕业。参与创办辅仁大学,1926年起担任校长到解放。^④

陈中凡(1888--1982),江苏建湖人。1913年考入北大哲学门。1921年任东南大学国文系主任。1926年任金陵大学国文系教授,并在东吴大学兼课。1935年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国文系讲座教授。抗日战争中随校迁成都。抗战以后,随校迁回南京。南京解放后任金陵大学文学院长,兼中文系教授。研究古典文学和诸子群经。^⑤

① 《类编体自传》,《社传》,一,第345-356页;《蔡尚思自传》,《社家》,四,第312页。

② 周永珍:《陈梦家传略》,《社传》,六,第240—242页。

③ 《陈寅恪传略》,《社传》,七,第246—247页。

④ 刘乃和:《陈垣同志勤奋的一生》,《社家》,四,第100页。

⑤ 《陈中凡传略》,《社传》,五,第134、135页。

邓之诚(1887—1960), 1917年任北大教师, 1927年任北大史学系教授, 兼任燕大教授。1931年起专任燕大历史系教授。每年除讲一门中国通史外, 还每隔一年分别开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明清各断代史中的两门。还兼任过几年辅仁大学的史学课程。^①

范文澜(1893—1969), 浙江绍兴人。191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国学门。先后任教于河南汲县中学、南开大学、北京大学, 并短期在辅仁大学任教。^②

方孝岳(1897—1973), 生于安徽安庆, 1919年毕业于圣约翰大学法律系。后到日本进修法律。回国后在北京华北大学、广州中山大学等校任教。1939—1948年在圣约翰大学任教。研究古典文学、经学、汉语语音史。^③

方壮猷(1902—1970), 湖南湘潭人。1926年毕业于清华研究院。1930—1933年间在北大、燕大、辅仁任兼职讲师。讲授宋辽金元史和日本史。研究民族史。^④

冯家升(1904—1970), 山西孝义人。1934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历史系, 获硕士学位。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东北大学任讲师, 同时与顾颉刚编《禹贡》。1939—1947年应美国华盛顿国会图书馆邀请前往工作, 后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研究室任研究员, 担任辽史研究工作, 1947年春返国。^⑤

冯友兰(1895—1990), 河南唐河人, 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门。后赴美留学, 1922年获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1926—1928

①《邓之诚先生传略》,《社家》,四,第11页。

②徐曰彪等《范文澜传略》,《社传》,十一,第156页。

③《方孝岳传略》,《社传》,五,第48页。

④岳华:《方壮猷传略》,《社传》,七,第50页。

⑤《社传》,七,第64页。

年，担任燕大哲学教授，讲“中国哲学史”，并担任《燕京学报》编委会委员。后来执教清华、北大。^①

冯沅君(1900—1974)，河南唐河人，1922年夏北京女子高等师范毕业，入北大国学门做研究生。毕业后，1925—1926年到金陵大学任教。研究中国文学史。^②

傅统先(1910—)，生于湖南常德。1927年转入圣约翰大学高中，毕业后升入圣约翰大学。主修哲学，辅修教育学。1932年毕业。1938—1941年，兼东吴法学院、圣约翰大学逻辑学和哲学概论课。1942年取得圣约翰硕士学位。一直担任圣约翰大学教育系主任兼教授到1948年。研究哲学和教育学。^③

傅衣凌(1911—1988)，厦门大学毕业，毕业后当过中学教师。1935年赴日进修。回国后在福建省银行研究室工作。1941—1944年在福建协和大学任教，担任中国通史、中国近代史、魏晋南北朝史、日本史、史学方法等课程。^④

高亨(1900—1986)，吉林双阳人，1926年清华研究院毕业，初任吉林省立法政专门学校教师。1929年任东北大学教授，1931年后曾任齐鲁大学教授。研究文字学和易经。^⑤

高名凯(1911—1965)，福建平潭人，1925年秋到1931年夏在福州英华中学读初、高中，1935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哲学系，1935—1937年在燕京大学研究院哲学部学习。1937起在法国巴黎大学学语言学，1940年获博士学位。1941年在燕京大学任助教。1942年至1945年在北京中法研究所任研究员。1945到1952年任

① 《自传》，《社家》，三，第39页。

② 袁世硕等：《冯沅君传略》，《社传》，三，第92页。

③ 《社传》，六，第448页。

④ 《自传》，《社家》，四，第282页。

⑤ 《高亨先生传略》，《社家》，六，第269页。

燕京国文系教授兼主任。1952年起在北大任教，担任过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学术委员等职。^①

高觉敷（1896—1993），1923年毕业于香港大学文学院教育系，毕业后曾在上海暨南学校师范科、四川大学、中山大学教心理学。抗战胜利后兼任金陵大学教授，兼任教育系主任。研究心理学。^②

顾随（1897—1960），河北清河人。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英文门。1929年到燕大任教。讲授古典韵文、佛学、书法、中国古典文学方面的课程。1939年开始兼任辅仁大学课程。1941年燕大关闭，以后一直在辅仁教书到解放。研究中国古典文学。^③

郭麟阁（1904—1984），河南西平人。1928年毕业于中法大学法文系。1935年获法国里昂大学博士。先在中法大学教书，中法大学停办后，1938—1946年在辅仁大学教法语及中国古典文学。1946年后，回中法大学兼任辅仁大学教授。^④

郭绍虞（1893—1984），江苏苏州人，青少年时读过小学和中等工业学校两年。后进商务书馆所属尚公小学教书，得读“涵芬楼藏书”，开始学术研究和创作。1921年到1927年先后在济南第一师范，福建协和大学、武昌中山大学任教。1927年后任燕京大学国文系教授、系主任和研究院导师，一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燕京被迫停办为止。1942年以后在上海开明书店任编辑，抗战胜利后在上海大夏大学、之江大学、光华大学、同济大学任中文系教授。主要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语言学、训

① 《高名凯语言学论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668—669页。

② 《高觉敷自传》，《社传》，四，第312页。

③ 《顾随传略》，《社传》，四，第335页。

④ 《郭麟阁传略》，《社传》，七，第331—332页。

诂学、书法理论。^①

黄嘉德(1908—1992),福建安溪人。1931年在圣约翰大学英语系毕业后留校,至1949年历任助教、教授、文理学院副院长,文学院副院长。30年代初起,在中文系讲授过《史记》、《汉书》等课程。1936年9月与胞弟黄嘉音以及林语堂三人合资创办《西风》^②。

黄子通(1887—1979),浙江嘉兴人。毕业于交通大学,留学英国伦敦大学、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获多伦多大学哲学硕士。回国后先在长沙明德大学,后到燕京大学、湖南大学、北京大学教书。研究西方哲学及中国哲学史。^③

胡士莹(1901—1979),浙江平湖人。1920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东南大学)。毕业后先在中学教书,1940年到暨南大学任教。1942年兼圣约翰大学的课程。1946年,应聘为之江大学专任教授。研究小说、戏曲、通俗文学。^④

胡毅(1904—),湖南长沙人。1924年毕业于清华学校,1926年获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学士,1928年获芝加哥大学博士。1934—1938年在中山大学和华中大学各教了4年。1941年离开华中到昆明西南联大师范学院。研究教育心理学、普通心理学和教学法。^⑤

胡小石(1888—1962),原籍浙江嘉兴,生于南京。1910年在两江优级师范学堂农科毕业后,历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和西北大学教职。1924—1926年前后在金陵大学

① 《郭绍虞自传》,《社家》,十,第214—215页。

② 《自传》,《社家》,三,第282—283页。

③ 《社家》,一,第324页。

④ 《胡士莹先生事略》,《社家》,五,第270页。

⑤ 《自传》,《社传》,六,第330页。

任教。以后在东南大学、中央大学、国立女子师范学院等校任中文系教授。研究中国文学史和文字学史。^①

黄云眉（1898—1977），浙江余姚人，一生只受过两年教育。30年代曾任金陵大学国学研究所研究员，后在沪江大学教书，研究明史。^②

蒋礼鸿（1916— ），浙江嘉兴人。毕业于之江大学，抗战后在之江当讲师，研究语言学。^③

蒋维乔（1873—1968），江苏武进人。1893年考中秀才，1902年就读于南菁江苏高等学堂。1912年当过南京教育部秘书长。1925年担任东南大学校长。1931年后，在沪江大学教授过中国文学史、《诗经》、《说文》。研究史学、佛学和教育学。^④

李何林（1904—1988），安徽霍丘人。读过国立东南大学，1926年投身北伐军。后从事教学。1940年秋到1942年夏，由老舍介绍，到云南大理喜州的华中大学国文系教书。研究文学史。^⑤

李霁野（1904— ），安徽霍丘人，1919年入阜阳三师。1923年春入北京崇实中学。1938年辅仁大学成立女生部，担任教师。1938—1943年在辅仁教学，译出《战争与和平》。^⑥

梁方仲（1908—1970），广东番禺人。1926年入清华大学，1933年毕业于清华研究院，获经济史硕士学位。后入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所。1943年哈燕社资助梁方仲、陈寅恪、闻一多、汤用彤、陈梦家、邵循正赴美。1948年底，应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文学院

① 《胡小石先生传》，《社家》，十，第195页。

② 潘群：《黄云眉传略》，《社传》，五，第407页。

③ 《自传》，《社家》，一，第338页。

④ 陈秉仁：《蒋维乔传略》，《社传》，六，第415、436页。

⑤ 《自传苍达经历》，《社家》，一，第108页。

⑥ 《自传》，《社家》，二，第179—181页。

长王力、教务长冯秉铨等人邀请，梁任岭南大学经济系主任。研究中国经济史。^①

林庚(1910)，原籍福州，生于北京。1928 年入清华物理系，1930 年转清华中文系。1933 年毕业后任朱自清助教。抗战爆发后到厦门大学任教。1947 年任燕京大学教授。研究古典诗歌和文学史。^②

林之棠(1896—1964)，福建福安人。1928—1931 在北大文学研究所国学门当研究生。毕业后在北京教中学。1937 年应华中大学国文系之聘，历任讲师、教授、系主任。研究中国文学史。^③

刘节(1901—1977)，浙江永嘉人。1928 年毕业于清华国学研究所。先到天津南开大学任教，1931 年任北平图书馆编纂委员会金石部主任。1935 年到燕京大学任教。抗战后在成都金陵大学文化研究所工作。1940 年离开成都赴重庆。研究中国古代史、古代民族史、古代语文史。^④

刘人杰(1904—1977)，湖南岳阳人。1922 年入武昌师范大学，1926 年初赴日留学，1930 年回国后先后在复旦大学、安徽大学、四川大学任教。抗战期间，兼任之江大学上海分校、圣约翰大学教授。研究中国文学史。^⑤

刘国钧(1899—1980)，江苏南京人。1920 年毕业于金陵大学，旋留学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哲学系、图书馆专科学校及研究院，获博士学位。回国后 1925—1929 年任金陵大学图书馆主任兼教授。1929—1930 年在北京图书馆任职，1930—1943 年任金陵图书馆

① 叶显恩等《梁方仲传略》，《社传》，四，第 382 页。

② 《自传》，《社家》，六，第 247 页。

③ 何士龙等《林之棠传略》，《社传》，六，第 256、260 页。

④ 《刘节传略》，《社家》，五，第 43 页。

⑤ 《刘人杰传略》，《社家》，五，第 62 页。

长、文学院院长及教授。1943年离开金陵大学，筹备国立西北图书馆并出任主任。研究图书馆学和目录学。^①

陆侃如(1903—1978)，江苏海门人。1927年毕业于清华研究院。1935年获巴黎大学文学院博士学位。同年秋任燕京大学国文系主任。1937年抗战爆发后先后任中山大学、东北大学（四川三台）、青岛山东大学等校教授。研究文学史。^②

吕思勉(1884—1957)，江苏武进人，1908年苏州东吴大学教授，1925年，经朱经农介绍，任上海沪江大学教授。1926年夏入光华大学。1941年又在沪江兼课。研究文史。^③

罗根泽(1900—1960)，河北深县人。1927年考入清华研究院国学门，同时为解决经济问题，又考入每月有津贴的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1929年毕业后一直在国立大学任教。顾颉刚在燕京时，他曾应顾之约，主编《古史辨》第四册、第六册。^④

罗庸(1900—1950)，原籍江都，生长于北京。1920年北大毕业后又入研究院国学门深造。后到中山大学任教。1932—1937年，任北京大学、辅仁大学两校教授。抗战后入西南联大。研究考古学、语言学。^⑤

马长寿(1906—1971)，山西昔阳人。1929入南京中央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1942年后曾在金陵大学、南京大学教书。研究少数民族史。^⑥

缪钺(1904—1995)，原籍江苏溧阳，生于河北迁安。1924年

① 《刘国钧生平及其学术思想》，《社家》，五，第80页。

② 牟世金等：《陆侃如传》，《社传》，十一，第285页。

③ 李永圻编：《吕思勉先生编年事辑》，任上海书店1992年版，第120页。

④ 周勤初：《罗根泽先生传》，《社家》，八，第235—236页。

⑤ 张书桂等编：《罗庸教授年谱》，《社家》，六，第233—234页。

⑥ 王宗维：《马长寿传略》，《社传》，四，第1页。

北京大学肄业。先在中学、河南大学、浙江大学国文系任教。抗战后，任华西大学国文系教授，兼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研究中国古代史和文学史。^①

蒙思明(1908—1974)，四川盐亭人。1929 年秋，考入华西大学历史系，1933 年毕业留校任教。1935 年考入燕京大学研究院历史部，修中国史。1938 年获燕大硕士。硕士论文《元代社会阶级制度》是其成名作。1938—1944 年在华西大学任讲师，副教授。经顾颉刚介绍，还参加齐鲁国学所工作。1944—1949 在哈佛留学，获博士学位。1950 年回华西大学工作。研究中国古代史。^②

庞石帚(1895—1964)，四川成都人。早年就读于商业学堂。后教中学。1924 年先后任成都高等师范、四川大学教授。1935 年至 1942 年曾任华西大学教授兼中文系主任。后在四川光华大学任教。研究中国文学史。^③

皮高品(1900—)，湖北人。1921 年入文华大学，1925 年毕业时发给文学士和图书科毕业证书。先在中学教书。后担任齐鲁大学图书馆主任、燕京大学图书馆编目主任。1940 年任武昌文华图书馆专科学校教授。^④

钱基博(1887—1957)，江苏无锡人，先后任清华大学、无锡国专，上海圣约翰大学，光华大学、浙江大学、湖南国立师范学院、华中大学等校教授。研究古典文学、考古学。^⑤

任铭善(1913—1967)，江苏如皋人。1935 年毕业于之江文理学院国文系后，留校任教。抗战后期到迁往福建的江苏三元学院

① 《自传及著作简述》，《社家》，三，第 334 页。

② 陈世松：《蒙思明传略》，《社传》，六，第 472—473 页。

③ 屈守元：《庞石帚先生小传》，《社家》，八，第 177 页。

④ 《自传》，《社家》，六，第 79—80 页。

⑤ 吴忠匡：《毕生勤奋读书著述的钱基博教授》，《社家》，十，第 302—305 页。

任教，后入浙江大学。研究文字音韵学。^①

容肇祖(1897—1994)，广东东莞人。容庚之弟。1922年入北大哲学系。1926年毕业后到厦大、中山大学，1930年到岭南大学任国文系副教授。1932年离开岭南。1933年又回到岭南。1934年到辅仁任国文、历史、哲学三系副教授。抗战起离京。广州沦陷后，再进岭南。1942年到中山大学。1946年后到北京大学。研究中国历史和哲学思想史。^②

商承祚(1902—1992)，广东番禺人。承家学，1923年出版《殷虚文字类编》，进北大研究所当研究生。1933年秋，到金陵大学任教，兼中国文化研究所专任研究员。1941年后辞去金大职务赴重庆，兼任齐鲁大学、东吴、沪江大学联合法商学校教授。1948年秋入中山大学。研究考古学、中国历史。^③

沈兼士(1886—1947)，浙江吴兴人。留学日本东京物理学校。回国后1912年到北京。先后在北京大学、厦门大学、清华大学等校执教。1929年后一直在辅仁大学任教，担任过国文系教授，代理校长、文学院院长兼文科研究所主任。研究语言文字学。^④

史念海(1912—)，山西人。1932年入辅仁，受业于陈垣。大学读书期间，由于顾颉刚的引导，走上了研究历史地理的道路。后曾任燕京大学和辅仁大学教师。^⑤

孙楷第(1898—1986)，河北沧县人。1928年毕业于北平高等师范，毕业后留校任助教。1931年任职国立北平图书馆。1942年经陈垣介绍任辅仁大学讲师。抗战胜利后任北大教授。1948年转

①《自传》，蒋礼鸿：《任铭善传略》，《社家》，三，第61页。

②《容肇祖自传》，《社传》，三，第360—368页。

③《商承祚自传》，《社传》，四，第406—409页。

④葛信益：《沈兼士传略》，《社传》，五，第103页。

⑤《史念海自传》，《社传》，一，第47—56页。

入燕京大学任国文教授。解放以后随燕京并入北大。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和中国小说史。^①

孙望(1912)，江苏常熟人，1932 年秋，考进金陵大学国文系。1937 年毕业后在政府机关工作。1942 年后在成都金陵大学任教直到解放。研究中国古典文学。^②

谭戒甫(1887—1973)，湖南湘乡人，上海高等实业学堂肄业，先在中学后到武汉大学教书。1938—1945 年间，曾在之江大学中文系任教。抗战胜利后到湖南大学。研究先秦诸子、楚辞和金文。^③

唐兰(1901—1971)，浙江嘉兴人，自学成名。1932 年春，代顾颉刚在燕京和北大讲授《尚书》，秋后入北大，也在清华、辅仁讲授古文字。主要在北大工作。^④

谭其骧(1911—1992) 1930 年燕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1932 年初任辅仁大学教授。1934 年起在北大、燕大兼课，在辅仁开过《魏普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1935 年到广东一年，1936 年仍在燕京兼课。1937 年到 1940 年在燕京教“中国地理”。1940 年到浙江大学，1950 年到复旦大学。研究中国历史地理。^⑤

童书业(1908—1968)，浙江宁波人，自学成名。1934 年在浙江图书馆附设的校印所当工人。1935 年应顾颉刚邀到北京，任禹贡学会编辑。并任顾颉刚在燕京和北大的助教。抗战后在光华大学当中国历史地理讲师。抗战胜利后在上海市博物馆当部主任，并

① 杨镰：《孙楷第传》，《社传》，十一，第 35—36 页。

② 《自传》，《社家》，三，第 91—95 页。

③ 谭回生：《谭戒甫传略》，《社家》，一，第 325 页。

④ 曾礼：《唐兰传略》，《社家》，第三辑，第 235 页。

⑤ 《谭其骧自传》，《社传》，二，第 364、366 页。

兼任光华大学历史系教授。解放后任山东大学历史系教授。①

王辑五(1900—1981),河北雄县人,1933年毕业于日本广岛文理科大学历史系。回国后在北平师范大学和辅仁大学任教。1935年辞去辅仁职,改在北京大学和北京师范大学任教。研究中日关系史。②

王惟中(1903—),安徽合肥人。1922年入金陵大学,后转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政治系,1927年毕业。1928—1930两年间在圣约翰大学当一年数学助教和两年讲师。后回安徽担任中学校长。1934—1938在奥德两国留学。1938年回国,在金陵大学教过书。研究外国经济学说史。③

王钟翰(1913—),湖南东安县人。1934年考入燕京大学历史系。1938年考入燕大研究院历史学部。1940年毕业后一直在燕京任教。1946—1948年在美国学习两年,回国后担任哈燕社引得编纂处代主任兼历史系副教授。研究明清史。④

吴世昌(1908—1986),浙江海宁人。1928—1935在燕京学习。1935年在燕京研究院毕业。先后在研究机关和西安临时大学、中山大学、桂林师范学院国文系任教。后入中央大学。1947年起旅英15年。研究红学。⑤

王力(1900—1986),广西博白县人。1926年考入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1927年赴法,获法国巴黎大学文学博士。1932年回国。任清华大学中文系教授。同时兼任燕京大学讲师。抗战后去南方。

① 黄永年:《董书业传略》,《社传》,一,第331—333页。

② 叶昌绾:《王辑五传略》,《社传》,七,第38页。

③ 洪人麟:《王惟中传略》,《社传》,五,第12、15页。

④ 《王钟翰自传》,《社家》,五,第20—24页。

⑤ 施议对:《吴世昌传略》,《社家》,八,第98、103页。

1948年任岭南大学教授，兼文学院院长。研究古汉语。①

王遂常(1900—)，浙江嘉兴人。无锡国专毕业后从事教育工作。1938—1942年任沪江大学历史系教授，讲唐宋文选。研究文史与哲学史。②

王驾吾(1900—)，江苏南通人，1924年东南大学毕业后，曾在中学和大学任教。1946年去之江大学代理秘书长，兼授中国哲学课，1949年之江恢复中文系后，任教授和主任。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哲学。③

夏承焘(1900—1986)，浙江温州人，1918年温州师范学校毕业，1920年在南京高等师范暑假班听胡适等讲课。1930年后一直在之江文理学院任教。研究词学。④

萧璋(1909—)，山东济南人。1931年北京大学国文系毕业。曾担任国立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专任讲师，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辅仁大学国文系教授。研究语言学。⑤

徐嘉瑞(1895—1977)，云南昆明人，早年就读于昆明工矿学堂、云南省立师范。后在中学任教。1938年云南大学讲师，次年文史系主任兼教授。1946—1948任华中大学教授。后回云南大学。研究中国文学史。⑥

严群(1907—1985)，福建侯官人。1927年报考福州协和大学哲学系，后转入燕京，1931年燕京哲学系毕业，入燕京研究院研究希腊哲学。1935年赴美留学。1940年任燕京大学哲学系主任。

① 田小琳：《王力传略》，《社家》，七，第115页。

② 潘泳君记录整理：《王遂常自传》，《社家》，七，第146页。

③ 水冒松：《王驾吾先生传》，《社家》，八，第29页。

④ 夏承焘《我的治学道路》，《社家》，一，第305—306页。

⑤ 萧璋：《非曰能之，愿学焉》，《社家》，六，第114页。

⑥ 徐滨：《徐嘉瑞小传》，《社家》，五，第313页。

1947年到浙江大学。^①

杨堃(1901—),河北大名。1920年入保定直隶省立农业专门学校。1921年起留法,1928年获博士学位。1937到1941年在燕大社会学系任教。后入云南大学。研究民族学。^②

杨明照(1909—),四川大足人。1935年毕业于四川大学。1936年秋考入燕京大学研究院国学部。1939年毕业以后,先后在燕京大学和成都燕大教学。后入四川大学。研究古典文学。^③

袁珂(1916—),四川新凡人,1937年入四川大学中文系。1940年转入华西大学中文系。“当时许寿棠先生恰好在那里任中英庚款专聘教授,开了“传记研究”和“小说史”两门功课。1941年毕业在中学教书,后来从事编辑。神话研究。^④

余嘉锡(1884—1955),湖南常德人。光绪二十七年(1901)举人。1928年赴北京,先在北京大学讲解目录学。1931年任辅仁大学教授兼国文系主任,1942年兼辅仁大学文学院院长,直到解放。^⑤

游国恩(1899—1978),江西临川人。1926年北京大学国文系毕业。先在中学教书。1929年到武汉大学任教。1931年到青岛山东大学。1936—1942年在华中大学任教。以后任北京大学兼西南联大教授。研究古典文学,尤重楚辞。^⑥

于省吾(1896—1984),辽宁海城人。1919年毕业于沈阳国立高等师范。曾任故宫博物院专门委员。1929到1949年,任辅仁大学

① 严群:《生平和著述简述》,《社家》,五,第148—150页。

② 杨堃:《我的民族学研究五十年》,《社家》,一,第196页。

③ 杨明照:“自传及著作简述”,《社家》,四,第219、220页。

④ 《袁珂自传》,《社传》,四,第326页。

⑤ 余淑宜:《余嘉锡先生传略》,《社传》,十一,第123—124页。

⑥ 游垚:《游国恩传略》,《社传》,七,第400页。

讲师、教授，燕京大学名誉教授，北京大学兼职教授。研究古文字、古史。^①

张长弓(1905—1954)，河南新野人。早年入师范求学。1929年秋考入燕大国学研究所中国文学研究生。1930年兼任岭南大学国文系讲师，毕业后先在安阳教中学。1940年9月—1942年春，到燕大任教。以后到河南大学工作。研究中国文学史。^②

张维华(1902—1989)，山东寿光人。1927年齐鲁大学历史政治系毕业，1929年到齐鲁大学历史系作助教。1931年到燕京大学研究院读书。1933年又回到齐鲁大学历史系作教师。1936年到北京禹贡学会工作。1939年到齐鲁。1944年离开成都，到国立女子师范教书。1948年秋到迁往浙江的齐鲁大学工作。研究历史。^③

张默生(敦谟)(1895—1979)，山东临淄人。1924年北京师范大学毕业。1925—1927齐鲁大学讲师。^④

郑振铎(1898—1958)，浙江(永嘉)温州人。1917年入铁路管理学校。五四后投身创办新刊物。1922年曾在上海大学中文系任教。1927—1928年游学欧洲。回国后在商务印书馆任职，并任复旦大学教授。1931—1935年，任燕京大学教授，并任国文系代理主任。1935年春离开燕京大学，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和中文系主任。后从事文化活动。^⑤

赵承信(1907—1959)。1930年燕京大学社会学系，1933年美国密执安大学博士，博士论文《从分与合的观点对中国一个区位学研究》，1933年起，任燕京社会学系教授，曾在美国发表《中

① 于省吾：《教学和科研成果概述》，《社家》，一，第1页。

② 张庆木弓：《张长弓传略》，《社传》，五，第122页。

③ 《张维华自传》，《社家》，五，第201—210页。

④ 张皓：《忆先父张默生》，《社家》，五，第213页。

⑤ 陈福康：《郑振铎传略》，《社家》，八，第269—272页。

国人口论》，抗战后任法学院院长。

周祖谟（1914— ），北京人。193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同年考入历史语言所语言组。1939年到辅仁大学教授国文课。1946年受聘为北京大学副教授。解放后一直在北大任教。研究语言学 and 古典文学。^①

朱东润（1896— ），江苏泰兴人。早年入上海南洋附中。肄业于伦敦西南学院。曾在中学教书12年。以后在武汉大学、中央大学、江南大学、齐鲁大学、沪江大学、复旦大学教书。研究中国文学史和传记文学。^②

朱士嘉（1905— ），江苏无锡人。1928年获燕京大学学士学位，1932年获硕士学位。1930至1937年加入禹贡学会和地理学会，并在该会编辑禹贡半月刊和《地学》杂志。并担任辅仁大学讲师和燕京大学图书馆中文编目部主任。并主编《史学年报》和《燕大图书馆报》。1939年离开燕京赴美国工作和深造。研究历史和图书馆学。^③

朱希祖（1879—1944），浙江人。1905—1909年就学于东京早稻田大学。1913年以后任北大中文系及史学系主任。1926年，应聘为国立清华大学和辅仁大学教授。1928年仍回北大。1930年留美派控制北大，朱就中央研究院职。^④

① 周祖谟：《往事自述》，《社传》，十一，第198页。

② 《朱东润自传》，《社传》，三，第135页。

③ 《朱士嘉自传》，《社家》，第88—90页。

④ 傅振伦：《朱希祖传略》，《社传》，五，58页。

附录二

教会大学三种主要学报目录

《燕京学报》总目

《燕京学报》第一期，1927年6月

金界壕考	王国维
元代的戏曲	谢婉莹
中国哲学中之神秘主义	冯友兰
秦妇吟之考证与校释	张荫麟
殷周礼乐器考略	容庚
葇芷繅衡室读诗杂记	俞平伯
福州旧历新年风俗之调查	叶树坤

《燕京学报》第二期，1927年12月

元西域人华化考	陈垣
孔子在中国历史中之地位	冯友兰

道教思想于道教	许地山
朱熹的哲学	黄子通
九章及两汉之数学	张荫麟
明清戏曲的特色	顾敦铎
王国维先生考古学上之贡献	容 庚

《燕京学报》第三期，1928年6月

儒家对于婚丧祭礼之理论	冯友兰
中国历史上之“奇器”及其作者	张荫麟
摩尼之二宗三际论	许地山
汉代服御器考略	容 庚
中国史书上关于马黎诺使节之记载	张星烺
汉书释例	杨树达
王守仁的哲学	黄子通
续书楼读书记	伦 明
明季史籍五种跋文	朱希祖
明吕乾斋、吕宁衡祖孙墓志铭考	洪 业

《燕京学报》第四期，1298年12月

史讳举例	陈 垣
西域佛教之研究	日本羽溪了谛
儒道二家论“神”与文学批评之关系	许敦谷译
印度释名	郭绍虞
	吴其昌

《燕京学报》第五期，1929年6月

戈戟之研究	马 衡
伪古文尚书案之反控与再鞫	张荫麟

西周金文真伪存佚表	容 庚
西汉物价考	崔兑之
燕京故城考	奉 宽
渔洋山人著书考	伦 明
附录：评猷氏集古录第一集	

《燕京学报》第六期，1929年12月

校舍落成纪念专号

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	顾颉刚
耶律楚才父子信仰之异趣	陈 垣
云岗石窟寺之译经与刘孝标	陈 垣
三百篇之“之”	黎锦熙
周金文中所见代名词释例	容 庚
金文历朔疏证	吴其昌
筹算制度考	李 伊
慎懋赏本慎子辨伪	罗根洋
燕京大学校址小史	许地山

《燕京学报》第七期，1930年6月

从天文历法推测尧典之编成年代	刘朝阳
刘向刘歆父子年谱	钱 穆
大学为荀学说	冯友兰
释巫	崔兑之
山海经在科学上之批判及作者之时代考	何观洲
书后	郑德坤
宋元南戏考	钱南扬
“辽彭城郡王刘继文墓志”跋	奉 宽

《燕京学报》第八期，1930 年 12 月

匈奴王号考	方壮猷
鲜卑语言考	方壮猷
耶律楚才之生卒年	陈 垣
斐律宾史上‘李马奔’ Limahong 之真人考	张星烺
莽量函率考	颜希深
三百篇之‘之’	黎锦熙
释诗书之‘诞’	吴世昌
关于老子成书时代之一考察	钱 穆
学术消息：	
民国十八、九年国内学术界消息	余逊、容媛
一九二九年日本学界对于中国研究之论文一瞥	黄孝可
日本已故东洋史学家箭内藤田博士之著述目录	黄孝可
新著评论：	
评猷氏集古录第二集	容 庚
评戴闻达博士英译商君书	瞿世英

《燕京学报》第九期，1931 年 6 月

矢彝考释	吴其昌
汤盘孔鼎之扬榷	郭鼎堂
臣辰禾铭考释	郭鼎堂
陈那以前中观派与瑜伽派之因明	许地山
斐律宾史上李马奔之真人考补遗	李长傅
崔东壁先生故里访问记	顾颉刚、洪煊莲
(图后附说)	
二十年(一月至六月)国内学术界消息	余逊、容媛、赵贞信

《燕京学报》第十期，1931 年 12 月

周初地理考	钱 穆
殷历质疑	刘朝阳
“斐律宾史上‘李马奔，Limahong 之真人考’补正 （并附“林道乾事迹考”补正）	黎光明
整理升平署档案记	朱希祖
珠算制度考	李 俨
大藏经录存佚考	冯承钧
大晋龙兴皇帝三临辟雍皇太子又再在之盛德隆熙之颺跋	顾廷龙
二十年（七月至十二月）国内学术消息	容媛编
本刊一至十期篇名引得	
本刊一至十期撰译者人名引得	
本刊八至十期出版界消息引得	

《燕京学报》第十一期，1932 年 6 月

周官著作时代考	钱 穆
层化的河水流域地名及其解释	郑德坤
上代象形文字中日文之研究	闻 宥
汉熹平石经周易残字跋三原氏藏	刘 节
秦腔考	马彦祥
读说文虫，虺，蟲，三部札记	王善业
二十一年（一月至四月）国内学术界消息	容媛编

《燕京学报》第十二期，1932 年 12 月

太一考	钱宝琮
古三苗疆域考	钱 穆

所谓“修文殿御览者”	洪业
白石歌曲旁谱辨	夏承焘
中国语法复词中偏义例续举	刘盼遂
柯江考	何观洲
觉罗诗人永忠年谱	侯璜
近年西北考古的成绩	贺昌群
二十一年五月至十二月国内学术界消息	容媛编

《燕京学报》第十三期，1933年6月

契丹名号考释	冯家升
三国吴兵考	陶元珍
再论殷历	刘朝阳
诗三百篇“言”字新解	吴世吕
三面篇联绵字研究	张寿林
写本经典释文残卷书后	胡玉缙
龚自珍汉朝儒生行本事考	张荫麟
月氏为虞后及“氏”和“氏”的问题	徐中舒、郑德坤、冯家升
二十二年一月至六月国内学术界消息	容媛编

《燕京学报》第十四期，1933年12月

卜辞所见殷先公先王续考	吴其昌
古乐器小记	唐兰
即、则、祗、只、且就古训今义通精考	吴其昌
大龟四版考释商榷	瞿润缙
尚书释文敦煌残卷与郭忠恕之关系	洪业
郁华阁金文跋	顾廷龙
论字喃(Chu Nom)之组织及其与汉字之关涉	闻宥

二十二年七月至十二月国内学术界消息

容媛编

《燕京学报》第十五期, 1934 年 6 月

新莽职方考	谭其骧
晋永嘉丧乱后之民族迁徙	谭其骧
古闽地考	叶国庆
唐蕃会盟碑跋	姚薇元
金开国前三世与高丽和战年表	朱希祖
胡惟庸党案考	吴 晗
水经注板本考	郑德坤
李唐为蕃姓三考	刘盼遂
日本鸟居龙藏氏调查热河谷境契丹文化的经过 与陈寅恪论汉朝儒生行书	魏建猷 张荫麟
二十三年国内学术界消息	容媛编

《燕京学报》第十六期, 1934 年 12 月

晋荀勖十二笛律考	颜希深
白石道人歌曲考	夏承焘
唐代俗讲考	向 达
从西洋哲学观点看老庄	张东荪
左传与国语	卜德 (Derk Bodde)
国语真伪考	孙海波
鸟书考	容 庚
二十三年七月至十二月国内学术界消息	容媛编

《燕京学报》第十七期, 1935 年 6 月

佛说圣观自在菩萨梵赞	钢和泰
------------	-----

汉人月行研究	钱宗琮
关于东北史上的一位怪杰的新史料	吴 晗
卜辞历法小记	孙海波
秦始皇刻石考	容 庚
鸟书考补正	容 庚
义净译宝生论中唯识二十论与玄奘译本之关系	李华德
二十三年七月至廿四年国内学术界消息	容缓编

《燕京学报》第十八期，1935年12月

大中磬刻文时代管见	许地山
唐大中铜磬流传考	容 庚
释天	美国 顾立雅撰
记正德本朱子实纪并说朱子年谱的本子	容肇祖
月令的来源考	容肇祖
魏收之史学	周一良
四十二章经道安经录阙载之原因	王维诚
元杂剧里的八仙故事与元杂剧体例	石兆元
山西石佛考查记	马 鉴、周一良
二十四年五月至十一月国内学术界消息	容媛编

《燕京学报》第十九期，1936年6月

水经注赵戴公案之判决	郑德坤
庄子外杂篇探源	罗根泽
潘平格的思想	容肇祖
古文字中之商周祭祀	陈梦家
东林党人榜考证	朱 倬
日人在东北的考古	冯家升

安史乱前之河北道 谷霁光
二十四年十二月至二十五年五月国内学术界消息 容媛编

《燕京学报》第二十期，1936年12月

牟子理惑论检讨 余嘉锡
陶集考辨 郭绍虞
古剧四考 冯沅君
风雅韵例 陆侃如
庄子内外篇分别之标准 冯友兰
南宋亡国史补 张荫麟
宋金元戏剧搬演考 钱南扬
跋洪去芜本朱子年谱 容肇祖
汉语和欧洲语用动辞的比较 陆志韦
老子新证 于省吾
春秋周殷历法考 莫非斯
明代户口的消长 王崇武
周金文中之‘双宾语句式’ 沈春晖
山周迄清父子之伦未全确定论 刘盼遂
临安三志考 朱士嘉
明大诰与明初之政治社会 邓嗣禹
商代的神话与巫术 陈梦家
汉张衡候风地动仪造法之推测 王振铎
跋洪去芜本朱子年谱补记 容肇祖
国内学术界消息（二十五年六月至十二月） 容媛编

《燕京学报》第二十一期，1937年6月

平均律算解 杨荫浏

商君书考证	容肇祖
庄子校证	杨明照
北宋诗话考	郭绍虞
说“赚词”	冯沅君
禹邗王壶考释	陈梦家
释诗经之于	吴世昌
国内学术界消息（二十六年一月至六月）	容媛编
本刊十一至二十期引得	
篇名	
撰译者人名	
学术机关消息	
出版界消息	
本期英文提要	

《燕京学报》第二十二期，1937年12月

中国佛史零篇	汤用彤
神韵与格调	郭绍虞
反训纂例	董 璠
封建制度与儒家思想	齐思和
元明残剧八种（附录一则）	顾 随
答吴诸两君评国策勘研	钟风年
国内学术界消息（二十六年七月至十二月）	容媛编
本期论文英文提要	

《燕京学报》第二十三期，1938年6月

焦竑及其思想	容肇祖
性灵说	郭绍虞

唯识新解	朱宝昌
清开国初政府诸部疆域考	刘选民
明代宣大山西三镇马市考	侯仁之
吕氏春秋校证	杨明照
鸟书三考	容庚
国内学术界消息（二十七年一月至六月）	容媛编
本期论文英文提要	

《燕京学报》第二十四期，1938年12月

中国语词之弹性作用	郭绍虞
五行之起源	陈梦家
白石道人行实考	夏承焘
善本传奇十种提要	郑 騫
战国制度考	齐思和
读书杂识	周一良
国内学术界消息（二十七年七月至十二月）	容媛编
本期论文英文提要	

《燕京学报》第二十五期，1939年6月

证广韵五十一声类	陆志韦
戊戌政变时反变法人物之政治思想	陈 铤
宋词科考	聂崇岐
中俄早期贸易考	刘选民
王鸿绪明史列传残藁	侯仁之
国内学术界消息（二十八年一月至六月）	容媛编
本期论文英文提要	

《燕京学报》第二十六期，1939 年 12 月

不同的逻辑与文化并论中国理学	张东荪
四库著录南宋诗话提要评述	郭绍虞
唐五代韵书跋	陆志韦
唐写本韵书的声类	凌大斑
三四等与所谓‘喻化’	陆志韦
孙子著作时代考	齐思和
太史公书称史记考	杨明照
评冯著中国哲学史	李世繁
国内学术界消息（二十八年七月至十二月）	容媛编
本期论文英文提要	

《燕京学报》第二十七期，1940 年 6 月

宋辽交聘考	聂崇岐
王守仁的门人黄绾	容肇祖
商王名号考	陈梦家
所谓‘景善日记’者	程明洲
南戏与北剧之变化	凌景埏
王明清挥尘录辨证标题	张家驹
四罪辨	钟风年
下花园之北魏石窟	鸟居龙藏
国内学术界消息（二十九年一月至六月）	容媛编
本期论文英文提要	

《燕京学报》第二十八期，1940 年 12 月

说文广韵中间声类转变的大势	陆志韦
---------------	-----

试拟切韵声母之音值并论唐代长安语之声母	陆志韦
卜辞“𠄎”弗通用考	张宗箴
郭象庄子注是否窃自向秀检讨	杨明照
由经典释文试擦庄子古本	寿普暄
宋魏汉津乐与大口晟府	凌景埏
冯惟敏及其著述	郑 箴
契丹黑山黑岭考	鸟居龙藏
燕吴非周封国说	齐思和
五音七音述考	王西征
国内学术界消息（二十九年七月至十二月）	容媛编
本期论文英文提要	

《燕京学报》第二十九期，1941年6月

宋代府州军监之分析	聂崇歧
吴伟业殿上行本事质疑	秦佩珩
段氏说文注所标韵部辨误	许世瑛
论开合口	王静如
契丹之角牛氏	鸟居龙藏
翰脱杂考	翁独健
国内学术消息（三十年一月至六月）	容媛编
本期论文英文提要	

《燕京学报》第三十期，1946年6月

汉语的人称代名词	高名凯
南宋六陵遗事正名暨诸攒宫发毁年代考	阎简弼
石面雕刻之渤海人风俗与萨珊式胡瓶	鸟居龙藏
西周地理考	齐思和

- 北平金水河考 侯仁之
- 说文解字读若音订 陆志韦
- 元典章译语集释 翁独健
- 书评
- 紫江朱氏刊 黔南别集三种 孙楷第
- 朱桂莘编 紫江朱氏家乘 孙楷第
- 李霖灿著 摩些象形文字字典 闻宥
- 李霖灿著 摩些标音文字字典 闻宥
- 吕澄编著 汉藏佛教关系史料集 闻宥
- 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译：
高本汉中国语音学研究 陆志韦
- 徐炳昶著 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 王钟翰
- 陈寅恪著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王育伊
- 陈寅恪著 隋唐制度渊源论略稿 王钟翰
- 郭沫若著 十批判书 齐思和
- 陈安仁著 中国近世文化史 聂崇歧
- 善秉仁著 中国说部甄评 罗文达
- 怀履光著 开封犹太人史料 罗文达

学术消息

本期论文英文提要

《燕京学报》第三十一期，1946年12月

- 战国时代秦疆域考 钟凤午
- 释中原音韵 陆志韦
- 记邵雍皇极经世的‘天声地音’ 陆志韦
- 汉语句终词的研究 高名凯

中国石棚之研究		鸟居龙藏
汉故谷城长荡阴令张迁表颂集释		容媛
书评		
岁振玉著 贞松老人遗稿		容媛
李玄伯著 中国古代社会新研初稿		容媛
翦伯赞著 中国史纲第一卷		容媛
容肇祖著 明代思想史		容媛
傅芸子著 正仓考古记		容媛
梁上椿著 岩窟藏镜第二集(汉式)		容媛
萧一山著 清代通史		容媛
东亚考古学会羊头注		鸟居龙藏
福山敏雄、森畅合著 平等院画鉴		鸟居龙藏
山中重九著 日本壁画の研究		鸟居龙藏
下店静市著 唐绘 C 大和绘		鸟居龙藏
梅原末治著 东亚考古学论		安志敏
梅原末治著 支那汉代纪年铭漆器图说		安志敏
梅原末治著 汉三国六朝纪年镜图说		安志敏
长广敏雄著 带钩の研究		安志敏
鸟居龙藏著 黑龙江と北桦太	安志敏	聂崇歧
C. Martin Wilbur 著 (Slavery in China during Handynasty)		聂崇歧

学术消息

本刊二十一至三十引得篇名

撰者人名

学术界消息

出版界消息本期论文英文提要

《燕京学报》第三十二期，1947年6月

水经注校、补质疑		钟凤年
满官汉释		聂崇岐
汉语之表意语法		高名凯
能仁与仁祠		周一良
记蓝茂韵略易通		陆志韦
记徐孝重订司马温公等韵图经		陆志韦
周代锡命礼考		齐思和
书评		
钱玄同辑	刘申叔先生遗书	容 媛
郭沫若著	青铜时代	容 媛
陈恭禄著	中国史第一册	徐宗元
童书业著	春秋史	齐思和
翦伯赞著	中国史纲第二册	安志敏
劳干著	居延汉简考释	安志敏
金毓黻著	中国史学史	齐思和
学术消息		
本期论文英文提要		

《燕京学报》第三十三期，1947年12月

中国细时期文化略说		裴文中
奴儿干都司考		鸟居龙藏
殷墟之石刀		安志敏
楚辞韵释		陆志韦
记异拱宸韵略汇通		陆志韦
金尼阁西儒耳目资所记的音		陆志韦

福州语之语丛声母同化		高名凯
史地辨疑		钟风年
吴三桂与三海关之战		王崇武
商鞅变法考		齐思和
宋役法述		聂崇歧
书评		
罗氏墨像堂刊	待时轩丛刊	容 媛
潘景郑编	海盐张氏涉园藏书目录	容 媛
郭绍虞著	中国文学批评史（下册）	阎简弼
陆志韦著	古音说略	阎简弼
劳干著	居延汉简考释	周 桓
李济等编	中国考古学报	安志敏
郑振铎编	西域画（上辑）	容 媛
郭沫若著	屈原研究	容 媛
凤岗及门弟子编	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	邓之诚

学术消息

本期论文英文提要

《燕京学报》第三十四期，1948年6月

记五方元音	陆志韦
记三教经书文字根本	陆志韦
国语入声演变小注	陆志韦
论古韵合怙屑没曷五部之通转	俞 敏
唐代禅家语录所见的语法成分	高名凯
论宋太祖收兵权	聂崇歧
金上京城佛寺考	鸟居龙藏
清代边制述略	陈芳芝

六国纪年表	陈梦家
论语注疏汇考	梁启雄
梁颙的中状元的岁期年寿跟其他	阎简弼
战国策著作时代考	齐思和
书评	
广东丛书编纂委员会编辑	
广东丛书第一集	容 媛
高名凯著 汉语语法论	林 焘
史岩著 敦煌石室画像题识	容 媛
商承祚著 长沙古物闻见记	容 媛
江藩遗稿 炳独斋杂著	容 媛
林语堂著 The Gay Genius; Life and Times of Su Tung	
Po	聂崇歧

学术消息

本期论文英文提要

《燕京学报》第三十五期，1948年12月

中国语言学及民俗学之地理的研究	贺登崧
古汉语里面的连音变读 (Sandhi) 现象	俞 敏
论古汉语之腭界音	王静如
梁译大乘起信论智伪割序中之真史料	陈寅恪
孟子井田说辨	齐思和
金上城及其文化	鸟居龙藏
敦煌写本杂钞考	周一良
古陶残器絮语	王 襄
白衣天子试释	唐长孺
书评	

王力著	中国语法理论	高名凯
陆志韦著	诗韵谱	阎简弼
杨大鈿著	禹贡地理今释	周 桓
朱师辙著	商君书解诂定本	齐思和
苏秉琦著	斗鸡台沟东区墓葬	安志敏
裴文中著	史前时期之西北	安志敏
张尔田著	遁堪文集	齐思和
闻一多著	闻一多全集	容 媛
钱钟书著	谈艺录	阎简弼
顾廷龙编	番禺叶氏遐庵藏书目录	容 媛

学术消息

本期论文英文提要

《燕京学报》第三十六期，1949年6月

牟子理惑论时代考	周一良
辽上京城内遗存之石人考	鸟居龙藏
古汉语里的俚语俗源	俞 敏
沙锅屯洞层位之研究	安志敏
释甥	俞 敏
六国纪年表考证	陈梦家
汉郎中郑固碑集释	容 媛
元曲家考略	孙楷第
清世宗夺嫡考实	王钟翰
毛诗谷名考	齐思和
书评	
董同和著 上古音韵表	林 焘
Forrest 著 The Chinese Language	俞 敏

金同甲编	龟甲文	徐宗元
裘文中著	中国史前时期之研究	安志敏
李世繁著	颜李学派	齐思和

学术消息

本期论文英文提要

《燕京学报》第三十七期，1949 年 12 月

重文例		于省吾
中国发现之上古铜犁考		陆懋德
公孙龙的辨学		张东荪
乞活考		周一良
汉语的“其”跟藏语的 gi		俞敏
史记体例溯源		程金造
真本石头记之脂砚斋评		周汝昌
六国纪年表考证下篇		陈梦家
契丹国书管窥		罗福颐
书评		
蒋玄怡著	长沙楚民族及其艺术	安志敏
梁思永等编	中国考古学报第四册	安志敏
张一磨撰	心太平室文集	齐思和
莫伯骥撰	五十万卷楼藏书跋文	容媛

学术消息

本期论文英文提要

《燕京学报》第三十八期，1950 年 6 月

经典释文异文之分析	林焘、陆志韦
书经顾命篇侍臣执兵器考	陆懋德

滕县汉石画记		王 襄
辽中京城内遗存之二石		冯居龙藏
中国哲学史上佛教思想之地位		张东荪
香奁集跟韩偓		阎简弼
努儿哈赤受明封赏考实		张鸿翔
胤禛西征纪实		王钟翰
书评		
罗常培著	语言与文化	俞 敏
杨丙辰译	汤若望传	齐思和
金毓黻编	明清内阁大库史料	容 媛
许大龄著	清代捐纳制度	陈仲夫
Anderson 著	Researchs into the Prehistory of the Chinese People	安志敏
Rowley 著	Principles of Chinese Painting	高名凯
学术消息		
本期论文英文提要		

《燕京学报》第三十九期，1950 年 12 月

元曲家考略续篇		孙楷第
北朝的民族问题与民族政策		周一良
殷代的矢射考略		王西征
易卦的来历		陈温桂
北京西郊发见的瓮棺		安志敏、伊秉枢
魏源与晚清学风		齐思和
魏季子白盘研究		陆懋德
读通鉴札记		吴兴华
书评		

顾颉刚著	浪口村随笔	容媛
贾兰坡著	北京猿人	安志敏
沈玉清著	广东从贴叙录	容媛
曾毅公著	甲骨文缀合编	徐宗元
邓嗣禹著	New Light on the History of the Taiping Rebellion	王钟翰

学术消息

本期论文英文提要

《燕京学报》第四十期，1951年6月

甲骨断代学甲篇	陈梦家
经典释文异文之分析	陆志韦
语法杂识	高名凯
什么叫一个词?	俞敏
中国古文数名考原	陆懋德
辽上京城以南伊克山上之辽代佛刹 书评	鸟居龙藏
陆志韦著 北京话单音词汇	俞敏
陈寅恪著 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	容媛
蒋玄伯著 长沙楚民族及其艺术	安志敏
陈述著 契丹史论证稿	鸟居龙藏

学术消息

燕京学报专号目录

1. 中国明器	郑德坤、沈维钧合著	1933
2. 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	向达	1933
3. 明史纂修考	李晋华	1933

4. 嘉靖御倭江浙主客军考	黎光明	1933
5. 辽史源流考与辽史初校	冯家升	1933
6. 明代倭寇考略	陆懋恒	1934
7. 明史佛郎机吕宋和兰意大利亚四传注释	张维华	1934
8. 三皇考	顾颉刚、场向奎	1936
9. 宋元南戏百一录	钱南扬	1934
10. 吴恪斋先生年谱	顾廷龙	1935
11. 国策勘研	钟凤年	1936
12. 南戏拾遗	陆侃如、冯沅君	1936
13. 14. 宋诗话辑佚	郭绍虞校辑	1937
15. 中英滇缅疆界问题	张诚孙	1937
16. 元代社会阶级制度	蒙思明	1938
17. 18. 商周彝器通考	容庚	1941
19. 晚清五十年经济思想史	赵丰田	1939
20. 古音说略	陆志韦	1947
21. 诗韵谱	陆志韦	1948
22. 清代捐纳制度	许大龄	1950
23. 中国史前考古学书目	安志敏	1951

《辅仁学志》总目

《辅仁学志》第一卷第一期，1928年12月

中国造纸术输入欧洲考	姚士鳌
从古器款识上推寻六书以前之文字画	沈兼士

唐时非洲黑奴人中国考	张星烺
跋幸存录	朱希祖
四库总目索引与四库撰人录	鞠增玉
新嘉量之校量及推算	刘 复

《辅仁学志》第一卷第二期，1929年9月

周公子明两器	柯昌泗译文
中国人种中印度日尔曼分子	张星烺
旧时宪法编制法	常福元
史学工具书努力者：汪辉祖年谱	陈 让
续书楼藏书记	伦 明
蒙古史发凡	柯劳斯教授著，从吾译并注

《辅仁学志》第二卷第一期，1930年1月

汉官印跋四篇	柯昌泗
宋尚书礼部郎中上护军范阳县开国伯祖上衡墓志铭跋	柯昌泗
释午	魏建功
四库总目韵编勘误	那志廉
孔子生日之国历日期	常福元
许伯政谭云两书之比较	常福元
古代浊声考	敖士英
从五音六律说到三百六十种	刘 复

《辅仁学志》第三卷第一期，1932年1月

晋辟雍碑考证	余嘉锡
清代两个人辑佚家评传	王重民
中亚史地译丛	伯希和，冯承钧译

记姬_肅葬铭释例 魏建功

《辅仁学志》第三卷第二期，1932^年 7 月

雍乾间奉天主教之宗室 陈 垣

建文逊国考疑 伦 明

明外族赐姓考 张鸿翔

楼兰鄯善问题 冯承钧

清初市音家赵绍其及其贡献 赵荫棠

《辅仁学志》第四卷第一期，1933 年 12 月

宋徽宗谋复燕云之失败 陈乐素

四库提要辨证 余嘉锡

唱诺考 孙楷第

苍颉篇辑本述评 王重民

宝应刘楚桢先生年谱 刘文兴

《辅仁学志》第四卷第二期，1934^年 6 月

汉书西域传康居校释 岑仲勉

汉书西域传奄蔡校释 岑仲勉

元代几个南家台 冯承钧

明外族赐姓续考 张鸿翔

切韵指掌图撰述年代考 赵荫棠

汉池阳令张君残碑年代考 余嘉锡

《辅仁学志》第五卷第一、二合期，1936 年 12 月

吴渔山普铎二百五十周年纪念 陈 垣

再说钦察 岑仲勉

吕留良及其思想	容肇祖
明史卷一五六诸臣世系表	张鸿翔
广陵散考	戴明扬
实录考	赵士炜

《辅仁学志》第六卷第一、二合期，1937年6月

吴渔山先生年谱	陈 垣
小说家出于裨官考	余嘉锡
汉书西夜传校释	岑仲勉
明清等韵之北音系统	赵荫棠
何心隐及其思想	容肇祖
新唐书突厥传拟注	岑仲勉
跋突厥文阙特勤碑	岑仲勉

《辅仁学志》第七卷第一、二卷合期，1938年12月

汤若望与木陈忞	陈 垣
寒石散考	余嘉锡
清太祖实录纂修考	方苏生
智君子鉴考	唐 兰
原始鼎铉之推测	刘厚滋
宋代摩尼教	牟润孙
山水画南北宗说考	启 功
恭王府沿革考略	单士元
景宋本刊谬正俗校记	周祖谟
突厥本回鹘英武威远毗伽可汗碑译释	王静如

《辅仁学志》第八卷第一期，1939年6月

语录与顺治宫廷	陈垣
辽金北边部族考	冯承钧
弥撒祭考	英千里
崇祯帝之撒象与信仰	牟润孙
吴昌龄与杂剧西游记	孙楷第
清列朝后妃传稿订补	方苏生
论文选音残卷之作者及其音反	周祖谟
陶渊民述酒诗补注	储皖峰

《辅仁学志》第八卷第二期，1939年12月

杀祭古语同源考	沈兼
宋江三十六人考实	余嘉锡
释屯	于省吾
明西北归化人世系表	张鸿翔
嘉庆丙寅上谕中之贺清泰	冯承钧
清实录修改问题	方甦生
故宫文献馆所藏之清代外交史料	张德泽

《辅仁学志》第九卷第一期，1940年6月

汉武伐大宛为改良马政考	余嘉锡
陈氏切韵考辨误	周祖谟
读天壤阁甲骨文存及考释	魏建功
张石琴与太谷学派	刘厚滋
唐帝诞辰祝贺考	叶德禄
广韵诱夺读举正	葛信益

《辅仁学志》第九卷第二期，1940年12月

请初僧诤记	陈 垣
明失辽东考原	赵光贤
鞞公楚辞音之协韵说与楚音	周祖谟
蔑历解	戴君仁
释氏疑年录通检	赵卫邦，叶德禄

《辅仁学志》第十卷第一、二合期，1941年12月

疑年录稽疑	余嘉锡
明末殉国者陈于阶传	陈 垣
明失辽东考原（续）	赵光贤
市母古音考	周祖谟
崔浩与其政敌	牟润孙
宋宦官参与军事考	柴德廣
四库提要宣室志考证	叶德禄

《辅仁学志》第十一卷第一、二合期，1942年12月

高车之西徙与车师鄯善国人之分散	冯承钧
王粲不慧有心疾论辨	余嘉锡
书全谢山先侍郎府君生辰记	陈 垣
近代戏剧原出宋傀儡影戏考	孙楷第
袒裼 但马 剗袜	沈兼士
早期道教之政治信念	余 逊
七曜历人中国考	叶德禄
联绵字浅说	孙德宣

疑年录释疑

冯先恕

《辅仁学志》第十二卷第一、二合期，1943 年 12 月

北魏六镇考辨

朱师辙

古音无邪纽补证

戴君仁

南朝之北土地位

余 逊

鲒埼亭集谢三宾考

柴德赓

清初诸王争国记

赵光贤

北宋校刊南北八使诸臣考

陈 垣

颜氏家训音辞篇注补

周祖谟

宋代汴洛语音考

周祖谟

黄东发之卒年

陈 垣

李志常之卒年

陈 垣

述也是园旧藏古今杂剧考跋

李玄伯

原刻初本亭林文集跋

叶德禄

《辅仁学志》第十三卷第一、二合期，1945 年 12 月

杨家将故事考信录

余嘉锡

石鼓文研究三事质疑

沈兼士

梁鼓角横吹曲用北歌辨

孙楷第

四声别义释例

周祖谟

胡三省生卒行历考

周祖谟

通鉴胡注表微（上）

陈 垣

《辅仁学志》第十四卷第一、二期合刊，1946 年 12 月

通鉴胡注表微（下）

陈 垣

陈之昂及其文集之事迹

岑仲勉

弥天释道安著作辑目	岑仲勉
齐子仲姜傅之鬯叔即鲍叔说	杨树达
宋亡后仕元之儒学教授	周祖谟
急就篇章草本考	启 功
草书在文字学上之新认识	魏建功

《辅仁学志》第十五卷第一、二合期，1947年12月

太史公书亡篇考	余嘉锡
日知录停年格条注引辛瑛考	陈 垣
唐代胡商与珠宝	叶德禄
唐章怀太子贤所生母稽疑	孙楷第
题蔡宽夫诗话	陈 垣
阿保机营建四楼说证误	陈 述
归潜志作者刘祁	鹿焯世
宋元僧史三种述评	陈 垣
全谢山与胡稚威	柴德赓
跋邵念鲁年谱	柴德赓
记贵阳本书日答问兼论答问补正	柴德赓
韩非子集释删要	陈奇猷
王西庄先生年谱	黄文相
顾亭林画与顾亭林之得名	刘迺誥

《中国文化研究汇刊》

《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一卷

金陵大学、华西大学编辑，1942 年 9 月出版

秦代钟鐻金人之艺术学的考察	史 岩
栢柱	商承祚
嵩县唐墓所出铁翦铜尺及墓志之考释	孙次舟
契丹民族丧葬制度之变迁及其特点	刘铭恕
建安时代之政治思想	刘国钧
古代巴蜀与中原的关系说及其批判	顾颉刚
读蒙古世系谱	韩儒林
新元史氏族表蒙古部族分类质疑	张蓉初
Some Western materials on the Panthay	
Rebellion of 1856—1873	M. R. Norins
论汉藏语族中 M>N 之演化	闻 宥
A Review of E. D. Edwards. Chinese Prose	
Literature of T'ang Period (London, 1937—8)	吕 湘

《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二卷

金陵大学、华西大学、齐鲁大学编辑，1942 年 9 月出版

殷代年岁称谓考	胡厚宣
汉河西四郡建置年代考疑	张维华
两汉郡县属吏考	严耕望
两汉诏举考	孔玉芳
隋黎阳河阳常平广通与洛回洛六仓考	王伊同
论宋代相权	钱 穆
四十余年前之联俄外交	沈 铨
说文所称古文释例	孙次舟

说文谱声字之分析	甄尚灵
现代汉语动词形容词介词为一类说	傅懋绩
“相”字偏指释例	吕 湘
论汉藏语中若干 T>M 之现象	闻 宥
古玉兵杂考	蒋大沂
汉武梁祠画像中黄帝蚩尤古战图考	刘铭恕
古书评三种总考	史 岩
广西象平间徭民之占卜符咒与禁忌	徐益棠
大花苜移入鸟撒传说考	杨汉先
英文提要	

《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三卷

金陵大学、华西大学、齐鲁大学编，1943 年 9 月出版

汉武帝伐大宛与方士思想	张维华
西汉郡县属吏考补正	严耕望
东汉诏举制度考	孔玉芳
五胡通考	王伊同
周濂溪年谱	许毓峰
郑和航海事迹之再探	刘铭恕
论汉字意符之范围	甄尚灵
歌戈麻古音新考	张维忠
论‘底’‘地’之辨及‘底’字的由来	吕 湘
‘见’字之指代作用	吕 湘
维西摩些语汇	傅懋绩
汉川瓦寺纽羌语音系	闻 宥
论戈秘之形式	蒋大沂
宋季翰林图画院暨画学史实系年	史 岩

八思巴字大元通宝跋	韩儒林
凉山罗保民之类政治的组织	徐益棠
大花苗的氏族	杨汉先
英文提要	

《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四卷（上）

齐鲁大学、华西大学、金陵大学、燕京大学编辑，

1944年9月出版

气候变迁与殷代气候之检讨	胡厚宣
殷末周初日月食考	刘朝阳
井田制度探原	徐中舒
连昌宫词笺证	陈寅恪
苏莱曼东游记证闻	刘铭恕
南宋杭州之都市的发展	徐益棠
英文提要	

第四卷（下）

1944年9月出版

先秦语音之发声	张维思
论形声字意符之部位	甄尚灵
与动词后‘得’与‘不’有关之词序问题	吕 湘
古台语喉塞音及带塞音声母对于剥隘声调系统之影响	李方柱
成都儿童间的秘密语	刘念和
论嘉戎语动词之人称尾词	闻 宥
巴黎所藏敦煌老子写本综考	唐文播
抱朴子外篇补正	杨明照
英文提要	

《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五卷

燕京大学、金陵大学、齐鲁大学、华西大学编辑，

1945年9月出版

夏书日食考	刘朝阳
宋代平时的社会救济行政	徐益棠
宋代海上通商史杂考	刘铭恕
中国古代医药卫生考	束世澄
宋代出版法对辽金之书禁	刘铭恕
语源蠡测	张维思
论唐蕃会盟碑中所见之藏语前置子音与添首子音	闻宥
‘个’字的应用范围，附论单位词前‘一’的脱落	吕湘
汉字俗解小考	甄尚灵
巴黎所藏敦煌老子写卷翻记	唐文播
汉书颜注发覆	杨明照
三国志裴注考证	王钟翰

《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六卷

金陵大学、华西大学，1946年9月出版

吕氏春秋撰著考	缪 钺
释判涣	葛毅卿
崖墓稽古录	刘铭恕
辽代帝后之再生仪	刘铭恕
南京之人文区域	徐益棠
敦煌老子写卷‘系师定河上真人章句’考	唐文播
宋代辽金文化之南渐	刘铭恕
吕氏春秋中音乐理论	缪 钺

南京紫竹林与古代分科大学	徐益棠
论摩些文写本之形式	闻宥
中日战争时期大后方之汉学研究	傅吾康
诸家英译中国诗杂论	吕湘
西文提要	

《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七卷

金陵大学、华西大学编辑，1947年9月出版

两周金文所见职官考	斯维至
中国南北人口之升降	徐益棠
文选赋笺	缪钺
宋代陷北之美术考古家毕少董	刘铭恕
辽代之头鹅宴与头鱼宴	刘铭恕
金元之南家与宋代之口语文学	刘铭恕
元代之户口青册	刘铭恕
明史要目解题初稿（英文）	傅吾康
丹阳话里的联词变调	吕湘
大理情歌	葛毅脚
川滇黔彝文之比较	闻宥
赵元任杨联升合编（汉英）“国语字典”评价	吕湘
本期各篇西文提要	

《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八卷

华西大学编辑，1948年9月出版

殷代风之神话	斯维至
清谈与魏晋政治	缪钺
颜延之年谱	缪钺

襄阳与寿春在南北战争中之地位	徐益棠
唐代之仓储制度及其他	徐益棠
唐代归化之何国僧伽大师	刘铭恕
元代安南进贡之代身金人	刘铭恕
元代之只孙校尉	刘铭恕
元西域曲家阿里耀卿父子	刘铭恕
‘把’字用法的研究	吕 湘
记西片夷语的元音	闻 宥
南宋说话人四家的分法	王钟麟
本刊西文提要	

《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九卷

华西大学编辑，1950 年出版

黄河流域穴居遗迹考	徐中舒
秦祠白帝解	赵卫邦
南北朝之物价	缪 钺
北魏三长制年月考	缪 钺
僚族杂考	王文才
苻苻传事迹考	孙 望
歹字形声义及其制作年代	徐 复
元代之救济行政与法制	徐益棠
补元史仓官表	徐益棠
明代之救济行政	徐益棠
南京在中国文学史上之地位	胡光炜

《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十卷

华西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化研究所编辑，1951 年出版

北魏之鲜卑语	缪 钺
古藏语中浊破裂音与浊音塞擦音	A. A. Dragunov 张咏言译
中国人肱骨之研究	党 华
西康会理的 赞人	赵卫邦
教坊记笺订	任二北
彝族体质测量之绝对值	颜 闾
汉传羌语词汇篇 (附拉丁化文字初稿)	闻 宥

附录三

主要外国人名译表

A

阿伯拉罕姆

C. E. Abraham

阿姆斯特朗

Mervyn Armstrong

奥斯汀

Warren R. Austin

奥图尔

George Barry O'Toole

安特生

Johann G. Andersson

B

巴顿

Ernst D. Burton

巴敦

James L. Barton

白晋

Joachim Bouvet

鲍润生

Francis Xaiety; Biallas

贝德士

Miner Searle Bates

毕乃德

Knight Biggerstaff

毕律斯

Eisie M. Priest

伯希和

Pavl Pelliot

博晨光

Lucius Chapin Porter

卜道成	Joseph Percy Bruce
卜德	Derk Bodde
卜昉济	Francis Lister Hawks Pott
包文	Arthar J. Bowen
文惠廉	William J. Boone
白威淑珍	Suzanne Wilson Barnett

C

蔡宁	Mario Zanin
陈毓贤	Susan Chan Egan
徐光荣	Roderick Scott

D

戴德华	George Tarlor
戴密微	Paví Demievlite
戴维斯	Arthur
狄百瑞	Wm. Theodore deBarry
狄考文	C. W. Mateer
狄德满	Gary Tiedmann
丁韪良	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
董纳姆	Wallace Donham
杜赫德	J. B. Du Halde

F

冯秉正	Joseph Anne De Mailla
冯吕黎	W. B. Bonnell
傅兰雅	John Fryer

福开森	John C. Ferguson
福克斯	Walter Fuchs
福赛斯	S. A. Forsythe
富善	Chauncey Goodrich
富路特	Luther C. Goodrich
傅吾康	Wolfgang Franke
费正清	John King Fairbank
法思远	Robert C. Forsythe

G

钢和泰	Stael—Holstein, Alexander von
高第	Henri Cordier
高厚德	Howard Spilman Galt
葛维汉	David C. Graharn
葛德石	George B. Cressey
顾立雅	Herrlee G. Creel
顾盛德	Koster Hermann
郭士立	Charles Gutzlaff
郭查理	Charles H. Corbett

H

海陶玮	James R. Hightower
何伟业	James Hevia
花之安	Ernst Faber
霍尔	Charles Martin Hall
韩山文	Theodore Hambery

I

艾克	G. Ecke
艾约瑟	Joseph Edkins

J

嘉德纳	Charles S. Gardner
金尼阁	Nicolas Trigault
季理裴	Donald Mac Gillivray

K

克雷夫	Francis W. Cleaves
克劳佛德	Hanford Cramford
柯睿格	Edward A. Kracke
凯德	George N. Kates
柯文	Pavl Cohen
库寿龄	Samuel Couling
柯约翰	John Coc

L

拉铁摩尔	Owen Lattimore
赖德烈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雷冕	Rvdolf Rahmann
利玛窦	Matthiev Ricci
李明	Louis Le Comte
李佳白	Gilbert Reid
李承恩	Nathan J. Plumb

李提摩太	Richard Timothy
李约瑟	Joseph G. Needham
理雅各	James Legge
力为廉	W. H. Lacy
林乐知	Young J. Allen
龙华民	Nicholas Longobardi
鲁珍晞	Jessie G. Lutz
路思义	Henry winters Luce
罗炳生	Edwin Cariyle Loenstine
罗利	Rowley

M

马伯乐	H. Maspero
马礼逊	Robert Morrison
麦都思	Walter H. Medhurst
门多萨	Jvan Gonzalez de Mendoza
孟禄	Pau Monroe
孟斯达特	A. Mostaert
米怜	William Milne
明恩溥	Arthur L. Smith
明义士	James Mello Menzies

P

潘慎文	Alvin L. Parker
派特鲁奇	Petrveci
裴士丹	Daniel H. Bays
普利斯特	Elsie Priest

Q

钱德明 *Jean Joseph Marie Amiot*

R

芮歌尼 *Harold W. Rigney*

仁维克 *W. L. Renwick*

芮活寿 *Arthur F. Wright*

S

沙普德 *Farley*

施约瑟 *Schereschewsky*

史考特 *Scott*

史密斯 *Edward L. Smith*

史玛莉 *Martha Smalley*

宋君荣 *Avoine Gaubil*

W

瓦尔纳 *Langdon Wamer*

王克私 *Philippe de Vargas*

卫德明 *Helmut Wilhelm*

卫匡国 *Mari Martini*

伟烈亚力 *Alexander Wylie*

尉礼贤 *Richard Wilhelm*

文惠廉 *William Jones Boone*

卫三畏 *Samuel Wells Williams*

魏鲁男 *James R. Ware*

魏思特	Philip West
武林古	F. Chlinger

X

西克门	Lawrence C. S. Sickman
香使文	Benjamin Couch Henry
谢礼士	E. Schierlitz
谢卫楼	Devello Z. Sheffield
谢威德	Koster Hermann
修中诚	E. R. Hughie

Y

晏文士	Charles Keyser Edmunds
晏马太	Matthew Tyson Yates
叶绥夫	Serge Elisseeff
约翰逊	Homer H. Johnson
庄斯倾	Mary E. Johnston
伊凤阁	Alekesi Ivaovich Ivanov

Z

张诚	Jean Francosi Gerbillon
----	-------------------------

附录四

主要参考书目

一、档案资料

齐鲁大学档案，济南，山东省档案馆藏

Archives of the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archives and Manuscripts. Group Number 11. Compiled by Martha Lund Smalley & Karen Jordan.

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档案及手稿缩微胶卷第 11 组，耶鲁神学院图书馆史玛莉、凯伦·乔丹编口，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宗教系藏。

二、图书资料

(一) 中文书目

(1) 校史资料

- 《东吴学报》，东吴大学编，1919，1920，1921 年。
- 《福建文化》，福建协和大学福建文化研究会，福州，1931 年。
- 《协大艺文》，福建协和大学国文系，福州，1935 年。
- 《协大学报》，福建协和大学，福州，1949 年。
- 《协大校友》，第 37、38 号合刊，福建协和大学，福州。
- 《辅仁学志》，辅仁大学学报编辑委员会编，1928 年—1943 年，1945—1947 年，北京。
- 《私立北平辅仁大学一览》，辅仁大学，北京，1938 年，陈垣署。
- 辅仁大学校友会编委会编：《风云录》，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5 年。
- 辅仁大学校友会编：《辅仁校友通讯》，北京。
- 《辅大五十年》，台北，辅大出版社 1979 年。
- 《华大校刊》，华西协合大学，成都，1949 年。
- 《中国文化研究所集刊》，华西协合大学，成都，1943 年。
- 《沪江大学纪念集》，沪江大学校友会编，上海 1986 年。
- 《金陵大学学报》，金陵大学学报编委会，南京 1931 年—1938 年。
- 《金陵大学史料集》，南京大学高教研究所校史编写组编，南京大学出版社 1989 年。
- 《金陵大学建校一百周年纪念册》，南京大学出版社 1988 年。
- 《永久的思念》，金女大校友会编，南京。
- 《岭南学报》，岭南大学学报编委会，广州，1929—1937 年，1945—1950 年。
- 《岭南大学校报》，广州，1—70 号。
- 《抗战期间的岭南》，岭南大学编，广州中山文献馆藏。
- 王元德，刘玉峰：《文会馆志》，潍县广文学堂 1913 年。
- 《齐大季刊》，齐鲁大学国学所，济南，1931 年。

- 《(齐鲁)国学汇编》，齐鲁大学国学所，济南，1931年。
- 《贲善》半月刊，齐鲁大学国学所，成都，1941年。
- 《齐鲁学报》第一号，齐鲁大学，成都，1941年。
- 《圣约翰大学五十年史略》，圣约翰大学出版委员会编。
- 《燕京学报》，燕京大学学报编辑委员会编，北京，1929—1941年，1946—1951年。
- 《史学年报》，燕京大学史学会编，北平，1929—1941年。
- 《文学年报》，燕京大学国文学会编，北平，1932年，1936—1941年。
- 《燕京社会科学》，燕京大学法学院编，北京，第一期（1948），第二期（1949）。
- 《燕大文史资料》，北京大学出版社，第一一九辑（1988起）
- 《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一至十卷，华西大学金陵大学创办，齐鲁大学和燕京大学曾参与数卷编辑，第十卷由华西大学编辑。成都，1942—1952年。
- 金陵神学志社委员会编：《金陵神学志》第二十六卷，南京，1950年11月。
- 《北平各大学的状况》，北平，新晨报印刷部，1930年。
- 《二十三年度全国高等教育统计》，教育部统计室编，1936年10月。
- 《抗战前十年之中国》，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书日第82种，
- 《中华基督教会年鉴》
- 李楚才编著：《帝国主义侵华教育史料——教会教育》，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7年7月。
- 潘懋元等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高等教育》，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3年。
- 舒新城编：《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中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61年。

钟叔河等编：《过去的学校——回忆录》，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2 年。

朱有璩等编：《中国近代学制史资料汇编——教育行政机构及教育团体》，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3 年。

朱有璩、高时良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四辑（简称《学制史料》），上海，华东师大出版社 1993 年。

《济南文史资料选辑》第五辑，济南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1984 年。

《江苏省文史资料》第十三辑，江苏省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南京。

《解放前上海的学校》，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年。

《上海地方史资料》第四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986 年。

《上海文史资料》第四十七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年。

《四川近现代文化人物续编》，四川人民出版社 1989 年。

《文史资料精选》第二册，中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编，中国文史出版社。

(2) 有关校史

高时良主编：《中国教会学校史》，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4 年。

《复旦大学志》，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1985 年。

华西校史编委会：《华西医科大学校史（1910—1985）》，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 1990 年。

李瑞明编：《岭南大学》，岭南（大学）筹募发展委员会 1997 年。

山东大学校史编写组：《山东大学校史（1901—1966）》，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 1986 年。

王德滋主编：《南京大学史》，南京大学出版社 1992 年。

汪文汉、宋才发等编：《华中师范大学校史》，武汉，华中师范大

学出版社 1993 年。

萧超然等编著：《北京大学校史(1898—1949)》增订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88 年。

张圻福、陈少英、杨恒源编：《苏州大学校史》，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2 年。

《北京师范大学校史》，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黄福庆：《近代中国高等教育研究：国立中山大学(1924—1937)》，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 1988 年。

(3) 研究著作

(法)安田朴、谢和耐等著，耿升译：《明清间入华耶稣会士和中西文化交流》，成都，巴蜀书社 1993 年。

白刚等著：《历史学发展的趋势》，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 1989 年。

蔡仲德著：《冯友兰年谱》，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曹伯言、季维龙编：《胡适年谱》，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 1986 年。

陈学恂等编：《中国教育史研究现代分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4 年。

陈毓贤：《洪业传》，中译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6 年。

陈智超编注：《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0 年。

查时杰著：《民国基督教史论文集》，台北，宇宙光出版社 1994 年。

存萃学社編集：《陈垣先生近二十年史学论集》，崇文书店 1971 年印行。

方豪编：《马相伯(良)先生文集续编》，台北，台湾文海出版社 1972 年。

费正清：《费正清自传》，黎鸣等译。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1 年。

顾潮编：《顾颉刚年谱》，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 年。

顾溥：《顾颉刚评传》，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1995 年。

- 顾卫民：《基督教与近代中国社会》，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年。
- 顾学稼等编：《中国教会大学史论丛》，成都，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 1994 年。
- 何迪：“燕京大学与中国教育现代化”，1989 年华中师大中国教会大学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
- 胡奇光：《中国小学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7 年。
- 胡绳：《枣下论丛》，北京，人民出版社 1978 年。
- 《胡适的日记》，北京，中华书局 1985 年。
- 《胡适思想批判》，北京，三联书店 1955 年。
- 黄新宪：《基督教教育与中国社会变迁》，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 1996 年。
- 李济：《安阳》中译本，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年。
- 黎澎：《再思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5 年。
- 李永圻编：《吕思勉先生编年事辑》，上海书店 1992 年。
- 李志刚：《基督教与近代中国文化论文集》，台北，宇宙光出版社 1992 年。
- 聊城师范学院历史系等编：《傅斯年》，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1 年。
- 林志平主编：《基督教与中国本色化》，台北，宇宙光出版社 1990 年。
- 林志平主编：《中国基督教大学论文集》，台北，宇宙光出版社 1992 年。
- 林志平主编：《基督教与中国现代化》，台北，宇宙光出版社 1994 年。
- 刘乃和：《励耘承学录》，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年版。
- 辽宁大学哲学系编：《中国现代哲学史资料汇编》 1981 年版。

- 《陆定一文集》，人民出版社 1992 年。
- 罗香林：《香港与中西文化交流》，中国学社 1961 年版。
- 罗志田：“传教士与近代中西文化竞争”，见《历史研究》，北京，1996 年第 6 期。
- 鲁珍晞（卢茨）著、曾钊生译：《中国教会大学史（1850—1950 年）》，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1988 年版。
- 马敏等编：《跨越中西文化的巨人：韦卓民学术思想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武汉，华中师大出版社 1995 年。
-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蒙默编：《蒙文通学记》，三联书店 1993 年。
- 牟润孙著：《海遗杂著》，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1990 年。
- 裴化行著、管震湖译：《利玛窦神父传》上册，北京，商务印书馆 1995 年。
- 桑兵：“晚清民国时期的国学研究与西学”，《历史研究》，北京，1996 年第 5 期。
- 史静寰：《狄考文和司徒雷登在华的教育活动》，台北，文津出版社 1991 年。
- 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程宗家译，刘雪芬校，北京出版社 1982 年。
- 沈兼士著、葛信益、启功整理：《沈兼士学术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 1986 年。
- 宋家珩、李巍主编：《加拿大传教士在中国》，北京，东方出版社 1995 年。
- 孙琴安等著：《毛泽东与名人》，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3 年。
- 孙尚扬：《基督教与明末儒学》，北京，东方出版社 1994 年。
- 王尔敏：《中国文献西译书目》，台湾，商务印书馆 1975 年。
- 王立诚：《美国教会高等教育在中国：沪江大学个案研究》，博士

论文摘要 1995 年。

王成勉：《文社的盛衰——二十年代基督教本色化之个案研究》，台北，宇宙光出版社 1993 年。

《闻一多全集》，第一卷，开明书店 1948 年。

翁独健、王钟翰编：《洪业论学集》，北京，中华书局 1981 年。

吴梓明编：《中国教会大学历史文献研讨会论文集》，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1995 年。

吴梓明、梁元生主编：《中国教会大学文献目录(二)》，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学院宗教与中国社会研究中心，1996 年。

吴学昭：《吴宓与陈寅恪》，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1992 年。

谢桃坊：《中国词学史》，成都，巴蜀书社 1993 年。

夏承焘：《天风阁学词日记》，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 1984 年。

徐樱：《方桂与我五十五年》，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 年。

徐达深总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实录》第一卷（上，下）、第二卷（上），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杨宽：《历史激流中的动荡和曲折：杨宽自传》，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 1993 年。

杨天宏：《基督教与近代中国》，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俞平伯学术论著自选集》，北京，北京师范学院出版社 1992 年。

张谷、王缉国：《王力传》，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 1992 年。

张维华：《明清之际中西关系简史》，济南，齐鲁书社 1987 年。

章开沅：《南京大屠杀的历史见证》，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5 年。

章开沅：《文化传播与教会大学》，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1986 年。

章开沅、林蔚编：《中西文化与教会大学》，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1 年。

曾宪通编：《容庚选集》，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民国史研究室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中华书局香港分局 1983 年。

《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北京图书馆、《文献丛刊》编辑部及吉林省图书馆学会编辑部编，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第一、二辑（1982），第三、四、五（1983），第六辑（1984），第七、八辑（1986），第九、十辑（1987），第十一辑（1990，改为《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由陈翔华等编辑）。

《中国现代社会科学家传略》，晋阳学刊编辑部编，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第一、二辑（1982），第三、四辑（1983）。

《中国学术名著提要》编委会编：《中国学术名著提要、语言文字卷》，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1995 年。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一册，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2 年。

朱谦之：《中国哲学对欧洲的影响》，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3 年。

朱维铮编：《基督教与近代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4 年。

曾芳苗：“民国教会女子教育—‘金陵女子文理学院’，个案研究”，1996 年硕士论文。

（二）西文书目

Barnett, Suzanne Wilson and Fairbank. John King edited. *Christianity in China: Early Protestant Missionary Writing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85.

白威淑珍，费正清合编：《基督教在中国：早期新教传教士的著作》，哈佛大学历史系美国与东亚关系委员会，1985 年。

Chinese Recorder, January. 1896

《教务杂志》，1896 年 1 月。

- Chu Sin — Jan. *Wu Leichuan . A Confucian — Christian in Republican China* . Peter Lang Publishing. Inc . New York . 1995.
- 朱心然:《吴雷川——一个民国时期的儒家基督教徒》,皮特·兰出版公司,纽约,1995年。
- Coe John., *Huachung University* .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 . New York . 1962
- 柯约翰:《华中大学》,中国基督教大学联合董事会,纽约,1955年。
- Corbett. Charles H. . *Shantung Christian University (Cheeloo)* .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 . 1955. New York.
- 郭查理:《山东基督教大学(齐鲁)》,中国基督教大学联合董事会,纽约,1955年。
- Day Clarence B. *Hangchow University*,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 New York. 1955. 戴,克莱伦斯:《杭州大学》,中国基督教大学联合董事会,纽约,1955年。
- Edward. Dwight W. . *Yenching University*, New York.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 1959.
- 爱得华,德华特:《燕京大学》,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纽约,1959年。
- Egan. Susan Chan. *A Latter day Confuciar . Reminiscences of William Hung (1893 — 1980)*.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Cambridge . 1987.
- 陈毓贤:《洪业传》,亚洲研究学会,哈佛大学出版社,1987年。
- Franke . Wolfgang . *Sinological Research Work in Free China during the War Period 1937 — 1945 in Bulletin of Chinese*

Studies, Vol 6 . pp137—171.

傅康开：《抗战时期大后方的汉学研究》，见《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六卷。

Forsythe . S. A. . *An American Missionary Community in China. 1895—1905.* Harvard Universtity Press. Cambridge 1971.

福赛斯：《一个美国在华传教团体：1895—1905》，哈佛大学出版社，1971年。

Forsythe. R.C. . *Shantung . the Sacred Province of China.* Shanghai . 1912.

法思远：《山东：中国的神圣省》，上海，1912年。

Lamberton Mary. *St. John's University. Shanghai 1879—1947, Hong Kong.* 1988.

兰伯顿，玛瑞：《圣约翰大学》，香港，1988年。

Legge. Helen E. . *James Legge. Missionary and Scholar*, London. Religious Tract Society . 1905.

理海伦：《理雅各：传教士和学者》，伦敦，1905年。

Leung, Philip Y. S. . 'Chinese Studies at Yenching . Core or Periphery' . paper presented the conference on 'The Yenching Experience and Chinece Higher Education. held at Claremont Mckenna Colloge . USA in May 1996.'

梁元生：《中国学研究在燕京：核心还是边缘？》，论文稿。

Nance. W.B. . *Soochow University* United Board for Chriltian Colleges in China . Nwe York. 1956.

南思：《东吴大学》，纽约，1956年。

Scott. Roderick. *Fukien Christian University.*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 New York. 1954.

徐光荣：《福建基督教大学》，纽约，1954年。

Thurston . Lawrence & Ruth M. Chester. *Ginling College*,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Colleges in China . New York. 1955.

德本康等:《金陵女子学院》,纽约,1955年。

Varg. P. A. . *Missionaries . Chinese and Diplomats. the American Protestant Missionary Movement in China . 1890 - 1952*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8.

瓦格:《传教士,中国人和外交官,在华美国新教传教运动》,普林斯顿,1958年。

West. Philip. *Yenching University and Sino—Western Relations . 1916—1952*,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1976.

魏思特:《燕京大学和中美关系》,哈佛大学出版社,1976年。

Yeh. Wen—Hsin. *The Alienated Academy. Culture and Politics in Republican China . 1919—1937*,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叶文心:《离异的学府:民国政治与文化》,哈佛大学出版社,1990年。